

目录

1 十五、十六世纪

- 1.1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
 - 1.1.1 文艺复兴时代概述
 - 1.1.2 亚威农时期
 - 1.1.3 回到罗马
 - 1.1.4 西方教会大分裂
 - 1.1.5 康斯坦斯会议
 - 1.1.6 从马丁五世到利奥十世
 - 1.1.7 教会内的生活
 - 1.1.8 异端的传播
 - 1.1.9 人文主义
- 1.2 新教的产生
 - 1.2.1 马丁·路德的生平
 - 1.2.2 教会大赦问题
 - 1.2.3 路德派的形成
 - 1.2.4 不列颠群岛的血案
- 1.3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的革新
 - 1.3.1 自发的改革
 - 1.3.2 特力腾大公会议
 - 1.3.3 特力腾大公会议后的革新
- 1.4 文艺复兴时代及革新时代的传教事业
 - 1.4.1 新航路开辟
 - 1.4.2 美洲的传教情形
 - 1.4.3 菲律宾的传教情形
 - 1.4.4 非洲的传教情形
 - 1.4.5 印度的传教情形
 - 1.4.6 圣方济·沙勿略的传教情形
 - 1.4.7 日本的教难

2 十七、十八世纪

- 2.1 十七世纪的繁荣教会
 - 2.1.1 十七世纪概述
 - 2.1.2 圣味增爵与法国的修会改革
 - 2.1.3 其他修会的情形
 - 2.1.4 教友的生活情形
 - 2.1.5 教育与圣心敬礼

- 2.1.6 伽利略案
- 2.1.7 笛卡尔与巴斯噶
- 2.2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宗教纷扰
 - 2.2.1 杨森异端
 - 2.2.2 法兰西主义
 - 2.2.3 寂静主义
 - 2.2.4 天主教与新教
- 2.3 教会在十八世纪的情形
 - 2.3.1 十八世纪概况
 - 2.3.2 无神论的蔓延
 - 2.3.3 启蒙运动
 - 2.3.4 共济会
 - 2.3.5 教宗权利低落
 - 2.3.6 耶稣会的会难
- 2.4 十八世纪的教会生活
- 2.5 十七、十八世纪的传教事业
 - 2.5.1 传教事业概况
 - 2.5.2 加拿大的传教事业
 - 2.5.3 北美的传教事业
 - 2.5.4 印度的传教情形
 - 2.5.5 越南的传教情形
 - 2.5.6 非洲的传教情形
 - 2.5.7 关于保教权
 - 2.5.8 中南美的传教情形
 - 2.5.9 天主教回到中国
 - 2.5.10 韩国的传教过程

第三部分 近代教会时期

1 十五、十六世纪

1.1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

1.1.1 文艺复兴时代概述

前面的一部分专门介绍了中古时代前期和全盛的中期的情形。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直到十三世纪的末叶，也可以说十四世纪初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去逝为止。也就是说，自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由于蛮族的入侵、时势的变迁，基督所创立的圣教会，不久之后就取代了罗马帝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圣教会的使命原本是“出世”

的，以救人的灵魂为任务，但是，环境的变迁，使得教会也负起了“入世”的责任。从第三世纪以后，罗马的文明已经呈显出衰退的局势，幸好有基督的教会担负起，继往开来的重大工作。它一面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一面培养自己的实力，从事归化蛮族的神圣使命，教会的势力也就逐渐传播到整个欧洲。所以说，当日尔曼人进入濒临崩溃的西罗马帝国时，是圣教会从废墟中，拾起了古典文化的残骸，将它传授给新来的蛮族；当罗马帝国的政权在西方消逝之后，是圣教会当仁不让的负起了，领导和教化的责任；各教区主教也代替了地方政府。在中古时代，教会联系着各个民族，建立了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文化”。到了教宗额我略一世时，逐渐产生了所谓的“教皇国”，在长期的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的冲突，这相互之间的权力消长，构成了欧洲中古历史。在中古时代的晚期，中古的思想和制度，都逐渐的衰弱。在资本主义、专制王权、理性主义的不断冲击之下，中古的基督教世界，在十六世纪之初，终于宣告崩溃。宗教革命可以作为中古和近代之间的里程碑，许多历史学家，也称中古晚期为“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起自 1303 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去逝，到 1517 年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这是一个从中古进到近代的过渡时代，因此这里也要进入中古的晚期，因为中古晚期这个时代的事情和后面的文艺复兴以及天主教在十六世纪的革新密不可分，因此将中古晚期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放到了近代历史中来介绍。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更好说，它是教会领导地位的衰落时期。中古教会在欧洲社会的领导地位，从十一世纪 1077 年日尔曼皇帝亨利四世，为了解决他和教宗额我略七世之间的政教冲突，而引发的“卡诺沙事件”，到 1303 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和法国国王菲力普四世之间的冲突，菲力普竟然派遣军队到义大利的亚那尼，企图逮捕教宗，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年迈的教宗，经过这次的打击，不久就去逝。在这两百多年中，从逐渐兴起，而到一蹶不振，在 14 到 15 世纪的两百年中，教会历经内忧外患。到了 16 世纪初，由于马丁·路德倡导宗教革命，圣教的大一统局面，终于破裂而不可收拾。这里就是主要分析宗教革命所产生的原因。

圣教会力量的来源，是靠着教会本身所特有的两大特性，一是普遍性致公性、一是统一性致一性。所谓普遍性致公性，指的是教会，是所有人的教会，而并非是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国家、或是某一个地区的教会。这种普遍性的有形象征，是教宗的定都罗马，所以罗马的教会也称为“公教会”。而所谓的统一性致一性，指的是教会只有一个，是不能分割的，教会的有形象征是教宗、耶稣的代表伯多禄宗徒之长的继承人。14 世纪的时候，教会力量的这两大要素和特性，先后受到严重的震撼而开始动摇，先是教宗流亡亚威农，长达 70 年之久，由于这段也被称为“巴比伦流亡时期”的教宗，全都是法国人，他们的领导政策也就多少偏向法国，因此使得当时的人，怀疑教宗似乎是法国王室的教宗，而不是领导整个教会的教宗。等到教宗最后离开亚威农返回罗马后，又发生了更大的不幸，先是出现了两位闹双胞胎案的教宗，后来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教宗，互相对抗、争夺权位。一时之间教会分裂，各自拥护自认为“正统的教宗”，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西方大分裂”，时间长达 40 年之久，这真正是教会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就在这惨痛的分裂问题解决后的整一百年，马丁·路德向教会发动革命，教会的分裂终于演变成为定局，圣教会也就同时失去了有史以来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1.1.2 亚威农时期

“亚威农流亡”和“大分裂”已经足够使许多信仰不够坚定的人，对教会的使命和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发生怀疑；再加上领导者领导无方；教会的各阶层生活上的腐化，更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因此改革的呼声从四面八方而来，异端邪说的祸害也随之而起。总而言之呢，14 和 15 世纪，教会真可以说是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夹攻，几乎到了招架不住的地步，难怪有不少学者把 14 和 15，这两个世纪的教会历史，当作是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呢！

教宗鲍尼法斯八世死于 1303 年 10 月 11 日，11 天后选出本笃十一世。他是一个完全和

鲍尼法斯八世不同的人物。他善良、温柔，但却又富有毅力和自尊。他就职以后，首先采取“和解政策”，赦免法国国王菲力普四世，因为对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无礼而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也取消鲍尼法斯八世所公布的“反法国”诏令。本笃十一世希望用这种友善的态度，来改善法国和教廷之间的关系。至于在罗马方面“本笃十一世”仍然坚持，开除高隆那家族的两枢机的教籍，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本笃十一世暂时居住在贝鲁齐亚。他想要消除高隆那家族的势力之后，才再回罗马，可惜壮志未酬，他在1304年的七月七日去逝，在位不过只有八个多月而已。本笃十一世的安抚政策，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法国菲力普的野心是想控制罗马教廷，而控制教廷的最好方式是拥立一位“亲法国”的教宗，因而经过了差不多长达一年的周旋，也就是从1304年的7月18日到第二年的6月5日，菲力普终于获得他所希望的人选，法国波尔多的总主教当选为教宗，取名叫克勒孟五世。当然，罗马教廷也就进入了法王的掌握之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认为，教会从此以后也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克勒孟五世并没有出席选举教宗的会议，也没有去意大利，他只是召集枢机们去到法国的里昂，在那里举行了教宗的加冕就职典礼。然而那时候，罗马教廷还没有迁往法国，宗座的财产仍然保留在意大利的亚西西。虽然教宗克勒孟五世很想到罗马去，但却始终都住在法国的各大城市，到了1309年，才在亚威农定居下来。在法王菲力普四世的压力下，他的处境相当艰难困苦，为了解除，法王和宗座之间关系上的阻碍，教宗克勒孟五世，于是废除了《唯一至圣》的敕令，向法王表示教宗并没有意愿，要与他相互竞争现世的权益，而号称“美男子”的菲力普对教宗的这种让步，并不感到兴趣。法王却要求召集一次公开的审判会，由审判会来宣布鲍尼法斯八世是一位不合法的教宗。当然，克勒孟五世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菲力普四世的第二个要求，是要求教宗摧毁圣殿武士会，这真是一项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的要求。拿这件事来说明，法王菲力普四世控制在亚威农的教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圣殿武士会成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的巴勒斯坦，到这时候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对保护圣地和保护到圣地去朝圣的人，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在1191年，巴勒斯坦的阿克城陷入回教徒之手后，他们的存在逐渐的失去了原来的宗旨。自从圣殿武士会成立以来，受到帝王公侯的支持，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多，欧洲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会院，正因为如此，形成了一个密布的交通网，圣殿武士会逐渐开始了一项新兴的工作，从事汇款、贷款等类似现代银行业务，欧洲的帝王公侯，甚至教宗、主教也都成了圣殿武士会的债务人，法王菲力普四世就是债务人之一。整个法国一年的收入，都不足以偿还他欠圣殿武士会的债款。他之所以要摧毁圣殿武士会，一则是想要赖帐，第二是想要没收圣殿武士会在法国境内的大批财产。然而，“圣殿武士会”本身也有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他们的财富固然引起不少人的妒嫉，而债权人更不会得到债务人的欢心。他们在贷款上所用的种种不公道的方法，不禁叫人怀疑，他们和犹太人究竟有什么不同？此外，他们为了业务上的方便，又与回教徒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而使人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修会团体存在的原来目的了。他们在态度上的傲慢与不合作，在过去就曾经引起过，法王“：路易九世”和日尔曼的“腓特烈二世”的严厉批评与攻击；再就是，他们有些带有神秘色彩的礼节，使得当代的人，怀疑他们是一种变相的秘密组织，具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行为。

早在1305年时，法王“菲力普四世”就已经开始采取攻击“圣殿武士”的措施。在诺加来特计划的策划下，依序进行，先是一连串的宣传，揭发“圣殿武士会”的种种罪行，甚至不惜以诬告、或许多莫须有的罪，说他们在入会的当初，会士们必须向十字架上的耶稣吐唾沫，用以表示对耶稣的侮辱；说他们崇拜偶像，有异端之嫌；说他们有同性恋的恶行；还说他们在业务上，有各种欺诈和不义的行为。除了这最后一项，有事实的根据之外，其他的罪行都是诬告和莫须有的事。可是，在大部份欧洲的王公贵族都欠“圣殿武士会”的债的时候，这些出人意料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诬告，都会有人相信。1307年，法王“菲力普四世”下令，逮捕所有的“圣殿武士会”的会士。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因为在下令逮捕的前

一天，正是“菲力普”的弟媳出殡的日子，“圣殿武士会”的总会长还和当时的权贵们，参加了殡葬弥撒的大礼节呢！没有料到第二天竟成了阶下囚。“诺卡来特”的手下以各种严酷的刑罚，强迫武士们承认所列出来的各种罪行，一位武士曾经这么说过：“在那种严酷的刑罚下，要我承认我曾经谋杀天主，我也会招认！”对于这件惨无人道的悲剧，当时的教宗“克勒孟五世”的立场和态度又是如何呢？

教会历史的进程随着时光的流逝走进了文艺复兴时代，教会却因为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去逝，而走进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中，教廷因为义大利境内的战乱和续争而一时无法解决，同时又受到法国政治的影响，竟在法国境内的亚威农长期的住了下来，教宗也因而成为法王菲力普四世的私人教士了。法王菲力普四世为了要从圣殿武士会的手中抵赖所欠下的债，同时更想没收圣殿武士会的财产。1307年，竟然狠毒的下手逮捕并囚禁了，全法国境内的两千多名圣殿武士会的会士们，甚至还包括了该会的总会长，也成为法王菲力普四世的阶下囚。由于圣殿武士会的财产具有教会慈善事业的标记，法王菲力普需要教宗的合作，才能达到他欲取欲求的野心。为了威胁教宗克勒孟五世，法王菲力普竟然以严酷的刑罚，不择手段地强迫圣殿武士会的武士们告解，专指定会士们告那些莫须有的、被诬告的罪，迫使教宗相信圣殿武士会的会士们犯下了那些滔天大罪。那么，教宗克勒孟五世是如何来应付法王菲力普，这种惨无人道的要胁、以及对圣殿武士会的这种迫害呢？可是这位教宗是经由法王菲力普的同意而选出的。懦弱的教宗，竟像惊弓之鸟一样，生怕得罪法王而重蹈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覆辙。教宗克勒孟五世，他只能发出微弱的抗议，承认法王菲力普四世可以审查会士个人，申明圣殿武士会的问题应该是由教廷来处理，并且宣布要在1310年召开“维恩会议”，来讨论圣殿武士会的命运。可是，在会议还没有召开以前，更多的会士被捕、被迫害而死于非命。教宗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想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大会。法王菲力普四世所发动的这股反圣殿武士会的风潮，更从法国蔓延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塞普鲁斯等地，不过除了法国之外，各地的法庭在缜密的调查之后，都声明圣殿武士会无罪。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维恩会议”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教长们，根据所提供的证件，都不承认圣殿武士会的武士们所犯的罪行。但是法王菲力普四世亲自参加“维恩会议”，在法王强大的压力下，教宗克勒孟五世不得已宣布解散“圣殿武士会”，理由是这个修会有异端之嫌，如此一来，在亚威农的教宗完全向法王屈服。“维恩会议”的决定，给了法王菲力普四世在法律上的根据，去没收圣殿武士会所拥有的广大财产。菲力普一方面立刻声明对圣殿武士会的债务一律取消；同时又下令没收圣殿武士会在法国所有的不动产。在原则上“维恩会议”规定圣殿武士会的不动产，应该是归属教廷，而教廷把这些财产赠送给了医院武士会，可是菲力普却命令医院武士会应该缴交一笔可观的赎金，才能从法国政府的手中，赎回这批不动产。至于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圣殿武士会的财产，也同样的遭到了各国政付的没收。每一位会士的个人命运只是这样，有的只好还俗，有的转入了其他的修会，更有少数倔强的，则是抵抗到底，坚持自己没有罪。而他们的总会长夏克摩雷，在被逮捕后的第七年也被判用火烧死。不久以后，教宗克勒孟五世、法王菲力普四世和诺卡来特先后去逝，当时的人，都认为他们的死，是他们应得报应。相传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法王路易十六的头颅在断头台上砍下后，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人群中有人高呼：“夏克摩雷啊！你的仇已经报了！”圣殿武士会被解散摧毁的事件，揭露了亚威农教宗的无能，教宗克勒孟五世不但没有能力为正义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反而完全向恶势力投降。从此以后，亚威农的教宗们失去了他的普遍性，而给人留下了“法王的傀儡”这个不良的印象。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圣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教宗克勒孟五世在这个事件中，又重演了一次“比拉多”的角色，实在是亏善牧的职守。

教宗克勒孟五世登基的初期，原本有意要返回罗马的，但是正巧有几件紧急的事情，使得他暂时留在法国。一方面，他愿意彻底的解决教廷和法王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呢，他愿意当和事佬，想出面调停英国和法国之间，多年以来的长期战争，他希望能有一项永久性的

条约，来维持英、法两国之间的和平；此外，他还有意要组织十字军，希望能再从回教徒的手里夺回圣地。或许这一个意愿，才是他暂时居住在法国的真正原因。要想重新组织十字军，如果得不到英、法两国的支持，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教宗克勒孟五世向法王菲力普四世，作了两项让步。一是，新的教宗加冕大典，要在里昂举行，而里昂这个地方，正是法王菲力普四世可以直接控制的城市；第二项让步是教宗升任了九位新的枢机，竟然全都是法国人。而圣殿武士会的事件，也使得他无法离开法国，而这时候的罗马，也是一片混乱的情形，内战经常发生，也无法保证教宗的安全。克勒孟察觉到法王菲力普对教廷的压力，所以，他就暂时定居在法王领土以外的亚威农。亚威农是属于普房斯侯爵的封地，教宗就栖身于亚威农城的一所道明会的会院。教宗克勒孟五世虽然一再的声明要返回罗马，但是却又不采取任何的具体行动，1314年，克勒孟去逝，正好是圣殿武士会总会长夏兢摩雷被烧死后一个月。

克勒孟去逝之后，宗座的职竟然虚悬了两年多，诗人但丁曾经一再的呼吁，希望枢机们能推选出一位义大利籍的教宗，好使教廷能够迅速的重返罗马。1316年，选出的竟是亚威农的主教，取名为若望二十二世。他只不过是一位缓冲的人选，因为若望二十二世，已经72岁了，身体也很虚弱，大家都不希望他有太多的时间和太多的作为。枢机们就可以方便行事，而不会受到任何太大的限制。但是，在若望二十二世衰老的身体内，却蕴藏着一个钢铁般强硬的心灵。亚威农教廷的外形和制度，就在他长达18年的任期内，尊下了基础。他首先下令，把主教府立刻改为教宗的宫殿，又把教廷的各个部门都迁到亚威农，亚威农也从此变成了教会的中心，至于什么时候要返回罗马，若望二十二世和他的教廷，已经是不作任何的打算了。

亚威农是今天法国弗格鲁斯省的省会，位于隆河的东岸，距离里昂有一百四十多英里。在军事上，是一个容易防守的城市。为了增加教廷的土地，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又花钱买进附近的花园和房舍。若望二十二世可以说是十四世纪最为重要的教宗，他擅长法律和行政，而且肯在高龄之下，仍不辞辛劳。在政台方面，他比克勒孟五世要稳健坚定；他比鲍尼法斯八世聪明而且幸运。要是他能具有更深远的见识，对宗教以及教宗的职责能更成熟的话，他也会成为历史上的伟大教宗之一。可惜，他曾经依仗自己对神学的了解，固执地维护自己的私见，以及他在政治上的见地狭窄，因而造成了许多难以弥补的错误。以他和日尔曼的关系，来举个例子加以说明。日尔曼卢森堡王朝的亨利七世去逝后，发生了一场王位继承竞争。巴伐利亚的路易公爵和奥地利的腓德烈公爵互相争夺王位，双方面都请教宗出面仲裁，若望二十二世都接受了申请，但是并没有做出决定。1322年，路易击败了腓德烈，被全日尔曼拥立为王时，教宗仍无意承认路易；不但如此，若望二十二世根据一连串已经作废的权利，在王位虚悬的时候，任命了一位王家助理，来总理义大利的行政。若望二十二世所任命的王家助理，又正好是路易公爵的仇敌，日尔曼新王路易深深觉得自己遭受到很无理的攻击，便也任命一位治理义大利的王家助理。若望二十二世使用教会惯用的，开除教籍的惩戒来威胁路易，路易因而宣布召开会议。教宗若望二十二世认为他公然犯错，就在1324年将路易开除教籍。而当时在路易的宫廷内，绝大多数都是反对若望二十二世和宗座的人，他们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否定了罗马教宗“首席权”的全部道理。而路易本人却置身事外，想要与教宗谋和。但是1324年，一批日尔曼的王侯们，抗议教宗开除日尔曼王路易的教籍，还宣布若望二十二世是一个异端份子。若望二十二世这时候就不再置若罔闻，他向全日尔曼发出禁令。路易跑到罗马，接受了教宗的敌人高劳那家族西亚拉的加冕，而且还拥立了一位对立的教宗。当路易回到北方后，这位教宗便匆匆赶到亚威农，去请求若望二十二世的原谅。若望二十二世去逝的时候，把日尔曼留在一个相当黯淡的情况里。虽然从表面上看，若望二十二世似乎没有殆忽宗座的职守，但是他也遭到后人的谴责，因为在一切的冲突中，他以教宗的身份，应该比世俗统治者还要更知道守经达变、钩深致远、兼顾到法律和后果方面的完善才是。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教会行政上，作了很大的贡献，从亚威农的文献纪录来看，远比过去在罗马时为多。从这时候开始，教廷开始有了中央行政机构的特性，这种情形一直保持下来，而且还越来越分明。若望二十二世特别注重教廷的经济问题。宗座的经济基础是靠税收，那就是教皇国的收入和教宗属下的各个诸侯们的贡品、税收、还包括了颁发给各地总主教的佩带、一般特权、宽免权、以及他的各种宽免敕令所征收的规费。其实在亚威农以前，这些规费就已经存在，为了充实教会的经费，所作的募捐在以前也已经有了。不过在亚威农的教宗们，尤其是若望二十二世，把这种制度加以扩充和改善。从若望二十二世开始，从某一位神职人员的去逝或退休，一直到他的继承者上任以前，该地应有的经济来源，应该归缴到教廷，归宗座来管理；甚至在神职人员上任以后，第一年内的收入，也应该归属宗座，称之为“初年收益”；此外，如果有人愿意为某一项神职预先缴付定金，宗座甚至可以为他保留这项职位。

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所特别重视的经济政策。其实就是要如何来增加教廷的财源、增加教廷财务经济的收入。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各国政府国库的收入，是靠人民纳税的收入，教廷也有如政府一样，想要增加税收，那就得从制度上来制定法规，因此出现了像“初年收益”的规章。下面从更深一层从各个角度来对教宗“若望 22 世”的经济政策作一些说明。首先从比较消极晦暗的这一方面，来评断教廷的经济征策，这么一来，也就为 16 世纪所谓的宗教改革等问题的原因，预先为教会发出警讯。

在亚威农时期所增加的经济来源、或是已经改善后的筹募教廷经费的办法，固然为教廷的经费来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如果问题只是在物质事务这一方面，而没有牵涉到，灵魂方面的拯救事故的时候，那么，为某一些捐款加上一个名义，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但是，如果这些事和拯救灵魂的问题相关连的时候，情形也就十分的不同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许多的历史书籍，提到亚威农教廷的“经济技巧”，或则是“财物运转”的本领。对于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对当时情况的一个非常肤浅的看法。教廷也和其他行政中心机构一样，也需要有它经济的基础。那个时候的教皇国几乎没有收入可言，再说，让义大利来单独的负担起，整个教会的经济责任，当然是很不合理的。所谓的“亚威农的经济技巧”，便是去向各地的地方教会征税。这种征税的对象不是信友，而是主教和其他持有教会财物的人，并且间接的推延到诸侯身上。亚威农时期的教宗，最受人批评的是他们的财政措施。亚威农教廷的大兴土木、庞大的教廷组织的工作人员、在义大利的教皇国里战争的平定、传教事业的推动，以及十字军的运动等等，这一切也都逼使历任的教宗，尤其是若望二十二世，在财政制度上大费心机。教廷财政组织之庞大和严密，是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不能及的。他们敛财的方法真是五花八门，就像是修改旧有的制度、或是创立新的征税方法。财政部因而成了亚威农教廷最最繁忙的部门。委任权的运用，虽然并不是从亚威农的教宗们开始的，但是，在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时候，它的范围逐渐扩大，教会内所有的大小职位的任命，几乎都操纵在教宗的手里，甚至还把同一个职位，同时委任两个或好几个不同的人；更有甚者，是把还健在的主教们的职位，预先由某人预定下来。当然，“亚威农时期”的教宗们所分施的各种职位，都牵涉到金钱问题。从下面三个数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委任权”的运用，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后果的严重。在名叫列日的教区内，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位的 18 年中，委任的职位共有 496 件，本笃十二世在位的八年中，在法国各地所委任的职位就有四千多件，其中新主教 58 人中，只有九个是由主教座堂的教士团体，也就是称“伽农”的所推选出来。其后果是，加深了地方教会对于教廷的离心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许多捐税，例如，某位主教去逝后，连他的私人财产也都归并，属于罗马教廷。十一税、以及前面所说的“初年收益”，名目之多，还真是不胜枚举！教廷把整个欧洲，画分成好多收税员在辖区内奔走、征收赋税，所收到的金钱，就由银行解送到亚威农。总而言之，这些金钱活动，虽然不是始于亚威农的教宗们，但是却引起一般人的反感，而且还远比过去更加严重。因为

他们发现所缴纳的金钱，似乎都被用在教廷人员的享受上，至于用在传教或其他慈善事业上的金钱，则是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另外呢，英、法两国之间的交战，教廷似乎有以金钱支援法国的嫌疑，引起英国的不满和怀疑。

历史书籍经常的夸大了亚威农教廷税收的总数。像《佛罗伦斯编年史》的作者维拉尼，他以为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有两千五百万存在财库里，这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经常被人所引用。现在我们知道的正确数字，只不过是七十五万而已。义大利文艺复兴的著名学者佩脱拉克，曾经以最最黑暗而严峻的文字，来渲染亚威农教廷的贪财，而他的文字可以说是大大的影响了后世对这件事的判断。但是，佩脱拉克自己也是一个营营图利不遗余力的人，他在亚威农所获得的财物不能满足他的奢望，这是他为什么如此尖酸刻薄的原因。

教宗若望 22 世的继承人是本笃十二世。本笃十二世在公元 1334 年就任，他是一位虔诚而严肃的西笃会会士。他本来很乐于结束，教廷和日尔曼的巴伐利亚王路易的争执，但是法国国王以及那不勒斯的国王都知道，如何的阻挠本笃十二世的行动。因为他们唯恐教宗和日尔曼和好以后，会在政治上变得更为独立，并且会重建罗马的教廷。其实教宗本笃十二世倒并不想回罗马，因为他开始在亚威农建造俯临全城的巍峨宫殿，它是后期哥德式的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本笃十二世和日尔曼之间的争执仍然继续着。1338 年，有选举权的日尔曼王公，在莱茵河的兰斯，公布了一项法律，从此以后，日尔曼国王的选举与教宗无关，于是教宗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特权之一了。1342 年，本笃十二世去逝，被选出的下一任教宗是克勒孟六世。1348 年，他为教廷在亚威农买下了整座城，以及附近的土地。亚威农城原先是属于那不勒斯王，前几任的教宗，都曾经在亚威农客居，而克勒孟六世，买下了亚威农城以后，更是不断的大兴土木。前面曾经提到过，不仅是教廷大兴土木，甚至于每一位枢机也都用心的建造自己的庭园，这似乎意味着要在亚威农永久性的居留了。亚威农既然成了教宗的驻在地，各种角色的人物，也就从四面八方涌到亚威农，以追逐名利和权位的目的。除了教廷本身庞大的职员组织之外，在教宗私人的府邸就有四百多个仆役，有的是贵族侍从、有的当卫兵、当听差、有的当内侍、当猎人；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列任教宗的亲戚朋友、律师、医生和各式各样技艺人才，也都涌到这块新土地来淘金。亚威农既然因着教宗的常驻，而成为西方文物的中心，同时在卫道之士的眼里，也成为罪恶的渊藪、各种弊端的来源。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位人文学者佩脱拉克，他的一生几乎和这个时代同时。而且他还曾经在亚威农住过很长的时间，对亚威农曾经做过很严厉而又苛薄的批评。佩脱拉克称亚威农是“巴比仑”，所以“巴比仑流亡”，也就成了亚威农时代的另外一个称呼。

教宗克勒孟六世在和日尔曼王之间的冲突上，采取了比较强硬的作风，他也把巴伐利亚的路易开除教籍，并且，下命有选举权的王侯们重新选举新的国王。因为路易在日尔曼失去支持者，不得人心，而原本在不久之前，才拒绝教宗有权参与日尔曼王选举事务的王侯们，竟也同意了教宗的命令，改选亨利七世的孙子，也就是卢森保的查理·波希米亚王当日尔曼的皇帝。幸好在巴伐利亚和卢森保发生战争之前，路易去逝了，查理也就被全日尔曼所接受，一场可悲的纠纷，就这样自然的平息了。但是，日尔曼的教会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它曾在教宗的禁令下度过 20 年，连教廷本身，也受到很深的伤害。所以，想要叫日尔曼人去相信，法国籍的教宗曾经公正的对待日尔曼人，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1352 年，教宗克勒孟六世去逝，选出新教宗依诺森六世，这时候有权选举教宗的枢机们，规定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同议案”。什么是同议案呢？那就是所有的枢机，必须宣誓，如果他们中有人被选为教宗时，他就必须把他精神上的和辖治方面的权威加以明确的限制。如果从神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同议案应该是无效的。因为教宗本来就应该享有完整的权威，不能限制他自己，但是这种同议案，说明了有权选教宗的枢机，对未来当选的教宗的人，加给了精神上的压力，这至少可以说明枢机权力的逐渐扩张，把教宗当成是他们中的一份子，这也是亚威农时期的教廷，另一个不幸的现象。

教宗依诺森六世他必须忙于罗马城的事务。原来那时候的罗马，正呈显出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高劳那和奥西尼这两个大家族之间的怨仇有增未减，最后引起了罗马民众的公愤。曾经担任罗马公证人的哥纳，以民众审判官的身份，取得了罗马城的统治权。1354年，当他又大权在握的时候，教宗依诺森六世承认了他，哥纳不久就在一次新的群众暴动中丧生。教宗依诺森六世派遣西班牙籍的枢机艾基阿波诺为教廷代表，到义大利去重建秩序。艾基阿波诺既公正又有魄力，他把教皇国大加整顿，使它成为中古时期的一个大公国，使得教宗迁回罗马的障碍或羁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亚威农的人，也清楚的知道，教宗是迟早该回罗马去的。在一般教友的心目中，亚威农的教宗们，最大的罪恶并不在于教廷的各种陋习和财政，而是在于他们已经乐不思蜀，放弃了罗马。从历史上来看，罗马一直就是教宗的驻在地，而且从君士坦丁大帝把帝国的京城，迁到东方的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更成为所有基督宗教的京城。而亚威农的教宗们，久久不图返回京城罗马，实在是太违背教会的传统。虽然亚威农也是教会的领土，有它独立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在地理上或文化上来说，更好说亚威农在实际上是法国的一部份，而教廷的政策也不该受到法国的影响。除了法国人希望教廷永远驻在亚威农之外，其他的一般教友，可以说从瑞典到西西里、从波兰到英国，都不断的提出呼声，希望教廷提早结束它的“巴比伦流亡”的时日，回到罗马的怀抱。佩脱拉克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亚威农，统治者是加里肋亚贫穷渔夫的继承人，奇怪的是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来源。”1373年，他又说：“有福的罗马殉道者的热血所奠祭的城市，世界的京城，正在望眼欲穿的等待着，她最显要的市民。”教宗依诺森六世的继承人，是德高望重的教宗吴尔班五世，他受到各方面的催促，以及日尔曼皇帝查理四世也劝吴尔班五世回罗马，吴尔班决定至少作一次罗马之行。

在一些近代的教会历史家们的眼中，教宗流居“亚威农时期”，是一段不幸的时期，而近代的史学家常常用流亡、放逐、巴比伦的俘虏这些名词来形容这段时间，这些名词仍然经常在历史作品中看得到。不过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应该是那些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的史学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用流亡、俘虏，这样词汇来形容“亚威农时期”的教廷，显然是不合历史的事实，因为“亚威农时期”的教宗比在罗马更安全也更尊荣。在亚威农没有高隆那和奥西尼两大家族的纷争；也没有贵尔夫和吉白林之争；没有街市的骚动和民众的法庭。实际上，在公元十三世纪时，也就是在教宗额我略七世以后的教宗们，是有理由在罗马以外寻找更好的避难所，有些教宗在他们的任期内从来就没有能够进入罗马城。我们无可否认，亚威农还真的非常适合教宗的驻留。长久以来，罗马已经不是基督信仰领域的中心了。自从十字军溃败，想要摧毁南方和东南方回教徒势力的希望，也就更为渺茫了，基督徒地域的重心又向西北部转移，总而言之，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那时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是法国。以法国为封建领主的有英国、法朗德、阿拉贡、卡斯提尔等地，而这些地方距离亚威农比距离罗马还来得近，也与正在兴盛起来的波希米亚，和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北义大利相距也不远，从欧洲各地到亚威农的人也不必翻山越岭。如果只从行政管理而言，亚威农的条件实在比罗马还要好。亚威农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宗徒之长伯多禄的墓地，也没有殉道烈士们的墓地，当然也没有上千年的传统。教宗是教会的元首，只因他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罗马第一任主教的继承人，他是罗马的主教，也是整个教会的首长。亚威农时代的七位教宗全都是法国人，不过我们不能拿教宗的国籍来做为抱怨的理由。因为，谁又能证明法国人士就不适合当教宗？真正的问题，并不出在教宗本人的国籍，而是出在那使教廷形成为国家性质的组织，或是至少在表面上，染上了同一个民族气份的环境啊！而真正的教廷应该是超越国籍之上，不应该有义大利式的外表，当然也不该是法国式的。但是，当教宗本人与几乎所有的枢机，以及在教廷内工作的神职界，和工作人员也几乎都是法国人时，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被法国所包围。而当时的法国又是欧洲唯一强大的力量，这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形成了教廷显得有如一个国家性的组织了，因而教宗的一切言行，都被有心人只从这一个观点来评断。所以

我们说，这种狭隘的观点是不够理性、也不够客观的了。总之，要说亚威农的教宗们不善于统治管理教会，那是不对的，而事实上这时期的教宗都大大地提高了教廷的权威。

1.1.3 回到罗马

教廷搬回罗马的责任落实到了当时的教宗吴尔班五世身上，他除了受到教会方面的压力之外，还有更为迫切的政治压力，逼使亚威农的教宗，最后不得不考虑还都罗马的问题。教宗克勒孟五世和他以后的几位教宗，他们之所以定居亚威农，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罗马和教皇国内政治的混乱；强大家族之间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1354年，教宗派既公正又有魄力的枢机艾基迪·阿波诺率领军队，从事教皇国内秩序的重整，这工作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如果教宗能够亲自坐镇罗马，那么教皇国和罗马城的混乱局势或许还有改善的希望。因此，罗马的人民代表不绝于途，一再的企催促教廷终止流亡，返回永城罗马。

教宗吴尔班五世，他就在政治和宗教的两种压力下在1367年作出返回罗马的尝试。在义大利各城邦所供给的六十艘船只的护送之下，教宗吴尔班五世和随从们就从法国的马赛港出发，同年的十月，返抵梵蒂冈，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谢恩弥撒，这是经过了六十三年后，教宗第一次在大教堂内举行大典。1368年，日尔曼皇帝查理四世还跋涉长途来到罗马，让教宗亲自为他举行加冕典礼，为的是要表示教会与日尔曼帝国之间，从此要走上合作之途。1369年，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翰五世，也公开宣布终止东西教会从1054年以来的长久分裂。这些事件看来，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就要逐渐展开了，可是，教宗吴尔班五世是法国人，在罗马有着身处异域的感觉，而他颁布的擢升新枢机的名单中，八位中竟有6位是法国人，这又引起了义大利人强烈的反感，许多城邦竟以暴动来表示抗议。而米兰的威斯康提更率领军队入侵托斯卡尼，教宗仍以调解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作为借口，想要返回亚威农，圣女碧利姬达曾经哀求教宗留居罗马，教宗不肯，回到亚威农后不久就去逝了。圣女碧利姬达竟断言说，这是天主教怒的证明。教宗吴尔班五世去逝后，枢机们选出额我略十一世为新教宗，他即位之初，就宣布准备还都罗马。可是还都的计划又一而再，再而三拖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义大利的政治混乱，我曾说过的艾基迪·阿波诺枢机在重整教皇国的事上，颇有成就，因此引起了邻近各城邦的猜忌，同时新教宗额我略十一世派到义大利去征收捐税的收税员都是法国人，他们的欺压贪污的行为，更加深义大利的本地人对亚威农教廷的怨恨。就在佛罗伦斯共和国和米兰城的领导之下，在1375年，由80几个城邦组成了同盟，公然反抗教廷，为了对付这场叛乱。教宗除了开除这些人的教籍之外，还派遣法国籍的罗伯枢机，率领佣兵一万，进兵义大利，佣兵所到之处，竟是劫掠和屠杀，比起第五世纪时蛮族入侵义大利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佛罗伦斯等城的叛变虽然是平定了，但是教会历史上却又新添了惨痛的一页。

就在那时候，法国锡艾纳地方的圣女凯瑟琳，蒙受天主特别的恩宠，不顾国家的利益，专以教会与教友为念。她以道明会第三会在俗会友的身份，以身作则，用信函促成了佛罗伦斯和教宗的和解，使教宗有归返罗马的可能。她虽然还不到30岁，但是已在德行上有卓越的修养，教宗额我略十一世和佛罗伦斯人以及其他的人，都很佩服圣女凯瑟琳，因而也愿意接受她的忠告，她就在1376年前往亚威农。当然促使教宗额我略十一世归返罗马的，甚至连现代的人，也都把主要的功劳归于圣女凯瑟琳。

1376年的9月13日，教宗额我略十一世，终于永久的离开了亚威农，10月初以比吴尔班五世更壮观的排场，从马赛港启航，教宗在热那亚与凯瑟琳会合，圣女凯瑟琳已经去过佛罗伦斯，枢机们却不断的催促教宗返回亚威农去，圣女凯瑟琳则全力襄助教宗，并且很坦白的告诉教宗，要求教宗必须征服自己的懦弱害怕和踌躇。12月5日教宗额我略在教皇国的高乃多港上岸，在1377年的一月十七日进入罗马城，终于结束了罗马教廷70年之久的流亡。归返罗马的事进行得太快了，那时整个义大利还在骚动中，罗伯枢机和他所带领的佣兵也还

正在塞色纳的血战之中，罗马的一切并没有合乎教宗额我略十一世的期待和理想，经过一年多的失望和忧虑，正考虑重返亚威农时，忽然得病去逝。

1.1.4 西方教会大分裂

教宗额我略十一世去逝之后，在罗马的 16 位枢机立刻开始集会，商讨选举新教宗。枢机中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四位义大利人、五位法王派、和七位里摩辛派，这一派的枢机们虽然也是法国人，却不受法王派的信任，当时还有一些枢机仍然留在亚威农。此外还有一股强大的，能影响教宗选举的外来因素，那就是罗马城的群众们。当枢机们开始选举教宗时，罗马的群众都聚集在伯多禄大教堂外面的广场游行，大声急呼说：“我们要一位罗马人，否则我们就采取行动！”就在这种气氛下，枢机们匆匆忙忙的选出吴尔班六世担任教宗，新教宗虽然不是罗马人，却是个义大利人，也不属于枢机团，因此，吴尔班六世是一位折衷的人选。

教宗吴尔班六世当选时，年龄已是六十岁了。他是一位法学家，因此对教会的革新极为热心，但是他所用的方式却过份的残酷和独断。他为了改革教会而操之过急，反而把枢机团和周围的人都得罪了。圣女凯瑟琳曾经一再的劝告吴尔班六世要待人以礼，以便能收揽人心，但他鲁莽而又固执，不听从圣女凯瑟琳的劝告。他还公开宣布将要擢升一大批义大利籍的枢机，目的是使法国籍的枢机从此可以闭口无言，他还尽量的苛待那些仍然留在亚威农的枢机们，而疏忽那些新枢机；他又与那不勒斯的王后们发生了冲突，枢机们个个都非常的懊悔选举了他，他们以夏天的炎热为借口，都悄悄的离开了罗马。在秘密计划下，13 位枢机来到亚那尼。1378 年的八月，他们从亚那尼发出一项声明，宣布在四个以前的选举是受到强迫、失去自由，所以宣布教宗吴尔班六世当选无效，连那不勒斯的王后和法国查理五世都预先许诺，要支援枢机们。他们在凯达诺伯爵的保护下转到丰迪，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之下选出罗伯枢机为教宗，取名为克勒孟七世，于是形成了西方教会历史上长达 39 年之久的大分裂悲剧。

就人而言，罗伯确实是一位适当的人选，他是一位有魄力、有才华而又深得人心的领导人物，但是就当时的环境而言，罗伯是义大利人所痛恨疾首的。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法国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曾率领佣兵改打义大利，所遗留下的创伤，依旧还深深的印在义大利人的心灵上，称他是“罗伯·西塞那的屠夫”。而且就选举的程序来说，克勒孟七世是一位非法的教宗，因为在乌尔班六世被选出的四个月以后，一部份的枢机因为对新教宗的不满，才借口说：“在罗马群众威胁下的选举无效。”这显然是事后的遁辞，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吴尔班六世以及他的继承人，就被称为“罗马系统”，以正统自居，而克勒孟七世和他的继承人，则被称为“亚威农系统”，也被称为“假教宗”。

大分裂大大地破坏了教会的统一性，下面就说说西方教会大分裂的情形。教宗吴尔班六世及他的继承人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正统的“罗马系统”，而在法王支持以及法国军队保护下被选出的克勒孟七世及他的继承人，则称为“亚威农系统”的假教宗。克勒孟以武力夺取罗马的动作失败后，他只好率领法国籍的枢机们去亚威农，开始了所谓“的西方教会大分裂”，这场分裂悲剧所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巴比伦流亡时期。

那个时候的情势，可以用“迷离惆怅”四个字来形容，甚至连圣人们也有的倒向对立教宗的那一边。圣女凯瑟琳则是拥护吴尔班六世，她还致函给枢机们，表达了她内心极大的悲愤，同时，也给予执拗的吴尔班坦率的警告。吴尔班六世刚开始时，曾经得到日耳曼皇帝查理六世的承认，但查理六世不久就去世，他的继承者温斯拉仍然继续支持吴尔班。此外，那不勒斯王国的义大利、英国、匈牙利，以及斯堪地那维亚等地也都拥护吴尔班。而西班牙、法国、西西里、那不勒斯萨伏、苏格兰、葡萄牙，以及一部分的日耳曼地区，则是效忠于亚威农的教宗，由于服从的方式各有不同，各个教区和修会也常呈现出分裂的状态。当然啦，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混淆在其间。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演变下去，就成了教会的大毒瘤。执拗的吴尔班六世不但不努力挽救这个分裂的局势，反而疯狂地攻打那不勒斯王国。他把王后开除教籍，号召十字军攻打那不勒斯王国，为了要推翻王后，他请出了王后的堂兄

查理与之对抗。等查理征服了那不勒斯之后，教宗吴尔班又和查理之间有了冲突，继而把查理也开除了教籍，后来连支持他的枢机们也起而反对他。吴尔班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其中的几位枢机判处了死刑。1389年，吴尔班死于罗马，没有多少人为他惋惜。继承他职位的是鲍尼法斯九世，新教宗随即与那不勒斯议和，鲍尼法斯九世因此而获得了全义大利的承认。五年后鲍尼法斯去世，依诺森七世继位，两年后去逝，罗马系统选出额我略十二世。而在亚威农方面，继承克勒孟的是本笃十三世。

罗马系统和亚威农系统同时争夺伯多禄宗徒之长的职权，双方各有自己的教廷、自己的枢机团，也各有一套行政机构，更各有派遣到各地的代表。某地有主教遗缺时，双方也都企图委任自己的人选，因此往往又造成了地方上的双包案。他们各有各的收税员，往往在同一地区征收赋税，造成百姓双倍的负担。总而言之，两个相互对峙的教会各不相让，教会的分裂带动了社会的分裂。教会大分裂的最大悲剧在于，一般人民不能分辨真假和是非，因此个人的良心常常蒙罩着一层阴云。我们设身处地来体会当时人的心情，救灵魂和死后升天堂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要达成救灵魂、升天堂的方法，就是接受教会的领导，可是，究竟那一个系统才是真正在领导教会呢？说的更具体一点，如果罗马的教宗不是真教宗，那么他所任命的主教当然就不是真主教，至于主教所祝圣的神父，当然也不是合法的真神父了。再往下推，这些神父所举行的圣事当然也就无效了。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教友们也就不免产生怀疑的心，进而否认教会的需要，这也难怪英国的威克利夫创导异端和邪说，会获得许多人共鸣了。罗马和亚威农的教宗都认为自己是正统，所以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对方，其中包括了精神上的以及物质方面的方法。开始时，双方各自公布诏令，将对方开除教籍，双方也各组十字军，企图用武力来消灭对方。双方还利用大批的宣传者，用文章和宣导的方式，揭发对方的罪恶，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学教授参与笔战。这些笔战最初都以攻击对方为主，久而久之，更具思考、更富理论的建议就出现了，终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大公会议运动”。

借会议来解决教会问题，这原本就是教会一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各位一定还没有忘记，宗徒大事录中记载了宗徒时代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公会议，当时讨论外邦人是否应该行割礼的问题，伯多禄以宗徒之长的身份主持了会议。公元第四世纪召开过尼西亚公会议。除了教会整体性的会议，还有地方性由各地主教所召集的教务会议，目的是解决地方性的问题。而大公会议必须由罗马教宗宣布召开，由他亲自或委派代表主持，或至少会议中所产生的议决，应由教宗亲自批准后予以公布。如果没有教宗的同意，任何大公会议，一律都被认为是非法的，不能产生法律上的约束能力。大公会议的目的是在解决整个教会的问题，而现在教会已经分裂为二，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吗？如何能够使分裂的教会再度重新合一，是当时基督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所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亚威农时代以后的教会，有许许多多急待改革的地方，可是只要教会的领导权还在分裂的情况下，任何的革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要召开的大公会议，必须先解决分裂问题，而且啊，按照当时的情势，也只有大公会议才能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教会史上所说的“大公会议运动”，希望借一连串的会议，先来解决教会的分裂，然后再去从事教会方面的各种改革。

但是，提倡以大公会议来解决问题的，立刻就面临到一个大难题，那就是到底该由谁来召开会议呢？罗马和亚威农双方都自认为是正统，双方也都坚持任何会议都该由他们来召开和主持。实际上，罗马和亚威农两方的其中之一应该是正统，可是，要认定究竟谁是正统，这正是有待大公会议来解决的问题。大公会议必须由教宗来召开，而两位教宗谁真谁假，又必须由大公会议来决定，为了解决这种两难的困境，并解决这种恶性循环，因而出现了一种所谓“大公会议”的学说。“大公会议说”的主张重点是这样的：大公会议的权力高于一切，它是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有权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它可以承认一方而拒绝另外一方，也可以罢免双方而另外重新另选一位新教宗。我们可以把这项学说的内容归纳成以下三点：第一，它否认了教宗的权力来自天主的神学说法。第二，它否认了教宗全权的说法。第三，它

以代议制度替代了教宗的独断专制。如果真的是依照这项学说，那么整个教会的传统势必会全部遭到推翻。现在，说明一下所谓“大公会议说”的背景。

“大公会议说”虽然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但却不是一种新的理论，从俗世的政权这个角度来看，欧洲在公元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代议政治的观念呼声相当地嚣张，比方说 1295 年英国的模范国会和 1302 年法国的全国三级会议，都是这一派学说的具体表现。而欧洲其他区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果俗世的政府可以容许人民参政，那么，基督徒又为什么不能参与教会的行政工作呢？教会原本在创立的初期就已经有大公会议的组织，那么，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经由这种代表全体信友的会议，在会议中共同解决问题。既然教会的“头”已经丧失了领导全教会的能力，那么就只好由教会的肢体来执行任务了。所以，从政治观念的发展而言，“大公会议说”这个观点是很合乎当代的政治潮流，而对教会传统而言，它本身还真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呢！

然而，教会的传统，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已经不断受到挑战，“大公会议说”正好可以说是这些条件的结晶品。中古初期，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俗世的政权就一再地干涉教会的内政；甚至企图全面控制教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教会也不断地在侵占俗世政权的各种权力，尤其是罗马教廷，一直就以基督教共和国的领袖自居，想要建立它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整个中古时期，政治和宗教的冲突都源于这个领导权的争夺。教会本身的分裂，正好给俗世政权带来了很好的机会。而“大公会议说”又给了俗世政权一个很合乎情理的法律根据。因为“大公会议说”主张统治教会的权力，应该是操控在全体教友的手里，其次，根据中古时代所谓的重要份子的法律观念，控制这个全体会议的，理所当然应该是帝王公侯。如此一来，过去无法成功直接控制教会的帝王公侯，如今就可以借由控制大公会议来达到控制教会的目的了。俗世政权在自己的疆土权力范围内竭力反对代议制，但在在教会权力方面，却反而竭尽所能地支持代议制度。“大公会议说”之所以能够盛行一时，正是受到这班俗世政权的支持。其实早在西方教会大分裂之前，就已经有好几位学者，主张以俗世政权控制的会议制度来统治管理教会了。像是英国的威廉奥冈、义大利的马西里奥，还有法国的约翰杨登，他们三个全都是日耳曼皇帝巴代利亚的路易在反抗亚威农教宗时期的幕客。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大公会议说的先驱者，今天，我只介绍威廉奥冈的看法。威廉奥冈原本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因为涉入精神派方济会对贫穷的争执，而被认为是在宣传异端，所以就被召到亚威农教廷做自我辩护。1328 年，威廉奥冈认为不能在亚威农获得公正审判，于是投奔到日耳曼皇帝路易的麾下，要求政治庇护。而路易这时候也正好和教宗若望 22 世之间发生了纠纷，威廉奥冈到来，正好给路易增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威廉奥冈就以哲学家的立场，攻击教宗的全权，认为太大的权力势必导致暴政，如果教宗成了暴君，就像若望 22 世一样，教友就有反抗的权力，为了不使教宗沦为暴君，威廉奥冈提议，以大公会议来限制教宗的权力，而整个教会联合起来的智慧，是限制教宗权力的最大力量，教宗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大公会议却是整个的教会，所以大公会议的权力也应该高于教宗之上。

下面讨论这个时期的几个代表人物，第一位是义大利学者马西里奥，在他的著作中，马西里奥不仅否认了教宗的全权，而且更进一步认为教会应该完全隶属于国家政权之下，成为政府里的一个部门，教士也一如其他的人民一样，不应该享受任何特权。他还说，以教会本身的组织而言，一切的权力是来自全体教友，而教宗、各级教士和行政人员的职权，是来自教友的授权，换句话说，他们的职权直接来自教友，而不是来自天主；教会的最高权力应该是属于代表整个教会的大公会议，如此一来，教宗和主教就仅有执行任务和惩罚罪犯的责任而已。威廉奥冈、马西里奥以及杨度等学者的言论，并没有在提倡之初就受到普遍注意，因为他们当时只不过是日耳曼巴伐利亚路易王的私人辩护者而已。但是，西方教会大分裂出现之后，他们的言论逐渐受到有识之士的注意。当时的教会已经没有真正的领导人，那么，肢体就该起来活动了，连原本不承认大公会议权力高于教宗权力的人士，这时候也都认为，在

当情形下，实在是有必要借着大公会议来解决所面临的分裂问题。维也纳的亨利兰根斯坦写下了《教会合一与革新建议书》，内容就解释说大分裂是天主用来说明，权力应该属于全体的教友，建议书中并且还说明，大公会议有权罢免教宗。另外，还有孔拉德说大公会议不仅高于教宗，而其本身也不过是由教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最高权力是在全体教友。在这一波大公会议学说论战中，最热烈的是巴黎大学，其中有的是为论战而论战，或是为个人的名利，或是为政治关系。其中还有人很不负责任地喊说“教宗的数目或多或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有两位、三位、十位或十二位呢？甚至为什么不能每一个国家有一位教宗呢？”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学者，为了教会的利益，根据学理，推动大公会议来解决问题。他们在研究教会的性质以后，认为当教宗无法执行任务时，必须另外找一个足以替代的机构，这个机构应该是大公会议，不论有没有经过教宗同意，大公会议正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支持这个论点。他们主张，如果教宗拒绝召开大公会议，那么皇帝就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在这种气氛之下，公元 1409 年的三月，十四位来自罗马、十位来自亚威农的总共二十四位枢机，以及三百多位教会显要，在比萨召开会议。参加的还有西欧各政权的代表、神学家和教会法典的专家。与会成员以大公会议的身份，从三月到八月，努力地要寻找出解决分裂的途径。他们曾经要求罗马和亚威农的两位教宗自动辞职，但是两方面都不同意，于是呢，比萨会议只好宣布罢免这两位教宗，另外选出米兰的枢机当教宗，取名为亚历山大五世。亚历山大五世在位不到一年，比萨会议又选出若望二十三世，而罗马的额我略十二世和亚威农的本笃十三世，都认为比萨会议不具合法性，因此都拒绝接受，他们也都各有不少俗世政权的支持，所以也都能够继续维持各自的势力。因此呢，比萨会议不仅没有解决原来二分天下的问题，反而更增加了一个所谓比萨系统的教宗，把局势搞得更加地混乱而不可收拾。

比萨会议失败，这说明了在民主的气氛中，领导人物还是不可少的。教宗既然不能起来领导教会，那么只有让俗世的政府来越俎代庖了。早在 1398 年，法国的查理六世就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会议中通过决议，不再支持本笃十三，1407 年又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法国教会应该走国家路线，就是所谓的法国教会。在这同时，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也有类似的措施。这种情况，指出了一个更大的危机，长久的分裂已经迫使各国走向地方教会，对教会的统一普遍感到失望。比萨会议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至少已经指出，为了挽救教会分裂的局势，只有合作才是合理而且有效的途径。

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领导大家合作的人，他就是日耳曼皇帝西祺门。西祺门本身已经尝过政治分裂的祸患，因此，当他在日耳曼境内获得完全的胜利之后，他深信统一教会应该是他的职责，他就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决定召开另一次大公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除了谋取教会的统一之外，还有其他的两个问题也有待会议解决，一是教会内部的革新，一是在波希米亚境内胡斯的异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西门祺宣布在现今瑞士国境内的康士坦斯召开大公会议。您知道西门祺为什么选择康士坦斯这个小城来召开大公会议吗？原因是这样的，前面我已经说过，康士坦斯属于日耳曼皇帝的势力范围，西门祺选择康士坦斯用意是要避免意大利和法国的干涉而操纵整个大会。果然，法国对开会地点深表不满。不过嘛，最后还是接受了，并且派了三位著名的枢机与会。然而，实际上，法国的势力还是控制了整个的大公会议。

1.1.5 康士坦斯会议

公元 1414 年的十一月，康士坦斯大公会议正式开幕，据统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三位枢机、五百多位主教，各大学派出的代表合计有两千多位，还有五千多位神父。代表各国政府的有四十位公爵、三十二位亲王和五百多位骑士。每一位出席者又都各有秘书、随员和仆役。史书上的记载说，康士坦斯城一时之间增加了十多万人，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啊！康士坦斯大公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解决教会的分裂。1415 年，大会先解除了比萨系统

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职权。若望二十三世只好接受大会的决定，同意辞职。罗马系统的教宗额我略十二世，也被大多数的拥护者所遗弃，而他很有自知之明，先自动追认康士坦斯大公会议的召开，使得这个空前的大公会议因他的追认而取得合法的名份，接着再自动辞去教宗的职位。剩下的，就是那位“亚威农系统”的教宗本笃十三世了。本笃十三世的问题还真不容易解决。日耳曼皇帝西门祺曾亲自到他的处所拜访过他，大会也推选代表，劝他自动辞职，他都拒绝妥协。最后在 1417 年四月，大公会议正式将他解职。至此，三位教宗都先后解除了职务，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便召开秘密会议，选出年纪只有二十五岁的新教宗马丁五世。将近四十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就在 1417 年十一月马丁五世就位后宣告结束。

康士坦斯会议的另外两个任务，其中的解决胡斯派异端这件事情，后面会专门介绍这件事情。至于推动教会内部革新这个任务，参加大会的人，虽然都赞成革新的原则，但是一谈到具体要如何革新时，因为牵涉到每人的个别利益，并没有具体的结果，实在非常遗憾。康士坦斯大公会议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说的，构成并代表教会的大公会议，具有直接来自基督的权力，任何人，不论他的身份或地位，甚至连教宗也不例外，在有关信仰的事务上、在终止分裂的事务上，以及整个教会的头和肢体的革新上，都必须服从这个权力。另外还有一条法令规定，从 1417 年开始，五年后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再隔七年开第二次，再以后，每隔十年召开一次。从两条法令的内容来看，大公会议的代表很明显地愿意以大公会议的方式来统治教会，就好像是同一个时代的西欧各国所推行的国会制度一样。如果康士坦斯会议的法令确实实行的话，那么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一千多年来的传统势必一笔勾销，而罗马教宗也势必丧失他直接来自耶稣基督统治教会的权力，变成听命于大公会议的首相了。

而康士坦斯会议的两项法令，注定是要失败的，为什么呢？各位不妨想一想。我从三方面来说明。第一，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已经得到了解决，当然也就消除了当时所以要召集大公会议的迫切需要。第二，康士坦斯会议对教会的革新问题并没有完成预期的效果，这正证明了这个会议的无能，根本上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参加会议的代表，或是因着国家的利益，或是由于地域冲突，或是因为个人的私欲，对革新措施都不能达成协议。第三，会议固然可以立法，但执行法律则要看以后的每位教宗是否合作。但事实上，自从从马丁五世以后的列代教宗，全都坚守教会的传统，重新振作教会的领导权威。一旦时过境迁，“大公会议说”自然也就逐渐消失。到了 1460 年，教宗庇护第二发布的诏书，就已经公开声明，这一项学说符合教会的信仰和传统。盛行一时的大公会议运动，也就到此结束。

不过，不论大公会议的学说在理论上有多少缺点，也不论在实施上表现了多少的无能，它至少完成了西方教会的统一，那么东西方教会的合一，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达到呢？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是可能的。1438 年，教宗欧杰尼四世在法拉拉召开会议，当然也抱着同样的信念。自从 1054 年东西教会分裂以后，合而为一就始终是历代教宗和西方人士所关怀的问题。十字军东征的任务也是在达到双方合一的目的。可是，由于东西文化不同，政治因素分歧，再加上双方领导人物的个人恩怨，合一的愿望始终无法达成，教宗欧杰尼宣布召开会议时，合一的时机又再度出现，而且成功的可能也远较过去来得大。因为这时候的鄂图曼土耳其人已经在东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君士坦丁堡已经危在旦夕，随时都有可能陷落。就如同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拜占庭向西方求援的使者不断来到西方，合一就是他们的愿意付出的代价。

1439 年，双方勉强签订了合一法案，在文字上，东西教会合一总算完成了，但是当东方的代表回到君士坦丁堡时，迎接他们的是群众的暴动，连皇帝也不敢公布合一法案，东西教会最后一次合一的企图，就这样又归于泡影了。1453 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希腊教会的重心迁到了莫斯科，距离罗马就更加地遥远了。

1.1.6 从马丁五世到利奥十世

前面的内容是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和经过的情形，特别强调了在会议中，

借着舆论的力量和大公会议的功能，宣布解除了当时存在的三位教宗的职务，接着在 1417 年，另外选出教宗马丁五世，结束了西方教会从 1378 年以来，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局面。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以后的列代教宗，当然，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中选出的马丁五世。马丁五世在任的时间是从 1417 年到 1431 年。他就任教宗职位时，年纪只有二十五岁，不但有魄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强韧的耐性。这位新教宗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安定教会，领导教会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同时还要重建罗马，因为罗马是真正的教会领土中心，这个中心却被疏忽了好几个世纪。而马丁五世出身罗马的高隆纳大家族，严肃又敏感，为了达到刚才提到的双重使命，马丁确实是一位恰当的人选。他知道如何运用离间的方法，让那些支持“大公会议学说”的人自相攻击。

依照康士坦斯会议的规定，教宗马丁五世在比萨召集会议，会议开幕以后不久，因为受到米兰的独裁者威斯康底的威胁，又把会议迁移到锡也纳。支持和反对“大公会议学说”的两派之间，一直不断地有冲突，经过一年的争辩，锡也纳会议自然也就不欢而散，这也是教宗所希望的，他希望这种会议不再产生作用。锡也纳会议虽然最后是不欢而散了，但在解散之前，大会还是规定，七年后的 1431 年召开会议，教宗国里不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会议能够如期在巴塞耳召开。不过，马丁教宗却在大会开幕之前去世了。有关巴塞耳会议的经过，我会在介绍下一位教宗欧杰尼时的情形。

再回过头来看看马丁五世上任后的情形，在义大利方面，首先承认早先一直与教廷为敌的那不勒斯皇后若安娜。至于教皇国，当时已经全部落在义大利军官布拉秀的手里。教宗设法使他为教廷服务，委任他治理波洛那。这一步棋，促使教皇国又回复到中古的状态。所谓中古的状态，就是由许多自立的封主、城市和行省组合而成，具有非常复杂的权利和义务的制度。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马丁第五恢复了过去雅伯诺兹枢机在十四世纪中期所建立的秩序。教宗马丁在 1420 年回到了已经残破不堪的罗马。为了再度繁荣罗马，教宗宣布 1425 年为圣年，给罗马带来了许多的朝圣者，不过要让罗马再度恢复昔日五万居民的盛况，就还得再等上一百年。教宗马丁五世在他的任内，任命了一批相当优秀的枢机，协助教宗治理教廷。

1429 年教宗与西班牙半岛上阿拉贡王国的亚尔丰索第五签订和约，清除了教会大分裂时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巴塞耳会议开幕之前，教宗马丁五世英年早逝。新选出的教宗是原籍威尼斯的欧杰尼四世，他是教宗额我略十二的侄子，也是一位奥斯定会隐修士。他的任期是从 1431 年到 1447 年。欧杰尼四世登基时，教廷又传出凶兆，首先是在达乌斯地方，和异端胡斯派作战的十字军惨遭失败。其次，欧杰尼四世和前任教宗的家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前任教宗马丁五世是出身有权有势的高隆纳家族。此外，欧杰尼决定要解散已经开始筹备的巴塞耳会议。欧杰尼的疑惧之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的这项举动，反而把会议导向了他避之唯恐不及的分裂局面。马丁时代奉命出任巴塞耳会议主席的柴撒里尼枢机，忠诚地劝告教宗欧杰尼四世，要他谨慎处理。可惜，忠言逆耳，欧杰尼仍然一意孤行地，以人数不足为理由，宣布解散会议。枢机和主教群都不愿意屈从教宗欧杰尼的决定，于是自行重新公布康士坦斯会议的宣言，一致申明大公会议的权力高于教宗。而义大利高隆纳家族、米兰的腓力普威斯康丁，以及布拉秀等人的势力，更加把义大利的政治环境搅弄得愈发不利于教宗欧杰尼。欧杰尼只好撤回解散大公会议的命令，但是他坚决不接受教长所公布的宣言。米兰的公爵开始在罗马策动反教宗的革命，罗马共和国又再度在义大利出现。欧杰尼逃往佛罗伦斯，途中群众竟然用石块攻击他。而在巴塞耳的教长们，看见教宗如此无能，更加地愤怒，因此替教宗颁布了彻底革新的公告，取消一切征税和其他属于宗座的收入。巴塞耳的教长一厢情愿地以为，教宗已经被他们所控制。而精明能够的枢机主教又控制了这种混乱的情况，维持了罗马和教宗国的秩序。这个时候，正巧又有东罗马的使臣来觐见教宗，要求教宗重新召开会议。教宗的威权因此大幅提高，教宗就以巴塞耳这个地点对希脏人方

便为理由，宣布大公会议迁到法拉拉。这项消息对于在巴塞耳的教长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忠于教宗的枢机全都赶往法拉拉，留在巴塞耳的，就企图阻挠教宗。但他们所维持的会议已经不是合法的大公会议了。他们甚至还选出了取名为菲力克斯第五的教宗来和欧杰尼教宗相互对抗。巴塞耳的会议继续开了十年之久，但是参加的人愈来愈少，到 1449 年时，也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教宗欧杰尼四世离开罗马九年以后，又再回到了罗马。

欧杰尼四世的继承者是尼各老五世，他在位的时间是 1447 年到 1455 年，尼各老五世出身中产阶级，父亲是一位医生，教宗在少年时进入卡都西会修道，不久，到波隆那大学就读。由于经济困难，他替富家子弟补习功课以维持生活。晋升神父以后，他担任尼古拉斯阿贝迦底枢机的私人秘书。阿贝迦底枢机在法拉拉佛罗伦斯会议中，曾经扮演过最具权威的角色，而尼各老也是在这个期间展现出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教宗欧杰尼四世的赏识，获得任命继承阿贝迦底去世后的波隆那城主教。不久之后，教宗派他代表教廷出使日耳曼，同时升他为枢机。欧杰尼四世去世后，他就被选为教宗，他也是第一位被人称为文艺复兴教宗。尼各老五世即位时，正是西欧各国走向民族国家的时期，中古基督教共和国的大同理想已经没落，而罗马教宗也已经没有能力以“世界统治者”的身份，领导国际政治了。义大利半岛呢，这时也深深陷于所谓的“政治马赛克”的局势中，王国、公国、共和国、城邦等组织纷纷独立，彼此之间不仅各自为政，而且还弱肉强食，造成空前未有的混乱局面。教皇国身处其中，除非运用智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否则大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教宗尼各老五世有鉴于此，于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活动。一方面为的是确保教皇国独立，一方面维持半岛的政治现状，以避免遭到当时的强国日耳曼及法国干涉。教宗尼各老开始让罗马教廷直接投身于义大利政治，前后有六十年之久。教宗尼古老的政策相当成功，在他亲自策划下，1454 年的罗提和约结束了威尼斯和米兰之间的长期战争。不久以后，佛罗伦斯也参加了罗提和约。签订罗提和约不仅给义大利半岛带来了长达四十年的和平，而且还为分裂的义大利，指示出一条可行的政治路线，朝向所谓的“邦联政治”迈进。

教宗尼各老五世以及他的继承人，全都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当然，他们的邦联观念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由教宗来领导，这样的观念其实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政治。所以罗马教宗都深深陷入自己所制造的陷阱中。而且是愈陷愈深，到头来根本就无法自拔，这倒是教宗尼各老五世代所始料未及的。尼各老显然对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没有多大兴趣，对教会的改革只是挂在口边说说，丝毫没有具体的事实表现。不过，天主似乎给了他足够的启示，希望让他觉悟，担任“教宗”这个职位，需要担负什么样的使命。有一位他最宠信的学者史提芬波卡诺，也许是受到古典文艺的影响太深了，竟然计划烧毁梵蒂冈，劫持教宗，重建罗马共和，实行革新。幸亏阴谋提早曝光，史提芬波卡诺被逮捕，判处了重刑。这件阴谋揭发之后不到几个月，更不幸的事发生了。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在土耳其人的手中。这两件事应该给尼各老重大的启示了，那就是，过份地推动文艺活动和不顾一切地投入政治，都不是身为教会最高领袖的份内事。可惜教宗尼各老五世一直到死，始终没有了解这一点。

教宗尼各老被被誉为文艺复兴教宗，下面就介绍一些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教宗尼各老五世对推动文艺始终不遗余力，他任用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来美化梵蒂冈；为了要建造更雄伟的圣伯多禄大教堂，他竟然下令把原来君士坦丁在第四世纪所建造的大圣堂予以拆毁。这种破坏古迹的行为，曾经受到后世严厉地批评。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则一直受到后世的肯定和称赞。像举世闻名的梵蒂冈图书馆就是在他手中创立的，他不惜以重金收集希腊罗马古典文艺的手抄本，还重金礼聘当代有名的学者翻译希腊罗马的古典名作，像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修辞学和伦理学、荷马的史诗，许多希腊教父的名作，如巴西耳、金口若望、欧瑟比等人的作品，也都翻译成拉丁文。教宗尼各老五世还命人翻译圣经。不过，尼各老身体多病，限制了精力和时间，他的全部翻译计划因而无法完全实行。但是经由他大力提倡，开了风气之先，文艺的气息也就日益兴盛，罗马教廷因而也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中心。教宗尼各

老去世的时候，梵蒂冈图书馆的藏书就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册，这也是他留给后世最尊贵的学术遗产。

教宗尼各老五世去世后，接替他的是西班牙籍的加里斯督三世。他之所以被选为教宗，一来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位高龄七十七岁的老人，二来他是外国人，是罗马奥耳西尼家族和高隆纳家族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他在位的时间是 1455 年到 1458 年，约三年而已。他最最感到迫切的任务是呼吁组织十字军去对抗那不断向西发展的土耳其人，但是以十字军来实现“基督教共和国”的年代早已过去，西欧各重要国家又都忙于自己国内的问题，无暇去兼顾遥远的东方问题。东方问题占据了加里斯督全部的注意力，推动文化自然就被忽视了。他下令停止尼各老五世已经开始的美化梵蒂冈工程，将所节省的经费移作建造军舰，对付土耳其人，不过，他对教宗尼各老所任用的人文学者，仍然十分慷慨，教廷还是这班学者活动的中心。他对教会没有令人兴奋的贡献，却因着他滥用亲戚而给教会留下了深感悲痛而又头痛的历史。

前面已经介绍过四位教宗，他们是马丁五世、欧杰尼四世、尼各老五世和加里斯督三世，下面介绍继任他们职位的几位教宗。首先，介绍碧岳二世，他继加里斯督三世荣登伯多禄的宝座，他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公元 1458 年到 1464 年是他的任期。他的过去波澜壮阔，他曾经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早年就读于锡也纳大学，专程到佛罗伦斯学习希腊文，对古典文艺很有心得，他在年轻时所写的诗词和散文就已经在文坛上传诵。他参加过巴塞耳的大公会议，替对立的教宗菲力克斯五世服务过，曾接受诗人最高的荣誉象征“月桂冠”，也一度在维也纳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对日耳曼的人文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是欧洲闻名的人文主义者、多才多艺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维也纳协约缔结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公元 1445 年，他突然看破红尘，摆脱了官场而决心献身给教会。教宗欧杰尼四世赦免了他当年参加过分裂运动的行径，第二年他晋升司铎，从此一帆风顺，步步高升，1447 年就升了主教，两年后调任故乡锡也纳的主教，1456 年升任枢机，两年后被选为教宗，消息传出之后，欧洲各地的人文学者都额首相贺，深庆得人，一时之间，奔赴罗马、希望获得一官半职的人络绎于途。可是，碧岳二世并不是恣意挥霍、任意用钱的人，由于组织十字军对抗土耳其人急需用钱，他不得不减低无谓的费用，对文艺的支持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他自己却在公余之暇从事写作，他是唯一留下自传的教宗。这本自传提供了研究当代政治和社会的重要史料，他的书信活泼生动而又富有人情味。他是一位诗人，一位历史学家，他也会画画，他注重教育，在他任内先后创办了三座大学，他还计划编写一本世界地理，可惜只完成了亚洲部分。碧岳二世不仅是一位人文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富有机智的政治家，在这一方面他也有所成就，他促使法王路易九世废除了教会分裂时期所订的法规。半胡斯派的波希米亚王乔治也派遣使节向教宗碧岳二世表达服从的意愿。他又屈服了里米尼的暴君，不过他并没有能够完成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组织欧洲联盟的十字军抵抗土耳其人。

碧岳第二甚至还宣布召开曼都亚会议，并且亲自前往，但是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所获得的仅仅只是口头的承诺而已，反应相当冷淡，只有威尼斯提供了少数的船只做为点缀而已。他决定不再等候王侯们的支持，亲自组织十字军，希望这样会给王侯们树立一个好榜样，但是所有的人都试着劝阻教宗，何况教宗当时的健康状况很差，病势已重。然而，他不听劝告，竟率领着一支杂凑而成的军队和抱持怀疑态度的神长们，离开了罗马。到达安哥纳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1464 年八月，威尼斯的船只姗姗来迟，教宗只能让人扶他到窗口，看了看从威尼斯开来的船舰。第二天便溘然长逝。和他同行的人，在他死后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地方。

继任碧岳二世职位的是教宗保禄二世，任期是从公元 1464 年到 1471 年，他是出生于威尼斯的教宗欧杰尼的外甥，因为在罗马建立了美轮美奂的威尼斯宫而留名千古。他是个老好人，与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以后的及与他以前的五位教宗相比，他就显得平庸多了。从他担任教宗开始，教廷内增加了世俗的气氛，在他以后的承继者任内，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几乎使教

廷和整个教会濒临毁灭。他本人对人文运动不太热心，教宗尼各老五世时的波卡诺事件给他的印象还很深刻。他认为过分地强调古典时代的外教文艺，对基督信仰可能有不利影响，同时，他也看到了过去的历代教宗所引进的学者当中，有些人不仅是思想有问题，连他们的私生活也不尽合乎教会的原则。而实际上，当时的教廷里面和罗马学院里的不少学者，也太嚣张，太不满现实了，这就证实了保禄二世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学者中的柏拉底那和赖多斯等人，不只崇拜罗马共和时代的文艺，而且还以恢复各种古代的宗教仪式为己任。他们显然想建立一个宗教大综合来代替耶稣基督的宗教。赖多斯甚且还自称为大司祭，同时他们还经常地歌颂罗马的共和政体，当时的罗马人已经经验过像哥拉黎恩吉之类的革命，或者之后的波卡诺事件，对他们来说，这些学者的言论很可能会产生很不良的政治后果。事实也果真如此，柏拉底那和赖多斯也真的正在酝酿政变，企图推翻教宗的政权，达到他们的政治改革目的。

教宗保禄二世先发制人，下令封闭罗马学院，并且把柏拉底那、赖加斯等领袖人物逮捕下狱。虽然后来问题圆满解决，保禄二世却落了一个“反人文运动”的恶名，柏拉底那所写的教宗传，对保禄二世的批评，始终强调保禄二世是一位反人文主义者，一直到近代，史学家才逐渐替教宗洗清了这个恶名。的确，保禄二世并不是一位人文学者，再加上教廷的经济拮据，他也未曾大力支持文艺，不过，他对传播文艺的印刷事业却相当注意。1466年，日耳曼的印刷专家孔拉德薛横汉和亚诺德巴拉兹来到了义大利，在苏比雅谷设立印刷厂，第二年，教宗保禄二世就曾邀请他们到罗马开设第二家印刷厂，又在梵蒂冈添设了出版部。他还对收藏古代的钱币碑刻很感兴趣，对后来的罗马博物院贡献不少。

说起罗马博物院和梵蒂冈图书馆，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继承保禄二世的教宗西斯笃四世。他的任期是从公元1471年到1484年，他是利古利亚人，出身寒微，早年进入方济会，在升任枢机以前，原是方济会的总会长，可以说是一位无可谴责的虔诚司铎。在教宗任内，他固然表现了杰出的统治才能，也表现了他个性上极大的弱点。他是一位学者，也是文艺复兴的热心保护人，在保禄二世任内被排挤的人文学者，又大受重用而侧身于教廷。他重用当代艺术大师，并且设置了梵蒂冈官方画家。西斯笃四世建造了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圣神医院、平民圣母堂、和平圣母堂，以及有艺术之宫称号的西斯汀大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473年，到1481年完工，也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大师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的天才表现。在教宗的惨淡经营下，梵蒂冈图书馆的藏书增加到了三千五百多册，比起教宗尼各老第四的年代，足足多了三倍。同时在他的任内，正式成立了罗马教廷档案处。西斯笃本人又好藏古物，并且开放展览梵蒂冈的珍藏品，供人参观，因而荣获罗马博物院创始人的头衔。前任教宗保禄二世在位时，有鉴于罗马学院被反对者控制，策划发动政变，便下令关闭罗马院，西斯笃则将内部人事改组之后，重新开放，四方学者又再度云集，罗马学院因而成了学术界的堡垒。所以教宗西斯笃四世真不愧是一个文艺复兴教宗。

在神学的历史上，教宗西斯笃四世钦定了两项有关圣母玛利亚始胎无染原罪的教义，而名留千古。因为他本人也特别敬爱圣母玛利亚，所以他把那有艺术之宫称号的西斯汀教堂奉献给圣母玛利亚。教宗西斯笃四世像一般公侯一样，具有给予、挥霍、开恩、不知节约的个性，结果，他把所有的东西给了所有的人，而他给自己的修会“方济会”过多的特恩，以致于当代人对这件事有些不满。同样的，他向各方面颁布大赦。我们知道，按照教会的惯例，蒙受大赦的人必须向教会奉献相当的金钱，西斯笃四世广颁大赦令，很容易被误会成是一种金钱交易。何况，那个时代的教会所得到的献金不完全应用在纯粹的牧灵事业上。在这方面，这时代的教宗和教廷的责任感也日益消退，而另外一方面，教宗西斯笃四世不顾教会的利益和立场，和各国的王侯签下了非常不智、充满危机的协约。其中最不智、也最为冒险的是，教宗给了王侯们指派主教的特权，又允许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几乎变成政府的工具。如此一来，以后的教宗继承者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而煞费苦心。此外，很不幸的，教宗西斯笃四世又让自己失落在小小的义大利各邦的政治迷宫里。在他的政治棋盘上，主要的角色是：除了

罗马的高隆那、奥西尼两大家族的长期纷争之外，还有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斯、威尼斯等城邦的纷争，冲突的地区常常变更，政治的联盟也常常变换。大部分的时间，教宗是联合那不勒斯以攻打美迪奇，有的时候，他也和那不勒斯为敌。教宗置身在这种纷扰不宁的政治圈里，声望大受损失，一般民众不再尊敬仰慕他，不再视他为教友的慈父，只把教宗当做是义大利王侯中的一份子，甚至更不是信友心目中强有力的王侯。

西斯笃闻名于教会的历史，给教会带来莫大的损害，除了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更大的损害，那就是，他任用自己的侄子、外甥，又提拔自己的亲戚。在教廷来说，任用亲人原是由来已久的陋习，加里斯督三世任用侄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西斯笃四世时，更是变本加厉，教宗的罗弗来家族，一时之间都变成了王侯贵卿，在他的十一个侄甥当中，有五位当上枢机、一位当上宗主教、两个成为那不勒斯王的女婿、一人娶了乌比诺公爵的女儿，另一个娶了米兰公爵的女儿，还有更离谱的，一个十六岁大的侄孙也被封为枢机。这些侄孙中，竟然没有一个是贤德出众对教会有所贡献，而当上枢机的，在六位当上枢机的侄孙当中，最能干的是求良诺，他也就是后来的教宗朱利二世。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善守洁德，其中更有一位名叫彼德利亚里欧的枢机，生活放荡，而且最后死于荒淫浪荡中。

在全部的教会历史中，没有一个像西斯笃这样利用职权来提拔亲戚的，在他的任内，许多年长又优秀的枢机相继去世，他居然以不可思议的懦弱和贪婪，选了一群平庸无能、年轻又有堕落倾向的人物，代替那些优秀的枢机。西斯笃选择的枢机中竟然包括了恶贯满盈的弗朗脱的儿子若望，同时他的侄甥枢机和声息相通的枢机联合，组织了西斯汀枢机团，控制了整个教廷的行政，教宗明知他们不法，也无可奈何。贪污、买卖神职等陋习又再死灰复燃，使罗马教会陷入于空前的腐败，他的侄甥为了扩展各自的权力和土地，从事各种不法的行为，教宗不但不加以阻止，还往往以贵为教宗的神权，来打击侄甥的政权。像这种为教会利益以徇私情，十足表现了这个时代罗马教廷的政治生活。这样的腐败、黑暗，好不令人悲痛啊！

文艺复兴的教宗、碧岳二世、保禄二世和西斯笃四世在位时暴露了罗马教廷的黑暗面，我们也许很不以为然，从护教的观点来看，我竟然在暴露教廷的无能和贪婪、徇私和放荡、堕落和腐败，这恐怕不好。我原先也考虑是否轻描淡写一下，不必举出那么露骨的例子，但是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坦白地说出当时的真象，好使各位明白，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创立者，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保护者，我们的教会是来自天主自己，而不是人类。人为的因素造成教会的俗化、腐化，令人汗颜悲痛，但是天主子耶稣会有能力引导教会从腐朽中蒙受救恩，得到净化与重生，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圣教会也会屹立多久，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也是圣教会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世俗政权的原因。

下面继续要介绍几位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他们当中有的生活放荡腐化，教廷黑暗消极的一面比起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仍然采取据实介绍的路线，然后，您将体验到天主子耶稣、我们圣教会的头，要如何地引领自己的教会，从罪恶、从黑暗中走向救恩，走向圣化。

接着，我就来为各位介绍继教宗西斯笃四世当选教宗的依诺森八世，依诺森八世当选，背后还有一段可耻的阴谋。经过情形原来是这样的，在西斯笃四世去世之后，有两个人想要争夺教宗的宝座，在选举的过程中，完全暴露了枢机团恶劣的精神和手段。想要当教宗的人，一个是教宗加里斯督三世的侄子罗特利哥波尔琪亚，另外一个就是教宗西斯笃的侄子求良诺罗弗来。求良诺考虑到自己还年轻，只有四十一岁，自己当教宗的时机尚未成熟，他需要的是一个会依赖他听他话的教宗，所以他就转了个方向，去支持一位来自热那亚的枢机西波。求良诺采用了卑鄙的手段，让西波当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竟想出书面贿赂的方式，也就是凡投西波一票的枢机，可以表明自己的意愿，这些意愿将来一定会实现，结果西波果然当选，取名为依诺森八世。他的任期从公元 1484 年到 1492 年。像这种公开贿选的非违法行为，在教会史上还真不多见。

依诺森八世既然是以贿赂获得选举，在他的领导下，罗马教廷的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

服务于教廷的人员又良莠不齐，其中竟有公开售卖神职，或是伪造文书以广赐恩惠的事。举个例子吧，竟然有人假冒教宗的名，特准教士金屋藏娇。至于枢机团也多为世俗的利欲薰黑了良心道德，专以俗世的名利为重，置教廷的名誉于不顾。

让我们来检视一下依诺森八世的任内，发生那些令后世悲痛的事。相传依诺森八世个性仁慈，意志非常脆弱，在他进入神职以前，已经有两个非婚生下的孩子，一男一女，依诺森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娶到佛罗伦斯的罗兰佐美迪奇的女儿为妻，有人说这是一个政治婚姻，为的是要和佛罗伦斯的美迪奇言和。这件事因此成了史无前例的笑柄。罗兰佐美迪奇也因此向懦弱的依诺森八世要求一个特恩，为自己十三岁的儿子若望美迪奇求得了枢机的荣誉和名份。这桩婚事以及教宗外孙女的婚事，都先后安排在梵蒂冈宫内举行，其铺张的程度，与俗世皇家的婚姻比较，毫无逊色。依诺森又把自己弟弟的非婚生子擢升为枢机。像这样公开而毫无廉耻的事，竟然出现在圣教会的中心——罗马教廷，其影响道德的衰落，可以想见。著名而德高望重的艾基迪枢机目睹了当时的情形，写下了辛酸的字句，他是这样写的：依诺森八世是第一位公开展览他的孩子、公开主持孩子婚礼的教宗，但愿这件空前的事，将来无人仿效。依诺森八世也不能远避义大利的战争和纷乱的政治，在众多使圣伯多禄的宝座蒙羞逊色的教宗当中，依诺森八世正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他庸弱无能的个性和他所造成的诸多笑柄。其实，真正该受谴责的应该是教宗西斯笃四世的侄子求良诺枢机，他只凭着一己的利害关系，把这位庸碌的人物举上教宗的宝座，并且在依诺森八世的整个任期内，完全操纵着他的行动。依诺森八世在位八年，一方面加速了教廷的腐败，一方面也唤醒了有识之士竭力呼吁教会要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的时机并没有成熟，教会还得遭遇更大的灾难。

教会所遭遇的更大的灾难就是亚历山大六世，他是教会历史上最不称职的一位教宗，二十五岁时，被他的舅父加里斯督三世擢升为枢机，后来西斯笃四世又任命他为波多的主教。他虽身任神职，但一直都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他 1470 年和一位曾经结过婚的罗马女子同居，过着一种婚姻生活，同时还维持着他不合法的关系，他这种放荡的行为是大家早已知道，碧岳二世也曾经恳切地责备过他。亚历山大六世甚至在他当上教宗以后的任期内，还生了一个儿子。既然明知他是这么一个放荡的人，怎么可能被选为伯多禄的继承人呢？原来，他当选的经过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六世在当选以前名叫罗特利哥鲍奇亚枢机，也是罗马教廷的副秘书长，他向选举他的枢机们行贿，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项选举本身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但也暴露出有投票权的枢机们缺乏责任感和道德勇气，这也是历史上所未见到的。亚历山大六世的任期是从公元 1492 年到 1503 年，教宗的四个孩子都在教宗父亲的宫廷内长大，长子放荡淫乱，一如其父，被暗杀而死。亚历山大六世最喜欢这个儿子，爱子死亡令他悲伤不已，他也在这事上看出天主的惩罚。他发表了一份致王侯和教友的信函，表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改变。亚历山大六世为了能和那不勒斯维持同盟关系，并且保持教皇国的安全，于是为他的儿女安排政治婚姻，借着他的婚姻政策，亚历山大不但为儿女做了打算，而且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因为这项婚姻政策，亚历山大将罗马教会带进了义大利战争。

公元 1503 年，亚历山大六世在一次宴会中，因食物中毒，得了疟疾而去世，亚历山大在教会史上固然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臭名，但在他的任内，对艺术而言，倒是留给我们一笔丰富的遗产。他命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重建天使堡教堂。这座著名的建筑物直到今天还巍峨屹立在罗马，波尔琪亚宫廷内的壁画，以及米开兰基罗的痛苦圣母大理石雕像，都是千古杰作。亚历山大不惜耗费钱财，美化梵蒂冈宫和罗马各教堂，一五零零年圣年，朝圣者的捐款大多用在圣伯多禄大堂的重建。一四九九年，亚历山大曾颁布一道诏书，恩准为重建圣伯多禄大教堂而捐献的人，能获得大赦，从此产生了多种弊端，终于导致马丁·路德起而抗议。

经过亚历山大六世 11 年公开的腐败生活，连枢机团也感觉到必须推选一位在道德上是

德高望重的教宗，结果选出了一位年迈多病的教宗碧岳三世。他是一位沉静虔诚的人，就任以后，他公开宣布说：“我将是和平的教宗，我也要革新教会。”很不幸的，他在位还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两个星期以后，召开选举大会，求良诺枢机认为他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公开宣布他渴望能够戴上教宗的冠冕。而在那时候，求良诺实在也是枢机中的佼佼者，选举大会只举行了几个小时，就选出他为教宗。他就是西斯笃四世的侄子，也就是教宗朱利二世。他登上教宗的宝座以后，立刻颁布公告，严格禁止在选举教宗时的一切买卖行为，这一个公告，无疑的，是对他自己往日行径重重的一击。朱利二世当选时已经六十岁，年轻时进了舅父的修会方济会，当舅父当选为教宗西斯笃四世时，他很快地被擢升为枢机，他的私生活并不比别人平淡，他有三个女儿，也是一位战士与政客。在西斯笃四世的任内，他当过统帅，指挥过远征军旅。他一手控制依诺森八世，安排依诺森当选教宗。他曾和法王查理八世以及沙伏纳罗拉共谋反对亚历山大六世。

朱利二世的一生并不清白，他登基以后，一心一意只想做教宗，他希望再一次高举教宗到独立强大而光荣的地位，他认为，独立强大而光荣的宗座，对完成教会精神的神圣使命，是一种必要。朱利二世是一位诚实的信者，他给当代人的影响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朱利二世不是圣人，可确实是一位伟人，在他的心中，没有诡诈卑鄙的念头，他的愤怒会叫周围的人感到害怕却不会引起不满，他像李尔王，是一位十足的君王，就像米开兰基罗所雕的巨人，他具有无限的毅力和决心，他可以随机应变，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的确是当代最标准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法国的路易十二世，或西班牙的斐迪南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更不必说义大利的政客了。

朱利二世的任期是从 1503 年到 1513 年，总共十年，罗马教宗的政治权在这段期间达到了高峰。朱利二世被称为政治教宗，他最终目的是要在罗马教宗的旗帜下，看到一个统一的义大利。第一步是要巩固教宗国。他以利诱、以武力，甚至以暗杀，铲除了许多好战分子，第二步是征服威尼斯。1509 年，朱利二世参加冈布雷同盟，目的是要瓜分威尼斯。在阿那代罗之役中，威尼斯被联军击败，同盟各国分别占领冈布雷条约划分的土地，教宗国的失地也全数收回。朱利二世达到目的之后，立刻又将矛头指向法国，他不愿意看见法国的势力在义大利过份嚣张，所以他先秘密地和威尼斯签订和约，然后再利用同盟之间相互的猜忌，一五一一年组成神圣同盟，以驱逐法国。法国也就在各方面的紧逼之下，在一五一二年退出义大利。他又继续想办法对付西班牙，他曾感慨地说：“只要天主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就能够使那不勒斯脱离西班牙了。”但是，天主却没有给他时间，一五一三年，教宗朱利二世与世长辞。

朱利二世是一位名实相符的政治教宗，以政治的力量来重建教会的领导地位，而他在艺术方面也有不可泯灭的贡献，他任用艺术大师米开兰基罗、拉斐尔、布拉曼德等人从事美化梵蒂冈的工作，策划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重建工程，总而言之，经过朱利二世十一年的努力，罗马已经成为西欧的艺术殿堂，而教廷也成为义大利半岛的政治重心。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依诺森八世、亚历山大六世和朱利二世三位教宗，他们相继当选。在他们就任的期间，当时教廷内部的腐败是很明显的，依诺森和亚历山大两位教宗私生活腐败的情形，严重影响到教廷的道德和声望。朱利二世终于在政治上重振了罗马教廷的领导地位，在文艺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项献。从他到奥十世，都有哪些贡献？管理教廷的情形等等。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教会所真正需要的是道德的革新，朱利二世和他的前任教宗，全都忽略了这一点，朱利二世在位的十一年内忙于南征北讨，战争占去了他整个的时间和精力，总而言之，朱利对重振教会声誉的看法，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的。一五一年朱利宣布召开第五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这个会议除了避免教会再次分裂的危机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具体表现。朱利去世时，拉特朗大公会议还正在开会中，教会应该革新的呼声从世界各地传来，对这些

呼声，罗马教宗似乎还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朱利二世的继承人利奥十世。

利奥十世相当幸运，亚历山大六世所恢复的教宗国，由朱利二世善加管理和努力扩展，而利奥十世从朱利的努力下偷取了一部份声誉。利奥从小到一直都很幸运，他是佛罗伦斯的罗兰佐美迪奇的儿子，童年时代受过很好的教育，公元一四八八年，当他十四岁时，他的姊姊嫁给了教宗依诺森八世的儿子，他也就在这时候被升为枢机，三十八岁时被选为教宗。当他被选为教宗时，还不过是个辅祭，所以连着接受神父和主教的神品，然后才举行教宗的加冕就职典礼。我们知道佛罗伦斯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而他父亲美迪奇又不遗余力的推行文艺复兴，利奥从小生长在宫廷里，所以自小就养成了对文艺的爱好，尤其爱好音乐、诗文和戏剧，他对任何学者也都有求必应，凡是给他献诗献文的都能获得金钱的酬报，他身边常带着一个红色的丝绒袋，里面装满了钱币，随时准备分赠给向他有所求的人，因此也有了“太阳王”的名号，而梵蒂冈教廷经常有音乐演奏会，甚至他身边还有乐队，随时待命表演，他是一位“生活的艺术家”，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却不知道如何去应付他所活着的年代，相传，他被选为教宗后，就曾对他的弟弟说，“天主既然给我教宗的职位，就让我好好地享用它吧”。他虽然在道德方面从来没有有什么玷污，在教宗的任内，他虔诚地完成宗座的职守，但是他在教廷内的私生活，却看不出他有内修的精神。每一年的秋天，他总率领浩浩荡荡的打猎队伍，离开梵蒂冈宫出外去打猎，而那个村庄就可以获得比丰收之年更多的利润。教宗利奥君王一般慷慨，已经流于挥霍，不到两年，前任教宗留下来的积蓄已经花光，他花掉了三代教宗的钱，一是吝啬的前任教宗所留下的财产，二是当时教廷每年固定的收入，三是将来要为他清偿债务的继承者的收入，使得教廷的财务顿时陷入枯竭，他为了继续完成伯多禄大教堂的建设工程，也就不得不颁布大赦，结果是导致北方有了大变乱，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张贴神学论题，引发出一连串的宗教革命，在朱利的时代，教会的病势已经很重，但是尚未病入膏肓，到了利奥十世的时候，已经是无药可救了。然而当时的罗马教廷对这个情势并不重视，在欢笑与舞蹈声中，蹒跚地走向深渊。利奥十世不仅是耗尽了教廷的财源，而且也失掉了朱利第二辛苦得来的政治资本，利奥十世一直自称为“和平的教宗”，为了和平他不惜牺牲一切，法王路易十二在一五一五年去世后，由年仅二十岁、野心勃勃的法兰西斯一世继承王位，他立刻采取武力行动，想要夺回路易十二所失掉的米兰公国，一五一六年米兰公国战败，与法国签订《永久和约》。法兰西斯一世占领了米兰，他的下一步就是向南攻取那不勒斯，而教宗国就是他的必经之地。利奥自知不能用武力与他对抗，于是改用外交智慧好能取得法兰西斯的欢心，利奥一方面承认法王在米兰的既得主权，一方面又任命法王为罗马教宗和美迪奇家族的保护人，利奥还在当年和法兰西斯一世签订条约，除了很少的修改之外，几乎全照一四三八年法国所公布的《布尔热国是诏令》，把法国境内许多重要城镇神职人员的委任权交给法王，法王也就从此成为法国教会的统治者，这个条约一直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才失去效力。当然造成了法国教会更走向独立，同时也因为高级神职，像主教、修道院院长是由法王任命，被任命的又多为贵族的子弟，结果，造成了法国的神职界分成高低悬殊的两个派别，彼此之间逐渐发生了嫉妒和误会。不过，从教会的角度来平心而论，1516年所签的条约，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这话怎么说呢？那就是在宗教革命以后，法国的教会没有如同日尔曼或英格兰一样受到严重打击，还得归功于法国政府有力的措施，这话又怎么说呢？因为法王既然成为法国教会的统治者，就政治立场来说，他是不愿意和罗马断绝关系的。他也不愿意容忍天主教的信仰受到任何改变。到以后的法国亨利四世在即王位之前，原是改革派的新教徒，但他当了法国国王之后，就改信罗马天主教，这可以说是一五一六年的条约逼使他不得不如此，这个条约能够产生如此有利于教会的效果，原不是利奥所能预料得到的，当他与法兰西斯一世签订条约时，他唯一所顾虑的是如何平安无事地维持教皇国的现况和美迪奇家族的利益。

从教宗尼各老五世到利奥十世的九位教宗，我们通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因为公元一四五零年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已经进到它的黄金时代，而从事推动这项文化运动最热心的是罗马教宗。这一段时期也是意大利政治最紧张的时期，先是弱肉强食，各城邦采取向外扩展的政策，来巩固各自的势力和利益，继之是法国军队入侵，使意大利各城邦在强敌压境之下，寻求为自身最为有利的关系，罗马教宗以教宗国国王的身份，被逼卷入这种政治和战争的漩涡中合纵连横，从事各种政治上的活动，因此，罗马教宗又有“意大利君主”之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统治整个儿的意大利半岛，而是因为他们和其他意大利的独裁者一样，以平等地位来分治意大利半岛。

推动文化和从事政治活动，很明显的，都不应该是罗马教宗的本来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地热心而又不遗余力呢？这当然是欧洲局势，尤其是意大利的政治局势所促成的，中古时代的那种基督教共和国的观念早已成为过去，西欧的几个重要国家，都在忙着发展自己的命运，像日尔曼正忙着如何为哈布斯堡王朝奠定基础，法国正处在百年战争之后，百废待兴，忙于法国本身的统一工作，而逐渐的走向专制王权，而百年战争以后的英国呢，因为战败而失去了在欧洲大陆上的土地，引起国内贵族不满，导致三十年之久的蔷薇战争，最后才由亨利·都铎建立专制王朝，至于伊比利半岛，也从分裂步向统一，从消灭回教国家而走向纯基督教国家。这些国家实际政治的发展，历代的罗马教宗不能不清楚认识并坦白承认，基督教共和国的理想，已经根本不可能实行了。

既然如此，唯一可以采取的政治路线就是和这些国家妥协，基于现实政治的原则，罗马教宗也只好忍痛默认与法国之间的有伤教会权益的布耳热国是诏令，以及和日尔曼之间的维也纳协定，退守意大利，因为这里是他的根据地。可是，在当时的意大利，政治上是一片混乱，不能不采取合纵连横的政治手腕，在这种情形下，罗马教宗被迫于情势而不能以领袖自居，只有和其他的领袖一样平等对待，变成了意大利的众位君主之一了。在政治上，罗马教宗固然是已经失去了他的领导地位，但是，他毕竟还是罗马传统的继承人，而罗马也是基督教会的中心。因此，从教宗尼各老五世开始，列代教宗都推动不遗余力，一时之间，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罗马也就逐渐成为意大利的文化中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非常幸运地可以瞻仰这群文艺复兴的天才大师遗留给我们的遗产。这时代的罗马教宗对艺术的贡献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几位教宗，他们不论是为保护教会俗世的利益，或是为推动文艺来美化梵蒂冈教廷，这些教宗都给人一个很坏的印象，那就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常非常的世俗化的一面，很明显的，他们已经把本末给颠倒了，他们所做的，和教会需要他们做的，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无论是教宗的政治权力，或是一座外表雄伟富丽的教堂，都只不过是教会应用的手法，而不是他刻意去追逐的目的啊。文艺复兴教宗，他们竟然错以方法为目的，以俗世的价值来替代精神价值，这也正是当时的教会所面临的真正危机，它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亚威农流亡或是西方教会大分裂，因为这两者都只是暴露出教会在组织上的弱点，而教会的世俗化所暴露的，确实是教会在思想上的偏差和精神上的缺陷。也就难怪在教宗尼各老五世继承教宗职位后的七十年，马丁·路德倡导改革宗教时，立刻获得四方共鸣，宗教革命一发不可收拾，这并不是出于少数改革者个人的天才，而是在已经世俗了的罗马教廷，已经失去了它反击的力量了。

1.1.7 教会内的生活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是历史上相当重要的大时代，也是世界历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前面的章节很详细地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教宗与当代的各个西欧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角度上的来往关系，以及他们相互之间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下面的章节我们要从高层的教廷和教士们的生活环境，进入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圈子里，看看他们宗教生活的情形。

十四到十五世纪的西欧，还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的世界，一般平民百姓的思想和生活，都在教会的信条和教会的法律控制之下，从外表看来嘛，宗教活动是有增无减，无论是个人、

家庭、社团和国家全部都笼罩在基督教的气氛之下。但是，这种外表的宗教活动，对教友个人的内心生活，对社会的健全和安宁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无可讳言的，宗教生活更加的形式化、更加的机械化，缺乏潜移默化的力量，宗教似乎成了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活动，这话是什么意思？教友们在生活中和天主讨价还价，他们参加各种宗教活，已不是发自内心出于真诚，而是希望天主赐给他某种恩惠，或是避免某种灾祸。这是不是像是市场上的交易活动呢？是不是在和天主讨价还价呢？因此许多的宗教活动也就近乎迷信的行为了。做了某种善功，或是念了某篇经文，就保证可以获得自己的心愿，这种信心，从某种角度而言，固然可以说是一种类似赤子热情的流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却减低了基督教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基督宗教常常是以外表的行动来表达内心的真诚，而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欧洲基督徒，似乎已经失去了内心和外表齐头并进的平衡了。

要说明那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失去了内外平衡，最好的例子就是宗教游行和朝圣的活动了。为了庆祝教会里重要的节日，像圣体瞻礼、圣母升天瞻礼等，或是是本城、本镇、本村的主保圣人的生日或殉道的纪念日，再有嘛就是祈福消灾了，每座城或每个村镇都有场面非常壮观热闹的宗教游行。举办游行的机会很多，比方说公元一千四百年左右，日尔曼的科隆城，每年总要举行将近一百多场游行，几乎是平均每三天一次，一四一二年的巴黎，从五月到七月，每天都有游行，由不同的工会、商会、宗教团体、男女修会分别举办。游行的原来意义是说：“某个地区用具体的行动来表达信友内心的宗教热忱”，但是想一想，那种三天一市、五天一集的游行，已经流为例行公事，失去了它原有的严肃而神圣的意义了。更何况，在游行之后，往往大吃大喝，甚至还又唱又跳，前后的活动显得相当不调和。朝圣这种宗教活动，起源于中古时代，具有苦行赎罪的意义，长途跋涉，沿途托钵乞讨，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尤其是巴勒斯坦去朝圣，绝对不同于现代的观光旅游。耶路撒冷一直是教友们朝圣的热门地点，十四到十六世纪的巴勒斯坦虽然是在回教徒的控制之下，但是教友前往朝圣的数目还是相当可观，此外，在西欧本土上，也有不少朝圣地，吸引从各地去的朝圣者，当然了，最令基督徒向往的就是罗马，罗马是教廷的所在地，是基督徒的中心，罗马不仅有千余年的教会传统，何况还有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坟墓。公元一千三百年以后，罗马更增添了吸引朝圣者的理由。

公元 1300 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第一次举行圣年的庆祝活动，公元 1343 年，教宗克勒孟六世又规定从公元 1350 开始，每隔五十年就举行一次圣年，以后的教宗又改为每三十三年举行一次，然后，又改为每二十五年举行一次圣年活动。这种圣年活动就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的现代，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一九七五年的圣年，当然公元两千年也会是一个圣年，不知这一年我们中国人有多少去朝圣了。为了吸引教友到罗马参加圣年朝圣，教会颁发大赦，凡诚心悔罪告解而又履行善功的教友，能获得罪罚之赦，按照教会传统的道理，人若犯了罪，就必须接受因所犯的罪而应该受的罚。罪能在告解圣事内获得宽赦，而罚呢，仍然得需要实行某些善功才能抵消，否则的话，就必然会在死后在炼狱中补行。许多善功中的一种就是“金钱”，拿钱给教会帮助教会去推行各种传教事业和慈善工作。由于宣讲大赦的某些神职人员在观念上有偏差，往往把捐献说成是获得大赦的重要条件，而一般的教友也以为向教会提供某些捐款，就能够获得大赦，因而忽略了，内心的悔罪和生活上、行为上的改过迁善，才是更重要的条件。历代教宗所颁的大赦愈来愈多，而颁布大赦的理由也愈来愈世俗化，所以，也就造成了教会内很多的弊端，可是大赦所造成的最大毛病，倒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宗教生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只要教友履行教会规定的某项仪式，似乎就可以保证获得预期的效果，而宗教所要求的内心改革反而被置之高阁略而不提了。

另外一种反映出这时代宗教的形式化和机械化的，就是对圣人圣女的崇敬，这种习惯本原本在初期教会时代就已经盛行，在教难的时代，许许多多的教友，不分男女老少，更不分贫富贵贱，为自己的信仰而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为主证道。这种殉道精神，对其他的教友

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殉道者因此也就得到教友的崇敬，而被尊奉为规范。除了殉道者之外，还有不少信友，虽然没有流血壮烈牺牲，但是他们每天过着圣善的生活，虔诚祈祷，也成为信友的楷模，随着时代延长，圣人圣女的数目也就跟着不断增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在纪念一位或好几位圣者。圣人圣女之所以被人崇敬，对信友产生吸引力，是因为这些圣人圣女也都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也都饱经人间痛苦，所以也就容易了解一般人的痛苦，而对世人富有同情心。他们的成功，正是一般教友对来世永生的希望，圣者们既然富有同情心，那么对世人的痛苦，自然会有一份特别的关怀，只要我们向他们祈祷，那么任何困难都会有一位主保圣人向我们向天主祈求，困难也就容易解决了。我给您举些个例子，您就更明白了，像圣女阿波罗尼亚殉道的时候，行刑者敲掉了她满口的牙齿，她就成了害牙病者的主保。普通一般的病则求圣费亚克，而疑难杂症，尤其是瘟疫，就该求圣洛克不可了，圣碧岳能治跛子，圣安东尼诺则治风湿病，各行各业也都有各行各业的主保圣人。

原本，崇敬圣人的目的是为了激发自己效法他们的芳表，热心恭敬天主，到十四、十五世纪以后，反而被祈福避祸所取代了。而且在态度上，一般的教友往往是以一种交易的态度来崇敬圣人。只要是我履行了某些宗教仪式，我所祈求的也必然要应验才对。当然可以看出来，若是抱持着这种态度，不就是迷信的行为吗？这种宗教仪式和态度也就成为以后有心改革宗教的人，攻击教会的另一个焦点。虽然如此，但是仍然要跟各位说明另一个正面而积极的事实。的确，崇敬圣人也说明了当时的教友中，仍然有不少人富有赤子般的信心，度着单纯而又诚朴的宗教生活。从崇敬圣人推而广之，因而也崇敬圣人们的遗骸和遗物，这跟我们现代人珍藏先人留下来的纪念品的心情一样，而当时的教友们珍藏圣人的遗骸和遗物，实在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所能想像的。圣人的遗物，竟然变成商场上交易的货品，我们现在也有买卖古董的，但是，当时的情形已经到了超乎人能想像的程度。比方说，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所遗留下来的一块面包，竟然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被高价买卖呢，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公元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流亡到西方的希腊人带来无奇不有的遗物到处兜售，充满生意经的商人竟然假造仿冒圣人的遗物，在市场上销售，为的是满足教友们收藏的嗜好。

避祸求福，本身就是人的天性，崇敬圣人和圣人们的遗骸遗骨，教友的用意也多是为此，虽然带有迷信的色彩，但是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可是相信除了天主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超自然力量，控制着人类的祸福，那就是直接违背教会的信仰，真正是迷信无疑了。教会当局虽然一再重申严格的禁止星象和巫术，整个的中古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星象和巫术仍然盛行不衰。星象学相信人类的命运是受到天空中各种星辰的控制，因此只要知道星辰的方位，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相对的关系，就可以避祸得福了。已经归化于基督信仰的欧洲，还深深相信星象对人类的活动具有深远的控制能力，当时欧洲各个帝王公侯的宫廷里或是旅途上，都有星象家在他们左右，随时侍候着，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征求星象家的意见，连教会人士也不例外。比方说，教宗格肋孟六世，曾先征求星象家的演算推测，才敢决定十字军出发的日子，而一般民间，对婚丧之事，也多会请求星象家指算所谓的黄道吉日。教会信德的道理，相信有魔鬼存在，同时也相信魔鬼不能加害于人，除非有天主许可，可是在当时，混乱多难的时候，一般信仰浮浅的教友往往忘了自己的信仰，认为与魔鬼建立友善的关系，就可以避祸得福，或是利用魔鬼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仇人，所以巫术大行其道。十四、十五世纪的巫术相当盛行，文献上曾有这么一段话说：西欧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受到巫术影响，大公会议和地方教会会议都把巫术当成是异端，在法庭上，凡是被告有巫师嫌疑者，都交给宗教裁判所处理，当宗教裁判所查明属实之后，又交给一般政府法庭执行死刑，当时都是火刑，被火活活烧死。公元一四二八年，法国的一个名叫鲁埃雪的地方，就有两百个巫师被判处死刑，十年以后，另一个名叫勃里安桑的地方，也有大批的巫师死于火刑。公元一四四零年，教宗欧杰尼第四曾经公布诏令，明令巫术是迷信，但是民间巫术的流传并没有因此而衰弱。

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一般教友的宗教生活有这么两个特点，那就是宗教生活趋向形式化

和机械化，教友的精神普遍缺少了、丧失了初期教会时代的那种内在活力，这固然是受到时代社会和经济背景影响，但是对形成这种现象，应负最大责任的是教会各领导阶层，上自罗马教宗，下至低级教士，一旦教会的各层领导者，也被卷进到时代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时，当然也就无法领导一般的教友了。下面我必须毫不避讳地谈谈教会中领导阶层腐败的状况，以及在教会内面对各种腐败的情况所产生的一种神秘运动。

罗马教廷的各种财政措施，造成了各阶层教士的腐败，教士们为教友所做的各种服务，所要求的献仪，像是求大赦和许可啦，接受教职啦，都需要缴纳一定的捐献，更使得一般教友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金钱竟然变成了宗教活动的主要因素，同时，主教的任命往往成为教廷对亲友和功臣的酬劳。这样的结果是，教区的领导者往往是一些既无才又无德、或者是些没有服务精神的人，他们把神圣教士的职务，当做是获得财产和权势的资源，却忽略了以身作则传扬福音、为人群服务的责任，甚至还有一个人担任好几个职务的现象，或是终其一生，没有亲自前往职所在地的情形。教区的主教如此，各堂口的本堂神父，也大同小异。当然啦，我们也不可否认，文艺复兴时代，还有不少认真而又尽职的主教和神父，不过根据各种文献的证明，我们得承认当时神职界的素质的确是每下愈况，情形相当地严重，潜藏着好大的危机。各个修道院的情形又如何呢？他们也不见得乐观。以贫穷生活为号召的方济会道明会，自从十三世纪初期创立以来，一直是教会的新力军，挽回了中古教会的颓势，可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他们也经不起时代的考验，逐渐的，也和世俗教士一样，同流合污了，十四、十五世纪时，他们成为人文学者攻击嘲讽的题材。

1.1.8 异端的传播

宗教生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教士精神的腐化，这些现象当然引起教会内许多有识之士不满，因而主张从事积极改革，大公会议运动的主要目的，固然解决了教会内部分裂的问题，但是革除陋习和提高教士素质，也是大公会议运动的主要课题之一，即使是各种异端派的产生和传扬，最初动机也是要改革教会。

下面要介绍的神秘运动，也算是一种教会革新运动。神秘运动开始时发起于一般民间和低级教士，他们正因为看到教会领导阶级的无能与腐化，所以主张回复到教会初期的那种纯朴生活，又为了反对宗教生活逐渐严重的形式和机械化，他们强调人内在心灵的精神生活，宗教的本质原本就是在建立人和天主之间的个人关系，制度和外在的仪式固然是有助于人内在精神的发展，但是这些都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神秘运动的宗旨是要促进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为的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最后目的。在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之前，人必须改革自己的生活，先要合乎教会的原来精神，个人的生活改善之后，还应该推己及人，影响到周围的近人，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改善，所以，这时代的神秘运动不讲求教会的典章制度，宗教礼仪，也不讲求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分析和注解，而完全只讲求简朴而平实的个人生活。正因为如此，这种立意很好的神秘运动，在当时并没有能够获得教会当局谅解，往往将他们列入有异端的嫌疑。神秘运动最早发源于日尔曼的来茵河流域，然后再流传到尼德兰，也就是现在的荷兰境内，称为新的虔诚，拜我国印刷术的传入欧洲，神秘家善为利用，以文字来广传他们的思想。有的还兴办学校，教育青年学子，他们更进入城市或乡间传道，使他们的思想渗透到民间。这些神秘家中，固然有不少知名之士，但绝大多数是沉默的一群。站在个人的生活岗位上，沉默地做一个虔诚的好基督徒。下面就介绍一下在日尔曼和尼德兰的神秘家的活动情形。

在日尔曼，宣传神秘运动最热心的是艾卡托和他的两个弟子，一个名叫陶勒，另外一个苏梭。艾卡托是道明会会士，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因此有人批评他的思想带有泛神论。他为了强调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而被科隆的主教以异端罪告到当地的教会法庭，最后交给亚威农的教廷直接处理，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他死后两年，宣判他作品中的一部分为异端。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说，艾卡托并不是一位明知故犯有意的异端者，他的整个神学体系也都合乎教会的传统信仰，可是，他太过份地强调人和天主之间的神秘关系，在用辞上似乎犯有泛神论的嫌疑。艾卡托不只是用拉丁文写作，他还是一位动人的宣道家，借着宣道，他唤醒了许多热心人士，尤其是基层教士和修女，度一种虔诚的灵修生活。他们以天主之友为名，组成小团体，互相劝勉，努力修德立功，艾卡托的弟子陶德，继承衣钵，强调实际和灵修之道，尽量避免神学上的抽象推论。他不辞辛劳，四出宣讲，用简单明了的话，说明做人的大道理。艾卡托的另外一个弟子苏梭擅长写作，他以文字来传播神秘运动的思想，最有名的书是真理小册和永恒智慧小册，他用富有诗意的辞句来描写和永恒的智慧天主相结合的甜蜜，在陶德和苏梭之后，日尔曼的神秘运动也就后继无人，开始衰落了，反而是在尼德兰，却大放异彩。在尼德兰的神秘运动，因而有组织，而且创设学校，教育下一代，所以也就流传得比较广，影响呢也就比较持久。

所谓的新虔诚，是指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用平安的简单的神修方法，表达灵修的美满生活，为了使各位能了解新虔诚究竟是什么，翻开一本名叫《遵主圣范》，又叫《师主篇》的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他的观点就是在强调灵修生活，而忽略神学的理论，认为圣事和礼仪只是方法，是要帮助人达到天人合一的最终目的，因而低估了教会存在的价值，当然与教会的传统有些格格不入了。我们都知道，从神学的立场来说，天主自己创立了教会，借以辅导人类完成灵修，所以教会的存在自然也就有它必然性的价值，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教会内部固然有很多弊端，但是这些弊端并不足以抵消教会继续存在的价值，而神秘运动虽然和传统信仰没有直接抵触。但是，这种运动对教会的消极态度，对教会本身而言，则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也就无怪乎教会当局对之有所顾忌了。而且，同时代的许多异端派别，论及它们的起源，也都是以改革教会，提倡灵修生活为目的，但是都因为过份强调个人灵修的价值，陷入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终于导致对教会某些信仰的否定，甚至还否定了教会本身存在的必要性。

神秘主义和异端，由于一念之差，而走向不同的方向，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曾经一再提出警告说，理智和情感应该相辅而行，只强调任何一面，都会导致不良结果，而异端派就是过份强调感情的发展，终于在理智方面发生信仰上的错误。接下来谈谈十四、十五世纪异端派传播的情形。在还没有谈异端派传播的情形之前，我先说明一下，当时的异端含有那些性质。我们知道，异端对教会的干扰，并不是从十四世纪才有，在初期教会时代，就已经产生过异端，只不过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和初期教会的异端，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当然是受到前后不同的时代背景影响。

初期教会时代，各种信条都还没有清晰的解释，更没有官方的定义，像是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的关系，玛丽亚究竟是天主之母或仅仅只是耶稣基督人性之母，这些教义都还含糊不清，都还没有经过明文解释。教会内的学者一方面为了解释这些信条，另一方面也为了答覆教外学者的质疑，因而有了神学。在解释讨论的过程中，有些学者的言论在大公会议集思广益的严格审查下，被教会当局认为不合乎教会的传统，因而被判定为异端。各位都一定还记得，我从前曾提到过的，公元 325 年尼西亚大公会议时的亚略异端，431 年厄弗所大公会议时的聂斯多略异端，总而言之，教会初期的异端，都是有关教义、信条方面的争论，都是纯粹学术性的神学方面的争论，和具体的教友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些异端也曾经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但是这都是间接的结果，与异端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就不一样了，他们始于对教会具体问题的批评，终于演变成对教会甘一条教义，或是教会内某种制度的否定，甚至是对教会本身的存在，都在被否认的范围内。所谓的教会具体问题，就是指教会内部的腐化，尤其是一般教士生活的腐败和俗化。自从教会在中古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封建化以后，高级教士几乎都成了封建领主，拥有封建头衔，大批大批的采邑，他们不仅卷入与教会毫不相干的政治漩涡中，对教会本身的事务，

对教友的照顾冷漠不关心，而且由于财富增加，道德生活跟着也就降低。从十一世纪以来，历代的教宗都以革除教会陋习和革新教士生活，做为自己的责任，但是，成效都不大。到了十四世纪，教会更遭到空前的危机，先是教宗流亡到亚威农长达七十年之久，随后又有教会的大分裂，两位、甚至三位教宗互相争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有识之士均以革新教会为当务之急，因而有各种改革方案出现。

教士生活的腐化，教会遭到空前的危机，有识之士均以革新教会为当务之急，因而有各种改革方案出现，方案之一就是回到宗徒时代初期教会的那种贫穷简朴的生活。这一派人认为，上自教宗主教，下至基层的神父，既然自称为宗徒的继承人，执行着他们传下来的职权，那么他们也应该过着宗徒时代宗徒贫穷简朴的生活。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派，将使徒的生活和使徒的职权，紧紧相连，两者不能分开，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也不应该享有使徒的职权，反过来说，度使徒般生活的人，当然也应享有使徒的职权。他们认为：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根本无权执行使徒的职权，因此他们所举行的圣事和弥撒，都没有神效，教友就没有服从这种教士的义务。反之，凡是过着相似使徒生活的人，不论他是不是教士，都能执行使徒的职权，他们才是真正的教士，是使徒的继承人，更进一步下结论说：“教会的圣统”应该被否定，因为人人皆是教士，而不需要专职的教士。当然，下一个结论就是：教会的整个意义和使命也就都被这一派的异端给一笔勾销了。

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派和神秘运动，都以改革教会为目的，前者走入了极端，最后是否定教会存在的价值，后者在教会的范围内从事改革，从个人开始，推己及人，而以整个教会的圣化为目标。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也有极大影响，许多都市人民和乡村居民的暴动，各国政府反教会的法律也相继制定并获得议会通过，都可以说是受到异端派的煽动，至于一般平民百姓“反教士情绪”激烈增加，更是这些异端制造出来的后果。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之所以能够盛行，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之外，还得力于过去许多异端思想之潜伏民间，为异端铺了路。比方说，早在十二世纪后半期，我曾讲到过的华陀派或里昂穷人的出现。华陀派最初也不过是标榜回到初期教会的简朴生活，并不算是异端派，而在教会当局禁止他们公开讲道时，他们才开始逐渐走向极端，而成为异端。他们有激烈的反教士情绪，攻击教士的腐败生活、拒绝领受教士所主持的圣事，而把所有过着使徒式简朴生活的俗人，都看成是教士，都有教士的职权，他们诚朴简单的生活，引起都市中下阶级人民的共鸣，所以虽然受到教会当局的惩罚，但是思想的余毒继续潜伏在民间，一旦时机到来，这种潜在的势力就立刻突显出来。

这时期异端的另一个源流，是乔亚金有关未来世界的预言。他的说法和解释相当偏激，影响也更为严重。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像在罗杰培根的著作中，就能看到乔亚金思想的痕迹，还有，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将乔亚金列在天堂上，乔亚金受人推崇也由此可知了。

华陀派、乔亚金派的思想受到教会官方的宣判，被列入异端，但是仍然在民间继续流传，时隐时现。十四世纪的教会，先是“巴比伦流亡”，接着是“大分裂”，给了这些异端思想重新出现的大好时机。十四世纪的前半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方济会精神派，早在修会创立的初期，“贫穷生活”的尺度问题，已经在修会内部起了激烈的争执，会祖圣方济强调的是绝对的贫穷生活，不仅是修士个人不可能有财产，即使是修会本身也不能拥有现世的财物。但是随着会士人数激烈增加，绝对的贫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会士中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主张有限度的贫穷，也就是说，修会应该有生活的必需品，另一派则主张维持圣方济的原始精神，度绝对贫穷的生活，以行乞为生，我们就称他们是方济会精神派。

两派一直争论不休，一二七九年，教宗尼各老第三颁布诏书，规定所有教友捐赠给方济会的动产不动产，所有权属于教宗，会士则只有使用权。对激烈的方济会精神派而言，其中有一部分偏激者拒绝接受教廷的命令，一面攻击教会的腐败，用以标榜自己绝对贫穷的立场，

这一派的势力在意大利、法国的南部最为壮大，热心支持他们的是城镇中的中下级百姓，他们反教士的情绪已经相当高昂，精神派的作为更为他们火上加油，两者合流，力量就很可观了。到了十四世纪初，教廷只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将拒绝接受教廷折衷办法的极端份子开除教籍，以后他们只有转入地下、分散各地继续传播他们的思想。

类似方济会精神派的还有所谓小兄弟，和自由精神兄弟等，虽然没有正规的组织，但却有相同的偏激思想，他们都自认，已经得到基督的真传，认定“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份子”，十三一一年的维恩会议，宣布他们是异端。

前面所谈到的各种异端，一般来说，都是在民间盛行着，没有一个出色像样的领导人物，要到十四世纪后半期，才算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位领导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威克利夫，伏尔泰曾经评论过他“华陀派所窃窃私语的，他则公开宣扬，而他的言论和一个世纪以后新教所说的几乎相同”。

威克利夫生于英国约克郡，就职于牛津大学，是一位哲学家、神学家，也是一位能吸引青年学生的老师，在他手中握有两张王牌，他的势力很快地就突出于大学范围之外，而打进了政治圈里。他的第一张王牌是攻击教会内部的弊病和教士生活的腐败。第二张王牌是英国的排外情绪，亚威农的教宗在法国政府荫蔽下，往往有偏袒法国的嫌疑，而教廷的某些财政措施更引起英国人的不平。英国国会在过去已经好几次通过反罗马教廷的法令，教宗吴尔班五世和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更给了他反对的接口。

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给威克利夫带来了参与英国政治的机会，因为参与了政治，威克利夫也就成为英国王廷反对教会的发言人。他著书立说，不仅批评教会的弊病和腐败，而且还更进一步攻击教会的职权和教义中的某些信条，他身为一位著名的牛津学者，言论所造成的重大影响真是不可言喻。1370年，威克利夫参与了英国派往法兰德斯的布鲁日，和教廷的代表协调教宗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以及其他有关英国教会的事务。他的任务是宣传做英国反教士政策的代言人，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返回牛津以后就开始著书立说，攻击教会和教士，1381年的农民暴动，杀了不少的贵族教士，就是受到威克利夫言论的影响。威克利夫的著作出版以后，教会当局立刻对他采取行动，1377年下令逮捕威克利夫，对威克利夫而言，反倒是一个大好机会，一跃而成为国家的英雄，反教士运动的象征了。1378年，西方教会大分裂，他的言论更走极端，他还授徒传道，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弟子海莱福特和普尔威，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其他的弟子到穷乡僻境，宣传威克利夫的思想。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却有一个非正式的团契，称为罗拉特派，参加这个团契的，大都是乡村绅士及低级教士，这也就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英国的下议院一再地通过反教会财产的法令。

不过在官方，政府是反罗拉特派的。1399年，亨利四世即位后，就对罗拉特派采取严厉的手段，因为在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支持前王查理二世，两年后的一四零一年，国会通过了焚烧异端派的法令，一四一五年的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再度惩罚威克利夫的作品中四十八条的异端。1424年，威克利夫的尸体当众被焚毁，正式被列为异端份子。

威克利夫的思想在英国本土暂时未能发挥公开的作用，但是在遥远的波希米亚树立了强大的势力，和波希米亚的民族意识结合以后，竟然导致了近百年的宗教战争，领导者是普拉克大学的教授约翰胡斯。为什么威克利夫的思想竟会在波希米亚传扬开来呢？原来，在波希米亚王室的公主安妮嫁给英王查理二世以后，两国之间的交往就日渐频繁，许多青年都到英国的牛津求学，因而受到了威克利夫思想的影响。当他们学成归国以后，威克利夫的思想也就随着流传到了波希米亚，很快地就在当地散布开来。波希米亚的教会也具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教会，同样的弊端和腐败的情形。过去曾有不少有心人士要求改革，在亚威农的教宗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设法阻止，除了这宗教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因为，波希米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教会内或是在政府里，重要的职位都操在日尔曼人手里，对波希米亚的捷克斯拉夫民族而言，攻击教会就是攻击日尔曼人，因此，教会的改

革和捷克的民族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推翻教会就是推翻日尔曼人的统治,就在这种气氛中,出现了约翰胡斯。

他生于 1369 年,或 1370 年,早年丧父,由母亲教养成人,也由于他母亲刻苦牺牲,他才能接受大学教育,不久就成为普拉克大学的教授。他的学问、口才、道德修养惊动了整个教育界。1401 年晋升为神父,一四零二接掌普拉克大学的教堂,同时又是索菲亚皇后的神师神父,胡斯可以说是当时捷克最著名的宣道家。每当他讲道时,圣堂内总是座无虚席,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独立思考的人,他的思考都来自华陀派,及其他改革家。当然,影响他最深的是威克利夫。胡斯的异端完全和威克利夫的相同,只有一点,他拒绝接受威克利夫有关圣体圣事的看法。1415 年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宣布胡斯为异端,并且将他交付给俗世政权。最后他被焚烧而死。但是,胡斯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胡斯的死,激发了一片强烈的波希米亚民族运动,他被公认为罗马教会和日尔曼皇帝压迫波希米亚的牺牲品,因而爆发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同时,胡斯派本身也发生了分裂,所以到 1431 年的巴塞耳会议才采取和解政策。由于彼此立场不同,从此,直到宗教革命前夕,波希米亚的内部存在着三个对立的教派,互不相让。宗教革命以后,激进派、温和派与新教合流了。

1.1.9 人文主义

从十五世纪中叶,我国明英宗以后,圣教会和西方基督信仰的世界,都展开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我们惯常称呼的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个时代,东罗马帝国亡于一四五三年,许多学者、艺术家流亡西方,使得西方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杰作,由接触和研究产生了惊叹羡慕,对古典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股风气从意大利传向西欧各国,社会制度、经济制度都有着重大的改变,科学技术更进步,但是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最突出的典型人物是神学家,“天主”、“神”本身是中世纪一切研究的中心,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是人文学者。

因为研究的兴趣从神身上转移到人的本身了,神学家所关心的是思想的本身,所注意的当然是思想的正确与否,文字的表达是否清楚,人文学者则注重作品的文体、用字遣词是否美妙文雅。所以,这时候的学者反而羡慕古代的作品了。所谓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智和艺术活动,并没有创造出新人的典型,相反的,人类被警醒了,自觉性地全神贯注在古典文明上,喜欢用古典的服装来装饰自己,而实际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和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迥然不同的。新的人文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高度的傲慢、自负、骄傲、强力的自觉、崇尚个性,甚至于趋向泰坦主义。他们到处想摆脱束缚,把教会和国族的法律和传统规则当作是束缚个人的桎梏,把每一种社会当做是抑制个人的不公平约束。这些新思想并不是来自古代历史的探讨,他们根本就缺乏纯粹的历史观,催促他们行动的,是一种抗争和对峙的情绪。

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欧人,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高雅,或许有人会以为他们都向往柏拉图、斯多葛、或是西塞禄,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伦理道德上的修养,他们自认为是英雄或超人,而事实上呢,通常他们是些个性懦弱的人,思想贫乏,夸诞不经,阴险虚伪,凶恶无耻,缺乏羞耻之心和自制能力,他们竟然因恶行而自傲,竭力斯瞒他们反抗的姿态。总而言之,人文主义者都互相标榜无限虚荣的记号,他们彼此无止息地标榜着,谈论着不朽的名誉和声望,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时代,曾经有过那么多不朽的诗人、自由人、公仆与政治家,但是,却不曾真正创造出等量的不朽之作。这个奇异的时代,唯一的真正不朽成就就是美术,这也几乎是所有史学家唯一能怀着真正喜悦,给予高度评价的硕果。它潜藏着一种异教精神的毒素,过分地褒扬自然以及肉体之美和肉体上的一切贪欲。另外,它也无限地揶揄人的理智,想要打破一切束缚而自我陶醉。

在人文学者中,知道去防范异教的传染而推动合乎基督教义的文艺复兴学者,当然也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数几乎都染上了异教精神,由于爱好古典,道德规范也就随之低落了,产生一种相反的人生观,而与教友的人生观相对立,当代的人已经认为,人不属于天主,以及

他所属的社会或团体，而认为人是应该在世界上寻求个人的最大幸福，为了摆脱天主或来自他人的一切束缚，抬高自己的身价，满足自己的贪欲，这就是人文学者所标榜的理想。他们决心享尽人间的荣华和富贵，只要是能表现他们的伟大，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用尽一切方法，甚至是谎言、欺诈、毒药、残杀……也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也有许多人文学者，对宗教的特性比较保守，怀着宗教的虔诚，想要革新教会，以适应当时的思想潮流，在这个教会历史上的阴霾时代，出现了一个想拯救教会的热烈而有力的呼声，他就是撒未纳劳的呼声。他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也就是风俗败坏的中心佛罗伦斯城一所道明会修道院的院长。他以热情演讲，呼吁教友刻苦补赎，他自信负有天上来的使命，预言教会将遭受天谴，但是土会必会复兴，而且不久就会应验。因为他演讲的成绩不错，而胆子更加大了，措辞上也逐渐地激烈起来，对教会中腐败份子，尤其是当时的教宗亚历山大，更是大胆批评。在撒未纳劳的影响之下，佛罗伦斯这座沉迷于声色娱乐中的城市竟然转变成为一座忏悔的城市，在他的要求下，产生了矫枉过正的举动，撒未纳劳自己被成功冲昏了头，逐渐由宗教的领域转移到政治的领域，他幻想着使佛罗伦斯成为天主的城，再以它为中心，把改革的风气推广到整个教会。

尽管撒未纳劳为移风易俗而工作，但是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却无动于衷，不过当他干涉政治，而且与教宗的政治采取鲜明的对立时，教宗便改变了态度，并且命令撒未纳劳到罗马去解释说明他的预言。撒未纳劳竟然抗命，拒绝前往罗马，教宗又再下令禁止他演讲，教宗虽然私德不好，但他毕竟是教会的最高领袖，撒未纳劳本该服从他的命令。以后，撒未纳劳更是变本加厉，猛烈攻击教宗，教宗再三警告，最后不得已，只好在 1497 年，不得已将他开除教籍。从此以后，许多追随他的人也逐渐抛弃了他，不久之后，在一次烈火考验时，他所表现的是犹疑和退缩，因而名誉扫地，声望从此下降，原先支持他的人转而攻击他，最后被佛罗伦斯政府逮捕，宣判绞死。死后尸体又遭焚毁，这个一心图力挽狂澜，热心改革的人，由于过分冲动不知节制，遭到如此下场。

除了撒未纳劳以外，还有一位原来是奥斯定会的人名叫依拉斯莫斯，被称为“人主正义学者的巨擘”，他的理想是想把古人的智慧结合圣经同福音溶于一炉，因此他为出版古典作品，以及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然而他的思想却很难捉摸，宗教对他而言，是一个道德生活的向导，他愿意把信条减缩到最少的数目。他嘲笑士林派神学家，他也讽刺隐修士和他们的短处。依拉斯莫斯诚恳地希望能见到教会的改革和进步，不过他的攻击也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为了讥讽当时神职界的缺失，而对修会生活有所曲解，为了嘲笑士林哲学的繁琐，因而攻击神学本身，他虽然始终没有和教会决裂，但是却在无意中给誓反教的改革铺了路。到他晚年时，又深深后悔，他青年时代的作品未免太孟浪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曾提倡鼓励古典艺术的复兴，并且使罗马成为艺术生活的中心，但是却并不像是中古时代那样，艺术完全是朝着敬礼天主的方向而发展。这时候的艺术家也创作了外教的神，他们所寻求的，都离不开他们自己个人的光荣，但是也给圣教会造成好大的玷污。自从西四督四世开始，历任的教宗只忙于俗事，似乎忘记了教会和教友的福祉及利益，说他们是俗世的君王一点也不为过。中古时代的教宗善用他们的神权，是为教友服务，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不但将教会重要职务任意委任给无才又无德亲友，还设法使他们大富大贵，成为义大利上等社会的公侯。

教宗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也和世俗的君王一样，采用同样的方法和手段，招募兵士，与他国联盟。为了维护军队和武力，为了外交，为了发展艺术，为了建造大教堂，以致经济困难，不得不加重税收，更有滥用神权以施放大赦来敛财的情形。这一切丑事，大损教宗的威望，教廷内的教士又都上行下效，使教友大失所望。地方上的主教、神父和隐修院院长的灵修生活，也逐渐颓废下来，情况每下愈况，但是还不致于绝望，因为历史给了我们证明，这时的圣教会虽然危机四伏，但是我们不该忘记，教会的真正领袖是耶稣基督，祂

曾经许诺“地狱的门绝不能战胜她。”

从下面的几许事实来看，我们就可以获得证明。的确，固然在文艺复兴时代，有几位教宗的声望很差，但是在信仰方面，却一直蒙圣神引导，从未出过差错或背离天主所启示的道理。像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他也从来没有在纯粹宗教性的事务上贻人任何口实，他曾经奖励修会，曾经卫护对圣母的敬礼，而且当美洲新大陆发现以后，派遣传教士前往美洲新大陆传扬福音，也不正说明了，天主在照顾着祂自己的教会。人虽然能暂时性地损害教会，但是绝不能毁灭圣教会。何况就整体而言，神职人员和教友，并没有随波逐流走向集体性的堕落，只凭几个历史学家的歪曲报导，是不能令人以偏概全的。

当历史学家提到某一个时代发生了某几件不幸的事件时，一般人就很容易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完全败坏了，以至于对于那些循规蹈矩的，反倒不被人注意，史学家也没有兴趣去加以描述。他们所注意的，是那些反常的事。文艺复兴时代的确有些野心贪婪的枢机，行为不够标准，但是卓尔不群为圣教会增光荣的，也大有人在；傲慢不羁优游自在，只知道游猎而不理教务的主教固然不少，热心拯救人灵，努力改善自己教区的主教更是不乏其人；修会会规废弛的修院不少，但是谨守会规、热忱敬拜天主的修会也比比皆是。文艺复兴对圣教会之所以未酿成重大危机，是因为大部分人仍然保有坚强的信德，对宗教的本份也奉行不辍。我举出一些例子给您参考。

像是圣地朝圣，虽然路途遥远，却常吸弗大队的教友到圣地朝圣，许多新的敬礼蓬勃发展，像是为了敬礼耶稣基督的苦难，而盛行拜苦路的善工。自从我国的印刷术西传以后，圣经、祈祷经书、圣人的行传都不断受到信友欢迎，就像师主篇这本书，成为当代人最最爱读的一本书，而最足以表现当时教会活力的，就是在当时圣教会册封了许多具有英豪圣德的圣人，多达一百来位，各种生活阶层的人都有，有圣女加大利纳，圣若望贾比斯坦，圣方济保辣等人。我们对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初年的社会秩序，可以这么说是频频出现危机，而新生的近代文明尚未稳定，工商业已经突飞猛进，但是大部分的财富是操纵在少数的财阀手中，广大的民众却是在贫困中，圣教会受到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不良影响，虽然代代圣贤辈出，但是不少人为贪污的野心所腐化，不少的具有深思和远见的人，不停地呼吁教会要从事改革，基督的教会和基督教世界，正期待一个更好的日子。

1.2 新教的产生

1.2.1 马丁·路德的生平

这里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单元，紧接着前面的内容介绍誓反教，或是称为抗议教，也就是目前所通称的基督教改教运动。首先，要介绍的是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改教运动。改教的悲剧，我们称它是一场教会分裂的大悲剧，而且这场大悲剧所造成的伤害，直到现代都无法愈合。改教的悲剧首先在德国爆发，这就与德国日尔曼和圣教会的关系，以及当时德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有密切的关连性。

我们要知道，自从罗马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尔曼皇帝开始斗争以来，日尔曼反对罗马的情绪始终就没有消除过，尤其在十五、十六世纪之际的日尔曼本身，充满了矛盾，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来得严重，高级神职人员的财富和生活的腐化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生活既奢侈又浪费，而低级教士却因为生活在贫困中，而显得情绪不佳，对一切希求与改革的革命运动，自然也就很容易表达出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在工商业兴盛的城市，开始流行资本主义，使得从事工商业的资本阶级愈来愈富有，而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却愈来愈贫穷，工人被剥削，小商人倒闭，农民也被沉重的赋税拖垮，这些人都希望改革。而政治方面，日尔曼境内也呈现异常紊乱的情形，大大小小的邦国多达四百多个，还真像一团乱麻，彼此纠缠不清。这些

小邦国虽然同属一个帝国，但是他们都心想独立自主，被三位主教和四位较大的有选举皇帝大权的王侯所控制的皇帝，对这么一盘散沙的帝国，当然是很难施行他的权力。

马丁·路德所面临的皇帝查理五世年轻又任性，十六岁时当上了西班牙国王，同时也兼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菲律宾的广大殖民地的主人，而且还拥有现在的比利时、奥地利及义大利的南部，1520年明武宗正德年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权势最大的国君，而事实上领土虽然广大，但是统治上很困难，还得时常提防外来的敌人，东面有土耳其人威胁，西面有权势日渐强大的法兰西。因此查理五世虽然有心想要保持帝国内信仰一致，但是也无力镇压新产生的改教运动，一切错综复杂的情形，对改教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如果像没有像马丁·路德这么一位特殊个性的人，恐怕也是难以造成一股改教风潮的。

马丁·路德1483年生于萨克森省的埃斯勒本。他的父亲是矿工，为人正直而又勤奋，母亲行止端庄大方，信仰虔诚但却显得心窄。他们对子女的管教非常严格，马丁·路德在成年之后，曾回忆说他曾经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遭到父亲鞭笞，他的学校生活因着家境贫寒而常常感到苦恼，幸亏得到一个富有的贵妇在经济上接济，才得以完成学业。他天资聪明学业有成，父亲为他的成绩感到骄傲，有意要儿子研究法律，不料马丁·路德竟然在1503年进了奥斯定会修院的修院，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原来在入会修道的十五天以前，他曾被一场异常猛烈的暴风雨袭击，当时是雷电交加，他饱受虚惊，深怕自己会被雷电劈死，于是就向天主许愿，如果能脱险不死，便决心入隐修院当隐修士。虽然有人一再劝阻，但是他仍然坚持十五后，正式入会。他这种不够纯正、不够成熟的圣召，成了他终身的累赘。

1507年，马丁·路德晋升为司铎，第二年被委任为威丁堡的神学教授。1510年到1511年他到过罗马，亲眼目睹了教廷的奢侈腐化，深受刺激。但是他信赖教会服从教廷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动摇，真正实际导致马丁·路德改教的，并不是教会的腐败，而是那份困扰他心灵的悲观心情，以及他对罪过、圣宠和灵魂得救的神学问题所抱持的偏执成见。马丁·路德原本是一位虔诚谨慎的司铎，一心一意地渴望自己能成为完美的圣人，但是他个性却又狭窄，刚愎自用，经常是不听劝告，更何况他对士林神学的了解不够深刻。他经常喜欢沉思，虽然十分小心谨慎，但是自从他受到那场猛烈的暴雨风袭击，他对天主的审判就经常怀着恐怖的焦虑。他因为畏惧天主而感觉局促不安，也就对自己是否能得救而开始怀疑，他相信应该对自己内心当中的恶念负责，于是便希望能摆脱内心的烦恼与不安，还希望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确是被天主所宠爱的。当他每次感到猥亵、暴怒，或是对某一端道理怀疑的思想冲击时，便认为自己已经犯下重罪，应当受严属的惩罚。他努力地祈祷，行各种善工、办告解，都不能解除他内心的那份恐惧和不安。他曾经向人说：“我虽然厉行善工，但内心的失望仍然无法去除。”

他为了替心灵内潜伏的问题寻求解答，以获得心灵的安慰与平静，就潜心研读圣经。有一天他看到圣保禄致罗马人书中的一句话：“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他深信他发现了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他按照自己心情的需要去求解释这句话，他说人类已经彻底败坏，无法赦免罪过，虽然人可以在外表上符合法律的要求，完全遵守天主的诫命，但是人类仍旧还是罪人，人类即使多么努力地行善立功，也无法办到，因为人类已经因着原罪而彻底败坏了。人自己不可能得到罪恶的赦免，罪恶的赦免是由外力而来，那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圣宠。耶稣的圣宠能够为我们遮盖人类的任何罪污，但却不能改变我。他更认为，不是善工拯救人，而是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耶稣以自己的救赎功劳，把我们的罪过遮盖起来，所以我们也就不需要去立善功，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立了功。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这么写道：“人类已经被法律压倒，人根本就无法遵守它，那么人应该做什么呢？基督已经完成了法律，用不着我们再去完成，人只须信赖基督，用信心依靠祂就行了，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您听了马丁·路德的这段话，您也就发现他的话和教会传统的道理相互抵触的地方在那

儿了。圣教会训诲我们的是，天主教是公义的，但是天主更是仁慈的，依靠着天主的公义和仁慈，祂绝不命令人做我们人做不到的事。祂一方面以祂的公义公平地分施祂的圣宠。告诉人，若是没有天主圣宠的帮助，人决无可能拯救自己，而另外一方面，祂也教导人要天主的圣宠合作，人也应该自己努力行善，才能求灵升天，信心只不过是得罪赦的开始而已。圣宗徒雅各伯不是说了“信德如果没有善行，只是死的信德”吗？为了得救，只凭信德是不够的，人还应该有爱德，而爱德呢，是要靠行善才能呈现出来的。人应该努力行善，依赖天主的助佑，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1.2.2 教会大赦问题

马丁·路德与圣教会之间的破裂，是逐渐累积而成的，在开头的几年，他只不过是攻击当代神学家的意见，并没有设法攻击圣教会传统的信德。每当有人反对他对信德的看法时，他就回答说：“只有圣经，才是一切真理的泉源和准绳。”这圣经还得是按照他自己所下的解释才算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马丁·路德与教会之间的决裂呢？

大赦事件才是造成马丁·路德与教会决裂的导火线，给了他离开教会、离开修会的机会，下面我就详细说个明白。前面集中讲解了教宗朱利二世在 1506 年开始建造伯多禄大殿，到教宗良十世时大殿尚未完工，所需要的经费实在太庞大，一时无法筹措得够，于是良十世就派人到各处去募款。教友们办告解，领圣体，肯为建造伯多禄大殿而捐献金钱的，教宗就可以颁给他大赦。从教会史和神学方面来看，教宗颁赐大赦，并没有不合法，按照天主教的道理，大赦是圣教会交给教友运用的一种方法，为的是帮助教友补偿自己的罪过。主耶稣基督、童贞圣母和诸圣的功劳，形成一个神恩的宝库，委托给教会来管理支配。教会有权力制定各类条件，像是念短诵、施舍穷人，或是实行其他各种善功，而使教友能够分享到神恩宝库中的宝藏，使吾主耶稣和诸圣者的功劳，能够贴合在教友自己身上。所以凡是满足了教会所规定的那些条件，便能够获得大赦，但是教友必须清楚明白的是，大赦只能宽赦暂时的罪罚，而并不能赦罪。这个信条是根据诸圣相通功的道理，也就是说教会的每一肢体都能共同分享、共同所拥有的神恩宝库。

早在公元第十一世纪时的教宗，已经给参加十字军的人颁赐过各种大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友得大赦要比过去来得容易得多，像是朝圣，拜圣体，为教会捐献，施舍给穷人，都能够从教会获得大赦，这种做法在当时曾获得相当好的成效，使教会有了足够的经费，兴办了许多的慈善事业、社会工作，更有许多圣堂、医院也得以建造完成。而在教友的灵修方面，也有不少良好的收获。

教宗所指派的专人一直为“大赦”这个课题演讲宣传，许多教友因此而办妥了告解，去旧更新，重新与天主和好。到了中古的末期，教宗颁大赦颁得太容易，以致于有被滥用的指责。何况又是以捐款的机会来颁大赦，看来还像在做交易买卖似的。到底代表教宗到各地去宣传大赦和收集捐献的人，他们的目的，是拯救人灵呢，或者是收集金银钱财呢？更糟糕的是，宣传大赦的人甚至是歪曲了教会的道理，从事宣讲的人中，竟然有人说：“大赦的效力是由大赦本身而来。”甚至流行着这样的说词：“当你为某个炼狱灵魂捐献的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他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这样夸张的说词，在今天任何一个神学家，都不敢支持这种言过其实的论调。只可惜的是当时代表教宗到德国去宣传大赦的那位道明会士帖勒，竟然就是如此说的。这种情况对中古时代的人来说，既不新奇也无可憎厌，教友们并不关心教会权威当局是否慎重运用从各地来的捐献。他们所注意关怀的是自己行了善功，但是久而久之，许多人开始对教廷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有所责怪，宣传大赦的教廷任表，在德国尤其引起德国政府的愤怒，他们眼看着德国的银钱源源不断地送到罗马而感到大大地不愉快，因此有人大做宣传，控诉教廷剥削德国的教友，榨取他们的金钱，而对罗马，历代以来所潜藏着的愤恨也因之而日渐加深。

1.2.3 路德派的形成

教宗良十世为了继续建造伯多禄大殿，派人到世界各地宣传，好能得到足够的捐款，所以就以颁布大赦的方法，鼓励教友多行善工。有些派出去宣讲的人，竟然言过其实，歪曲了教会的道理，因而逐渐有人开始责怪教廷颁布的大赦令。由于德国的特殊政治社会背景，引发了德国人对罗马教廷的不满。马丁·路德在整个大赦事件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下面进行分析。

马丁·路德利用了教廷宣讲大赦的不当，公开宣布他那只靠信德、不必要行任何善工便能获得救恩的新理论。他在 1517 年 10 月 21 号，在一次激烈的讲道之后，在威丁堡大学的教堂大门上，按照大学的习惯，对许多神学问题，尤其是对大赦和一般善工的价值问题，提出挑战。他总共提出九十五条论题，当中许多攻击滥放大赦的理论固然不是无的放矢，但是其他的论题则大大损伤了大赦的道理。马丁·路德的论题，虽然沿用了大学论文的传统方式，却立刻传遍整个德国，争辩也就接着展开。

马丁·路德发挥了他演讲的长才，他有动人的声调，活泼的想像力，再加上他那扣人心弦的言辞，有时表现出细腻的热情，有时又大胆痛骂，甚至连最粗鄙的词句也不怕加以运用。这种争辩开始时是在全德国，接着在整个教会激起了巨大的影响，同情他的如潮似涌，反对他的也像排山倒海。教宗良十世起初并不加重视，认为只是各修会的修士们、奥斯定会 and 道明会之间的争辩而已，但是不久，就知道事关重要了。1517 年，路德仍自认为是教会的忠顺份子，但是逐渐的，他被许多神学家的批评和挑战激得脑羞成怒，大赦的问题转为次要，所讨论的争辩，都是灵魂得救与否的基本信条。他一再强调，为灵魂得救只须要信仰，用不着善行，他甚至还想改革整个教会。1518 年教宗良十世召他去罗马答辩，他拒绝了。良十世不愿把事端扩大或闹成僵局，于是以温和的方法对待他，命令一位当时最有权威的神学家迦耶坦枢机去与他对话，让马丁·路德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迦耶坦枢机对路德很友善，但是很坚定地要求路德放弃不当的言词，路德拒绝迦耶坦的要求，不但不放弃自己的谬论，还要求召开大公会议以裁判他的言论，他甚至肯定地说，大公会议也能错。

教宗良十世将路德事件在枢机会议上提出来，经过深长讨论之后，在一五二零年六月对路德颁布了《主！请起！》的诏谕，正式宣判路德的道理，并且限定他在六十天内悔过自新，否则就要遭到开除教籍的处分。路德在还没有得到罗马当局的这种决定之前，曾写信给朋友说：“我已经痛下决心，无论罗马当局如何处理，我都满不在乎了。”这段时间内，他所散布的著作和言论中，声明他的谬论是：教友一律平等；人人可以当司祭；人人该以圣经为独一无二的真理来源；皇帝和王侯比教宗更有召集大公会议的权力；除了圣洗和圣体之外，应该放弃其他的五件圣事。当教宗的诏谕送到了他手上时，他为了表示轻视，就在威丁堡大学的教堂内，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将诏谕烧毁，教宗良十世只好在一五二一年一月将路德开除教籍。从事件一开始，教宗一直谨慎地处理，因此在这件事上，教宗良十世是不应当受到谴责和批评的。

路德到底具有怎么样的人品？他的人格特质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要把路德的人品确切地刻画出来，还并不容易。因为这并不在他具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个性，很难使人了解，而是因为许多人的想像中，他已经成为一个神话性的人物，已经成为一切可能的善与恶的象征了。而真正的马丁·路德，既不是什么妖怪也不是什么圣者，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和创新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颇为吸引人的地方。然而他常缺少自制力，有时候到了粗俗鄙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当他发怒时，他会像失去理智的人那样讲话，他的言论中有些真的是虚伪欺妄，有些则几乎是凶恶怪戾，而令人惊异！

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仅仅只凭借他著作中的那些热烈而又过于激烈的言词来批判他的话，这也不全然是公平的。如果从它的言论中斷章取义的话，当然就有不少句子呈显了他疯狂的气质。他常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毫不谨慎，他不是伪君子，也不是刁滑的外交家，但是他却会以一种鲁钝的简朴来撒谎，并且曲解真理。

在神学问题上，谁要是与他的看法不同，他都鄙视他们有如仇人，肆意地侮辱对方，他并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思想家，他自相矛盾但又不为所困。为了对抗天主教友，他做了圣经的三项驳辩，但是他却禁止他的同伙有不同的意见。马丁·路德被开除教籍以后，情势对他很不利，皇帝查理五世宣布他不再受法律保障，许多大学，包括代表欧洲学术力量的巴黎大学也在内，都宣布反对他，英王亨利八世也曾抨击马丁·路德，当时却有日尔曼的诸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冲突而介入这场风波，特别是马丁·路德所在地的封主，也就是萨克松尼的选侯，把路德带往伐特堡加以保护。马丁·路德就在此时此地，将圣经译成德文，萨克松尼的这位选侯，准许路德的朋友放弃天主教，还准许司铎结婚。1525年，路德自己也和一位离开修会的修女结了婚。

当时，德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去了西班牙，保持天主教信仰的诸侯，自动组织了一个联盟，为的是保护圣教会，联盟领导人是查理五世的哥哥斐迪南大公爵，以及日尔曼南方的主教兼诸侯。而与路德应和的诸侯和萨克松尼选侯则组织了道却联盟。1526年，德国的国会为了避免引起内战，做了以下的决定和公告：“在即将召开的大公会议，解决彼此的争端以前，各个诸侯在其所辖的地区，可以自由选择或约束他所愿意的宗教。”因此，不少的地区改变了信仰。1529年，国会又再公告说：“在召开大公会议以前，不容许再有改变信仰的事发生。”公告发出后，有六位主教和十四个城市起来反对这项公告，因此他们被称为“抗议教派”，或者是称之为“誓反教派”。而在我们中国，一般翻译为基督教或新教。其实，基督教这一个名辞包括了一切信仰耶稣基督的教会，连天主教和东正教也包括在内。所以，在这里暂时就用“新教”这个名词。

皇帝查理五世一直不放弃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达成协议的希望，所以在1530年再一次在奥格斯堡召开会议，新教徒在会议中陈述了他们的看法，他们编写了所谓的奥格斯堡信条，这是新教教义第一次汇集的正式纲要，足以表明路德的思想。所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隔年新教徒组成了一个名叫斯马开德的军事同盟，形成了一种政治势力，而且还拥有一支军队呢。

日尔曼境内，分成了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造成了绵延不断的内战，一直到二十五年后的1555年彼此在奥格斯堡签订了和约，有了一段暂时性的和平。和约的内容可以综合成三点，第一点，他们根据一五三零年所定的奥格斯堡信条，路德教派在日尔曼帝国境内的地位与天主教相同。第二点，帝国境内各地区的宗教信仰应该由诸侯领主来决定，而不是由一般百姓自行决定，假如有人不愿意接受该地区诸侯所选定的教派，那么他们必须离开这地方到他想去的去地方，而不必改教。第三点，凡是神职人员兼任诸侯的主教或修道院的院主，只能私自个别改信路德教派，而在改信路德教派之后，他也就丧失了他的封地，因为土地并不属于他们继承的产业。

奥格斯堡和约签订以后，至少在表面上和平降临到日尔曼境内，根据条约的内容，我们看出来，由封建的领主来决定百姓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说，一般百姓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信仰那一种宗教，得受封建领主的控制。领主要百姓信什么教派，百姓就得信仰什么教派。从此以后，“属谁管辖，便得信奉谁的宗教”这一句话，也就成了德国公民权的惯例。当然啦，日尔曼帝国境内宗教统一的情势，也正式结束。奥格斯堡和约中，这种由封建领主决定人民信仰的原则，在现在的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这项原则至少在当时对这股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潮流，给予一种固定的限制，也从这时候开始，日尔曼的疆土分裂成大大小小的领域，平民百姓各随自己的领主皈依不同的派别，而不再有争执。新教徒不承认教宗和大公会议的权威，不接受教会的训导权，也不接受主教和神父的祝圣、弥撒圣祭以及对圣母玛利亚和圣人圣女的敬礼、圣事与善工的补赎价值、告解圣事、一部分圣经的解释等等，只保留了天主圣三的道理和对耶稣基督神性的信仰。

奥格斯堡和约签订时，马丁·路德已经在他的故乡埃斯勒本去世九年之久，这时候德国

北部、瑞士、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和英国都已改了教，法国境内正在试图改教。本来他对自己的改教似乎应当知足的，然而事实上，他的晚年却笼罩在愁闷的心情中。在他生前，已经看出他自己在许多点上失败了。无数的社会动乱，虽然不是出自他的本意，但是他的偏激思想，却是真正的导因，他也曾经为他所亲眼目睹的德国道德衰颓而悲伤，他蓄意想要改革教会，但是却造成了教会的分裂，这显然不是他始料所及。他愿意使在德国的教会摆脱罗马的政治权力统治，结果呢，却把各国的教会放在世俗君王的权力之下，使他更生气的，应该是他的徒弟之间的争斗，连他所坚持的“只要信，就能得救”以及圣体圣事的道理，也被他的门徒反对，他确实不愿意看到弟子分裂，但是路德言论本身，就已经注定，非分裂成无数的派系不可。

他自以为对圣经有精确研究，他只认定他个人对圣经的看法，不容许别人也有神恩以解释圣经，他实在缺少了圣人的谦虚，他掘开了教会分裂的洪流，给信仰基督的世界造成了四百七十多年来长久分裂的遗憾。

产生于德国的路德教派，不久之后，就获得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普遍支持，不过这种局面，乃是基于政治的因素。原来半岛上的三个王国—瑞典、挪威和丹麦，早在十三世纪末年的公元一二九七年，卡尔麦联盟时，就在丹麦国王的权力下合而为一，但是到了1448年，瑞典几乎独立自主。瑞典教会与罗马教廷分裂的导火线是乌普萨拉地方的总主教古斯塔夫洛来和行政长官斯都尔之间的权力争执，而斯都尔竟然下令监禁总主教，并且还强迫他辞职。当时的教宗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斯都尔开除教籍，同时又向瑞典颁布禁令，就在这种情形下，丹麦的国王克利斯汀二世，扬长直入瑞典，释放总主教，就在1520年总主教就为丹麦王克利斯汀二世加冕成为瑞典国王，克利斯汀二世又把总主教的政敌以及几位重要人物处死，在瑞典的历史上被称为“斯德哥尔摩浴血记”。瑞典人民大为激愤，于是爆发了革命，一位信奉路德教派的信徒伐沙，被拥立为国王，于是路德教派就进入了瑞典。

丹麦国王克利斯汀二世本人也是倾向于路德教派的，1523年，克利斯汀二世被放逐，在克利斯汀三世于十年以后的一五三四年统治丹麦以前，新教乘机进入丹麦、挪威和冰岛，克利斯汀三世即位以后，命令路德的朋友和学生，名叫布根哈根的拟定了一份和日尔曼新教徒地区所有的组织法完全相同的教会组织法。新教进入斯堪地那维亚的方式比较高明，由于在日尔曼地区所获得的经验，是由国家元首下令改奉路德教派，并且宣布为国教，天主教财产全被查封和没收。但是为了避免背逆民意，对外表的礼仪尽量减少更动，只是逐渐在不知不觉的散布路德的言论，以致于民众几乎查觉不出来信仰的内容已经有了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地区，天主教几乎已完全被取缔，而外表的礼仪仍然和天主教最为相似的原因。

曾经被条顿骑士会所统治的波罗的海地区，也开始在一五二五年有了分裂现象。条顿骑士会的会长雅博特，改东普鲁士为俗人管理的公爵国，雅博特的哥哥在一五三九年以后成为里加的总主教，他把新教带到现在俄罗斯境内的里福尼亚。库尔兰和爱沙尼亚在一五六二年以前，都一直信奉天主教，这一年哥德哈总督把库尔兰改成一个普通的公爵国，也推行奥格斯堡信条，而且也和雅博特一样，把库尔兰公爵国划归到波兰王的统辖，把爱沙尼亚让给已经接受新教的瑞典。原来属于瑞典的芬兰，也和瑞典一样，成为新教的地区了。

接下来，我要为您说明瑞士改教的经过。瑞士的改教运动，早在一五一九年就已经开始了，是由一位名叫乌尔利克慈运理的教区神父所领导，他是苏黎世城内的一个本堂神父，在当时是一位颇富盛名的宣道者，他在理论上深受路德影响，但是和路德派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他比路德更为彻底，不但取消了天主教的一切礼仪，摒弃了弥撒圣祭，捣毁了圣像、苦像和祭台，甚至抛弃了一切圣事。路德派至少还相信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隐藏在圣体中，慈运理只认为圣餐礼，是一种纪念耶稣基督受苦难圣死的仪式而已。在这一点上，路德和慈运礼的信徒之间，起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到了后来和奥斯堡信条、瑞士信条都不相同。慈运礼

的道理，在苏黎世赢得了瑞士国内大部分人的拥护，但是联邦当中，仍然有七个坚持信奉天主教。于是慈运理派和天主教派之间演变成政治性的战争。慈运理率领他的教徒去攻打天主教联邦时，不幸阵亡了，天主教派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在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天主教和瑞士新教被列于同等地位，从此，瑞士联邦也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派。

喀尔文派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从路德改教以后，新教就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彼此对立，路德教派的言论就有许多的矛盾，路德总也不敢从他自己的逻辑结论中提出什么原则来，他把组织、敬礼和教会的权力委托给世俗的君长去处理。在瑞士，除了慈运理以外，还有一个比慈运理影响更大的喀尔文教派，甚至还远传到瑞士国境以外的许多地方。教主喀尔文根据路德的言论原则，做了确切而清晰的结论，给新教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因此也确保了新教的生存。喀尔文是在公元一五零九年生于法国北部皮喀第省的诺荣，他比路德小二十六岁，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曾经攻读过法律和神学，当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开始镇压新教徒时，他便到瑞士的巴塞尔避难。1536年，喀尔文就在这个地方发表了《基督教原则》这本书，除了说明只信圣经和善行无益的论调，强调专靠信心便能得救的谬论之外，还更大胆地提出所谓的“预定论”，他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人类灵魂的得救和受到处罚，都早已由天主从永远就预先决定好，不能有所更改。意思就是说，天主早在创造人时，便已经预定某些人升天堂，某些人下地狱的说法，而且天主的这种决定是不能更改的。

事实上，在今天的的新教各派都已舍弃了他这种骇人听闻的道理，喀尔文稍后到达日内瓦，并在日内瓦定居下来，马上就成了日内瓦的领袖，从事整顿庶政、改善风俗的工作。他在日内瓦，根据政教合一的原则，组织了一个神权政治共和国，实施严格的管制，他独裁的作风引起人民不满，遭到驱逐，但是两年以后又被驱逐他的人召回，而以胜利姿态回到日内瓦，从此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喀尔文的角色是日内瓦的教主兼君主。

喀尔文和官员取得协调以后，制定了一部新宪法，交由牧师去执行，由一个有六名牧师和十二名长老组成的法庭，实行专断的裁判权。这个法庭享有很多特权，可以剥夺参加圣餐权、禁止参加会议、宣判放逐，还可以把不肯悔改的人，交付给世俗法庭，这种重裁判和一切严厉的处罚，也都以喀尔文马首是瞻。他健康不佳，但是精力充沛，律己很严，过着淡泊的生活，待人也很严厉。在日内瓦，娱乐是犯禁的，跳舞、掷骰子、夜间喧哗等等，全都是禁止的，对玩纸牌、看小说和刻意修饰发辫的人，常会被抓捕，送到监狱里，甚至在教堂听道理时打瞌睡，也被当做是犯罪的行为，唯一可以阅读的只有圣经而已。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都视为异端，不是处死刑，就是把他们放逐。他在日内瓦创办了研究院，造就培养了新教教义的讲师，派往许多地区去传教，日内瓦城因为喀尔文的努力，竟然成了一座改教运动的模范城，被当时的人称作是“誓反教的罗马”。

新教在当时能够传到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甚至远播到匈牙利，大都是因为从日内瓦派出去的传教士的努力，再有就是在日内瓦出版的各种新教观点的书籍，随着所派出去的传教士流传到这些地区。喀尔文是一位天才型的筹划家，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又具有一个神秘的心灵，他聚集了征服者、布道宗徒和领袖的才智于一身，可惜的是，他缺少了信徒应该有的两种基本德性，那就是真实的谦逊和福音的慈善，甚至是连仇恨我们的人都要爱的那种慈善。用他那清晰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在天主教和他所倡导的新教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超越的铜墙铁壁，信仰合一的希望，真不知道还得等上多少个世纪啊！

路德改教以后不多几年，他的著作便开始传入法国，但是不久之后就被喀尔文的教义取而代之了。新教在法国起初发展得很慢，因为法国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国王的权力可以遍及全国各地。法王法兰西斯第一世，在开始时对新思想表示得相当优容，但是当新教徒把侮辱天主教信仰的宣传图张贴在王宫的大门上，甚至掠夺天主教的圣堂，捣毁圣母及圣人圣女的圣像时，法兰西斯第一忍无可忍，便采取了断然的措施，逮捕新教徒，还处以火

刑。而这种措施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喀尔文教派的新教徒竟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被烈火烧死的刑罚，吸引了更多的人同情新教。

新教的传教士先是在小民、工人和小商人中宣传，到 1560 年以前已经开始在贵族，而且在王族中赢得了信徒，甚至还组成了一个政党，当然也就危及了王权和国家的治安，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也就爆发了。这种残酷的内战延续了几乎四十年之久，这其中，政治的因素反而多于宗教因素。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依照法律继承了王位，而大多数的法国人民仍然是天主教徒，对这位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宣誓反对到底，国内真是危机四伏。亨利四世认真地权衡法国的情况，他深知法国绝对不可能容忍一个新教徒当他们的国王，更何况他在两派神学家的辩论中，发现到新教的理论不充足，使他的信心发生了动摇，最后毅然放弃了新教，诚心重返他本国的国民所信奉的天主教。欧洲各国的君王当中，只有亨利四世最为开明，准许法国人民信教自由，而不加以强迫。他在明宪宗时的一五九八年颁布了世界文明史上，著名的南特诏书，诏告全国百姓，给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新教徒也一样可以享有公民应有的全部权利，也可以担任一切的职务。

改教运动开始时，现在的比利时、荷兰，被称为低地，隶属于西班牙的国王查理五世，就在他即位为王时，新教已经从德国传到了低地，查理五世虽然严加禁止，但是改教的人仍然不断，到查理五世的儿子斐理伯二世，在 1555 年继承王位时，已经很难加以钳制了。政府压制愈严，人民的反抗也愈大，甚至把西班牙的军队驱赶出境，北部七省就在 1579 年宣布独立，成立荷兰王国。喀尔文教派执政的省份，天主教的各种礼仪被禁止，违反的人就被处死，所以有不少教友殉道，许多神父、修会会士被杀，连路德教派也在被清除的行列。低地的南部七省暂时仍然受西班牙统治，保持了天主教信仰。

1.2.4 不列颠群岛的血案

前面已经介绍了路德教派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改教运动，以及喀尔文教派在瑞士、法国、荷兰、比利时的改教运动，今天要介绍一下新教在大不列颠群岛上传播的情形。大不列颠岛上北方的苏格兰，在公元十六世纪的时候，尚未与英格兰合并，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苏格兰建立新教的老祖宗是诺克司，他是一位大胆、豪强，而且言词动人的人，他加入新教以后，曾经因为参加暗杀苏格兰首席主教的阴谋，被逮捕囚禁在法国，获释之后他去了日内瓦，在喀尔文身边待了五年，负责把圣经翻译成苏格兰的方言文学，同时不断地写信给苏格兰的同胞，怂恿他们反抗罗马教宗。他回到苏格兰以后，更大力推动反抗活动，而且也获得了他想要的结果。

诺克司和喀尔文一样，具有法律和组织的天才，他按照喀尔文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教会，牧师由教徒选举产生，行政管理是由牧师和长老所组成的议会来执行，这也是长老教会名称的由来。这种组织方式，也被其他的新教教派所采用。下面介绍的就是英格兰改教的经过。英国改教的性质相当特殊，路德和喀尔文的改教，是出于宗教动机，各地领袖是事后才加入新教的，这些俗世的君主对新教教派的攻击或是袒护，都是依照政治的利益而决定。

至于英国呢？英王亨利八世对新教的观念，原本没有丝毫倾向，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迫使国家走上改教的途径。亨利八世在 1509 年十八岁时即位为英王，他生得很英俊，又善于锻炼身体，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久以后便博得了国民爱戴。至少在外表上，他对宗教表现得很虔诚，当路德教派开始传入英国时，他为了表示反对，曾经亲自撰写了一本护卫七件圣事的书，教宗颁给他“信德保障”的徽号加以奖励，一点都看不出他有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形迹。

导致英王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决裂的，是一件私生活上的事。与他的婚姻生活有关，而与教理没有关系。亨利八世的皇后凯瑟琳，原本是西班牙国王腓迪南和伊撒伯拉的女儿，也是查理五世母亲若纳最小的妹妹亚拉冈的公主。婚姻初期，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生活愉快，但

是亨利八世逐渐不忠实，盲目地爱上了一位宫女安娜保琳，并且坚持要和这位情妇结婚，还要立这位宫女为皇后，为了达到目的，先得解除第一次的婚约，亨利八世以极大的诡辩，要求教会当局批准他和皇后十八年来的婚姻无效，因而得以解除第一次婚约。当时教宗克勒孟七世经过细心检讨之后，明知第一次婚约绝对有效，连教宗也无权解除，但是又迟迟不做明快的判决，因为教宗深恐开罪这位有权有势的国王，将导致教会分裂，但是又碍于良心，不能破坏婚约的神圣性，因此不可轻言解除。教宗认为，亨利八世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若能拖延一下，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但是亨利八世已经迫不及待，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让他自己任命的坎特伯里总主教克蓝麦对外宣布亨利八世和皇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在这之前，亨利早已先行封安娜保琳为皇后，而且也先行为安娜保琳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册封她为皇后了。

教宗克勒孟七世眼见耽延无益，也就在 1533 年宣布只要在皇后凯瑟琳生存期间，亨利八世和宫女安娜保琳的婚姻也就无效，同时认为亨利八世的恶表昭著、不容忽视，就将亨利八世开除了教籍。亨利八世恼羞成怒，迫使英国国会在一五三四年通过了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最高权力法案，声明英国的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元首，正式宣布和罗马教会脱离关系，以王家最高权威来代替教宗。随后，亨利八世又把各隐修院的财产没收，并且将其中的一部分赠送给英国的贵族，他这一步棋真是高明，于是分得财产的贵族便俯首贴耳地对他表示服从。

当时的英国也和欧洲大陆一样，教友的信德很深厚，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大致都不高，这样一来，主教和神职界也和政府官吏一样，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不服从国王就是叛逆，大部分都屈服在英王亨利八世的权势之下，但是也有许多忠贞的神父，尤其是修会会士，英勇抵抗，甚至殉道致命而死。他们为了反抗，拒绝承认英国国王在宗教上具有最高权力，因而被捕、审讯、判处极刑，有被吊死的，也有被剖腹而死的。在这些殉教者中，有两位著名人物，也是英国当代最最显赫的人物，一位是费舍尔主教，另外一位就是教友多玛斯·摩尔。

费舍尔是罗吉斯脱的主教，他曾经在事件发生后，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替凯瑟琳皇后辩护，因而在 1535 年遭到逮捕，当时的教宗保禄三世在费舍尔主教被逮捕以后，擢升费舍尔为枢机，因而大大触怒了亨利八世，他扬言“一定要在费舍尔祝圣接受红帽子以前，立刻就叫他人头落地。”费舍尔在被送上断头台时，高声诵念天主教的信德誓言，然后跪在断头台下咏唱着“赞颂感谢天主”和“我曾仰望上主”的圣咏，然后从容走上断头台，被斩首殉道而死。十五天以后，多玛斯·摩尔也被斩首处死。

多玛斯·摩尔是欧洲文明史上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和人文主义者之父依拉斯莫斯之间，有很深厚的友谊，伊拉斯莫斯就是那本著名的《理想国》，又名《乌托邦》的作者。摩尔生平显赫，曾经是英国大法官，担任过国会发言人及其他政府重要职务。亨利八世任命摩尔为首相，相当地重视他，而摩尔也一直希望亨利八世能够重新返回正途。当事实证明，这种希望不可能的时候，他毫不迟疑地辞职挂冠而去，表示对英王的抗议。他原以为退隐之后，可静心读书著作以终天年，但是他拒绝宣誓承认最高权力法案，亨利八世大为愤怒，决不甘心罢休。于是将多玛斯·摩尔捉来关在监狱里判了死罪，家产也全数没收，甚至他母亲被迫变卖衣服度日，他女儿的哭求，都没有动摇过他的心志。1535 年 7 月 6 号，多玛斯·摩尔被押往刑场，在断头台上斩首而死。

1886 年，教宗良十三世将他和另外五十二位英国籍的殉道者一同列入真福品，一九三五年，多玛斯·摩尔和费舍尔主教殉道的四百周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将他们列入圣品，成为普世教会敬礼的对象。出人意料的是，1536 年两位殉道者被斩的第二年，这一切灾祸的女主角安娜保琳竟也失去亨利八世的宠爱走上了断头台。亨利八世前后娶过六个女子，除了安娜保琳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也是被杀身亡。

亨利八世终其一生信奉的是天主教教义，而且在晚年处决过不少新教教徒，但是他始终让丑闻路德教派的克蓝麦担任坎特伯里大主教，并且支持新教所翻译的英格兰方言圣经，而

以新教徒批评亨利八世过份地天主教，而天主教徒则又批评亨利八世过份地新教化。到亨利生命的晚年，他为自己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所指派的摄政委员会中，绝大多数都是新教份子，当然也就为新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爱德华六世在位的七年中，逐步更换教义和礼仪规则，而将天主教教义和礼仪的大部份作废。爱德华六世驾崩之后，由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皇后所生的长女玛利一世继承王位，玛利一世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当她和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结婚以后，就决心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召叫被亨利八世所放逐的所有主教回国，外来的新教牧师全被驱逐，她运用她的影响力，选出一个倾向天主教的议会。玛利一世透过议会立法，一方面恢复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也将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重新恢复。又把两百八十多位左右的新教徒，不分情节轻重，全部投在火里烧死。这种暴虐的行为促使她的声望下降，因而被称为“血腥的玛利”。英国人固然对她不满，而对于她的下嫁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更痛恨。当腓力二世返回西班牙后，玛利一世在登位的第六年之后，抑郁而死，由亨利八世和安娜保琳所生的女儿伊利沙白一世继承王位。英国国教就在她统治期间，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伊利沙白一世受过严格的训练，很爱艺术和文学，也从亨利八世那儿继承了一份政治天赋，但是对道德和宗教的情绪就相当缺乏，她不但奢靡放肆而且还很残酷暴虐，宗教为她而言，只不过是政治的机缘而已。她深深痛恨罗马教宗的神权，在她的姐姐玛利一世统治英国期间，她经历了不少的严重危机，但是她却深自韬晦，宣布信仰天主教，登上王位以后，因为新教徒承认她母亲的婚姻和她的继承权，因而被逼倾向新教，她喜欢天主教礼仪的庄严排场和它那坚强的组织，但是却把患于天主教的主教神父革职，而改由新教徒来代替。一五六三年，伊利沙白一世促使议会通过三十九款，做为英国国教的信条，不信奉国教，不接受三十九条信条的新教教徒，也和天主教一样遭受到各种磨难。她在英国国教掩护下，使用了强力，把英格兰变成一个新教国家。

1570年，教宗碧岳五世将伊利沙白一世开除教籍，狂怒的女王便对天主教制定了残酷的法律，主日天不去参加英国国教派敬礼的天主教徒，必须缴纳很重的罚金，许多教友不久便破产了。一切天主教的举动都以叛国罪论处，不但做弥撒的神长，连望弥撒和接待神长的人一旦被捕都判死刑。仅管如此，仍然有许多青年到国外修道院去攻读神学，晋升神父以后，再秘密回到英国，冒着生命危险去巡视教友，鼓励教友。在伊利沙白一世统治期间，曾有一百二十四位神父、六十一位教友为信仰牺牲生命，十六位主教被罢黜。

1603年，伊利沙白去世，由苏格兰的詹姆士入主英国，使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新教王朝下合而为一。当天主教在英格兰逐渐被窒息时，爱尔兰虽然隶属于英国，却效忠罗马教廷。亨利八世和伊利沙白一世时，都曾经想要以武力强迫爱尔兰人改教，但是爱尔兰的神长和教友，对祖传的信仰忠贞不渝，一致坚决反对。因此遭到长期蹂躏，教友的土地被剥夺，然后被赠送给英国国教派的教徒，他们不但丧失财产，就连公民的权利也被剥夺。这种违反正义的高压政策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的末叶，但是始终不能使顽强抵抗的爱尔兰人屈服。爱尔兰人坚强地保持了他们的信仰，这对以后英国天主教的复兴，以及美国天主教的建立，有很重要的贡献。

1.3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的革新

1.3.1 自发的改革

前面一部分的重点是介绍了十六世纪的新教，也就是誓反教，或是今天一般中国人所说的基督教产生的经过。在教会历史上，称为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我们称它是改教，因为是在原有的天主教以外，创立了一个本质不同的新的基督教派。这时候我们天主教内部，也正

在从事本身的革新运动，给中古世纪末叶和文艺复兴动乱而衰颓的教会，加上了一种活力和焕然一新的气象。实际上，这两种改变是同时进行的，一般人总以为天主教的改革，是新教改教的后果，我们认为那实在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观念和事实并不符合，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我们只能说，新教的改教运动给了教会改革工作一种刺激，使它加速进行而已。无论如何，我们应当认清，这时期教会生活的重整，并不是北方分裂现象的反作用，事实上教会内的改革复兴运动，是在从来没有受新教影响的西班牙和义大利开始。十六世纪表现教会活力最明显的是，修会的蓬勃兴盛。其中有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修会，也有将修会加以重整的，实在是当时出现了大批有圣德的圣人，同时也是教会向外方传教最澎湃的时期。天主教革新的工作，特力腾大公会议也作了决定性推动，因而使得教会的纪律有了明确改进。

首先，我为您介绍十六世纪新兴的修会。教宗良十世在位的时候，在路德还没有出名以前，已经有一群热心人士，包括神父和有学问的教友，在罗马团结起来，开始发起教会革新运动。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神爱会，最初的动机只是以勤领圣事、学习爱德、树立善表来刷新自己的内修生活。其他类似团体也在义大利其他各城纷纷成立。在这些团体中培植了许多对革新教会最有影响的人物。神爱会形成了一种很热心的气氛，但是，并没有稳定的组织，当加耶坦和伽拉法两位会员，为了使这个团体的影响能够向外展开，便创立了提阿亭修道会。他们所抱持的观念，是要加入修道会的神父如同一般会士一样，要发神贫、贞洁、服从三愿，但是却生活在教区的神职界中，生活的情形和所穿的衣服也和教区的神职界一样，为的是想要以善尽教区神父的职务，努力做一个标准的神父，用这种榜样来吸引神父度更热心积极的生活。

提阿亭的会员并不多，但是热情蓬勃，他们中有两百多位主教，在他们的教区内提倡革新活动。提阿亭修道会的生活，证明正适合当时教会的需要，因此有许多同样的修会同时跟着兴起，像是圣安当匝加利亚所创立的巴尔纳伯会，圣热罗尼莫爱弥连所创立的索玛斯克会。不过，这些修会并没有发展到义大利以外。在这时期同时成立的是耶稣会，而且还特别向外发展。耶稣会的创立人是西班牙籍的依纳爵罗耀拉，他和他的伙伴在一五三九年成立耶稣会，第二年就被当时的教宗保禄三世批准。

依纳爵将他的会士派遣到欧洲和世界各地，耶稣会最特殊的一点是，除了一般修会的神贫、贞洁、服从三愿之外，他们还应宣发第四个圣愿，这是什么样的圣愿呢？那就是特别服从教宗的圣愿，听命于教宗，任由教宗按照教会的需要，派往世界任何地区。耶稣会就像一支军队，常是随时待命，应召去为教会服务，会士的一切时间都贡献给所从事的传教牧灵工作、教育工作、读书和祈祷。这个新型的修会，常以入世的精神，随时可以动员出发，与近代教会的需要相符合。十六世纪会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抗新兴的改教运动。他们一方面从事革新神职界的工作，一方面训练从德国来的修士，返回德国后，对阻止日尔曼境内改教的蔓延作出贡献。十六世纪后半期，耶稣会在全欧洲已经开办了一百多所公学，这些公学对复兴教会的功效，真是难以估许。当依纳爵在 1556 年去世时，耶稣会已经有一百零一座会院，会士一千多人，除了在欧洲以外，会士已经进入印度、巴西、日本和埃底约比亚等地。再过六十年，会院增加到四百三十六座，会士一万三千多人。

除了一些新创的修会之外，当时许多历史悠久的老修会，都在从事各修会内的重整计划，像本笃会、奥斯定会、方济会等等。而且，方济会还产生了一种支会，称为嘉布遣会，他们以严肃的生活、神贫、对贫穷人的爱德、瘟疫流行时期在疫区对服侍病患的热情，很快地受到百姓响应。嘉布遣会发展得非常快，成立一百年后，他们已经有三万个会士。女性也不落后于人，当代的女修会也开始了复兴重整的工作。有些新兴的修女会，在形式上和新兴的男修会相类似。在十六世纪以前所创立的修院，都是隐居在修会内度默观的生活，十六世纪开始，有了从事慈善和教育工作的修女会，其中成绩显著的有在义大利成立的乌苏拉修女会，她们对女青年提供了服务，幸赖他们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修女会，女性的教育才开始在社会各

阶层中展开。

在新创立的修会内，宗教生活的可能性，得到了一种新的扩张，新修会放弃了原先隐修院的那种严肃的生活方式，改采平易近人的生活方式，好能适应当时的传教环境。他们以集中管理制度，代替了一般隐修院各修院独立管理的制度，这样他们能在各方面节省时间和精力，同时，在大多数新兴的修会里，会士改采宣发简愿的方式，以代替一般隐修院所采用的显愿方式，这样在修会纪律的管理和实践上，要容易得多了。因为，按照教会法典规订，撤销简愿的手续比较简便，同时长上对不合格修士的处理困难也比较少。总而言之，从十六世纪开始，整个教会的生活有了深刻转变，但是我们该清楚知道，这种深刻的转变，和日尔曼境内的改教运动丝毫没有关系，新型的修会和个别修会的产生，并不是针对新教离异的一种自卫活动。

1.3.2 特力腾大公会议

接下来，让我为您介绍在教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特力腾大公会议。当马丁·路德开始宣传他的改教言论时，罗马教廷先后在朱利二世和良十世的领导下，召开过第五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有不少规定，但是却并没有什么具体改革成就，一连几任教宗对改革缺乏毅力，懦弱而无法具体有效地推动拉特朗大公会议所议决的种种改革。像良十世的继承者亚德连六世，虽然对改革满怀善意而且具有热情，他本人的生活简朴而刻苦，态度严肃而显得僵硬，他虽然着手改革教会的种种弊病，但是因为他是荷兰人，不明白罗马的习惯，与教廷长期累积的流弊格格不入，未免操之过急，因而造成矫枉过正的情形，使得改革全盘失败。教宗亚德连六世在位不过二十个月就弃世，假如他能在位长久一些，不那么操之过急，或许改革还能有成功的希望。下一个继承者是教宗克勒孟七世，毅力更不如亚德连六世，虽然他的人品和修养可以说是无瑕可指，而且为人也热诚可嘉，即位以后对新兴的修会也不遗余力给以奖励。可惜的是他秉性柔弱，意志不坚，朝三暮四，以致于在他任内，一事无成，而且招来许多不幸，当日尔曼皇帝和法王互相冲突时，他竟然连合法王与日尔曼交战，结果给罗马和他本人带来严重浩劫。

日尔曼皇帝的军队中，有一部分是信奉路德教派的佣兵，1527年，日尔曼军队攻进了罗马城，对罗马大事劫掠，长达七天之久，教宗的宫廷被洗劫一空，圣堂被亵渎，圣伯多禄大教堂竟被当做马厩，枢机们被殴打侮辱，修女们被失去人性的佣兵强暴蹂躏，神父被杀害，没有杀掉的也都被为奴，真可说是无恶不做。甚至有些做父亲的，宁愿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不忍心看到女儿落入乱兵手里。像这样残虐的暴行对罗马的蹂躏，一直到城里已经没有再可以抢劫，可以毁灭的东西为止才罢休。可惜教宗克勒孟七世形同囚犯，卑躬屈节向日尔曼皇帝求和，接受了最屈辱的和平条件。罗马这次浩劫，对当时的人打击很大，几乎都认为是来自天主的严重警告，是对过去的腐败和迟迟不改革的惩罚。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是使教宗、教廷及枢机团觉醒的一个晴天霹雳、当头棒喝。不过，这教训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上自教宗下至各级神职人员，都有同样的意识，都认为只有迅速召开大公会议，才能有效实行人人都期待的改革。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教宗克勒孟七世直到一五三四年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做出要改革、要召开大公会议的决定，始终是缺乏那份改革的毅力。他去世以后，被选为教宗的是保禄三世。他在教会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决定了教会行政的新途径，及时改正了教会的方向，创导了教会的复兴运动，保禄三世可以说是伯多禄最聪明的继承人之一。从外表上看来，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身材矮小，显得疲惫而佝偻，他有着白白的长胡须，和一双明亮诚恳的眼睛，为人热情却很有节制，他不但有丰富的学识和口才，而且有洞察人心、采纳谏言的能力。

教宗保禄三世首先着手改革的，就是教廷内的枢机团，从一五三五年擢升英格兰的费舍尔主教为枢机开始，不常地把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人物擢升为枢机，因而使得整个枢机团面

目一新。枢机团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兼具才能、经历、学识、圣德、牧导和政治远见的机构，教宗保禄三世网罗了当代教会内的精英组成最佳机构，并且命令他们组成草拟教会革新的委员会，为即将召开的特力腾大公会议展开筹备工作。如果就当时教会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使人认为保禄三世想要召开的大公会议是绝不会实现的，至多不过是停顿在计划和希望的阶段，不了了之而已。私人的利益、野心和许多很难改革的累积下来的陋习，在在都与改革为敌，凡是想利用流弊混水摸鱼的人，都暗中抵制会议召开，甚至也有人怀疑即将召开的大公会议，将会重蹈巴塞尔和康斯坦士会议的覆辙，而对教宗权力的争论会死灰复燃，而且新教徒只在难以接受的条件下，才答应参加。何况当时的政治情形也不乐观，仍然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正处在土耳其进侵的威胁下喘气。

而真正重要的阻碍，还是来自仍然信奉天主教的各国君王，尤其是德皇查理五世和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他们的国土占去了奉教世界的绝大部分，他们如果不同意，大公会议实际上是无法召开的，而这两个皇帝之间却又存在着不能和解的仇恨和敌视。那么，怎么样邀请这两位对立敌视的君王来协商共同的问题呢？

公元十六世纪教会本身的改革复兴运动中，一部分自主性活动，尤其是十六世纪中所兴起的新型态修会，有男修会也有女修会，其中最最有名、也最最重要的是，西班牙人罗耀拉的圣依纳爵所立的耶稣会。此外，特力腾大公会议的筹备这次大公会议时遇到了所面临到的各种困难。在许许多多的困难中，最为棘手的是，如何邀请法国、德国这两个势均力敌的天主教国家君主，共同协商宗教信仰上的问题呢？更何况，他们两人对教宗的计划都抱持各执己见的反对态度。

法国法兰西斯一世是和他同盟的诸侯采取同样的态度，这群诸侯又是谁呢？他们竟然是信奉路德教派的德国境内的诸侯们。这真是不可思议，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皇帝竟和敌对国的诸侯、而且还是路德教派的诸侯结成同盟！那么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又有与自己利害相关的那些打算呢？在教宗保禄三世宣布想要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时，查理五世的态度是支持教宗的，但是后来，查理五世希望自己在德国境内建立宗教上的和平，因而公开表示，反对教宗召开大公会议。

查理五世所计划的和平，竟然是想和新教徒在教义上有所让步和妥协。教宗坚持一定要开大公会议，为选择开会的适当地点，又大费周章几经波折，新教徒坚决反对在德国国境以外的地点，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查理五世也坚持同样的意见，而教宗呢，当然是坚持在德国以外的地点开会了。最后，经过长期而慎重的磋商，才选定在特力腾这个地方。特力腾这座城隶属于德皇的统治权下，但是城中的居民全是义大利人，距离义大利的边界又很近。这样，教宗本身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情形下，保禄三世硬是坚持要召开大公会议，由于教宗保禄三世百折不挠的忍耐和坚持，善于灵活运用外交手腕，经过长达九年的努力之后，终于在1545年十二月十三号开幕了。

教宗派了三位枢机当大会主席，大会开幕时出席的主教只有二十五位，各修会的会长只有五位，其中还包括了奥斯定会会长。他曾是马丁·路德的督导，大会一开始，为了程序方面的问题，教宗和查理五世之间的困难立刻发生了。教宗愿意先讨论教理的定义问题，以便能够澄清教理方面的争论，查理五世则愿意延期讨论这一类的神学问题，以免激怒新教徒，查理五世希望先讨论革新法令，好让新教徒看到教会的善意。结果，只好采取折衷方式，在每期的会议中，教理和革新两方面的探讨同时进行。1549年，教宗与查理五世之间，为了义大利北部米兰城的爵位继承权争执，双方关系恶化，教宗同时也因为查理五世在大公会议上对教宗所施的压力久已不满，于是教宗就将会议的地点迁移到教皇国内的伯朗那城。这就激怒了查理五世，宣布退出大公会议。1549年，欧洲各地瘟疫流行，传染的速度很快，大公会议只好休会，不久以后教宗病逝，查理五世和保禄三世之间的协议始终未能完成。

教宗保禄三世本人并不是圣人，但是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开始，就从那时候开始，教会

有了一个坚强的革新组织。主教和枢机可以公开参加革新工作，教宗自己就是这组织的首领，教会普遍革新之路已经铺好。教宗保禄三世死后，选出了朱利三世，他曾在特力腾会议的初期，做过教宗的代表，在他即位以后，迫不及待在 1551 年重开会议，但是当时政治情势愈来愈恶化，又被迫停止会议，继承朱利三世的教宗是马塞尔二世，大德不凡，使人对他怀着好大的希望，可惜他在就任以后二十六天便去世了，恶耗传出令人惊悼，当时的人都认为，天主教是借这些发生的事，召告世人，教会的革新并不靠任何“人”的力量。

继承马塞尔二世的是保禄四世，他即位时已经七十九岁，他自己并不愿意登上教宗的宝座，同时也没有人喜欢他成为教宗，他自己把这件事当做是一个奇迹，所以就愈是觉得责任艰巨，他努力维护教宗的权力和最高舆论的尊严，他认为按照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政策，便能对付诸侯和民众，他虽然为教会恪尽职守，但是不识时务。教宗保禄四世是义大利的热烈爱国者，他恨查理五世，一五二七年查理五世曾经纵容日尔曼的佣兵攻占罗马，并且七天七夜洗劫罗马城。查理五世还对新教派妥协，都使保禄四世不能原谅他。保禄四世也恨以色列人和回教徒的后代，为了一点细小的事故，竟然在教廷国务卿，也就是自己侄子的怂恿下，宣布和西班牙开战。保禄四世希望法王法兰西斯会支持他，但是法王对这些义大利的冒险已经失去了兴趣，不再表示热烈的赞同，教宗只好单枪匹马，去面对当时已经举世无双的西班牙。

腓力二世派遣大军向罗马进发，教宗不得已立刻求和，幸好腓力二世只求和平，不要求任何条件，这次出兵失利，导致了一个深远但是值得庆幸的后果，那就是从此以后，世人都知道了教皇国不再是教宗良十世和朱利二世时代所曾经显露过的强大军事力量了。在教廷所完成的牧导工作的许多政策中，军事力量不再占有任何重要角色。他虽然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但是他激烈的性格却不曾稍减。他是一位独来独往的人，除了自己的权力外，决不容忍其他权力存在，他对重开大公会议不感兴趣，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来实行改革，为了对异端加强斗争，他大力整顿异端裁判法庭，颁赐给异端裁判法庭相当大的权柄，也为了不让教友受到不良书刊影响，而编制了一套禁止教友阅读的“禁书目录”。保禄四世深深知道邪谬论对思想危害的严重，而一般教友又不容易发现，受害而不知，他为了保护信友的信德，因而圈起了栅栏。这位严厉的改革家，未免矫枉过正。

这位一心想要凭自己力量改革教会的保禄四世，也蒙受到残酷的屈辱，他把教廷大权委派给自己的侄子去管理，以便自己好能全心从事改革，这位纨绔子弟实在辜负了他叔父的信任，竟利用职权来纵情恣欲，压榨善良百姓，事情揭发以后，教宗对他严加教训，把他和所有共同犯案的人，完全抛弃，要他们刻苦补赎去度他们的下半辈子。保禄四世在 1560 年去世，他是一位很不幸被推上首脑的人物，在他创办“圣职修会”、出任枢机的时期内，他对教会的贡献是了不起的，曾被称誉为圣人，然而在他担任教宗的任内，由于他过了份的严厉而大失人心。

虽然从教宗保禄四世以后，教皇国不再具有军事力量，但是信奉天主教的王公诸侯，对教宗的人选问题却仍感到兴趣，尤其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不希望再有一位像保禄四世这样的教宗，在他的压力下，选出了碧岳四世。碧岳四世是米兰人，在枢机的任内并没有受到大家注意，是一个聪明厚道具有世俗气，与保禄四世的为人和作风完全相反的人。就职以后，提拔他的侄子，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嘉禄鲍罗梅担任教廷国务卿，把全权交在这位年轻人的手里。鲍罗梅真是教会改革的一员大将，也是碧岳四世的光荣，碧岳四世在教宗任内所立下的功绩，还得归功于这位侄子鲍罗梅。鲍罗梅是一位不辞劳苦、锲而不舍、念念不忘最高精神目标的人，为教会立下了汗马功劳。

碧岳四世的功绩是继续召开特力腾大公会议，并且使它圆满的闭幕。劳苦功高的鲍罗梅调解了外交方面最大的困难以后，在 1562 年重开大公会议，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较以前为多，从一五四二年十二月开幕以来，前前后后总共举行了二十五次会议，到一五六三年的十二月四号，隆重而圆满地闭幕散会。1564 年，碧岳四世颁布通谕，批准特力腾大公会议所通过

的全部议案，也把所有的文件印刷装成册，并且由枢机们组成特别会议，负责解释各种条文。碧岳四世对这一件重大的事件，本来可以引以自豪的，但是当人庆祝他的成功时，这位谦逊的教宗只简单地回答说：“一切都因天主的感召而完成。”

这里开始谈谈特力腾大公会议，在教会的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会议，像特力腾大公会议这样，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确定了如此多的信条，制定了那么多的法律条文。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和其他的人，为了和平起见，希望在会议中，对教义当中和新教分歧的部分，不要深入讨论，但是历届的教宗却不能接受。和平固然要紧，却不是牺牲天主所启示的真理去换取的，教会有责任保护永世不变的真理，新教各教派的改教，深深影响到教友的思想，因此最重要的是澄清教会自古相传的道理。而另外一方面，又必须实施期待已久的改革，重建已经被动摇的固有纪律。

特力腾大公会议并没有制造出新的道理，只是对教会传统的信仰，规定出更清楚而确定的方式而已。特别是对圣经的问题，成义的问题，原罪的问题和七件圣事的问题，直到现在，圣教会都还坚持着同样的传统，我把这几个神学上有关教义的问题说明一下。马丁·路德等新教教派说，人是借圣经一天主的圣言和天主直接接触，就能够明白天主的启示。而大公会议清楚而确定地说：人不能随心所欲解释圣经，应该遵照传统的解释，也就是说，要根据教父们的著作，历届大公会议的规定和全体教会一致的教训，大公会议用团体主义来针对新教所提出的个人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圣教会把圣经传授给教友，让教友撷取其中全部的果实，除了教会所给予的解释以外，谁也不能作其他的解释，同时也确定了圣经的书目。

有关成义的问题，大公会议坚强有力地阐明了人性的脆弱和天主的无限仁慈，确定了圣宠在诚心悔改归依天主的罪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和变化，更有力地向教友说明：只有耶稣的苦难和死亡，才能使人获得罪过的赦免，能使悔改的人获得真实而内在的革新。有关圣事的问题，路德和喀尔文都只承认圣洗圣事和圣体圣事而已，大公会议明确指出，耶稣亲自建立的是七件圣事，会中还指定了每一件圣事的礼节和七件圣事在灵魂得救的过程中，所占的地位。

教宗保禄三世召开特力腾大公会议，历经保禄三世、朱利三世、马塞尔二世，最后，在保禄第四任内圆满闭幕，特力腾大公会议在历史上是多么的重要，并且在会议中议决了不少有关神学教义方面的问题，像是圣经方面的问题，成义得救的问题，七件圣事的问题，都有所澄清，加以明确地订定。下面介绍的是针对纪律方面，加以解决的途径，还会进一步谈谈我们的圣教会，在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的革新和进步的情形。

我们知道，教会的腐败，大部分都是因为神职界的堕落而来，因此特力腾大公会议首先所努力的，就是神职人员的革新，当时最为严重的，为人所垢病的弊端之一，就是主教们往往不喜欢驻守在自己的教区，好好管理照顾他的教区，反而长期住在罗马或王宫内，而教区内的收入全归他支配享用，至于治理的责任，则委托给自己的属下，因此，特力腾大公会议明确规定，凡是主教或是隐修院的院长，有严重的责任，住在自己的教区或隐修院内，与自己所管理照顾的教区内的教友，或是隐修院内的修士同住。一个人既然分身乏术，不能同时住在好几个地方，因此会议中也议决了过去一位主教有好几个教区的情形，加以改正，主教也有责任定期巡视教区内每一个本堂，认识并了解和关怀每一个本堂的教友和他们的需要。

圣教会不只是需要圣善负责的主教，也需要有才德的神父，有人说：“特力腾大公会议最大的成就和贡献，就是建立新时代的神父们的修道制度。”这句话是十分有道理的，也许你们会问，难道在一五六三年以前，教会就一直没有想过，要如何培养陶成自己的神职人员吗？在这以前，又是怎么个做法呢？圣教会建立之初的初期教会时代，服务于某个堂区的青年人，常常帮忙主教神父，善尽服务教会的职务，就由这种实地的服务中实习，而逐渐学会了如何栽培教者、如何讲解圣经、如何施行圣事，到了中古时代，在主教座堂和隐修院附近，都建有学校，以后，在各大学内，又设立了哲学、神学和教会法典等课程，不过，只有少数的、有意要当神父领受司铎品位的人，能接受这些学科，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又和一

般学生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在日常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应当遵守的纪律，神职人员的培育工作，完全由主教们权宜处理。一般而论，是不够的，到了特力腾大公会议时，所产生的流弊，已经因为积习已深，所造成的害处也就相当严重了，因此，想要革新教友的生活，首先应该从革新神职人员的生活做起，因此，特力腾大公会议做了以下的规定：每一个教区应该开办学校，收纳一些有志为教会服务的儿童、贫寒子弟，还有减免学费的优待，他们在这种特别设立的学校内，除了接受失识方面的培育以外，还应该学习教会方面的学科，接受品德方面的训练，提升他们的人品，以便日后能够担当责任，善尽神职。这项规定须得假以时日，逐渐付诸实行，至于效果，也一时不易看到效果，但在日后实际上所产生的效果，则是无法估计得了的。

特力腾大公会议，特别强调了婚姻的不可拆散性，不在本堂神父与两位证人面前所缔结的婚姻，不但被声明为犯禁，而且无效。最后，特力腾大公会议还严禁世俗的君长干涉教会的事情，对新教教派所攻击的，对圣母和圣人圣女的敬礼，也恢复了它应得的荣耀。不过，应该防范失之过当，或是走入歧途，会中也确定了关于大赦的道理，为了避免过去所产生的流弊，禁止神长在施放大赦的时候，收受金钱。关于教会财产的流弊，也在会中做了决定性的改变，自从亚威农以来的所谓的“教会经济来源的技巧”，对教士空缺、升等时所要求的捐献等等产生流弊的制度，都一概取消，因着主教和神职人员必须定居在他自己的教区或本堂，使一人兼得好几种教会财产和财产的累积，都不再有可能，连教宗和教廷也都放弃大部份的收入了。总而言之，特力腾大公会议可以说对教会的思想和生活，做了一个总检讨，也是教会在动乱的时代，一个最幸运的创始。有一位名叫奎克的新教派历史学家，很公正地承认：“特力腾大公会议那么勇敢地大声疾呼，持续了那么久，被中途休会了两次，遭受到种种世俗所带来的袭击，在第三期会议时，战胜了新的危机，终于能够在天主教的世界、普遍的和谐中圆满闭幕。从此以后，天主教要以加倍的力量，返老还童的姿态，在新教徒的面前屹立不摇了。”

教宗的权力，在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也就更加巩固了。会议得以召开，又能不顾种种阻碍顺利闭幕，不能不归功于保禄三世、朱力二世和碧岳四世，三位教宗，他们虽然不是圣人，却深明自己的责任和教会的需要，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完成了历史性任务，他们虽然都没有亲身参加会议，但始终派有代表担当主席的重任，而且教宗本人在有关信条和对圣经的解释上，常被尊为最高权威。为了对耶稣基督的在世代表表示服从起见，在闭幕时，要求教宗批准所有的议决案和训令。

1.3.3 特力腾大公会议后的革新

如果特力腾大公会议的议决案，仍旧像五十年前那样的决而不行，成为空文，对教会便丝毫没有意义和用途，如何使议决案落于实际的生活，则是继任教宗和主教神职人员的决心了。很庆幸的，这次教会的革新工作，有了很好的成果，一连几位教宗、主教和修会的会祖，以及重整修会的圣者们，都做了教会革新的推动者和响应者。

会议是在碧岳四世在位的时候完成的，也是经过他批准后公布实施的，并且在教廷国务卿鲍乐梅的协助之下，付诸实施，碧岳四世还成立了一个枢机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他又命令编撰一篇信德宣誓文，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主教、本堂神父、大学教授，在就职以前必须宣读的。他曾创建圣职修道院，修改了典礼书，特力腾所决定的革新，确实已经在他的任内推动落实于教会的各层面。

碧岳四世去世以后，被选为教宗的是一位颇有权威，热心虔诚，并且曾经担任过异端裁判庭最高裁判的道明会会士，取名为碧岳五世。碧岳五世是一位相当理想的人选，尤其是在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他的当选恰逢其时，真可以说是选对了人，因为教会法律已经颁行，革新的风气也普及各地，还需要有模范人物来完成下一步的工作。从他上任以后，就全心致力于这个精神使命，他以身作则，严格地执行大公会后的各项议决案，他呼吁枢机团和各区

主教要树立善表，应常驻在自己所属的教区内，并且应该经常地去巡视自己的教区，建立培育教区司铎的修道院，对于未能善尽牧职的人，他也会严厉地训示他们，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敢违抗的。由于他以身作则，躬亲巡视罗马的各堂区，在梵蒂冈教宗的宫廷里，他仍然严守着修会会士的惯例，有时彻夜祈祷，他自己刻苦的生活成为宫廷中的公共规律，一切被认为是奢侈的，都加以革除。

碧岳五世也推动编辑和出版大公会议认为必要的书籍，比方说，他出版了一本《特力腾教义》，以拉丁文清晰正确地阐明圣教会的道理，这本书立刻被翻译成各国的方言，此外也修订了日课和弥撒经书，碧岳五世所修订过的弥撒经书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也出版了圣多玛斯的《神学纲要》，同时也宣布圣多玛斯成为教会的圣师。碧岳五世除了大力整顿神职界和修道院之外，并且从事于攻斥异端的斗争，保护教友抗拒回教徒的艰巨工作。下面，就谈谈教宗碧岳五世怎样在回教徒的威胁下，保护西方世界。

自从十六世纪初年开始，土耳其人对信奉耶稣基督的西方，所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1526年，在匈牙利的木哈赤之战以后，他们占领了匈牙利的大部份土地，一五二九年又围攻维也纳，新教徒协助皇帝抵御回教徒的后果，迫使皇帝对新教徒做更大的让步。十六世纪中叶，土耳其人又取得了地中海上的一些岛屿。1566年，威尼斯人失去了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土耳其的军舰出现在亚得里亚海上，1569年，土耳其人向威尼斯要求取得塞浦路斯岛，并向西方挑战。这些占据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以及土耳其人在地中海上劫掠的舰队，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是一种长期的威胁，西方人都认为，土耳其人所向无敌，更认为无法战胜土耳其人，只是希望最多能延缓土耳其人前进而已。可惜当时的西方国家只热衷于本国的独立自主，而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总是不能团结一致，碧岳五世努力想要促成天主教国家组成联盟，他甚至还派遣使者出使俄国，但是愿意结盟的只有西班牙。威尼斯人又不愿和西班牙人并肩作战，最后碧岳五世重新提出过去十字军的理想，促使西班牙、威尼斯和教宗联盟，共同组成了一支舰队，联合出征。教宗更命令教会的人虔诚祈祷，祈求天主的助佑，必定超过军队的武力。1571年10月7号，教宗正在同枢机们共同工作时，忽然受到灵感，便停下手上的工作，打开了一扇窗户，注视着东方大声说：“我们暂时停止工作去感谢天主吧，我们的军队刚才获得了一个大胜利。”果然，几天以后，捷报从前线传回罗马，证实了教宗的灵感。前线传回罗马的捷报是这样的：1571年10月初，联合舰队在勒班脱、哥林多海峡的进口处，和土耳其的军队相遇，总指挥手里拿着十字苦像鼓励士兵，午后两军短兵相接，随即发生了从古罗马的凯撒奥古斯都时代到脱拉法尔格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交战四小时后，土耳其的军队几乎全毁，联合舰队伤亡也不轻，土耳其人从此一蹶不振，欧洲人的兴奋自然可以想见。

民众都把这次的战功归功于教宗碧岳五世，但是天主教国家彼此之间猜忌、仇视，并没有因为这次海战的胜利而获得所期待的效果，不过土耳其侵略欧洲的气焰暂时被粉碎，教友们的信念也恢复了新的精神，而碧岳五世却把这次的胜利归功于圣母玛利亚的转求，并且宣布十月七号是玫瑰圣母的瞻礼，为的是纪念圣母在这次抵抗回教徒的战争中代祷的恩典。

在教宗碧岳五世的号召下，欧洲为抵抗土耳其入侵组成的联合舰队，在1571年10月7号，在地中海上奇迹似的击败土耳其舰队以后，不到六个月，教宗碧岳五世就去世了。还记得在他当选的时候，曾说过一句非常幽默的话，他说：“假如天主帮助我，他们会对我的去世比对我的当选更感到失望。”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样洋溢着圣德的光辉，他身穿道明会的会衣，在最后的时刻还这样的祈祷说：“天主啊！增加我的痛苦，也增加我的忍耐。”他死后安葬在罗马的圣母大殿，到了1712年，教宗克勒孟十一世，把碧岳五世列入圣品。

继承圣碧岳五世的是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他是一位客观朴实的法学家，也是一位坚强不屈的人，令出必行，十分严厉，终身如一。由于他曾经在教廷国务院服务过很长的时间，使

他具备了政治的远见和处世的经验，他和教廷国务卿鲍罗梅之间有着很深的友谊关系，因而也加深了这位严肃的法学家在灵修上的深度。教宗额我略十三世完全遵照特力腾大公会议的议决，和圣碧岳五世的精神，从事革新教会的工作。虽然他无意擢升修会会士为枢机，但是他鼓励修会不遗余力，他特别欣赏耶稣会，为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公学，这所公学是教廷在罗马所创办的大学之一。他原本是大学教授，对他所创办的学校很感兴趣，所以罗马公学也称为额我略公学，他加强了神职人员的教育和训练，他在信仰受到威胁的国家，建立了许多培养神职人员的机构，还以巨额的捐款资助在罗马和在德国的日尔曼学院，在杜文的英格兰学院。他以法律和行政的专长，将教廷的核心一枢机团，加以充实和重组，他的继承人西斯笃五世接替他完成这项工作，这两位教宗给教廷树立了楷模，教宗额我略十三世还修改了教廷驻外的使节制度，他的名字还与公元历法相连，改正了自凯撒大帝以来历法上所有的误差。这本历法一直到目前为全世界所通用。

接替教宗额我略十三的西斯笃五世，原本是方济会会士，出身寒微，在圣碧岳五世时被擢升为枢机，因为他曾经以大无畏的精神对付强盗，在教皇国也在那不勒斯，大以机智和毅力处理了骚乱，在西斯笃五世的任内大兴土木，使伯多禄大教堂的圆顶建筑完成，梵蒂冈城内教宗的住所、新的拉特朗宫，也都是在他的任内建筑的。他还重建罗马，增设下水道，开辟新区，按巴洛克式的建筑原则，开辟了罗马的街道，使得整个罗马城的市容焕然一新，他还把额我略十三未能完成的改革枢机团的结构予以完成，使枢机团的组织更加完备。他又设立了一个选拔主教的委员会，和一个管理修会的组织和一个专门负责祝圣圣人的礼仪组织，这样的改革，使那一向很繁杂的教廷事务比起以前，要来得划一，使整个教廷办事更有效率。从此以后，教廷的事务分门分类，由专家去处理，也是他将枢机的人数规定为七十人，这个人数要到若望二十三的时候，才有所突破，不断增加。他和圣碧岳五世一样，关心着世界各地新开拓的传教事业。

继承西斯笃五世的连续三位教宗，吴尔班七世、额我略十四世以及依诺森九世，他们的任期都很短，一五九二年所选出的教宗是克勒孟八世，在历史上的地位比前三位重要得多，所以，我就与各位谈谈新教宗克勒孟八世。他是一个严肃勤奋、热心虔诚而且又富有责任感的人，只是顾虑比较多，因此在行动和决策上也就缓慢而持重了。他每天做弥撒，每天行告解，常常像一个普通的神父一样，在伯多禄大教堂里听告解，每星期五，连面包和水都不进一口，平常他总会邀请几个穷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还亲自侍候他们。在他的卧房里，还放了几个骷髅头，好提醒他世事的虚幻无常。他也是一位做事能力很强的人，所选拔出来的枢机，个个卓越不凡，都是教会内的一时之选，在他的任内，他命人完成了典礼书籍的修订，拉丁文通俗本的圣经。

在从事革新工作的人物中，主教也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教会走向复兴的路途上，实在是教宗们的辅佐。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位，第一位要介绍的就是教宗保禄四世的外甥，被列入圣品的圣鲍罗梅，圣鲍罗梅在升神父以前就被保禄四世擢升为枢机，担任教廷国务卿，可以说是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不久，鲍罗梅的大哥去世，许多亲友劝他放弃教会的职位，回家结婚好能延续家族的血脉，而他却采取相反的决定，一心服务教会，于是晋升为神父，随后又被祝圣为主教，成为米兰教区的统治者，实际工作有人代理，他只保留著名衔而已，特力腾大公会议闭幕以后，他就以身作则，辞去教廷国务卿的显要职位，到米兰去全力以赴地负起米兰主教的职务，并且以他全部的精力把大公会议的议决案，在他的教区内付诸实行。他不辞旅途辛劳去巡查他教区内的每一个本堂，即便是山野偏僻的小本堂，也不遗漏，足迹所到之处，也总不忘宣讲道理，也在重要的据点建立修道院，恢复修会原始的纪律，创建了不少的教育机构和慈善事业，组织了讲解教会道理的机构，邀请新兴的修会共同协力合作，更为教区内的神职人员创立了一个协会，还亲自定期召开教区的会议，他虽然出身显赫，事务繁重，生活却非常严谨而朴素，他变卖了自己全部的家产去救济穷苦的人，尤其是在 1576

年米兰为惨烈的瘟疫所蹂躏，更充分地流露出他的爱德，他不避传染的危险，去灾区探望病人，安慰他们，为他们行圣事、分发救济品，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施舍了，连家具床铺也没有保留，从此以后，他每夜只在椅子或木板上合衣睡上两三个小时，算是他最大的享受了。

他的善行德表连米兰教区以外的地区，也受到了影响，他曾奉教宗之命，担任宗座巡回特使，去巡查并督导各地区的革新工作。他因为操劳过度，加上严肃刻苦，力量消耗殆尽，终于在 1548 年体力不支去世，享年只有四十六岁。他的善表照耀各处，成为教友们的模范，也成为其他主教学习效法的对象，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时，也曾表扬过鲍罗梅，教宗说：“他的事业影响了当时的整个时代。”甚至有人称颂他的时代是鲍罗梅时代。他那个时代的革新精神，因天主的祝福还在不断延长着，我们更希望这种革新的精神，继续不断地绵延下去。鲍罗梅真是教会革新的一员大将，教会将这位劳苦功高的仆人列入圣品，加入了圣人的行列。

第二个被列入圣品的人，名叫方济各·撒肋爵，生于 1567 年，死于 1622 年，比圣鲍罗梅整整小了三十年。阿尔卑斯山中的萨伏依，是他诞生之地，撒肋爵也是出身召门的贵族子弟，父亲希望他成为法律学家和参议员，送他到巴黎去读书，最后撒肋爵选择了神职，升神父以后没几个月，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志愿前往日内瓦湖的南边，属于喀尔文教派的新教徒的地区去传教。这个地区有六万居民，而天主教徒只有一百来位，撒肋爵在冬季开始了传教行程，先是在小村庄讲道，两只脚冻裂开来，流着鲜血，仍然到处去传福音。有一天晚上，为了躲避一群野狼，只好爬到树上，几乎被冻死，第二天清晨才被乡人发现，抬他回去，在新教徒的地区，没有人敢大胆地去听他讲道，但是他丝毫不灰心气馁，他就利用印刷术，把他的道理印在活叶纸上，到处散发，到处张贴，终于感动了诚朴的乡民，牧师们不敢和他当面辩论，他却追着牧师不肯放，甚至还跑到日内瓦去公开辩论，终于有了成效。回头的人不断增加，被关闭了的圣堂也重新开放了，不久以后，日内瓦南方又都返回到圣教会。这是他坚苦劳力的结果，善良是撒肋爵性格上最突出的一点。“用一滴蜜比用一桶醋，会逮捕到更多的苍蝇。”这是他的名言，所以他总是以善言善语对待与他来往的人。

1602 年，撒肋爵被任命为日内瓦的主教，但是在弥漫着新教气氛的日内瓦，无法使他安身，于是他就住在日内瓦附近的安尼西小城，从此以后二十年内，他以不眠不休的精神，善尽了特力腾所规定的主教职务，他诠释教义、讲道、培育神职人员，改革整顿松弛了的修道院。1604 年，他和圣若翰纳尚达尔合力创办了圣母往见修女会，初创的时候观念很新，综合了默观型的修道生活，和活动型的自由出院慰问贫病的慈善工作，两种生活合而为一，可惜教会当局认为这种观念太前进，修女们仍置身于世俗生活中，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撒肋爵本身也未能打破这种观念，所以圣母往见会终于成为一个纯粹度默观生活的隐修会。

法王亨利四世，对撒肋爵慕名已久，对他敬爱有加，把他当圣人，愿意请他到巴黎去担任主教，但是撒肋爵不愿意离开他那穷苦的日内瓦教区，他回拒了法王亨利四世的邀请，他说：“我已经和一位贫穷的女子结了婚，我不能抛弃她而去和一位更富贵的妻子结婚。”这句话中的贫穷女子当然指的是他原来的日内瓦教区，那位富贵的妻子当然指的是法国首都巴黎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却远远地跨越了日内瓦教区以外的地方，撒肋爵是当时极为出名、非常受人尊敬的布道家，经常被邀请去不同的地方讲道理，所到之处都挤满了听道的人，他也是一位心灵的导师，直到现在，圣教会还保存了他的两千多封信，都是他指导人要善度虔诚生活的。这些信件和他的名作《入德之门》这本书，虽然经过了好几百年，仍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当时的人都有这么一个错误的看法，都认为只有进入修会的人，才能够修德成圣，撒肋爵却告诉每一个人，每一位教友都能修德成圣。他说：“倘若认为士兵、商人、贵族、家庭中的夫妇不能度热心的生活，那真是天大的错误，实在是一种异端邪说啊！”

在世俗的生活中，也能完全实现福音的全德，而热心虔诚地生活并不是什么复杂难行的，

只在乎灵魂清洁，全心归向天主而已，他要求人必须完全去除自私自爱，他还教导人如何进入神秘生活的领域，圣方济撒肋爵也实现了天主教人文主义的理想，他欣赏人的一切优点，但更加崇敬天主的无限伟大、天主的全能，而人的真正身份是天主的肖像。圣教会将他册封为圣人，永远接受后世教友的崇敬。

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教会革新，好几位教宗，包括圣碧岳五世、额我略十三世、西斯笃五世、吴尔班七世、额我略十四世、依诺森九世、克勒孟八世努力不懈，励精图治维护教会的尊严。也谈到两位列入圣品的主教，一位是米兰教区的圣嘉禄鲍罗梅，另一位是日内瓦的圣方济撒肋爵。他们都克尽职责，努力推动特力腾大公会议的议决和纪律要求，而且还以身作则，刻苦力行，因而使教会走上了真正的革新之路，使得中古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各种流弊，在历史的推演下逐渐改进，重振教会的威望和地位。下面紧接着再为各位介绍几位重要的圣人圣女，这样更进一步了解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教会革新的真实面貌。

今天我第一个要介绍的是罗马的宗徒及祈祷会的会祖，他的名字叫圣斐理伯乃利，他是佛罗伦斯一位律师的儿子，生于1515年，死于1595年，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放弃了家产的继承权，到罗马开始事奉天主，度祈祷补赎的生活，以一种畅快人心的姿态，在十六世纪艺术和悠闲的罗马城出现，热爱他人的心火促使他走进医院，以慈爱为病患服务。不久以后，他就赢得了病人的欢心，接着他开始向他们谈论天主，因此而回头的罪人很多，病人痊愈以后也都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也有的成了他的徒弟。斐理伯乃利的名声不久便传遍了全罗马城，他在街上行走时，常会以简短的语句与人谈话，或用幽默的笑话，吸引路人接近天主，他也常去工厂或商店和工人或店主以及采购物品的人交谈，在言谈当中，很巧妙地把人引向天主。

在罗马，他专心研究了神学和哲学，由于谦逊的缘故，而不愿领受司铎神品，在他为拯救人灵辛苦工作了十二年以后，在他神师的催促之下才升了神父，升神父以后，从早晨到午间，经常听告解，然后和来办告解的人一齐举行弥撒。下午，他集合所有来拜访他的人为他们讲道理，前去拜访他的人愈来愈多，连他的住所都容纳不下了。他们的聚会就转移到一座小圣堂，他们先静默一会儿，然后斐理伯乃利就朗诵一篇圣书，再讲二三十分钟的道理，题目多半是圣人的行实，圣经章节，教父或教会的历史。最后，他们一齐唱歌或听音乐，做为消遣，这样，日子久了，这群由俗人聚成的热心人士，被吸引迈向内修又深入了解教义，然后把斐理伯乃利传给他们的精神，向自己的周围发展开去，有不少的神父也加入了斐理伯乃利所开办的活动。斐理伯乃利经不起这群神父一再要求，把这群神父组成了祈祷会，祈祷会是在俗的神父们的社团，在服从之下共度团体生活，但是不发圣愿，爱是联系他们的唯一锁炼。

在斐理伯乃利去世之后，才有人把几条具体领导性的原则写了下来，作为祈祷会的会规。斐理伯乃利原本是希望到印度去传教，却做了罗马的宗徒，上自教宗下至里巷胡同的儿童，都认识他，受过他的影响。他先后经历了十二位教宗，获得了每一位教宗的信任，却没有一位能够说服他接受枢机的高位，这位教宗最尊重的顾问，十位枢机、许多贵族、神职人员和无数教友的听告解司铎，实在称得上是罗马的宗徒，和教会最具有实效的革新家。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位圣人是一位女性，她是重整加尔默罗圣衣会的圣女大德肋撒。一五六二年八月，特力腾大公会议已经接近尾声时，在西班牙中部名叫亚威拉的小城里，有五位贫穷的修女建立了一座隐修院，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事实上却是精神方面一种重大冒险的开始。小小的一座亚威拉城，当时已经有不少修院，为什么又再建一座呢？创办人是谁？她就是德肋撒，当时她已经四十七岁，有着活泼的信德，小时候偶尔读到致命圣人的行传，就决心要仿效。二十岁时，加入了当地的圣衣会，但是不觉得满意，因为她感觉到当时修道院内的生活，虽然没有什么伤风败俗的恶表，但是距离四百年前会祖初创修会时候的那种刻苦生活，已经相差得太远了。比方说到了应该去祈祷的时间，修女们反而在会客室里闲谈，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德肋撒在这样的修会中生活了二十七年，不往深处去想，也

就无忧无虑，但是好多次内心总感到一股强烈的圣宠，提醒她要往更完满的路上走。1553年，她偶然看到一尊遍体伤痕的耶稣态像，唤起了她决定性的改变，她曾经在自传中写过这样的话：“我一触目，便感觉到我的五内都震动起来，回想着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默想着我对这些伤痕所表现的还爱之情，实在是太乖戾，太冷情，于是苦痛就占据了我的心，觉得心痛得好像要裂了开来，我匍匐在耶稣的脚下，痛哭流涕，恳求祂给我勇气和力量，使我永远不要再犯罪，得罪祂。”从此以前，德肋撒蒙受到天主的奇恩异宠，像是神视、超拔等，但是，她的同会修女却认为是魔鬼在作祟，她的听告解神师，尤其是圣十字若望，却向她保证，认定是天主在她身上所行的奇妙化工。

德肋撒在隐修院内便晓得了马丁·路德和喀尔文的改教，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像在德国和法国境内的战争，许许多多的隐修院和圣堂被捣毁了，她认为这些灾祸最深远的原因，便是修会会规的废弛，于是她决心要加以整顿，发誓许下由她自己和她同会的姊妹们去弥补，赔罪做补赎，她离开了原本安逸的修院，创建了一座遵守圣衣会创会立初的原始会规的新修院，和与她志同道合的修女一齐度着和会祖及早期修女所度的那种严厉而贫穷的会规。她们足不出户地在隐修院内度着默观祈祷的补赎生活，粗衣淡饭，终身不吃肉。

圣女大德肋撒这位向往默观生活的修女，同时也是一位最具有活力和擅长组织的修女，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宣导革新，有十八年之久，她虽然疾病缠身，却坐着骡子拉的破车，巡行于西班牙各地，经常穿城炽热的平原，或是冰冻的山岳，不分昼夜地奔波着，遭遇了不少痛苦和烦恼，却总是面带笑容，不顾千难万阻，竟然创立了十七座重整的修会，这些修院虽然已经经过了四百多年漫长的岁月，一直是屹立不摇，也一直到今天，始终都是教会最坚强的支柱。

这些经过圣女大德肋撒重整后的圣衣会，在她死后，不断地向西班牙以外的地区发展，尤其是在法国，她们对后世重建灵修精神的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助力，比方说二十世纪的圣女小德肋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女大德肋撒对教会的贡献，除了建立了许多具有革新精神的修女院以外，还有她的著作和日记，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她不但是被教会尊奉为灵修上伟大的导师，而且还是西班牙古典文学上享有盛名的作家，几年以前，教廷更打破传统，册封她为女圣师。

圣衣会的上司曾命圣女大德肋撒，在百忙之中抽空写了不少作品，像是她的自传。她建立重整修会的经过、成德之路等等，她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却天生具有自然而流利的美妙写作天才，她谈论到神秘生活的最高境界和现象时，文字清晰流畅，因为这是来自她的亲身经验。字里行间到处都流露出条理井然而又炽烈感人的慷慨大方，以及她那份喜乐的情怀，这也是她在严厉而牺牲的生活中所修养出来的深度喜乐。圣女大德肋撒的作品，有一部分早已被翻译成中文。

介绍了圣女大德肋撒，我就不得不介绍另外的一位修会重整者，他就是圣十字若望。圣十字若望曾经是圣女大德肋撒的听告解司铎和顾问，生于1542年，死于1591年。他对加尔默罗圣衣会的男修会，正像圣女大德肋撒对女修会一样，做了同样的重整工作。他也和圣女大德肋撒一样，一进入圣衣会，便感觉到当时修会的会规太松弛了，常常向往着更严厉的补赎生活。圣十字若望正想要转入嘉都西修会的时候，正巧认识了圣女大德肋撒，圣女大德肋撒向他表示，他只要严格地遵守圣衣会最初的会规，便能够得到他所寻求的，不必另外再找其他的修会。于是，圣十字若望就按照圣女大德肋撒的榜样，开始整顿修会的工作，但是他遭遇到的反对非常大，修会几乎面临分裂的危机。他本身也受到了各种诬蔑和迫害，甚至被他的同会弟兄关进了黑暗的房间里，囚禁了九个月，内心所受的折磨也不少。他从这些痛苦的经验，描述了天主为清洁人灵所加给他的考验，被他称为“感官的暗夜”或“灵魂的黑暗”，天主惯常用这样的考验锻炼祂所深爱的人，引导他们进入神秘经验的领域。他所撰写的著作，使他成为最伟大的神秘灵修导师之一，他也是一位西班牙的古典文学家。1926年，

教宗碧岳第十一册封他为教会圣师。

在介绍一位在德国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的主要人物，伯多禄·加尼削。他生于 1521 年，死于 1597 年，荷兰是他的诞生地。他进入耶稣会以后不久，便被派到德国，他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走遍了德国各地。他刚到德国的时候，当地天主教的情形实在悲惨，许多地方的教友缺少神职人员照顾，教友的宗教生活几乎停顿，整个的德国正面临着变成新教的危机。圣伯多禄·加尼削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创办了许多大学和中学，培育出忠于教会而且具有影响力的下一代，其中有在俗教友，有品学兼优的神职人员和许多修会会士，尤其是耶稣会的会士，使得耶稣会迅速地发展。这许多大学和中学，已经够他忙得不可开交了，但是这不过是他惊人活力的一部分而已。除此以外，他还编写了重要的辩护学和神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本名为《教义》的书，到他去世时，已经翻印了两百版以上，还翻译成十二国的方言。罗马教廷屡次召他去做特力腾大公会议的神学顾问，他也出席日尔曼帝国的国会各种宗教讨论会。天主教的主教不断向他征求意见，教宗也多次派他去德国、波兰，担任微妙任务。我们把加尼削在十六世纪的贡献，与鲍尼法爵在第八世纪对德国教会的贡献相提并论，前后媲美。一位使德国皈依天主教，一位将德国从改教的危机中挽救出来。加尼削是第一个称改奉新教的人为“分离的弟兄”，1925 年，教宗碧岳第十一册封他为圣人，兼有圣师的荣誉。

十六世纪中从事教会革新，有伟大贡献的几位天主的仆人、教会的圣人，像是创立祈祷会的罗马宗徒圣斐理伯乃利，重整加尔默罗男女圣衣会的圣十字若望和圣女大德肋撒，以及在德国境内创办中学、大学，著作等身的第二代宗徒圣伯多禄加尼削，使教会和修会为之改观。除了出色的圣人，还有为教会不懈努力捍卫教会的护教学者，这样就介绍两位著名的护教学者，一个名叫柏拉明，另一位名叫巴劳纽。

教会受到攻击，当然应该要自卫，马丁·路德和喀尔文以及其他的改教者，在他们生前，虽然都面对来自天主教不可轻视的反对者，但是都不是他们的对手，特力腾大公会议后，情势就不一样了，神学家已经能够胜利地反击新教的攻势。新教很会利用当时欧洲新发明的印刷术，他们散布的论文和小册子，对他们的宣传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在德国出了一本巨大的著作，名叫《马德堡的世纪》，这本书的主编者依里古斯替这本书取名为世纪，是因为他是按照世纪的先后，来叙述教会的历史，他写这本书的地点是在德国的马德堡，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攻击天主教，内容相当广博，可惜的是主编依里古斯偏见太深，他认为教会的一切不幸，都是罗马的反基督者教宗所造成的。

天主教本身将怎么样来反击呢？这时候，在罗马的日尔曼学院内担任教授的柏拉明，用拉丁文编写了一本名叫《对基督信仰争辩问题的解答》，原本只是为他的学生们毕业以后，应付在传教工作上所可能遭遇到的思想斗争而编写的，很快地就被翻译成各国文字，柏拉明先逐条地陈述马丁·路德和喀尔文的学说，然后再以天主教的信条一条一条地加以有力地反驳，确实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使许多改教者又回归教会的怀抱。

当时的教宗非常看重柏拉明，擢升柏拉明为枢机，兼加普亚的总主教，从此以后柏拉明便专心致力于教育工作，培育更多的门徒，不断地反击新教，而且柏拉明还担任罗马圣部，尤其是传信部的顾问，受到学生和教友的推崇。柏拉明生于 1542 年，死于 1621 年，长大后进入耶稣会，成为耶稣会的杰出会士，1923 年时，教宗碧岳第十一世将他册封为圣人，1931 年又再被教廷册封为圣师。

另外一位则是反击新教对历史的攻击，他原是前一次我介绍过的斐理伯乃利的学生，名叫巴劳纽，他在斐理伯乃利的督促下，完成了教会历史，称为《教会年鉴》。巴劳纽为了编写这本教会年鉴，几乎用了五十年的岁月，这位近代历史学家的先驱，先到各地的图书馆去搜集资料，他唯一关心的事，是要建立真理，他深深相信，只有陈述历史的事实，才是面对诬蔑圣教会，最好的反驳。

十六世纪，实在可以说是有关教会的各种学术普遍复兴的时代，带动教会复兴的原因，最直接、最重要的就是，各地修会的繁荣和复兴，每个新兴的修会和较早成立的传统修院的圣召，都像是雨后春笋，不断地增加，耶稣会从十六世纪成立，可是十七世纪初年，已经有会士多达万名，此外还有道明会、方济会、嘉布遣会，及其他各修会，圣召增加的人数也不少。从这些修会中，造就出许多著名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为当代及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服务。

我们习惯上称十六世纪是“圣人的世纪”，圣人辈出，也是在十六世纪，教会历史上的最大光荣、教友生活的虔诚深度，最经得起考验而历久弥新，这全都得归功于圣人的推动。除了前面所介绍的圣人圣女之外，应当一并提出来介绍的，还有许多，特别是在西班牙和义大利。

天主教在西班牙的革新运动，早在马丁·路德以前，就已经由济迈乃枢机开始了，他重大改革了培育神职界的课程，还更大力推动研究圣经的风气。圣若望号由天主者，建立了一个专门照顾精神病患的修会；圣伯多禄·亚尔冈大辣重整了方济会，他也曾经担任圣女大德肋撒的神师。圣方济玻尔日亚是西班牙的贵族出身，也是耶稣会第三任总会长，他在加入耶稣会后，一向度着谦逊苦行的生活。

在义大利方面，有圣若望理奥纳尔底从事教育青年的工作；圣嘉弥禄赖理原先是军人，生活浪漫，嗜赌如命，在 1575 年回头皈依以后，入了嘉布遣会，不久之后又离开，最后在圣斐理伯乃利的领导下，修成了崇高的圣德。圣嘉弥禄赖理为了帮助病人，并且为了减轻他们神灵的苦恼，因而创立了灵医会，灵医会的会员除了普通的三圣愿之外，并且还要发愿终身服役病患，即使是在瘟疫流行时也在所不辞。此外，还有道明修女会的圣女加大利那黎齐和圣女玛达肋纳巴济，他们两位都蒙受了最高神秘经验的恩宠。

最后，还要提到三位年轻的耶稣会圣人，他们的年纪都很轻，不满二十五岁，就都修得了成全之德，列入了圣品，成为年轻人的主保和楷模。一位是十八岁的圣达尼老，出身波兰的望族，努力克服了家人的反对，进入在罗马的耶稣会初学院，十八岁就病逝在初学院。第二位名叫圣内恩公撒格，是神圣罗马帝国侯爵斐迪南的长子，他在腐化的宫廷生活中，保持了天神般的圣洁，二十三岁时，就蒙天主召叫，返回了天乡。还有一位名叫圣若翰伯尔各满，出生于比利时，也以二十三岁的年纪，忠实遵守会规而成就了高超的圣德。谈到这儿，为什么我总也没有提到那号称“东洋宗徒”的圣方济·沙勿略呢？因为下面会有专门的章节去讲述他伟大的传教事业。

圣教会到底在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呈现出怎么样的面貌呢？这时代的圣教会仍然坚守宗徒传下来的信仰，在许多有疑点的教义方面，讲解得更为清楚，就好像一棵树，长大以后，虽然与以前有了不同的长相，但仍然是同一棵树。基督耶稣亲自建立的教会，在历史的过程中，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并没有变质，同以前比较起来，它更加的坚定了，在信仰上，正因为对信条有了更清楚的定义和说明，信友更加的团结一致了，教宗的权力也更加的坚强了，对这样一位有形的领袖，也更加的有归属感。

这时代的教宗在设有十三个部门的辅助下，更为得心应手，同时在十六世纪开始，许多的重要据点都有教廷派驻在当地的宗座代表，与各国经常保持联系，对呈送到罗马的种种问题，更容易研究，进而采取解满方案。从此以后，自然的产生了对罗马教宗的强大向心力，直到现在仍然不见衰退。

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的教会，所呈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教会显得更为庄重而且尊严。大公会议以后所选出来的教宗，大多数都是明智而又被人尊重的教宗，绝对不再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那么样的喜欢玩弄政治或是好战，神职人员也都能得到良好的训练和栽培，像大赦事件那种滥用职权的事也绝迹了。而教友的生活方面，信德更加活泼，大体上来说，信仰更加鲜明了，办告解、领圣体和领受其他圣事的人也更多了。在教宗、主教、新成立的和重整后的修会内，以及一般教友当中，也都出现了不少圣人，对整个教会的革新运动

而言，表现出很大的活力，此外大批的传教士随着探险家所发现的新地方去传播福音，有的甚至还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先传播福音了。

路德改教以后，天主教的重整革新工作是在奋斗中进行的，为了必要的自卫，教会不得不猛烈地反击新教的教义。大公会议必须对那些似是而非、违背宗徒所传下来的道理，宣判为错误不当。因为教会是信仰的寄托者，对破坏信仰者，绝不能让步或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非开大公会议不可的理由，所以，在大公会议以后，神学家便把新教所反对、所否认的真理，特别加以强调，使之凸显，这么一来，却又有了顾此失彼的情形，对教会的某些重要道理和教友生活中的重要部份，反而在无意之中被忽略了，以致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在“论教会”的问题上，特别的显著。新教各教派不承认有形的教会，也抛弃教会有形的领袖——教宗和教宗的权力，天主教的神学家就特别强调有形的教会和罗马的主教所具有的首席地位，反而较少发挥教会是耶稣基督化身的道理，这端重要的道理于是逐渐隐晦不彰了。直到二十世纪，引起了神学家深切的注意，才加以彻底阐明。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在这里特别说明，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拉丁文、拉丁话就是西方教会礼仪的通用语，凡是受教育的都懂，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各民族兴起了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的方言，方言和方言文学大为流行，而美洲和亚洲的民族也逐渐展开传福音的工作，新教教徒首先抛弃了拉丁文，同时也把传统的礼仪，搅得一塌糊涂，把不少道理也一并抛弃。为了反击这些弊端，避免教会道理因翻译造成偏差错误而变质，特力腾大公会议因而决定禁止使用方言举行弥撒，一律仍旧采用拉丁文，这里所说的，当然是指西方罗马拉丁礼的教会而言，至于东方礼的教会和斯拉夫的东方，一直都是采用希腊语或是斯拉夫语，不在禁令范围内，一切的礼仪在四百年几乎几乎没有改变。这固然可以防止当时擅改礼仪的恶风，但是却也在无形中阻断了一般教友以较容易的途径，了解礼仪的正常进步和演变。一直要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布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才有了改观和突破。

罗马天主教终于战胜了因改教而造成的惊涛骇浪，面对着四面八方而来的攻击，给以迎头痛击，使得教会直到今天仍然屹立不摇，就是因为基督在圣经中已经给门徒许诺过“地狱之门不能战胜她”。祂还说：“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必不留下你们成为孤儿。”我们也该感谢天主赏赐给我们领洗奉教的恩惠，并在这个圣教会中修善成德，去完成天主的伟大计划。

1.4 文艺复兴时代及革新时代的传教事业

1.4.1 新航路开辟

这个时期的传教事业走向了世界各地，跟着每一位传教士的足迹，参观访问探讨我们的教会，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及革新时代的传教事业，我们的思想领域、我们的视野疆界，我们对教会的了解和关心的程度，也将会随着传教士的足迹扩展加深。

当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继承教宗的职位时，哥伦布在 1492 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对大赦的问题闹得天翻地覆时，教宗良十世在 1518 年祝圣了第一位黑人主教。当喀尔文改教以及英王亨利第八与罗马教廷分离时，教宗于 1533 年在印度的卧亚，成立了第一个教区，1552 年正当特力腾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结束以后，圣方济·沙勿略在中国广东外海的上川岛上去世，而利玛窦也在此时出生于义大利，是利玛窦要再将天主教带入中国的首都。这是教会历史在新教徒企图改教时，另外一方面所出现的惊人情势。当西方天主教世界的三分之一不幸与罗马教廷分离的时候，她本身却在同时自行净化，借特力腾大公会议来整顿内部，许多圣德卓越的圣人辈出，而且比任何时代更认清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把耶稣基督的

福音传布到世界各地。向外教民族宣传福音的这个理想，是在十三世纪时时候，由圣方济亚西西首先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失败以后，大家也都明白了，绝不能再武力为耶稣基督争取新的领域和信徒了，必须靠宣传福音才行。于是英勇的方济会和道明会会士便纷纷走出欧洲前往亚洲，他们到处建立教堂，更有的在十三、十四世纪时来到中国。有关这一部份的历史，前面介绍过则不再重复。

由于中亚各民族先后都信了回教，信教的欧洲人和远东的交通也因此中断，和罗马失去连络的中国教会，便随着历史的长河，于无形中逐渐消灭了。不过欧洲人已经知道，在远东这个神秘的地方，出产香料、宝石、黄金和丝绸，这些东西都是义大利商人从阿拉伯的回教商队中买到的，他们便渴望认识出产那些珍品的国家，好能到远东来经商致富。但是必须经过回教民族所占有的地区，而回教民族又正好横梗在两地之间，形成了无法度过的天堑。

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叶，由于地理大发现，这种情形也就逐渐改观了，哥伦布坚信地球是圆的，他和同伴自西向东行驶发现了新大陆，1486年，达伽玛沿着非洲的两岸，绕过南端的好望角，突破了回教徒的封锁线，发现了到达印度和东南亚的新航路。麦哲伦也在稍后完成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行，同时在中途的太平洋上，发现了菲律宾。

值得我们注意，也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这些伟大的探险家一心一意想要征服世界，除了喜欢冒险贪求财富之外，还以热诚的心火想要把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每发现一块新的地方，下船以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就地跪下，感谢天主，然后在地上竖起一座大型十字架，随船同行的，便是一群又一群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于是就留在当地，开始向当地的居民传播福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负责开始将欧洲文化介绍给世界，将会把只属于欧洲的教会改变成为世界的教会，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权力达到极点，正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一年，两国之间就对占有所寻找到的新地方发生了冲突，两国的君王也都同意，请教宗来仲裁两国之间的冲突。

当时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就为两国画分了势力范围，以大西洋上的亚述群岛为界，从亚述群岛以西一百海哩的经度算起，经度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之地则归属葡萄牙，但是，第二年西葡两国又私订道尔黛西拉条约，两国同意彼此间的势力界限是以亚述群岛以西 270 海哩处，这么一来就可以把葡萄牙人加伯拉尔所发现的巴西，划归给了葡萄牙。教宗还规定西葡两国应该负责保护属地上的教会，派遣传教士，还应该负责把传教士运送到所派遣的地方去，此外还得筹措经费，为这些传教士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教廷则正式给了保荐主教的特权，做为酬劳，这就是西葡两国对传教区拥有保教权的由来。开始的时候，君王们在他们的属地上传福音的慷慨热忱，还能够符合教廷的期待，但是后来西葡两国为了争权夺利，便很少能够兼顾他们所负的传教使命了。这么一来，保教权对传教、对教廷而言，逐渐成了弊端丛生的根源了。

1.4.2 美洲的传教情形

紧接着，就是美洲的开教了。西班牙人占领了位于中美洲的安地列斯群岛以后，随即展开征服美洲大陆的工作。公元 1519 年到 1522 年间，西班牙人科泰斯率领了十一艘战舰，载着七百位战士，和十门大炮，从安地列斯群岛中的古巴出发，想要征服墨西哥。当时的墨西哥是在印地安的阿兹特克人统治之下，建立了阿兹特克帝国，墨西哥人对阿兹特克人心怀怨恨，便和西班牙人里应外合，暗结血盟，整个帝国在未做抵抗的情况下，费了五年的时间，就全部给征服了。然后，西班牙人又在 1530 年到 35 年之间征服了由印加人所统治的秘鲁，西班牙人以不到五十年的功夫，就把美洲，除了巴西以外，从加利福尼亚到南美洲的南端全给征服了。随着远征军而来的，便是西班牙籍的传教士，有方济会、道明会及奥斯定会、耶稣会的会士，稍后也有耶稣会的会士。

公元 1492 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时，曾有一位司铎名叫亚肋纳斯，随船同行，亚肋纳斯便是踏上新大陆的第一位司铎。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时，有一位名叫波依的神父同行，

人们都认为他是第一位前往美洲的传教士。从此以后，传教士的人数便迅速增加，早在 1504 年，西班牙人还没有大批到达美洲以前，教会就已经有在安地列斯岛建立教区的决定，但是最早的几个教区，像是海地的圣多明各和康色布逊，以及波多黎各的圣若翰，都是到 1511 年才正式成立。不久，又在古巴的巴拉哥亚和圣地亚哥建立两个教区。1509 年前后，方济会在海地已经有三座修院五十位会士，1510 年时，道明会开始在海地留驻，1511 年又有二十四位方济会的会士到达波多黎各。

1516 年开始，西斯耐罗斯枢机就明文规定，每一艘西班牙船都应该带一位司铎同行，1526 年，查理五世明白规定，凡是西班牙籍的船只都要载送传教士前往美洲，从此以后，前往美洲的传教士不绝于途。所以，接下来，就介绍教会在墨西哥开教和发展的经过。

早在科蒂斯率领西班牙军队取得墨西哥以前，教会已经有意在犹加敦半岛上建立教区，被任命为第一位墨西哥主教的是道明会士朱利安葛拉塞斯主教，他在 1521 年到达教区，这是美洲最古老的一个教区。而墨西哥教会的真正创始人，应该是方济会士苏马拉加的若望，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 1527 年被任命为墨西哥城的第一任主教，他创建这座城市的传教机构，设立学校和慈善社团，还创办了天主教的出版事业，并经常邀请神长和修道院的院长，举行有关传教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在若望主教的任内，教廷又增加了三个新教区，以后新的教区就不断地增加。

墨西哥自从最初被占领以来，不到数十年就已经不再属于传教区了，在十六世纪的末年，已经有 470 个本堂区，这些堂区大多由修会会士管理，每一个本堂通常都还负责管理好几个分堂，由神父轮流照顾，只有墨西哥的北部仍然是传教区。西班牙传教士在墨西哥的每一个教区都设立了主教座堂的圣职团体，并且都拥有丰富的基业，有学校、有善会、有慈善机构，还有许多隐修院。其中不少庄严美丽的教会建筑，一直存留到现在，使我们还能够瞻仰到刻划着悠久而深厚的、富有西班牙色彩的天主教文化的历史古迹。

但是，天主教在墨西哥也因受到西班牙政治的影响和人性的软弱，而遭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几乎所有的主教都来自西班牙，即使是在以后，已经有了足够的本地神父，很长的时间以后，仍然有很少祝圣本地神父的主教，到十七世纪时，墨西哥九十二位主教中，仍然有五分之四的主教来自欧洲，他们虽然都是非常优秀的教会领袖，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完全认同当地的一切，他们不学习印地安语言，一想到回国都会感到兴奋，所有新主教的任命，都得得到西班牙国内塞维利亚省专门管理印地安事务的皇家议会许可。所以一位主教任命手续因循而又复杂，造成了许多教区的主教虚悬，就以墨西哥城来说，在历史上就曾经有因为总主教去世而职位虚悬了四十六年，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另外一点是由于主教和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总督，以及政府官员，常常会为了土地的界限、管辖的范围、权力范围，甚至是一般的礼仪问题，而发生无休无止的长期争执和诉讼，这似乎是一种封建时代的病症。

墨西哥的牧灵工作，从一开始就全部由修会会士担任，十六世纪中叶，墨西哥已经有三百位方济会会士，到了十七世纪初，他们已经有 174 座修院，道明会士也有六百位，还有八百位奥斯定会会士，耶稣会会士在 1572 年到达墨西哥，十七世纪时也有三百五十位，耶稣会士在墨西哥的各大城市兴办高级学校，以教育当地青年，单在墨西哥城，就有三座学院。西班牙籍的传教士除了在墨西哥以外，在现在的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等地，也都先后建立了教区。

中美洲最早建立的教区是巴拿马教区，成立于 1520 年，随后在加勒比海沿岸，先后成立教区，秘鲁的利马可以说是西班牙殖民时代教会活动的中心，简单地介绍一下利马教区当时的情形：在十六世纪末年，利马大学就已经有二十个讲座，180 位教授，一千六百位大学生，主教座堂的神职团体里，有五位教长、22 位咏礼司铎、30 位神父，尤其是第二任主教圣多利比亚丰索的任内，他创下了利马总主教区最光荣的一页。

他主持了三次教省会议和十三次教区会议。就以 1582 年第一次教省会议来说，他们编

写了大小两种要理问答，一种神师手册，另外还编写了一本讲道手册，这几本书都是用西班牙文和当地的印地安语文写的。圣多利比亚丰索总主教曾经三次访问过他那几乎相当于现在秘鲁全国那么大的教区，他是死于第四次访问的旅途中，据说他曾经为一百万的印地安人施行坚振圣事。在圣多利比亚丰索任内，利马城内有五个本堂区，十座医院，还有其他的慈善机构，八座修女院，十六座男修院，其中包括了方济会、道明会、奥斯定会、救赎会和耶稣会。

传教士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开教，建立传教区，随着传教事业开拓，圣教会也先后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圣统制。下面再进一步来探讨：西班牙籍传教士是如何在他们足迹所到之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各种修会的会士只是以传播信仰为目的，他们的阻碍相当的大，因为传教士的人数毕竟太少，其次便是地势的困难，高山峻岭，简直就是无路可走，更何况，又是地广人稀，有时候，主教为了巡视自己的教区，需要好几年的功夫才能完成。传教士的精力和时间，大部分都消耗在旅途上了，这些困难对传教士而言并不是最大的困难，传教士觉得最恶劣的困难，反而是从自己本国来的殖民者所产生的，尤其是在美洲发现了金矿、银矿以后，冒险淘金的人便蜂拥而来，他们所贪求的只是财富和光荣。

哥伦布为了使移民能够长期安居在美洲，就准许了这些人去强迫印地安人为他们做苦工，使移民者可以发财致富，虽然没有奴隶的名义，却有逼人当奴隶的事实，为了开垦荒地，为开矿，为搬运挑担，样样工作都需要工人，结果印地安土著被殖民者不断地驱使着，做着苦工。后来，有些教会人士看不惯这种情形，提醒他应该听从良心的呼声，让我为各位列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人名叫拉斯卡萨斯，是哥伦布一个同伴的儿子，拉斯卡萨斯原本也是来美洲淘金的，35岁那年，偶然听到一位道明会会士讲道理，良心发现，明白了虐待土人的不义，幡然改变了作风，完全献身于保护印地安人的工作，弃俗修道，加入了道明会，也升了神父。他所献身的工作，无法赢得殖民者的同情，于是拉斯卡萨斯就回到西班牙，去向国王陈情。嘉禄五世命他担任全印地安人的保护官，并且改定法律，严格禁止强迫印地安人做奴工。可惜天高皇帝远，法律在当时的美洲只是如同具文罢了，没有认真地执行。

但是拉斯卡萨斯毫不气馁，继续地为保护印地安人而奋斗，他写了不少著作，描述印地安人所受的痛苦，还曾经为了保护印地安人，横渡大西洋12次。他爱印地安人的热情，有时候也不免矫枉过正，不过仍不失为当时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美洲的传教虽然困难重重，传教的成效仍然是可观的。大体说来，信仰已在西属美洲深深地扎了根，传教士努力地改善印地安人野蛮的风俗，在每座修院的旁边建立小学，免费教育儿童，也有为栽培印地安领袖的子弟而建的中学，在墨西哥和利马两座大城创办大学。另外，还把印刷术传入美洲。传教士努力地传扬福音，附带地也传入当代的欧洲文化，他们不但教导印地安人学习读书写字唱歌，还教导他们种植庄稼，造林建屋等等。

西属南美洲最初的传教方法可以说是相当原始，一般来说，只需要把原有的偶像摧毁，印地安人就会全村或全族集体领洗入教，至于教义和道德方面的训练，就都留给修会会士去做，连最小的乡村也不例外。由于从西班牙来的殖民者逐渐与皈依的印地安人通婚，不到数十年，就有了完全信奉天主教的新生代，而许多修会会士曾多次旅行传教，到偏远的地区，向分散在丛林中、山区里、田野间的印地安人传教，这些传教士不畏旅途辛劳，真正是劳苦功高，但是所获得的成效，往往都不能持久。

16世纪时，传教士为了替印地安人的信仰扎下稳固的基础，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传教方法，那就是在各地建立了许多的牧导村。什么是牧导村呢？牧导村是把各地流浪、居无定所的印地安人聚在一起组合成的村落。村落内，只有担任牧导工作的传教士可以进入，其他从欧洲来的殖民者都被隔离在外。这种牧导在教义和一般常识的传授上，相当成功，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在巴拉圭，由耶稣会神父所建立的牧导村。这些村庄的一部分，是在现在阿

根廷和巴西境内，公元 1610 年，经西班牙政府同意，在巴拉圭设立了牧导村，规定欧洲人不可以住在村子里。由耶稣会士所建立的牧导村，总数大概在 30 到 32 个之间，约可收容十五万印地安人，到 18 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这些牧导也逐渐崩溃了，在原始森林里，今天还能见到一些断垣残壁呢，至于其他地区，由其他修会所建的牧导村，像方济会所建的牧导村，仍然继续存留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殖民时代的牧导工作当作是一个整体来看，牧导村的传教方法是成功的，目前，拉丁美洲有两亿多万天主教徒，几乎占了全球天主教信友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只是少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殖民时代牧导工作的成果。

南美洲的巴西，在划分殖民地时，归给了葡萄牙，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政策不相同，西班牙人征服一个地区以后，就深入当地内陆，而葡萄牙人则只占领沿海的战略地点。另外，西班牙的传教士在墨西哥和秘鲁已经发现印地安人有相当进步的文化，而葡萄牙的传教士，在广大的巴西所面临的，只是没有成文的法律，没有外表的文明，和没有信仰的半游牧民族。方济会和奥斯定会士曾首先尝试开教，方济会士在 1503 年到达巴西，但不久就被土著所杀，以后方济会士在巴西设立了两个教省。圣衣会设立三个教省，有 300 位会士，是当时最有力量量的修会。义大利籍嘉布遣会士在 17 世纪时很活跃，在 18 世纪初年，人数减少到只剩 30 位。本笃会成立了五个会省。

耶稣会士在 1549 年进入巴西，到 1553 年正式建立会省，湾城和圣万桑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工作地点，1570 年曾有 40 位年轻会士到了巴西，却被喀尔文教派的强盗所掳杀，这 40 位殉道者在 1854 年都被教廷列入真福品。1571 年，另外 12 位耶稣会士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到了 1622 年，耶稣会在巴西，已经有一千八百位会士，他们当中有一位相当杰出的传教士，名叫安奇达的若瑟，被称为巴西的宗徒。1533 年，他到达巴西时，只有 20 岁，曾经担任省长，他有丰富的语言天才，编撰字典和文法，也写过要理书、圣歌集，而且还行了很多奇迹，当然他被教廷列入了圣品。

巴西殖民地的教务，开始的时候是由葡萄牙的芬查耳教区管理，1551 年建立了湾城教区，这是巴西的第一个教区，脱离芬查耳的管辖，改而属于里斯本的首席主教区，到 1676 年湾城教区才升格为总主教区。此外，也在北方的欧林达和南方的里约成立教区，到 1745 年，再增加了玛利亚纳和圣保罗两个教区，在最北部也分别于 1677 年成立了圣路易教区，1711 年成立贝伦教区。总而言之，葡萄牙所属的巴西教会，发展得要比西属美洲教会来得慢，因为，葡萄牙的兴趣是在亚洲和非洲，所以巴西一直是第二流的殖民地。今天，巴西的许多教会建筑，特别是在湾城和欧林达，还能使人回忆到殖民时代的林林总总，在巴西的传教士也采用牧导村的制度来管理民众。

1.4.3 菲律宾的传教情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菲律宾开教的经过。为什么我在这儿要提到菲律宾呢？首先，它是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虽然从地图上来看，菲律宾距离美洲非常远，但是从菲律宾开教的经过来看，我就不得不在这儿把菲律宾也提出来向各位一并介绍。我们知道，麦哲伦也和哥伦布一样，受西班牙国王的雇用到了美洲，沿着南美洲的东岸向南航行，发现了美洲南端的合恩角，然后向西航行，成功地横渡太平洋，在 1520 年登陆菲律宾群岛中的宿雾岛，并且在那里竖立了第一个十字架。随行的传教士便给岛上的人付了洗，等到西班牙人取得了墨西哥以后，便从墨西哥出发，正式占领菲律宾。往菲律宾传教的传教士也以同样的路线前往。

菲律宾开教，可以说是西班牙传教士最惊人最迅速的一大成就。菲律宾的土著相信，每一种东西都有精灵，不过没有公共举行的敬礼和场所，对天主教的道理很容易地就接受了下来。到公元 1585 年时，已经有四十万人领洗奉教，1620 年便增加到了两百万人，四十年的功夫，便已普及到全部岛屿。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农村大部分的本堂区，都已经交给当地的神职人员管理。1614 年，道明会就在最大的城马尼拉创办了圣多玛斯大学，380 年后的

现在，都还不断地在繁荣滋长。菲律宾近四百年来一直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

1.4.4 非洲的传教情形

我们来探讨非洲开教的经过，公元 1490 年到 1491 年，第一批传教士由葡萄牙到非洲的刚果去开教，他们虽然用葡萄牙语讲道，再请人翻译成土著民族的方言，但是效果却相当好，传教士登陆后的第四天，便为国王付了洗，不久以后皇后也受了洗，再过不久他们的长子亚尔丰索继承了王位，对教会很热诚，在位的时间也相当长，努力地刚果建立了一个信教的刚果。

公元 1512 年，亚尔丰索曾派遣了一个使节团到罗马晋谒教宗朱利二世，轰动了罗马，同行的有刚果王国的太子亨利，他立志晋升为司铎，这位黑人青年的才与德都很优越，他在里斯本完成了学业，领受了铎品，而且被教宗良第十擢升为主教，他是第一位黑人主教，一直到 20 世纪，教会未曾再祝圣第二位黑人主教。

黑人主教亨利带领了大批黑人司铎回到刚果，不久以后，就有好几千人受了洗礼。但是，天主教还没有在当地扎下深厚的基础，民众们粗野、迷信的风气也一时无法改除，等到葡萄牙全力经营在亚洲的属地时，非洲的传教士后继又无人。这时候，欧洲贩卖黑奴的风气逐渐猖獗，白人在非洲完全丧失了信用，教会也连带地受人轻视，新奉教的人也逐渐地放弃了信仰。至于非洲其他地方，像是安哥拉、莫三鼻克，情形也一样，虽然先后有不少人领了洗，葡萄牙的传教士也一再努力，但是教务并没有什么起色，一直要等到 19 世纪中叶，对非洲改采新的方式传教，情形才有了改观，信仰也有了持久的效果。

1.4.5 印度的传教情形

我们来看南亚的印度。拓展印度天主教的传教士是随同达伽玛航海，在公元 1492 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终于航行通过了印度洋，到达印度。他们在印度半岛西岸葡萄牙人所建立的殖民基地上，建筑了圣堂和修道院。到了公元 1533 年，罗马教廷正式在葡属印度首都卧亚成立主教区，这个主教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世界上最大的教区，从好望角一直伸展到东亚的日本。不过教务的进展有名无实，只不过是外表上拆毁了佛教的庙宇而已，绝不足以改造人心。

继发现新殖民地而来的人，大都是冒险前来淘金的人，他们远离自己的家园和祖国，来到印度，往往只是唯利是图，生活浪漫，恶声四溢，当然也就影响到传教事业的拓展。到 1535 年的时候，才有一位热心救人的神父，从卧亚到印度半岛的东南角名叫“渔岸”的地方，给好几千名帕拉瓦渔民付了洗。这个天大的消息传到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才决心派遣有圣德的传教士到印度栽培刚领洗的新教友。葡萄牙国王和当时刚新创立的耶稣会总长依纳爵商讨，耶稣会虽然刚成立不久，会士的人数也不多，但是依纳爵大方地同意派遣会士去印度传教，奉派到印度的，竟然是依纳爵自己最心爱的同伴圣方济·沙勿略。

1.4.6 圣方济·沙勿略的传教情形

圣方济·沙勿略原本是一位巴斯克族上流社会的青年，醉心于功名荣誉，他到巴黎去求学，就和比他大十五岁的同乡租了一所房子共同居住。这位同乡不是别人，就是一心思慕天主光荣的依纳爵。依纳爵屡次提醒沙勿略说：“人，即使赢得了普世，倘若丧失了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渐渐地，沙勿略的思想受到依纳爵的潜移默化起了变化，他的生活目标有了转变，加入了依纳爵的团体，同时在 1534 年共同宣发圣愿，而且还发愿任凭教宗随意处置。沙勿略从此以后就一心一意以献身救灵为志向，当会祖依纳爵派他到印度传教时，正中他的下怀。

沙勿略接受教宗钦差大使的名义，负责视察在东方的葡属教务，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只以教会传教事业的发展为目的。他由里斯本登上了每年定期开往印度的皇家舰队，前往印度，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传教生涯。这位与众不同的钦差大使，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黑布长袍，全部的行李只是一尊苦像、一本日课经和几本圣经圣书，有人就责备他不符钦差大使的身份，

他却处之泰然。在十一个月的艰苦航程中，他不但自己洗衣服，还替船上有病的人洗衣服，谦卑地为这些病人服务，其他的时间，就用来讲道劝人。当船航行抵达卧亚时，人们已经把他当圣人对待了。

沙勿略上岸后，就在当地建立了他工作的重心，刚一下船，便开始了传教工作，探访当地的病人和囚犯，还给儿童讲解要理。葡萄牙殖民者的行为和作风，影响到教会，这些殖民者并不欢迎传教士，沙勿略首先设法管束这批无法无天的殖民者，导引他们的行为，尽量符合福音的教训。待雨季过后，他便开始整理渔岸村的教会事务，他发现，那已经接受过洗礼的数千名教友，完全没有人照顾，一切得从新开始，新教友信仰有待加深，婴儿有待付洗，成年人的婚配、组织教团、训练讲道员，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应该办理的当务之急，他虽然缺乏一切，而且又水土不服，言语困难，忙得筋疲力尽，还得不时地回卧亚或到北部或到锡兰岛去传教。经年累月地忙着这一切工作，这是他一生当中教化印度人最多的一段时期。

沙勿略虽然在印度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该去视察所有葡萄牙国属下的亚洲各传教区。公元1545年，他动身去麻六甲，麻六甲是葡萄牙国前来远东的基地，这个马来半岛上热闹的港口，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死港，供人凭吊，它的地位已经被半岛南端的小岛新加坡所取代了。

沙勿略两年之间一连串的旅游，几乎全走海路。航行到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路途有如八卦阵一样，非常危险，常会遇到暗礁、暴风雨，或是海盗和回教徒的劫掠。沙勿略的足迹竟然到达过摩鹿加群岛，并且还穿越了回教徒所占据的岛屿，甚至还在西里伯斯这个专门猎人头的野蛮部落里居住了三个月，然后回到麻六甲，在葡萄牙人当中，展开他的牧灵工作。

公元1542年，有一艘葡萄牙商船被风吹到日本，日本当时还是欧洲不认识的处女地，这艘商船的乘员也是第一次到达日本的欧洲人。1547年，当沙勿略在麻六甲时，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位名叫安治郎的日本人，安治郎听说沙勿略的大名，又听了沙勿略的道理，要求沙勿略为他付洗。原来，安治郎在日本犯了杀人罪，逃往海外，他原是一位彬彬有礼又坦诚的人，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就教于沙勿略，和沙勿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安治郎领洗时的圣名是“圣信的保禄”，这时候安治郎唯一的愿望就是，引领沙勿略去归他的祖国。沙勿略也真的丝毫不顾他人所说的许多困难和危险，排除了一切困难和反对，终于向葡萄牙政府取得国书，以葡萄牙大使的名义前往日本。在去日本之前，他曾经先回到卧亚，料理许多未了的事情，随即带领两位同会弟兄，在安治郎引领下，向日本扬帆而去。

在麻六甲，他们一行人登上了一艘中国海盗船，一路非常颠簸，疾病啦、台风啦，接踵而至。不少旅客甚至船员都丧失了勇气。好在有沙勿略不断地鼓励全船的人，终于在公元1549年的8月15号，登上了九州的鹿儿岛，也是安治郎的故乡。当然这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沙勿略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欧洲传教士，这时候正是我国明武宗正德年间。

沙勿略发现日本人对西方的新奇事物和天主教的道理都非常羡慕，但是当时的日本国情却极其可悲，正是日本封建的战国时代，有许多的小邦，这些分封的诸侯之间，连年混战，形成一种无政号府状态。沙勿略了解到这种情形，丝毫不灰心，努力学日语，还与有学识的佛教高僧辩论，遭到僧徒讪笑。此路已经不通，沙勿略就改采其他的办法，他要去晋谒日本天皇，请天皇降谕旨准许他在日本传教。为了争取时间，他在严寒的冬天，徒步走向京都，几乎把他给累死，结果他才弄明白，自己白跑了一趟，原来当时的天皇，只不过是虚有其名而已，号令出不了京都，对分封的王侯发生不了效力。

这一条又不通，沙勿略又改采其他的办法，希望同掌握山口县地方实权的诸侯交接来往。他也从经验中得到教训，那就是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在日本人看来，该算是奇装异服，因此而受到日本人轻视，于是他立即改变服装，脱下他陈旧的黑袍，穿上高贵的丝绸，以葡萄牙国大使的身份，让葡萄牙商人当他的随从，还带了很多礼物去求见，这次果然碰对了，受到山口县诸侯的欢迎和款待，同时也获得了传教许可。

沙勿略在山口县所归化的居民虽然不多，但是信德都很坚固，他称这些日本教友是他心灵的快乐。日本传教事业的前景可见，希望很大，可是，圣依纳爵的信辗转来到，委派他担任耶稣会印度省的神长，命令他返回卧亚。

沙勿略从日本带回来伟大的计划，因为他发现，中国在整个的东方，具有无上的权威，他经常听见人说，中国才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日本人称中国是他们的上国，日本人也常说，如果天主教真正实在有崇高的价值，文化发达的中国应该是早已信教了。这样说来，他非到中国去宣传福音不可，然后再从中国去影响整个亚洲。可惜当时的中国在明朝闭关自守的政策下，严格禁止外国人入境，谁想偷渡便得冒生命危险。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沙勿略，他决心跟着葡萄牙的使节一起去北京。当时他曾写信说：“我们仰赖天主的护佑，要向前去，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天必要进入中国，我很高兴是要去给不怕牺牲生命的人开路。”但是，天主并没有赏赐给沙勿略进入中国传教的大恩典，只赏赐给他为中国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他把耶稣会在卧亚的事安排好了以后，就又开始了海上的行程，但是麻六甲的葡萄牙总督反对派遣使臣到中国，他因此不能公开地进入中国。即使冒险偷渡他都要到中国，意志坚定决不改变。他登上了一艘载着私货开往广东的葡萄牙商船，到达广东南方 90 里的上川岛，当时上川岛只是一个荒岛，是中国官吏暗通走私商人的地点，中国帆船常来上川岛与葡萄牙商船私通有利的商品交易。沙勿略就在上川岛上苦苦等待机会，希望有人把他偷偷地带进大陆，但是一直都没有人肯冒生命危险，把外国人带进中国境内，等了两个多月，没有人不劝他放弃这个心愿，但他就是不肯，而这时候的他，已经是心力交瘁终于病倒。

他在一间简陋的茅屋内，孤零零地一个人，只有一位忠实的传道士陪伴他，延挨到 1552 年 12 月 3 号黎明的时候，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只有 46 岁。沙勿略在亚洲的传教生涯，前后只有十年，而在这十年当中，以当时交通工具的不发达，而且还有生命的危险，他或是乘船，或是步行，大概走了十万公里的路程。他的生活可用“劳碌”两个字来形容，他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由一种水土气候，骤然进入另一种水土气候，可以由印度或摩鹿加群岛窒息的酷热中，忽然转移到冰天雪地的日本。吃的、穿的、用的都尽量简单而粗糙，常守夜祈祷，睡眠休息的时间也自行缩短，除非他累得不支，否则总不睡觉。他的工作就是讲道、听告解、祈祷、往来奔走，只有在乘船过海时，才稍微地松弛休息一下，他心中的远景，就是愿意多吃苦，而能为天主争取更大的光荣，为了天主的国，却以他的壮年之身，耗尽了他的体力和健康，他在弥留的时候，好在有一位传道士在他旁边，总算不虚他长途跋涉要为中国人传福音的希望。

我们走向世界的紧凑历程中，碰上了一位劳碌而又有毅力的、被教会尊称为“东亚宗徒”的伟大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我们跟着他的足迹，仆仆风尘，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出发，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了印度半岛的卧亚，然后又徒步去了渔岸村。我们看着他为千头万绪的教会急务，在语言困难、水土不服、物质又缺乏的情形下，忙得筋疲力尽，从渔岸村来回于卧亚、印度的北部、印度东南的锡兰去传教，以后又去了麻六甲，更航向有香料群岛之称的摩鹿加群岛，和专门猎取人头的野蛮部落中住了三个月，再回麻六甲，然后回到卧亚，最后更随日本的安治郎航向东北亚的日本，在冰天雪地中，从鹿儿岛步行到京都，正要在日本开拓发展的时候，总长依纳爵命他返回印度的卧亚，然后又从卧亚到麻六甲，在广东南方的上川岛上，等待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是鞠躬尽瘁，死在上川岛上。以 16 世纪的交通状况，十万公里的路程，该是多么辛苦，多么消耗体力啊！难怪他竟然在 46 岁的壮盛之年，心力交瘁而死。

我们跟着他在印度洋、在太平洋上漂泊，来来回回的行程、忙忙碌碌的教务工作，这位伟大的传教士，真不愧为“东亚的宗徒”，教会历史上，前有圣保禄，后有圣方济·沙勿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到耶稣生前从未去过的普天下，下面再对沙勿略的传教事业，和沙勿

略离开日本以后日本天主教的情形，简单地说明一下。

圣方济·沙勿略开创了教会在印度洋沿岸、太平洋南部和太平洋西岸的传教事业，这样伟大的传教生涯，全凭他那坚忍不拔的毅力，而他的毅力，又全来自他在祈祷中和在同天主教亲密结合中所获得的圣宠，否则他决不可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有时候，他甚至不论白天或黑夜，在神魂超拔中度过很长的祈祷时间。他那份炽烈的、热爱天主的心和渴望多多广传福音拯救人灵的心火，在他写回欧洲的信件中，充份地流露出来，那些信件在欧洲各地流行，被人抄录，被人翻译，被人热诚地阅读，真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因此而获得了天主的圣召，而步上沙勿略的后尘，成为传教士，为教会服务。

曾经有人批评他，常常更换传教的地点，走马看花，这并不是上策。如果他能够在固定的地点，多待些时间，以便使新领洗的教友在信仰上更为坚强巩固，不是更好吗？其实，沙勿略虽然不断地去开拓新的基督神国，但并没有放弃他已经开教的地区，他为每一个地区所建立的团体，训练了当地本土化的传教员，并且委派给其他的神父，继续照顾管理教会，为教友服务。他本人仍然不时地监督着每一个地区，他人不在，分身乏术时，总是想办法以书信鼓励、领导他们。沙勿略正如同圣保禄一样，负责起开路先锋的使命。他常感觉自己是被蒙召去把福音传遍各地，一直到天涯地角。

还有人批评他，没有充份的准备，就草草率率为整个部族，或是三千或是五千人付洗，其实，沙勿略的传教方式是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像对帕拉瓦以及其他心地善良朴实的种族，他有时候是大批大批地给他们付洗，甚至像他自己形容的“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而在日本，他就不这么做了，因为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多是些有学问的佛教高僧或是地方上的缙绅，要不就是某部落的精英，这些人都很有头脑，富有独立思想，对天主教又充满了好奇，想要向这样的人传教，必须得抱着不怕辞穷的危险，显示出他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思想不可。他也清楚地看出来，为能归化这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首先应该对他们的风俗和本地宗教有深刻认识，同时还应该赢得官绅的信任才行。他在日本所归化的，也只不过千人左右，不过，他已经为日本打开了公开传教的道路，后继的人踏着他的足迹，数年之间便得到了惊人的成绩。

沙勿略在公元 1551 年离开日本的时候，已经有一千名左右的教友，他所播下的种子，很快地就发芽开花，而日本当时的封建制度社会，是很有力地帮助了教务的推展，因为，只要封建郡主一旦领洗进教，便会有许多跟随郡主的人也领洗进教。织田信长即位以后，因为对佛教僧侣很有反感，对耶稣会会士却优礼有加。耶稣会的巡阅使范礼安在 1579 年率领了 14 位耶稣会士抵达日本，范礼安是一位既坚强又善于组织的人，他把日本分成若干个传教区，那时候，是日本天主教的极盛时代，不到 20 年的功夫，已经建立了三百座教堂，领洗进教的人差不多有二十万。范礼安看到这么样的成果，在欢欣之余，就称日本是“天主的灿烂花园”。当范礼安经过印度回欧洲时，就带了四个日本少年同行，他们是日本新领洗的贵族子弟，范礼安领他们去觐见葡萄牙国王，更带他们到罗马觐见教宗，他们八年后学成归国，其中三位已成为耶稣会会人，另外一位在后来日本教难时为主致命。

1.4.7 日本的教难

日本教会不久以后就遭遇到阻难，首要原因是英国和荷兰的航海事业兴起，他们又已经改信新教，于是在海上不是驱逐就是劫掠载运传教士去远东的葡萄牙商船，造成前往日本的传教士后继不易。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清势正动荡不安，圣教会便不免遭受波及，对教会颇有好感的织田信长被丰臣秀吉推翻，取而代之。开始时，丰臣秀吉对传教士也表示好感，到 1587 年时，忽然改变了态度，剧烈地反对耶稣会士，命令他们离开日本。耶稣会士销声匿迹了一阵子，之后也就不顾丰臣秀吉的禁令，暗中继续传教，又有不少人领洗进教，风暴逐渐消散。第二年方济会士到了日本，开始公开讲道，建造修院，这么一来，激怒了丰臣秀吉，教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可巧，这时候一艘西班牙商船被台风吹向日本海岸，按照日本法律，货物应该充公，船长想以威胁来阻止船上的货物被充公，向日本扬言说，倘若日本官员冒然行事，西班牙国王必定会来报仇雪耻，像征服美洲那样来征服日本，更何况西班牙传教士遍布在日本境内，到时候必定也会里应外合。商船船长说的这类话更加地激怒了丰臣秀吉，他下决心要严加惩戒，便下令逮捕 6 位方济会士、17 位日本教友，其中包括一个 11 岁、一个 13 岁的孩子，另外还有三位耶稣会的辅理修士。这 26 人被带到长崎，在全体教友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壮烈地殉道而死。这第一次的流血惨剧，想不到非但没有挫折到日本教务的发展，反而因着殉道烈士这种以身作则，赢得了更高的崇敬。在 1598 年到 1612 年之间，又有十多人受洗。在长崎致命的 26 位烈士，由教宗在 1627 年列入真福品，到 250 年后的 1862 年，再由教宗列入殉道圣人的品位，受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教友永远的崇敬。

第二次教难大大地蹂躏了范礼安所谓的“天主的灿烂花园”，几乎把这个生气勃勃的教会完全消灭。引发教难的原因很多，因为教友与日本神道教的信仰是对立的，引起了日本保守者的仇视，对西方来的事物缺乏信任，同时也有些传教士的作法不明智，又因为英吉利和荷兰两国的新教商人嫉妒、仇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散播谣言说西葡两国的传教士是他们本国军队派来的先锋或间谍，军队就将要入侵日本。这些都是激起教难的原因，至少也助长了教难的气焰。

公元 1614 年，德川家康发出公告，取缔一切宗教，放逐所有传教士，拆毁了所有的教堂，一百多位耶稣会士被遣送到澳门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并且警告他们，如果胆敢再回日本，必死无疑，决不宽贷，一切的港口随时严加戒备。而日本教友却成了众矢之的，受尽各种虐待，受逼背教，不肯背教而被处死的教友，一天天增加。公元 1622 年，52 名会士和教友致命而死，其中 27 位是被斩首，其他的是被火烧死，虽然也有几位英勇的耶稣会、方济会神父，冒死藏匿在民间，或是偷渡进入日本，也都无济于事，大多数的教友都成了没有牧人的羊，终究难于幸存。

从 1623 年起，德川家康执政时的教难更加地彻底，凡是有信教之嫌的，就命令他们践踏十字苦像，刑罚也都极其残酷，有些比初期教会时代罗马帝国对待教友的作法更不人道，像是把教友倒悬在盛满了粪便和种种肮脏恶臭的东西上，直到被熏死为止，要不就把教友浸泡在沸腾的硫磺矿泉里，使得皮肉被泡烂而死。公元 1637 年，在教友最多的有马一带，老百姓为大名诸侯的横征暴敛所苦，起而反抗，然后集体逃往到岛源岛，不幸被追兵击败，凡是声明不是教友的，都可以保全性命，其他的男女教友，包括儿童在内，据估计有三万五千多人，全都被集体屠杀。从此以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日本采取严密的锁国政策，与外国的一切接触完全断绝，禁止入境，也禁止出境。

公元 1640 年，澳门的葡萄牙人派遣使节，试图想要恢复贸易，充当使节的人及其他船上的乘客全被集体屠杀，只放回几个水手，要他们回去告诉本国人，日本不会改变既定的锁国政策。港口的关卡虽然是如此森严，但是在这段时期中，仍然有传教士不顾生命危险，置个人死世于度外，一批又一批想要偷渡进日本去照顾教友。但是先后遭到杀害或是终身监禁，没有一个获得幸免。日本的教会虽然没有了神职人员领导，教难又连年不断，许多英勇的教友宁死也不肯背教，究竟殉道的有多少人？那只有天主知道了。至少有姓名的，我们敢断定至少超过了四千。

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在长崎一带，仍然残存着一个教友的核心，保持着信德，一代一代自相传授，两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明治维新时代，结束了锁国政策。政治情形既然改变了，在那当年是“天主的灿烂花园”地下所潜藏的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又重新发育繁荣起来。有关这一部份，等我们谈到十九世纪的教会时，再为各位详细介绍。

2 十七、十八世纪

2.1 十七世纪的繁荣教会

2.1.1 十七世纪概述

已经讲述完了教会从创立到十六世纪，一千六百年间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下面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将要介绍天主教在十七世纪活动繁荣的情况。天主教的历史在十七世纪初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局面，一方面由新教改教所造成的痛苦分裂局面已经逐渐定型下来，另一方面在十六世纪所完成的革新工作，尤其是从特力腾大公会议以来，已经结出美满的果实，教会生活有了奇妙的荣景。

十六世纪的南欧，尤其在新教企图改教，而没有波及到的义大利和西班牙，天主教会已经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在西班牙和义大利出现了大批圣人，足可为这革新生活做见证。而十七世纪的法国，无论在版图上，或是在政治生活上，都独占鳌头，雄踞欧洲的第一把交椅，从公元 1562 年到 1594 年，疯狂的三十年内战，为了政治与宗教的利害冲突搅得一团糟，难解难分，国家遍地血腥，国家几乎就要给搞垮了。幸好法王亨利第四在 1598 年颁布南特诏书，宣布信仰自由，很明智地挽回了危局。颁布南特诏书是基于相互容忍的观点，而且也是一项创举。因为在南特诏书之前，无论是改革派的新教徒地区，或是天主教徒地区，都不曾相互容忍。法国因着颁布南特诏书，恢复了和平。

路易十三和他的宰相黎西留枢机，对宗教很热心，也关心教会的利益，黎西留不在乎他人对他外交政策的批评，却很努力地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圣女大德兰的著作、圣嘉禄、圣鲍罗梅、圣斐理伯乃利以及圣方济撒肋爵等圣人的工作，固然对当时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大有影响，但不足以解释这种革新的强度，如果我们想追问，“究竟为什么这段时期的法国会产生那么多圣人、神秘学家和那么多些神修作家呢？”这就好像想追问，“为什么义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了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是一样的，我们除了感谢天主上智的安排以外，实在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无论如何，这时候的法国神职界大有起色，教友的生活也非常虔诚敦厚。下面，我就介绍下十七世纪当中法国神职界的革新和新兴的修会。

只靠特力腾会议的法令，决不可能让神职界从衰颓中立刻涌现活力，大多数的司铎，尤其是乡间的司铎，皆无知得可怜，他们有的甚至连圣事如何举行都不知道。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的六十年，很少有新的修道院建立起来，他们当时还正在寻求怎么样实行“大公会议命令”，让每一个教区建立修道院，再加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争辩，使得神职人员的职务更加艰巨，栽培有学识又有心火的司铎，更是刻不容缓。很庆幸的是，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伟大人物，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或更好说，这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召唤这些卓越的人物，做天主主要做的事。

十七世纪第一个从事改造法国神职人员的是白吕耳神父，1627 年教宗擢升白吕耳为枢机。白吕耳深深知道司铎品位的尊高，因此对不称职不胜任的大多数神职人员，感到很头痛，他为了挽救这弊病，在法国创立了祈祷会，加入祈祷的神职人员，并不宣发任何圣愿，他们只愿意善度司铎职位的生活，在讲道理、施行圣事时，做神职班的助手而已，以后他们也建立了修道院，并且在学校里负起教育青年的工作。白吕耳的著作对当时的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司铎从他的著作中汲取神修生活的食粮。白吕耳把敬礼降生成人的圣言列为首要的目标，也教导人敬礼圣母玛利亚，经常地提醒大众“天主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也是白吕耳神修的基本原则。他为教会造就了许多伟大超凡的圣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圣味增爵。

2.1.2 圣味增爵与法国的修会改革

圣味增爵，这位十七世纪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实在是白吕耳不小的一件功德，圣味增爵生于 1581 年，死于 1660 年，在当代所有的圣人中，再也没有比圣味增爵更出名，对教会更有影响力的人了。但是当他晋升为神父时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要成为一个神职界的革新者。他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穷乡僻壤，小时候是个牧羊者，是一个平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发现到儿子的聪明，决心栽培他走上神职界，这是一条跻身上等社会的捷径。

圣味增爵直到三十岁左右，好像关心财富积蓄更甚于在神修之途上的进步，他在三十岁那年，竟然成为法国王后的家庭神师，他以为自己就这样下去，做个与世浮沉的司铎就已经很满意了，可巧就在这时候，他的生活起了重大变化，原来他在这时候认识了白吕耳。他受到白吕耳的影响，回忆起他在担任乡村本堂神父时，亲身体会到乡村居民的宗教生活相当贫乏可怜，而在都市里的居民，总也不会缺乏神父为他们费心，乡村居民真像是没有牧人照顾的羊群。

这时候的味增爵开始有了要为乡村居民讲道服务的意念，本来在他之前，早就已经有热心救人的神父偶尔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到乡村去讲道理，为的是能够唤醒乡村居民的宗教生活，味增爵本人也觉得这样的方法能产生不少好处，但是他这时候的看法，已经有了更积极的改变。他认为想使这种功效持久不衰，必须长此以往，继续不断地去从事讲道理的工作才行，所以需要有一批神父专门为这种牧道工作献身服务。于是，他召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个小团体的人数逐渐增加扩大，后来有人把在巴黎中心区一所报废的麻疯病人疗养中心送给味增爵，作为他和他伙伴们活动的中心，加入的人就更可观了。他为这些中心跟随他的同伴们，厘定了生活规范，订定了生活目标，也就是先圣化自己，然后去给穷人，尤其是乡村居民宣传福音。接着，他又加上了第三个目标，作为前面两种目标的综合，也就是扩大为一般的普通百姓宣讲福音。当然，他先得再教育从事牧灵的神职人员才行，因为当时的神职人员，生活已经相当腐化，这就是遣使会成立的经过。

法国的主教看到味增爵对遣使会所做的，就要求他带领即将接受神品的青年修士做避静，这工作对提升神职人员的素质，确实是成效卓越。但是，避静仍然只是短短一星期或数星期的准备而已，如果要能够长久维持神职人员的心火，这是不够的，圣味增爵又设立了所谓的“星期二神修训话”，前后十年之久，给在巴黎渴望增长灵修的神职人员训话，一直持续到他去逝为止。这种训话的效果，非常惊人，连在巴黎的许多极负名望的人，也在百忙中抽空去聆听他朴实而恳切的训话。

避静加上星期二的的神修训话，就足以全面革新神职人员了吗？当然不够。这只是整顿神职界的临时治标办法，治本的办法非得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新修道院，使新生代的神职人员接受长期的栽培不可。因为，一直到十七世纪，圣味增爵的时代，法国在尝试建立修道院方面，还没有多大的成绩，圣味增爵于是便开始建设修道院，从此以后，管理修道院便成为遣使会会士的一大主要工作。

整顿教会的工作，还得往上推及到最高当局，才能在全国上下普遍展开。公元 1516 年，教宗与法国国王所订的立的协定，授权国王选派主教，然后再由教宗授给主教治理教区的权力，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国王常常无法考虑顾及到教会的权益和需要。当法王路易十三去世后，圣味增爵由神师成了摄政太后的顾问，他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选派各教区的主教时，协助太后尽量选出能够称职的主教。这对法国教会的革新和发展，影响深远。

圣味增爵虽然不是整顿神职界的唯一人物，却可以说是最有效力的工作者之一，他本来足以引以自豪了，但是，他的热心神火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还提倡并亲手建立了许多慈善事业，在这方面，他在教内教外都留下了最活跃的纪念。只因他爱主情深，很自然地便在实际爱人的慈善工作中，舒展他那爱主而爱人的情怀，为了能够亲身参与救助贫病的慈善工作，他席不暇暖，经常重复地说：“我们爱天主吧，弟兄们，爱天主吧，这都是要以出力出汗来

实现的啊！”圣味增爵抓住一切机会去救助病苦和贫穷的人，并且在这一方面，又展现了他的组织能力。

1617年他担任本堂神父时，被一个遭受悲惨命运的家庭所感动，这一家人全部都感染急病，不能彼此互助，急需外人救援，圣味增爵便组织了一个慈善协会，专门在身灵两方面救助最贫病的人，他明白，好心的人到处都有，缺乏的仅是组织和持久的能力，于是他便把富有爱心的太太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慈善协会，还为她们订下规章。这些慈善协会和当代已经推动的圣母会，都争先恐后地在教友中间从事互助的工作，他们不但成群结队地去实行爱人的事业，同时并按照福音的精神努力圣化自己。不久之后，许多的贵族妇女便以“贫穷人的婢女”这样的姿态出现，奉献出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去救助监狱或医院里的各种悲惨待救的人，并且设法照顾被遗弃的婴儿。

一段日子以后，圣味增爵便感觉到，单靠世俗人的热情，不足以使照顾贫病者的工作持续不懈，必须想办法集合到终身为贫病者服务的妇女才成。于是他仰赖一位名叫路意丝·玛利亚克的寡妇，协助他创立了仁爱修女会。当我们谈到圣方济撒助爵的时候，他也曾有要创立一个修女会，从事慈善工作，扶助贫病的人，但是因遭到他人反对，圣方济撒助爵所创立的圣母往见会，终究成了隐修性的修会。当代人都认为修女如果不隐居在隐修院内，反而抛头露面出来从事社会工作，简直不可思议，圣味增爵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因此对仁爱会有这样的规定：“这个修会没有修院做为会所，只有病人的住宅，以租借的房间做为居住的斗室，以本堂区的教堂做为圣堂，以街衢或医院为修院，以服从做为修院的禁地，以一块方布做为头巾，……”这样的背景所产生的修会，却有了意外的发展。

天主教在十七世纪的繁荣发展着，我们谈到法国神职界的革新和新兴修会的发展情形，这时期的法国圣人辈出，上星期所谈的大圣人是圣味增爵，他创立了遣使会，整顿神职人员，并且创办各种慈善事业。最后，讲到圣味增爵在圣路意丝玛利亚克的协助下，创立了仁爱修女会，打破历史传统，修女不再局限于隐修院内，度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仁爱会修女开创了修女抛头露面从事慈善事业的先例，而且有意想不到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仁爱会的修女已经遍布世界各国，在她们的岗位上传扬基督的博爱，她们的人数已经接近五万人，可以说是会员人数最多的修会。中国在解放以前，就有不少遣使会神父和仁爱会修女，我们习惯称这些修女是白帽子修女，原本仁爱会的修女头上，所采用的只不过是当时法国乡村妇女的装扮，白色的帽子是日后为了防止强烈日照而改用的，无形中代代相传，因而成了仁爱会修女的特征。不过到了1964年，为了配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通过的《修会革新法令》，她们放弃了那不合时代潮流的飞机型大帽子，改戴一般女修会的头纱。

凡是圣味增爵所见得到的任何痛苦患难，他没有不立即设法救助的，像是被判刑到皇家舰队船底去摇桨的罪犯、被回教徒的海盗俘掳又被卖到非洲去当奴隶的教友，他就派遣使会会士去救助他们，圣味增爵还为被战争蹂躏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募捐运动，组织并训练发放救济品的人员，这么一位具有组织天才的圣味增爵，真不愧是现代天主教福利会的先驱。

他还在街头设立炉灶，煮粥煮汤分给穷人，他还建立工厂，设立孤儿院、养老院、失业者的收容所，总之，各式各样的慈善救济工作，他都经手创办了，所以教宗良十三在1885年特别尊奉他为慈善事业的主保，而他也确实当之无愧。当圣味增爵以八十高龄在1660年去世时，遣使会士的足迹已经从法国抵达到义大利、波兰、爱尔兰，甚至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而他所栽培出来的许多主教、神父，仍然继承他的遗志，努力不懈。

追随圣味增爵致力于整顿神职界的健将，还有一个名叫欧利耶的神父，他也和当时的许多神父一样，把教会神职人员的身份当作是晋身的阶级，因此在当上神职人员的开头几年，他的生活很腐化，后来被天主圣宠感召以后，和白吕耳、圣味增爵走得很近，因此受到他们的熏陶和点化，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决心成为圣善的司铎，不再随波逐流。他也和白吕耳、

味增爵两人的看法一样，他认为如果要陶冶培育有志当神父的人，建立修道院实在是当务之急。而且想要培育出良好的神职新生代，就必须先要有优良的师资，于是欧利耶就在他培育的神父中，选拔出一批最优秀的，给以特殊的训练，让他们成为修道院的优良师资，这就是苏比斯修会创立的目的。很可惜欧利耶却以四十九岁的英年早逝，好在他去世时，苏比斯修会的神父已经在法国的好几个地方，管理修道院，还有的已经分派到加拿大，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在世界各国陶冶培育了无数优良的神父。

十七世纪，在法国还有一位宗教生活的伟大改革家圣若望欧德。圣若望欧德在 1601 年出生于诺曼第省，加入了白吕耳的祈祷会。他是一位民间的宣道员，率领着一批神父，布道一百一十几次，每次延长六个星期，有时还更久，吸引了大量听众，成效相当好。他也像圣味增爵一样，深深感到民众最需要的，莫过于圣善的司铎和牧者，因此，他脱离祈祷会，好为神父另立修会。他有两个目标，一是在修道院里栽培圣善的神职人员，一是进入民间去宣传主基督的福音。

2.1.3 其他修会的情形

前面所提到的创立修会的神职人员，都是生活在法国的教会，现在我们也提出几位其他国家的神父，为了整顿神职界，他们曾经贡献过心力。最著名的一位是德国的真福郝则思，他在德国为在俗神父创立了一种善会，神父住在一起度着团体的生活，可惜当他去世后，这个善会就宣告解体了。不过，他的精神仍然屹立不朽，即使在今天，各地方为了提高教区神职人员的素质所建立的善会，所有规章的蓝本，都是以真福郝则思当年所写的为基础。

当时的神职界，在各种不同的影响下，素质都比以前要高，而且也更忠于自己的职守，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不停地改革以后，仍然有不少俗不可耐的主教存在，他们之所以当选为主教，多半是由于国王的宠信，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圣德和功绩。好在德学兼优的主教和神父不乏其人，我只提出两位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最具影响力的神父，提供参考。一位名叫鲍须爱，另一位是费乃隆。他们两位都是法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伟大作家，而且都是热心出眾的主教。记得前面跟您提过，圣味增爵在十七世纪时，主办“星期二神修训话”，鲍须爱正是经常去听课的年轻神职人员，他因此而对司铎的职位获得了高尚的观念。鲍须爱生于 1627 年，死于 1704 年，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他的主日讲道词和对亡者的追悼词，都是教会修辞学上无与伦比的杰作。他的才华并不以此为限，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雄辩家，在当时的宗教问题论战上，他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还写了很多道理以及兼顾热心的福音默想圣书，许多阅读他著作的教友，在心田上都获得了丰富的灌溉，影响真的是至深且巨大。他和他所崇拜的圣奥斯定一样，从他那小小的梅奥克斯主教府，向普世教会发射出耶稣圣道的光芒。

费乃隆主教生于 1651 年，死于 1715 年，他的才华也是多采多姿。他在演讲、著作、教育、哲学、护教学和神学，都有卓越而又超群的贡献，他的精神豪迈而维新。很可惜的是，他倾向于圣教会所摒弃的“寂静主义”，和鲍须爱主教展开笔战，好在当他知道这种运动被教会所摒弃时，他就申明放弃支持寂静主义，表现了对教会完全的服从。

下面我们来看看各种修会在十七世纪的状况。创会历史比较悠久的修会，对革新宗教生活，也有不小功绩。方济会、道明会这两大托钵修会，对新时代的需要也有所革新和适应，特别是方济会的别支嘉布遣会发展得非常迅速。公元 1700 年，在一千八百座会院中，共有会士三万人，而在专务默观祈祷的隐修会中，不少已经逐渐松懈的会院，又恢复了原有的严谨生活，像熙笃会的郎赛院长，重振熙笃会的工作，劳苦功高。郎赛院长也曾经和当时的许多贵族少年一样，从小就由他的父亲决定了前途，献身于熙笃会，目的是为了获得许多隐修院中丰富的俸禄，连从来没有去视察过的修院也包括在内。起初，因为修院资产丰富，他的生活自然世俗化，到了 31 岁时，他忽然痛改前非，把以前那种贪求世俗快乐的生活，一变而为忏悔补赎的生活，把原本可以享受、属于院长的一切俸禄全部放弃，只留下特拉波一个

地方，而且规定了最严厉的规矩，长期守大斋，终身谢绝吃肉，每天操劳地工作，严守静默，于是这座不但会规废弛、会员人数逐渐减少的会院，忽然之间，人数大大增加起来，而且还成了其他许多会院的模范。他们一直到今天，仍然遵守着圣伯尔纳多所订定的最严厉的修会，这种严守会规的修士，在西方常常被称为特拉波会士，这个名称就是来自郎赛院长所领导、经过重整后的特拉波修院，而在中国则习惯称他们为苦修会会士或熙笃会会士。

2.1.4 教友的生活情形

谈过了神职界，也谈过了修会革新的情况，接着就谈谈十七世纪时，一般教友们的宗教生活，跟我们现在教友生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的社会在十七世纪时，相当具有宗教精神，比起中古世纪来，一点也不逊色，没有信仰的人，少之又少。宗教方面，到处表现出活力，维系着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一般主日和重要的教会节日一律停止工作。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为止，遵守教规的情形，从来没有像这段时期那样普遍，每个月领圣体的习惯也很普遍。当然，犯罪和恶名昭彰的人代代都有，并没有绝迹，连朝廷内也在所不免。但是，违反了天主的诫命和教规的人，却都会自认是罪人，痛改前非的动人榜样也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一旦回头以后，终身做着严厉的补赎，像前面我所介绍的郎赛院长，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十七世纪教友生活严肃，最显明的证据就是宗教性的书籍大量出版问世，法国从来没有出版过那么多的书，不只是教人如何祈祷、如何热心的书，就连教义和圣人的传记，也都种类繁多，即使连讲论高级神修和神恩的书，也编撰了不少，不但是大量出版，而且是普遍被人研究和阅览。此外，讲道人员所收获的成绩，也是当代教友生活严谨热诚的最好证明。宣讲、布道，成了这个时代显明的特色，每一个天主教国家，都有他们特别吸引民众的演讲家，像是葡萄牙耶稣会的未叶拉神父，他年轻时去巴西传教，成绩斐然，回到葡萄牙后，在本国布道，影响力也很大。而法国在这时期的许多讲道人员，还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像鲍须爱就很使教友惊羨，而耶稣会士布尔达鲁，按照当时人所下的评论，认为布尔达鲁更驾乎鲍须爱之上呢。他甚至一直连讲四个小时，听的人丝毫没有倦容，他能毅然大胆毫不客气地指斥时代的弊病，以及王公大臣贵族的错误，而不会因此得罪他们，惹祸上身。王公大臣贵族以及整个社会，都爱听他大声疾呼，提醒、唤起他们勿忘福音真理，这是今天社会所无法办到的。

公元1630年，在巴黎产生了一个名叫圣体会的协会型式的组织，渐渐地发展到法国各地，参加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个名为圣体会的组织，可以说是开今天“公教进行会”的先河，参加的人大多数是普通教友，不过也有少数的神父、修会会士，甚至主教，但是负责领导的，却是在俗的教友。这个协会的特点就是保持秘密，这未免使我们惊讶，为什么他们要保持秘密呢？原因是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担心政府会利用协会的力量来达成他们政治的目的。协会的会员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像是照顾病人、筹建医院、救济堕落的女子弃娼从良、劝化新教徒归正、协助神父传教等，他们以各种方式与邪恶的势力搏斗，可惜他们对救灵的工作，有时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在态度上失于检点，尤其是对誓反教徒缺乏应有的容忍，操之过急。至少他们没能完全公正无私，否则他们的收获会更丰富。

司铎及会士的活动，所以能那么有效果，就是因为受到这些教友的大量协助，假如没有圣体会帮忙，只靠着圣味增爵自己的力量，决不可能完成那么多、又那么有成效的慈善事业。他们对布道的经济协助很大，对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修道院出力也最多，可惜法王路易十四嫉妒圣体会的成就和它的影响力，竟然勒令解散圣体会，但是圣体会对救人灵魂和资助传教的精神，一直继续存在。

2.1.5 教育与圣心敬礼

第二个重点，介绍的是十七世纪教会的教育工作。教会参与教育工作，在十七世纪是相当普遍的事，往见会的修女，尤其是乌苏拉会的修女，以及其他各种新兴的修会，大力提倡女性教育。而在耶稣会及祈祷会所开设的许多公学内，儿童所接受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的中

学教育。在许多本堂区，本堂神父则为贫苦家庭的子女，开设免费学校，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师资，教学方法上比起各修会所创办的公学，要落后一些，于是在里姆地方，有一位名叫若翰撒来的富有神父，为了补救这些缺点，奋然兴起，他卖了他的一切财产，召集到一批有志教育平民子弟、自愿奉献牺牲的青年。他们为了能专心于教育事业，拒绝领受神品，甘心终身做一位没有品级的修士，这就是公教学校兄弟会的起源和宗旨。

若翰撒来不但是一位正牌的圣人，还是一位天才的教育家，应该称他是近代小学教育的创始人，一点也不为过。在他以前，老师对学生都采个别教授的方式，还有的是让学生自己去读，或者呢，委派一位比较优秀的学生去领导，用这样的方式，一位老师当然就无法教比较多的学生，而且进度缓慢，这正像中国九十或一百年前的私塾一样。

欧洲的儿童读拉丁文，一如我国早期的儿童读文言文，只会念，却完全不懂意思。若翰撒来果决地打破了传统，毅然地加以改革，他取消了拉丁课，先教他们学本国文字，再按他们的程度分班教授，使一位老师同时教一班学生。

在特殊的师资学校造就优良的师资，这项观念也是他首先发起的，因此，他也是初级师范教育的创始人，这种教学法很快地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就普遍地加以推行，若翰撒来对平民教育的改革，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但是在他有生之年，曾经遭受过不少敌视和反对，公教学校兄弟会的修士一再试行，有了绩效之后，也就没有人再能推翻了。随后他的修士散布在全球各地，终身专心于公教教育的工作，会员人数也一直不断增加。

十七世纪，有一项对灵修生活最重要的一大贡献，那就是尽力传扬敬礼耶稣圣心，这种借耶稣圣心在十字架上被长矛刺透的标志，唤起了信友对天主父和救主耶稣对人类的爱情。给以特别敬礼的思想，由来已久，中古时代的圣师，像圣文都拉和圣大亚尔伯，以及十六世纪的圣力尼削和圣方济·撒肋爵，都是耶稣圣心敬礼的先驱者，直到十七世纪，圣若望欧德才开始在神学上确立了基础，这以后才正式加以传扬。不过这种敬礼发展得很慢，直到往见会的圣女玛加利大在巴莱毛尼小城的会院里，蒙主耶稣亲自显现后，才开始快速推展。从1673年到1675年之间，耶稣曾经三次显现给她，向她展露自己的圣心，说出了以下这句沉痛的话，耶稣说：“看这颗心，如此地爱着世人。”耶稣还说，祂从世人所得到的回应，只是冷酷无情而已，祂把传扬敬礼耶稣圣心的使命，交给了圣女玛加利大。

圣女玛加利大曾经为了传扬耶稣圣心的敬礼，遭遇无数阻碍和反对，开始的时候，她的长上都把她当疯子看待，而且都不相信耶稣真的显现给她，她虽然生前为这事尽力，但在她去世之前，竟未能亲自看见这个敬礼的推展成果。正式公开敬礼耶稣圣心，是在教宗肋孟第十三于1765年时明令举行的，到了教宗碧岳第九在1856年推行至全球教会，圣女玛加利大本人则在1864年列入真福品，1920年列入圣品。

耶稣圣心的敬礼从十九世纪到今天才算普遍推行，耶稣圣心敬礼发起于十七世纪末叶杨森异端传播的时候，可说是适逢其时，因为杨森异端所认定传播的天主，竟然是一位铁面无情的大法官，而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才唤醒我们想起，天主对我们人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爱”人爱到底的爱情。

2.1.6 伽利略案

文艺复兴以后，正是好几位伟大的智慧之士奠定现代科学基础的时候，文明和学术已经不再是神职人员的专利品，这些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创始者，还都是深具信仰的人，因此，在十七世纪初，才会发生科学天才伽利略和教会冲突的不幸事件。伽利略在公元1564年出生于义大利的比萨，从小便表现出在科学方面的特殊天才，他1592年便在著名的帕度亚大学拥有讲座，他的思想敏锐，求知欲很强，对于观察宇宙万象尤其有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当时，一般人对天体运行，普遍还是遵照第二世纪时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古老学说，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固定不动，其他所有的星体都是绕着地球运行。他这种学说一直到十五世纪，都被人无条件地接受，不过，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

怀疑了，最著名的就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神父所提出来的天体运行学说。

哥白尼认为，地球和行星不但会自转，而且还绕着太阳运行，哥白尼的学说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但是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学说，所以，哥白尼的学说在起初没有多少人相信，马丁路德和墨兰顿都剧烈攻击他。教宗克勒孟七世倒反而对他表示好感，以后的继任教宗，也从未指责过这项学说。伽利略开始时，也遵循着托勒密的学说，以后才改变看法，同情哥白尼。因为1609年，科学家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观察天象，他根据亲眼看见的事实，作为新学说的证明，之后，他来到罗马，受到破格优待，教宗、主教、贵族和官绅都愿听他解释宇宙天象的奇景，由此可见，如果他始终站在科学的立场，决不至于引起什么不愉快的问题。

但当有人攻击他反对圣经时，他竟擅自解释圣经，并且证明新学说和经过他自行解释的圣经是相符合的，这么一来，这事件就移到圣职部，也就是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在公元1616年宣布，处罚他所提出来的学说，因为伽利略说：“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地球在转动。”异端裁判所要求伽利略放弃他的学说，他答应了，并且保证一切照办。伽利略确实忠于他的诺言，但是到了1632年，他写的一本书《问答》出版问世，他在书中很明显地表达了拥护哥白尼的学说，于是，反对他的人又向异端裁判所控告他不遵守1616年所许下的诺言。伽利略为自己申辩说：“自从第一次受到谴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坚持哥白尼的思想。”1633年，异端裁判所宣判处罚伽利略，命令他跪地公开认罪，承认他思想有误，随即判处“监禁”。不过，事实上，裁判所并没有把他关在牢里，而是准许他住在罗马的朋友家里，以后又转移到佛罗伦斯附近他自己的别墅内。伽利略在那儿继续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忠实信守对宗教的义务，1642年，他在别墅中去世。

相传伽利略在听到判决后，用力跺脚，踩着地大喊：“可是地是在动啊！”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个传说是假的，现场目睹的人都证明，伽利略并没有这样做。时到今日，人人都了解到伽利略的学说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承认判决伽利略事件的法官欠缺明智，想从圣经中寻找出科学的证据，因此铸成大错，毕竟圣经不是要教导人类科学知识，圣经所要教导的，是伦理道德和宗教真理。

当时的神学家摒弃伽利略学说，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误以为他的学说和圣经里面的几处文意相抵触，这是当时神学家的大错，他们太以辞害义了。实际上，圣经的作者并无意解释宇宙天象，他们只是从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就外表的现象，以人的普通说法，传达人人能懂的道理而已，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是说：“日出于东方，日落于西方。”并没有任何人会指责这种说法不合天文学的原理，其实这只是一般人普通说话的方式而已。从物理学参考系的观点来看，以我们自己作为参考系，自然太阳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所以这也不是什么错误。

伽利略事件不能归咎于教会“不能错误”的问题，而是审案法官的“责任问题”。关系到教会“不能错误”的，只有教宗本人或是大公会议所宣布的某端道理为信条时，而且是有意要命令所有信友都应该信仰时，才谈得上“不能错误”。而裁判伽利略的命令和处罚，是从圣职部异端裁判所发出的，它只是教廷里的一个部院，部院的命令虽然经过教宗批准，但无权享有教宗那“不能错误”的特权与特恩。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明白。因此，异端裁判所的判决也必然会出现错误，我们无法逃避。

2.1.7 笛卡尔与巴斯噶

我们探讨了十七世纪时教友的传教工作、教会对青年学子的教育工作、对耶稣圣心的敬礼，以及伽利略事件。下面的内容，要谈谈笛卡尔和巴斯噶两位著名学者对基督信仰、对教会的贡献，还有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教会所面对的杨森异端，我要为您讲述整个杨森异端的来龙去脉。

我们已经谈到教会的信仰在十七世纪时，已经普及于西方，但是还是有一小撮人怀疑天主的存在和人灵的不死不灭，这些怀疑的谬论，引起了各位的惊骇，因此从十七世纪初叶起，

便出现了大批护教著作，其中大部分到今天已经湮没不存了，不过，有两位众所周知的伟大思想家，虽然用的方式不同，却对保障信仰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两位思想家，一位是笛卡儿，另外一位是巴斯噶。

举世都公认笛卡儿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生于 1596 年，死于 1650 年，为近代哲学的开路先锋。在他的著作中，最著名而且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他的著作“方法论”。笛卡儿的“方法论”是在已擢升为枢机的白吕耳敦促下，为了驳斥怀疑派、并证明天主存在而写的，笛卡儿为了使他的理论能够颠扑不破，所使用的方法是先大胆怀疑一切，然后小心求证，以便消除成见。他愿意以个人的努力，来重建一切体系，如果不是完全显明、完全清晰的，都一概不被肯定，笛卡儿说：“怀疑，在明显的事实之前是不能存在的。”“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儿的格言。

笛卡儿是一位很虔诚的教友，他一心愿意卫护信仰和教会，他一想到自己能建立比几何证明还显明的论证，来证明天主的实有，他就感到非常欣慰。但是，他的学说对宗教的护卫，却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效果。笛卡儿所证明的实有的天主，固然是哲学家和学者所承认的天主，但是他一直无法证明天主是否慈善。天主为了爱而降尊降贵，成了我们人类的一份子，这项奥迹他就没有办法提出证明。笛卡儿这种只求清晰和绝对明显的理论，一旦遇到奥迹和超自然的问题，也就碰壁了。笛卡儿虽然一再谦虚地说，启示的真理不在理智的范围以内，但是他的哲学既不给传统留下余地，最后必然是导致不信任信德的真理，这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接着，我们来谈谈巴斯噶，他生于 1623 年，死于 1662 年。巴斯噶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又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他还是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和卓越的作家，他在十二岁时，便已经自己了悟、解析了几何定理，他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架计算机的发明者。巴斯噶年轻时的生活相当浮华，回头以后退隐到王港地方的一座修道院，专心致力于思考自己和他人“永远”的大事。他当时计划编一大部替天主教辩护的书，但是却因为体弱多病，在三十九岁短命去世，而未能完成编写这部巨著的心愿。在他死后，有人把他那些零篇散稿汇集起来付印成书，取名为“思想”。从这本书虽然无法了解他思想的全部面貌，但是，仍然能够窥见他思想的崇高，而且能触及人类心灵的最深处。

否认天主存在的自由思想者和怀疑一切的怀疑派，深深刺激到巴斯噶，他悯恤这些人道德的堕落，以及部分教友的冷淡，于是便想说服自由思想者和怀疑派的人能从疑云中出来，也希望能使那些不按照福音生活的教友，冲破冷漠，踏上热心虔敬的路途。巴斯噶没有采用笛卡儿那种抽象的理论，对付缺乏信心的自由派和漠不关心的冷淡教友，因为他知道，抽象的理论对他们没有用，无法取信于他们，更何况教友所应当信奉的天主，也不能像几何定理那样证明就成的。因此，巴斯噶从人的本身出发，先使人能认清自己的微不足道，了解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同时，他使人认清在自身的可怜和极深的堕落中，还潜藏着一种伟大的神秘，也就是说，人虽然是如此虚无渺小，但是，人却是按照全能天主的肖像所创造的。他要人面对着天主的问题，他向人证明，对这样的问题，谁也不能漠不关心，必须得表明态度，或是皈依天主，或是反对天主。所以，巴斯噶先是激发出人在良心上的不安，使人不得不向往天主，因为，唯有天主才能赐给人心灵的真平安；接着，他再进而证明天主教的确是毫无疑问的真宗教，因为，在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中，只有基督耶稣能为人类解开人类心灵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罪人本身的可怜和他被救赎后的伟大。自从原祖堕落以后，人类就患了重病，无法自救，需要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替我们赎罪，也只有耶稣能治愈并且拯救人类。巴斯噶的书所以令人折服，是因为他不像笛卡儿那样，只靠理智的推论，巴斯噶是以整体的、完整的人来立论，理智、意志、情感三者都包括在内，他以学者和诗人的笔法，以感人的词句，直扣人心。巴斯噶所写的这本取名为《思想》的书，为天主教的护教学开辟了新的园地。十七世纪的神学家，对纯粹抽象的问题，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么有兴趣，也没有留下像圣多玛斯那样的《神学纲要》之类的综合性著作。但是在另一方面，则有很多重要的贡献，那就

是他们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教会的起源和教父学。在法国，有一个本笃会的支派，名叫“圣毛禄斯会”，在这些学术研究的工作上大放异彩。一位名叫马比庸的修士，以及其他本笃会士、祈祷会士、耶稣会士等，都与他竞相努力，为近代的历史批评学，建立了稳固的基础。有一批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在鲍郎神父领导下，也把有关圣人传记的一切文件公诸于世，这样一来，就把许多污蔑历史的不可靠传说，一扫而空。这一批人被称做鲍郎派，直到今天都还有他们的继承人，担任着这件伟大的工作。

2.2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宗教纷扰

2.2.1 杨森异端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在宗教方面出现了纷扰、消沉、黑暗的一面。十七世纪上半期，教会的革新正在进行，到了1660年左右，革新逐渐显露出微弱的现象，追究原因，是因为教会内部产生了很多纷扰，像杨森异端、法兰西主义、寂静运动等等，众说纷纭，使这世纪后半期的人心扰攘不安，但又和马丁·路德及喀尔文的改教有所不同。所幸，这些纷扰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分裂，只是浪费了教会一部分的生命力，也间接助长了无信仰的趋势。

下面就先介绍杨森异端。从新教派改教起，到以后的一百年期间，讨论圣宠和救灵问题的风气很盛，马丁·路德改教时候的情形就不再重复，喀尔文又掀起了“救灵是前生已经注定的了”问题，天主教的神学家不得不努力加深研讨。特力腾大公会议是这么裁定的：“功劳是天主的圣宠及人的自由意志共同的效果。”可是天主的圣宠和人的自由意志，要如何互相协调呢？这一点确实是不很容易明白，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道明会和耶稣会两个修会会士热烈争论的焦点，而且也已经涉及超乎人力的奥秘，更使得一般人无法明了。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巴由斯教授在十六世纪末，又重新掀起这个问题，对圣宠提出了新的解释，和喀尔文的说法非常接近，他们认为，谁进天堂、谁下地狱，天主早已有安排，而罗马教廷早在1567年和1579年时，曾两度判定这些说法为错谬，最后巴由斯服从了罗马。但是他的余毒却已经渗入了比利时的神学界，在巴由斯死后五十年，这种思想又在比利时伊普尔城主教杨森的作品中死灰复燃。杨森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名叫《奥斯定》的书，这本书是杨森死后两年出现的，杨森自己以为是圣奥斯定思想的发扬者，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圣奥斯定的几种意向加以夸大渲染，认为人类已经被原罪彻底败坏而无法救治了。

杨森说：“天主虽然赐给所有的人圣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对那些注定要得救的人，天主赐给他们不能抗拒的圣宠，对于其他不能得救的人，无论如何努力最后仍然必遭摒弃。”杨森的说法，听了也知道错在那儿了。我们应该是这么了解：“对天主的选择，我们不能置评，天主所拯救的，是出于纯粹的慈悲，祂所处罚的，是出于祂的至公至义，因为天主并不欠任何人什么！”不是吗？这种学说在宗教生活正盛正热诚的时候出现，也正是无论俗人或是会士，正全力反攻松弛的道德之际，因此，那些愈是渴望圣化自己的，便愈发地严行苦工了。杨森的学说一时风起云涌，信服的人还真不少，这些信服杨森的人更为严苛地厉行刻苦，信仰也变得好恐怖，天主摇身一变成了严厉的法官，而不是爱人的救主了。

这种学说很清楚地犯了两大错误，一方面，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陷天主于不仁不义，让人以为天主不愿意人人得救，救恩只给了一部分的人，耶稣也并非为救一切的人，而降生成人，受苦受难而死。圣教会自然大加讨伐这样的错误，教宗吴尔班八世就在公元1642年把《奥斯定》这本书列为禁书，严加禁止教友阅读。杨森在还没有公布他的著作以前，已经去世，他的思想是透过他的朋友沙西兰传布开来，沙西兰是法国的一位神父，他在为教友做神修指导时，散布着杨森的异端。

沙西兰说：“天主让我明白，教会早在五六百年开始就已经不存在了。”言外之意是说，

他相信自己是受天主的派遣，来拯救教会，他在王港修院找到了渗透他这种错谬思想最有利的场所。在王港，有一座属于熙笃会修女的隐修院，距离巴黎不远，这座隐修院也和其他的隐修院一样，曾有的热心虔敬，曾经一度衰颓，而在十七世纪初期，年龄只有十七岁的女院长安洁利奎阿诺德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的严谨规则，有些神父及一些号称独修者的热心教友，就被这种热心的气氛所吸引，便到这所隐修院附近觅得住处定居下来，而且还办了一座学校，显示出当时教友生活的复兴。可惜，这种慷慨行为不久便染上了杨森异端的毒素，而王港隐修院也成了异端的温床。

数学、哲学大师笛卡儿、物理学大师巴斯噶两位伟大的学者对宗教信仰有着自己的贡献，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杨森异端对教会、对信仰所造成的宗教纷扰，杨森的朋友沙西兰替死去的杨森传布他的异端思想，而在巴黎附近的王港，有座熙笃会修女的隐修院，成了杨森异端的温床。下面，接着介绍杨森异端的继续传播情形。

教宗吴尔班八世严禁杨森的书籍以后，王港的独修者起而替杨森辩护，其中有一位名叫安当·阿诺德的，正是修女院长安洁利·奎阿诺德的弟弟，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屡领圣体》的书，这本书的内容，却是叫教友避免经常领圣体，他要求教友每次领圣体以前，要有严格的准备和灵魂圣洁的必要，才可以领圣体。这样的论点固然是好，但是对于圣洁的要求，的确是非常难以达到的标准。安当阿诺德忘记了，圣体圣事并不是德行的报酬，而是预防罪过，增加精神力量的天粮，他矫枉过正地要求教友，先要有圣德，结果却使教友远离了圣德的源泉—耶稣基督。为杨森派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刻苦和谦逊的考验，甚至造成了王港的修女群中，有些人因为虚伪的谦逊，竟然不领临终圣体而死去。

纷争是愈演愈烈，而这时期，即使是世俗人对神学问题的兴趣也很浓厚，思想界形成了拥护和反对王港的两派，反对杨森派的人把杨森异端的主要思想，归纳成五个重点，呈给罗马教宗，教宗依诺森第十在1653年判定杨森的思想是异端，这么一来，杨森派再也没有回避的余地了，或者是承认错误，要不就被当成是异端。然而，他们的作风却不像马丁·路德，一旦被教会正式绝罚，就与教会决裂，背道而驰。杨森派的人认为，他们既然是为了整顿教会，就必须留在教会内，而不是与教会分裂。这一点是他们引以自负的，于是便拟定好策略，而且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说清楚了，也就是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上屈服，面对教宗的宣判时，则发表声明说：“反对我们的人所举出的五点理论，既然是异端，我们自然弃之惟恐不及，不过，在杨森的著作中，并没有那五点。”说实在的，在书中确实没有那么具体明显的词句，但是，那五点的确正是杨森的异端之所在。

杨森派请到了天才作家巴斯噶替他们辩护，因为巴斯噶有一个妹妹也在王港的隐修院，而且这位妹妹对杨森的学说中毒很深，巴斯噶不明究里，在被玩弄和被利用的情形下，以他那生花妙笔，为他们辩护。巴斯噶知道，最好的战术不是自卫，而是采取攻势，他认为杨森异端最大的劲敌就是耶稣会士，因为耶稣会士在任何一点上，都是和杨森派针锋相对。耶稣会士不但根据特力腾大公会议的精神，劝教友勤领圣体，而且对杨森思想的每一点都坚持反对。杨森派说，人性已经被原罪彻底破坏了，耶稣会士却坚持，原罪并没有解除人的自由意志和克胜仇敌的力量。耶稣会的神学家针对杨森派的严酷主义，在为听告解司铎所写的书内，除了天主的诫命和教会的规矩外，尽力不给行告解的教友增加其他的责任。可能有些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太为宽松了一些，因此落人把柄，被讥讽成为“道德观念宽松”。巴斯噶特别在他写给致省内某人的信函内大事攻击，他所写的这些偏激而欠公正的篇章，满纸的冷嘲热讽，用意就是要使人讥笑耶稣会士，转而同情杨森派。但是，到后来巴斯噶对他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心存悔恨，觉悟到这一批人以玩弄的手段，利用他的才华，他绝对没有意思要与教会决裂，并且在他临死以前与教会和好。

但是，巴斯噶无情的嘲讽所留下的伤害，却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因为从巴斯噶开始，常有人指控耶稣会士道德观念宽松。杨森派和法兰西主义派看到这种控告无法离间耶稣会和

教宗之间的紧密关系，于是又控告耶稣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批评耶稣会在英国是自由思想者，在南美洲的巴拉圭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和印度是偶像的崇拜者。杨森异端以后的历史，只是一连串的惩处，而他们总以伪装屈服和阳奉阴违的敷衍，戏剧性地反覆演变而已。

杨森派自以为拥有真理，只有他们真正了解教义，因此，当他们受到谴责时，便假意恭顺，不做任何辩论，但是，对自己的错误，始终不肯放弃。巴黎的总主教努力地要使王港的修女诚心悔改，但是终究是徒劳罔效，只得愤慨地说：“这群修女纯洁有如天使，但骄傲却有如魔鬼。”

公元 1667 年，登上教宗职位的教宗克勒孟九世，虽然因为秉性仁善，恢复了教会内的和平，也只是暂时使杨森异端偃旗息鼓而已，到十七世纪末期，祈祷会会士奎斯乃耳的著作《对新约圣经的道德反省》出版之后，纷争又死灰复燃，在他那虔诚默想福音经文的糖衣下，把杨森的异端又挑活起来。教宗克勒孟第十一在公元 1713 年，以《天主唯一圣子》的通谕，处罚了奎斯乃耳的学说，原本纷争可以收敛绝迹了，但是杨森派竟然向罗马呼吁，召开大公会议，重新唤起了十四世纪末西方大分裂时提倡的“大公会议高于教宗”的谬论，提出呼吁的人当中，还包括好几位主教。这次的纷争就几乎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才告平息。

甚至在宗教的纷争中，又扯上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不得不离开法国的杨森派领袖，又在杨森派发源地荷兰和比利时，找到了避难了。他们就在乌特勒支的主教那儿定居下来，那是一个自称为惟一真天主教的小教区，一直到今天，还仍然维持着裂教的态势。杨森派的教会一向人数不多，现在他们有三位主教，大概有一万多名教徒。

杨森异端的严重情形，我们不能只从分裂的教徒人数上来衡量，这些教会内部的纷扰前后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对教会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在杨森异端波及到的地区内，尤其是法国和荷兰、比利时，杨森异端的情绪感染到天主教家庭的思想相当地深，而它的余毒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初叶，以致造成教会的气氛敬畏多于爱德，对天主公义的惧怕，减低了对救主耶稣的慈爱而不敢多领圣体。此外，杨森派对教宗的宣判，一再阳奉阴违，无形中养成了桀敖不驯的情绪，而那些无尽无休的纷扰和争辩，在教会内也种下了纷争不睦的趋势，令教友痛心而令敌人称快。虽然杨森的信徒无心，实际上却助长了无神主义的繁衍和进展。

2.2.2 法兰西主义

下面不得不提到法国的法兰西主义。当一听到这名字，莫非这种主义源起于法兰西？是的，我们称之为法兰西主义，就是因为最早拥护这种主义的，就是法国神学家和法学家。什么是法兰西主义呢？这也不难明白，顾名思义，就是对教会的行政、所有的企图、态度和思想的综合，目的在限制教宗的权力，不让教宗管理领导在某一国内的教会事件。因为这种思潮起源于法国，我们就统称这种思潮为法兰西主义。

其实，法兰西主义由来已久，并不是十七世纪中叶的产品，早在十二世纪末年，法王美男子菲力和教宗鲍尼法斯一世之间的冲突，已经露出端倪，这种思想究其根本，则是起源于“大公会议高于教宗”的谬论。很不幸，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的西方大分裂和当时所召开的康斯坦士会议，就已经形成。法国的君王和政府的官吏，在对抗教宗的权力时，自称是根据古老的惯例和历代教宗所赋予的特权，其实是专制的君主们一种很自然的倾向，他们很难容忍外来的势力，干涉他国内的行政，把教宗对他国内教会事务的管理，看作是越俎代庖，尤其是触及国家现世利益时，更加明显而剧烈。何况是像路易十四那样的一位彻底极端的独裁君主，从 1643 年登上王位，到他亲自亲政，最后到 1715 年去世，跨越了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在位七十二年之久，国运昌隆，不断开疆拓土，提倡文学艺术，几乎只有中国的康熙乾隆可与之相比。法国在他的统治之下，可以说是一个极盛时代，达到了最高峰，足以雄视全球。

路易十四原本是一位很诚挚的教友，对王位也有高尚的理想，以天主在世的代表为己任，负有使命，要保护教会和信仰，以及在他本国内维持真正的宗教秩序。而这种观念原本就是

热心教友应该有的态度，但是一旦被误解，便会产生傲慢，如果本身英明能干，雄才大略，就更会因为唯我独尊而变得傲慢，再把国家的利益和本身的面子光荣混为一谈时，必定加倍地专制独裁，像路易十四这么一位国君，那能逃避这种诱惑呢！他的口头禅就是“朕即国家”，他所认同的国家，也包括教会在内，路易认为教宗应该少干涉法国教会的事，然而他自己却常想干涉教会，再加上在他左右的王公大臣对法兰西主义的思想，更是朝朝暮暮、心心念念，路易十四的不正确、不公正倾向，也就更加危险了。所以他与教宗之间的冲突势必在所难免了，潜伏已久的冲突，便在 1673 年为了一件看来次要的小事，猛烈地爆发了，路易十四借机处心积虑地刻意小题大做一番。

根据古老的惯例，当国内某教区的主教出缺时，法国国王享有治理教区的特权，路易十四想要把这种特权扩展到全法国所有的教区，而当时的教宗依诺森十一世，为人特别严厉不说，对教会的权力绝对不肯让步。他眼看路易十四擅权，是在神权范围内滥用世俗权力，曾经三次谕令路易十四，要他放弃滥用职权的行为，路易十四认为有损他的颜面，大为激怒，于是他在 1681 年召集法国的神职人员大会，做他的后盾。

鲍须爱主教受了当代思想影响，对法国教区久已享有的特权也非常重视，但是他同时也深爱教会和教宗，一直想努力和平解决这件冲突。他发表美丽的说辞，谈教会统一，也设法保全教宗的权力，法王路易十四对这样的说辞大表不满，要求鲍须爱重新草拟一份宣言，清楚地申明法兰西主义的思想。鲍须爱一再考虑之后，终于撰写了一份历史性文件，后来这份文件被称为《四点声明》，他在文件中把法兰西主义的思想顺序排列出来：第一点，教宗无权过问国家的俗事，第二点，对于神灵方面的事情，应该按照“康斯坦士”会议的规定来处理，因为大公会议的权力高于教宗，第三点，教宗的权力只能在符合大公会议的条文与法国教会的惯例下施行，第四点，教宗的决定只在全教会同意以后，才能成为不能更改的宪章。路易十四下令在全法国的修道院宣读讲授这项声明。路易十四和教宗依诺森十一世之间的冲突，将如何解决呢？

法兰西主义思想的抬头，形成了法王路易十四与教宗依诺森第十一两强之间，一为政权，一为神权，各不相让，引发严重冲突。路易十四召集法国神职人员召开大会，而且还命令鲍须爱主教，撰写了充满火药味和法兰西主义的四点声明。路易十四更通令法国的修道院，把四点声明列入教材。至于四点声明的内容不再重复，下面就来看看，两位强人如何处理这次的冲突。

冲突是法王路易十四引爆的，虽然那个时候教宗个人“不能错误”的道理，还没有定为信条，但是这四点声明显然的，是和天主教传统正面冲突，有一部分法国神职人员提出抗议，教宗依诺森十一世更不甘示弱，发表声明，宣告法王路易十四的四点声明无效，拥护四点声明的主教候选人，他也拒绝给予合法神权。法王虽然具有推荐主教候选人的权力，却坚决指定，教宗非得同意任命法王所选择的候选人不可，当然这些候选人都拥护四点声明。法王和教宗，两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连教宗派人秘密送到的绝罚“开除教籍”都无效。这种冲突彼此僵持了十一年之久，到最后，这位欧洲权倾一时的法王路易十四，终于在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下让了步。其实认真说来，法国路易十四，尤其是法国的神职界和法国的教友，都无意与罗马分裂，这场冲突就这样圆满地落幕。1956 年，教宗碧岳十二世将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列入真福品。

然而，法兰西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灭，在整个十八世纪的一百年间，在法国他们和杨森派联合，共同抵制教宗的权力，在其他欧洲国家，也借用其他名义活动，一直到十九世纪，第一届梵蒂冈会议时，还没有绝迹。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因而隆重裁定：教宗以教会领袖的资格，对信仰所下的裁决，不需要全教会同意，这便是所谓的“不能错误”，法兰西主兰才成历史名词。

2.2.3 寂静主义

正当法王和教宗互相争执得最为激烈的时候，教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谬论，我们称之为“寂静运动”，这种运动究竟不像杨森异端和法兰西主义那么难缠，想要真正了解寂静运动，便该记得在十七世纪的修会会士和一般教友，对宗教生活热心虔诚的情形，结果是有许多热心的人在祈祷的生活上达到了高超的境界，获得了神秘经验的恩宠，获得这种恩宠的人，享受着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因此产生了一种完全寂静的情绪，这种神秘的境界，原本是天主白白赏赐的一种恩典，升到这种经验的人需要有经验的神师领导，免得落入自欺欺人的幻想。那个时候，有不少神修者描写神秘的途径，其中也有人走火入魔，误入了歧途，错谬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弥厄尔毛利诺。

弥厄尔毛利诺生于 1640 年，死于 1696 年，原是一位西班牙籍的神父，生活在罗马，担任好多人的神师，1675 年，他写了一本神修指南，用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认为，祈祷的工夫应该迅速进入默观对越的境界，人的灵魂在这种境界中，被天主的纯洁和圣爱所吞噬，人一达到这种完美的境界，就不必去焦虑肉体上所经历的一切了，外表的行为那怕是不洁的，都已经不关重要，在这样境界中的人灵，已经不能犯罪，只是寂静地同天主结合而已，丝毫不用挂心未来的事，升天堂或是下地狱，都无关重要，只有天主为他才算数。这种理论，能导致不道德的行为，自然遭到教会处罚和禁止。1687 年，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宣判了对寂静运动应有的处罚。

当弥厄尔毛利诺在罗马遭到处罚时，法国的居庸太太已深被他的思想传染，她是一位相当富有的寡妇，温柔动人，精神上不太正常。她对自己的意念深信不疑，认定自己负有改造世界的使命。她得到弥厄尔毛利诺的思想以后，心火很大，她写了好些东西，宣传这种思想。由于她交游广泛，赢得许多贵族妇女信赖，相信了这种新思想，连费乃隆主教也相信了她。不过，弥厄尔毛利诺所说的那种不良结果，居庸太太绝不接受，费乃隆主教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费乃隆主教和居庸太太所宣传的，只能称为半寂静运动。他们相当信服一种看法，那就是“人爱天主的心如果十分纯洁，就可以漠不关心自己的得救问题”，居庸太太的著作对誓反教的某些派别产生了影响，有人把她的著作译成了中文。

也有人在巴黎总主教面前控告居庸太太的著作有谬误思想，主教就把她的著作交给神学委员会审查。经过神学委员会分辨的结果，确切地认定了神秘经验的真正意义。费乃隆起而为居庸太太辩护，因而和他的老师兼好友鲍须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鲍须爱恰巧是神学委员会的一员。他们两人的笔战不但有伤爱德，还引起许多人看好戏，费乃隆主教的著作最后遭到罗马谴责，费乃隆最令人佩服的是，当他遭到罗马谴责以后，所表现的服从态度。他在准备对民众演讲的时候，接到罗马谴责他的消息，他立刻放弃了所准备的演讲题，转而发表声明，淋漓尽致地表达对教宗应有的服从。所谓的寂静运动，也就由这次服从而宣告结束，可惜的是，教会处罚了这种虚伪的神秘主义，反而遭到不幸的后果，因为，真正的神秘主义被弄得长久混淆不清，难以分辨。

2.2.4 天主教与新教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的后期到十七世纪初斯所做的整顿工作，虽然很繁盛，而且也收到很好的成效，但是终究无法恢复信仰的一致，新兴教派虽然在西班牙和义大利无法扎根而告绝迹，但是在德国、瑞士、荷兰以及斯堪地纳维亚和大不列颠等地，则成了主流，天主教徒反倒成了弱势团体。圣教会非常关心这样的分裂，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圣教会如何努力，设法面对新兴教派，以挽救分裂的悲剧。怎么样才能修好，历代已有许多人试行过不同的方法，有的用说服，有的用强制，分裂的双方也都有过慷慨大方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大公运动的先驱者。

我们先来看看采用说服方式的人，有那些人呢？他们是怎么做的？采用说服方式之中，罗马方面最爱用的是以天主教的真理，说服新兴教派，设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在俗的或是在会的神职人员，尤其是研究圣经学的作家，或同新兴教派的牧师据理力争，或者写成书籍反

驳他们由圣经或是圣传所摘取出来的不正确的、断章取义的引证，向他们陈明天主教的道理所依据的理论，当时在研究神学和历史上所做的真正复兴，也正好为教会本身获取到更大的好处。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我只提出鲍须爱这位伟大的作家作为代表，因为新兴教派引发的分裂、信仰的不一致等问题，正是他的首要工作。在这里我介绍他的两本名著，一为《天主教义的说明》，这本书使得不少新兴教派的拥护者，迷途知返，重回圣教会的怀抱，第二本是《誓反教的千变万化》，在书中他指出天主教在信仰上如何一致不变，有着他的至一和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特性，而誓反教在我们中国则称为基督教，却从天主教分裂出去以后，又分裂为无数的教派。

至于采用强制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由谁，在那些地方，如何强制呢？在法国，天主教原本就是国王和绝大多数百姓所共同信奉的宗教，南特诏书准许誓反教的各个新兴教派享有信仰的自由，这在以“属谁管辖，就得信奉他所信的宗教”做为原则的欧洲而言，算是一个例外。路易十四一方面为了政治上的考量，另一方面因着他个人的坚实信仰，所以急着要在法国结束信仰的分歧，但是他认为，只以神学和历史来做为号召的说服方式，仍嫌不足，为了使在法国的新教徒皈依天主教，醒悟反正，非得利用强制的手段不可，他首先认真地按南特诏书的规定执行，迫令异教徒迁离法国，后来，因为他所发动的战争获得了胜利，态度也就傲慢起来，对新教徒采取一连串措施，像异教徒不得担任公职，归正重返天主教的，就给予优待，到后来，竟开始虐待异教徒。

在法国南部新教徒最多，地方官吏更变本加厉地执行路易十四的政策，他们以最残酷的手段压制异教徒，为了邀功而向路易十四报告说，异教徒都已经集体归正了，这种强制性的改教有什么价值呢？又能持续多久呢？不明真像的路易十四，竟误信异教徒在法国境内所剩无几，便仗恃他的权势，在 1685 年宣布废除南特诏书，重建法国信仰自由。在巴黎的人，曾经鼓掌称庆，欢迎废除南特诏书，认为是天主教的胜利，其实只是自欺的幻想而已，信仰一致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新教徒多数逃到英国和北美洲去了，所剩下的也只是阳奉阴违。路易十四的这种强制政策，为法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不但埋下反抗的种子，也由于多数新教徒出走英国或北美洲，造成国内经济社会的大问题，因为外流的人才，大部分是专业的工匠，技术也外流，金钱财物也外流，这是路易十四始料未及的。

在英国的情形又如何呢？我们知道，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诏书的那一年，也正好是信天主教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二世即位之年，假如他能明智而平和地处理宗教问题，为天主教而言，必然会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结果。当时，英国国内也有宗教纷争，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就劝英王詹姆斯二世稍安勿躁，要以最大的明智，顾全大局，来处理包藏危机的宗教纷争，免得小不忍而乱了大谋。但法国路易十四则怂恿他对异教徒采取强制反击步骤，建立专制政权，可惜他竟然听信了路易十四，而没有听从教宗的意见，他想以严厉的手段来恢复天主教的信仰，反而使他大失民心，爆发了革命。英王詹姆斯二世弃国逃亡海外，天主教友又丧失了法律保障。

公元 1688 年，英国的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不但信奉天主教的亲王不得继承王位，天主教的教友也不能从事教育工作，不得担任公职，甚至连置产权和立遗嘱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神职人员不是遭到永远的监禁，就是逃亡海外。我们现在的人听到这种宗教纷争的后果，不禁会发出好多的问号，只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风气确实是如此。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宗教纷扰，其中包括法王路易十四抱持法兰西主义的思想，和教宗依诺森十一世之间冲突达十一年之久，终于因路易十四的明智，向教宗让步，但是法兰西主义的遗毒，却延续到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才告结束，寂静运动和半寂静运动的起源错误之处，和这运动最后的销声匿迹。最后一部分跟您谈的是改教运动以后，看到教会的分裂，教廷也好，国王也好，都想到要恢复信仰一致，他们以说服的方式或是强制的方式，希望达到这个目标，推动的结果以说服的方式稍见成效，而法国的路易十四、英国的詹姆斯二

世，采取强制的方式，在法国虽然没有引发革命，但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还造成国内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危机。在英国引爆了革命，推翻了詹姆斯二世，以《权利法案》的法令限制了教会发展，教友也受到相当不公平的待遇，下面，再来看看德国的情形如何。

德国经过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后，又遭逢 1618 到 1648 年三十年长期战争的痛苦，战后又呈现了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的状况，三十年战争，原本就不是纯宗教性的，战到后来却变成纯政治性的，对打的双方，德、法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争夺欧洲的霸权地位而已。历任的教宗努力地周旋，想使双方能和平解决，经过四年努力磋商之后，终于在 1648 年签订了《西发里亚条约》，使得德国前后扰攘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政治和宗教局势，才算平稳下来。政治方面，在德国境内形成了三百四十三个独立的小邦，神圣罗马帝国只是拥有虚名而已。在宗教方面，也确定了公元 1555 年奥格斯堡条约所签立的原则，德国人应该追随各国小邦的君主所信奉的宗教，西发里亚条约仍然承认，君主有改革宗教的权力，这样的结果形成了各小邦拼凑而成的联邦，每一个小邦国的诸侯，都在实行宗教独裁。

当时的教宗克勒孟十世坚决不肯承认这些不道德的反人性反宗教原则，也反对条约当中不征询教会同意就擅自加上处置主教和修院财产的条文，教宗的反对只是徒然，因为事前就不顾教宗的希望，事后也就更不理睬他的抗议了。西发里亚条约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结束的里程碑，在条约以前的时代，教会能借她的元首教宗的声望，指挥全欧公共生活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欧洲各国的国君自己处理自己的国是，已经不在乎教会的意愿，奉教国家的国王也逐渐地把教会当做是一个国家政府内的机构了。政治人员算是正式抛弃了奉教的观念，在这条约以前，不论各国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如何不同，还都以“隶属于基督的教会”这样的信念，靠着同一信仰、同一教廷的精神锁链彼此联系在一起。条约以后，欧洲成为一群大大小小的国家，各自被他所属的专制君主统治着，本国的利益便是各国最高的法律，在这种局势之下，国与国间，如果有了争执，便只有兵戎相见，靠战争的胜负来解决问题了。

欧洲宗教和政治的一致，已经完全瓦解，面对这种“信奉同一个神、同一个耶稣、却彼此分裂”的怪异现象，无论天主教或新教的各教派，都曾有一些心胸宽大的人，非常地痛心于这样分裂的怪异形势。在德国，十七世纪的后半期，环境已经有利于彼此的接近，路德派那种初期的狂热已经减低，不少王侯的家庭里，也有不少又返回了天主教，有利于合一的思想已经开始在散布着，非正式的接触也正在建立，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下，德国誓反教中一个名叫莱布尼兹的学者，起来鼓吹合一。他学问丰富，在文学和科学、神学和历史、哲学和法律上，都有卓越的成就，莱布尼兹旅行全欧，奔走呼号，切望着彼此能合一，也幻想着重建欧洲和政治统一，莱布尼兹正是担任和解角色的适当人选，他与天主教的各层人物都有交往，尤其是和法国的鲍须爱，他们两人之间，信件往返，互相讨论了十年之久。这两位卓越的人物，抱着合一和寻求真理的精神，令当时在他们周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的人，看到他们如此诚心寻求可能使双方教会言归于好的方法，都深觉感动。

可惜最后，因为两人对教会的观念大相迳庭，无法调合，双方教会合一的努力终告失败。这次失败使得两个破裂的教会，长期的和平谈判也宣告结束，虽然仍然有人想在这方面努力，也都只不过是小小的试探而已，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举动，只有等到十九世纪末叶，大公运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再开始双方教会合一的可能。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对威胁一切启示宗教的新敌人，还能组成共同阵线，一致对付新的敌人，也就是无信仰的怀疑派。因为无信仰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已经逐渐侵入基督宗教的知识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齐来探讨，教会在十八世纪的情形。

2.3 教会在十八世纪的情形

2.3.1 十八世纪概况

西方世界在十八世纪起了重大变化，政治方面，原本只占次要角色的国家，如今已经跻身于强国之林，例如俄罗斯帝国在彼得大帝和凯瑟琳大帝两位开明君主的经营下，国势逐渐强盛，普鲁士在腓特烈二世时代崛起，英吉利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在印度洋和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洲取得了广大的殖民地，不久之后，北美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获胜，波兰却遭到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强的瓜分，从独立国中除了名。

从教会历史的观念来看，十八世纪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在内部酝酿着动荡不安，远比这些外在的成就更大，十八世纪的几次大型战争，其实更好说是思想战，人类对世界产生了新的观念，想把这些新观念建筑在科学上，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怀着过分的雄心，妄想着要认清一切神秘，明白一切，不分天主教或各种新教教派的整个基督宗教，在知识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把宗教当做是人智未开时所逐渐孕育形成的古老神话，不值得继续重视信仰。有些知识份子甚至相信，人的智慧可以无休止地进步，科学万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人性是完美无缺的，已经被压抑太久，应该让它自由发展一切的本能。西方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幻想着可以走向人间的天堂，西方的社会便向着法国大革命逼近，目的是想要改造整个社会的旧秩序。

在十八世纪中，教宗的权威已经低落，奉教的各国君主正想要摆脱教宗对他们的影响力，加强自己对本国教会的控制和管理，于是便对耶稣会，施加猛烈的攻击，在自己国内要排除耶稣会，更强迫教宗要解散耶稣会，因为耶稣会是教宗最有力的支柱，所以想要摆脱教宗的影响力，就得先解散耶稣会不可。

虽然知识阶级的一部分堕落了，庆幸的是民众都还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而且天主也不断护卫着教会，教会在当代也圣人辈出，为了抵当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考验。教会还有足够的力量，不但没有被击倒，反而经过了这次锻炼，在俗世中更为纯洁坚强起来了。

2.3.2 无神论的蔓延

接着就一项一项的说明，首先谈的是无信仰的自由思想派。在十七世纪时，已经有人放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这些没有信仰的人，大部分都是行为不检点、我行我素之辈，不过总归是少数份子，舆论也都不支持他们，到了十八世纪，这股无信仰的逆流，已经逐渐渗透到知识界。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新兴教派的改教运动，科学的进步，唯理主义的哲学，都影响了知识界。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在天主教之外，创立了许多新的宗教派别，而他们又以圣经作为他们信仰和敬礼的唯一根据。

既然抛弃了天主教的信仰标准，当然也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信条教义和礼仪，于是信仰意识的力量非衰退不可，教会与教会互相对立，各自拥有各自的信徒，个个都自称自己的教派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真正教义，这些各不相同的教派，既然自称根据圣经，结果又都自相矛盾，怎么能使人信服？又要相信谁呢？早先的传统天主教被认为是启示的宗教，已经这么久了，而今忽然被抛弃，视为腐败，信条和道理被认为已经不纯正，并且还染上了种种迷信，怎么能不令人怀疑是否真的有一个天主启示的宗教呢？新兴教派攻击天主教，不就是间接地助长了无信仰的发展吗？

接着再谈谈唯理派的哲学是怎样地助长无信仰的发展。新兴的哲学的确对信仰的影响更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哲学家笛卡儿，他以怀疑来证明，一切知识实在是给唯理派铺好了路，他本人有很深的信仰，对天主教的信理虽然没有用怀疑的方式去证明，但是其他的人，就不愿意把任何事由怀疑当中剔除，因而就以为是，人的理智就是一切真理的来源。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坚持说，一切结论都要由理智这个前题中推出，也就是说，凡是超出人类理智的

都被这些哲学家看做是荒谬或武断，宗教事物中，只有理智能了解，才认为是可以相信的，但是像奇迹、预言，以及人类理智所无法领悟的奥迹，以及超性的启示等等，则被视为无稽之谈，对神明的敬礼，只是道德的行为，也只是合乎自然理智的生活，这些我们称为自然神教。其他的人就更加离谱了，洛克和休谟硬要说知识是由经验而来，因此所谓灵性的观念，尤其是有关天主的存在以及人类灵魂不死不灭的观念，都没有根据，我们就称抱持这种思想的人为无神论。

下面就一齐来探讨一下，为什么科学进步会导致无信仰气氛蔓延。我们知道，十七世纪时知识份子对宗教问题的兴趣很浓厚，他们很喜欢辩论有关圣宠或是讨论祈祷的境界，这一类的问题。及至到了十八世纪，知识份子的兴趣就转移到科学的发明上了，他们多愿意做物理学家或是自然科学家，十八世纪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有自己的物理实验室，所发表的科学性的作品，也有如雨后春笋。十七世纪前期的笛卡儿、伽利略、巴斯噶，以及十八世纪后期的牛顿、来布尼兹，发现了宇宙间的几种基本定律，他们的高足弟子，更扩大了人类知识的宝库，物理、化学、自然科学都有了长足进展，许多原先看作是神秘的现象，也都找到了合乎科学的解释。

从宗徒时代的初期教会，迤迤迂回地，艰难迈进了十八世纪，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中逐渐有一股无信仰的逆流传布，形成这股无信仰的逆流，原因很多，我们谈过，改教运动，唯理主义的哲学和科学的进步，这些原因又互为因果，造成知识份子逐渐迷失了自己，成了无信仰者，今天，我们就科学进步这一点来看，给信仰带来什么样的危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是著名的作家，他们发现了存在宇宙中的几种基本定律，不断的扩大了人类知识的宝库，物理、化学、天文、生物、数学等等自然科学都有长足的进展，甚至许多神秘的现象也都有了科学的解释，这些进展对人类带来那些负面的影响？以致导致了世道人心的败坏呢？原本，人类科学的进步，与宗教的信仰，是丝毫没有妨碍的，这些促使科学发展进步，建立近代科学基础的学者们，对宗教都有很深的信仰，他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发现，只不过是使他们更明白，物质世界的广大和管制物质世界的严格秩序，在精神上使他们对创造和宰制宇宙的天主，更加的惊奇赞叹祂的伟大而已。可惜的是，有一些人被学问迷醉了，只看宇宙自然是一种永久的机械，把它归之于不会紊乱的布置，有信仰的人相信是天主大能的安排，没有信仰的人只认为，宇宙是一连串盲目偶然组合的必然力量，这些无信仰的学者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会成为宇宙大自然的主人，科学的进步将使人类能控制一切，人类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如果人人都有学问，便能无限制的进步，只要能够普及教育就成。这正说明科学家，或者说知识份子对科学的过分信赖，以致两三百年来都无法矫正这种错误思想所给人类带来的危机，物质文明固然可以改善人类生活，但是如果不同时注意精神文明和道德生活，信仰生活的提升的话，人类绝对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平安，我们如今都很清楚科学并不是万能，并不是有了科学就可以不顾良心和道德，没有道德良心标准予以规范的科学物质文明，将会使人类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啊！环视国内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以来，犯罪律却节节升高，世道人心又何在？

好了，话已经扯远了，我们认为改教运动，唯理主义的哲学，科学的进步所引发的负面影响是形成了反信仰、反宗教的思想，这种思想，得力于十八世纪中的几个法国文学大师，路易十四治理的法兰西，也并不是单靠军事和政治的成就，而更得力于文学艺术的杰作，替法兰西获得了更高的威望，法国的语文成了欧洲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18世纪的法国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的作家控制了全欧洲的舆论，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不够缜密和完备，因而把思想界引上了反信仰的路上，这话怎么说呢？就让我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上，把他们的思想作个简单的介绍和说明。首先要介绍的是伏尔泰，他生于1694年4月死于1778年，他并不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也没有深度，他的思想是从英国的哲学家那儿吸取来的，属于自然神教和唯理主义。伏尔泰解释宇宙的秩

序，肯定并承认天主的存在，但是他认为这个天主离人很远，对人类的事情，采取了放任自然的态度不加干涉，他以相当讥讽的语气说过：“如果没有天主，我们也要发明一个”，因为为了管理百姓使能够俯首顺命，需要有一个宗教，这也就难怪马克思要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了。伏尔泰本人虽然没有宗教意识，但是却主张宗教自由、主张对冤狱的昭雪，这是他人格良好的一面，他最矛盾的是，以他这一个维护正义和自由的人，一触及宗教问题，便摆出一副铁面无情的态度，丝毫不能容忍，他对宗教恨之入骨，在他的作品中表达的一贯思想就是：“我们要粉碎这个耻辱！”这种口号也经常出现在他书信内，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用一切方法，即使是诬蔑说谎也在所不辞，那个所应当粉碎的耻辱，就是基督宗教。他称“基督宗教，是一棵结毒果的树，是一群骗徒围困傻子长达十七个世纪之久的一面罗网，是狂热的信徒们十四个世纪之久刺杀兄弟们的一把利刃。”他还把耶稣基督形容成“一个毫无价值，可轻可贱，没有才德，没有学问，没有住址的人。”基督宗教就是这样的一个耶稣的事业，伏尔泰向一切超性真理、一切启示的信仰宣战，他的武器就是他那支冷嘲热骂的笔，他在他的各类作品中，无论是教文、诗歌，或是戏剧历史的写作，或是文学批评、小说，随笔以及字典的注解中，对司铎、信条、信徒、圣经、福音等，经常是嘲笑，凡是与基督宗教有关系的一切，他常采取毁谤、戏弄和讥讽的态度，伏尔泰有着宣传者的非常技巧，善于运用巧妙诙谐的词句，编造幻想而恶毒的问答，假造故事，来从事破坏宗教、丑化宗教的工作，所以他的思想虽然很平凡甚至是虚伪，但是读起来觉得生动有力。他那广泛而肤浅的知识，锋利的言词，却对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连非常杰出的君主，都成了他的信徒，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曾留他在自己的王宫中，俄罗斯的女皇凯瑟琳为了推行改革，也和他有书信往返，他以许许多多的信函在整个欧洲散布他的思想，在他生命的最后 20 年，已经过着隐居的生活，凡是到凡尔赛宫晋谒法王著名之士，也必去拜见有名的伏尔泰，活到 84 岁，在他死前几个月返回巴黎时，民众欢迎他的情形，如同欢迎神一般，伏尔泰在当时欧洲的思想界、知识界真可以说是称王称霸。

接着我要介绍的是“百科全书派”。对于新思潮的传布，只靠伏尔泰一个人仍不足以扩张力量，一种集体著作的出版物，帮了伏尔泰的大忙，那就是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领导下所编辑的《百科全书》，那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大部头书，实际上却是 18 世纪自由思想的总合，是一部专为攻击基督宗教的机器，为首的几位编辑者，都是充满唯物和无神论的人，表面上对宗教很少直接攻击，但是巧妙地假装了无信仰思想，虽然不直接打击信仰和道德，却婉转的在读者的心灵中，散布着怀疑否认，和讥讽的种子，结果却是对教会的一切，制造出一种敌对的气氛，制造出一种不给超性保留一点余地的心情状况。百科全书的影响是很大的，它装潢美丽，插图丰富，所有的欧洲人，只要是对新思想有好奇心的人，都能以一睹为快，真是一种宣传“哲学家”思想最好的工具。不过，百科全书倒是一种很好的思想，只不过这些人利用了这种良好的思想去进行了不好的勾当。鉴于百科全书的思想，在近代教会内也出版了一部《天主教百科全书》。

就在这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位杰出的作家，他反对哲学家们那种枯燥无情的唯理主义，他就是扬名于西方的卢梭。公元 1712 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誓反教家庭，死于 1778 年，曾经当过天主教徒，不过只是外表上很肤浅的教徒，他具有慈悲而热烈的情肠，著作虽然不多，但是却比伏尔泰更诚恳也更深刻，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他说，人不但具有理智，而且也具有感情，有一种内心的本能推动他去相信天主，他写过：“良心！良心！那是神圣的本能，从天上来的声音，是无知而浅见的人稳妥的领导，良心是聪明而且自由的，是审办善恶不能错误的法官，使人能肖似天主，是你使它的本性高超，使他的行为有道德观念，如果没有良心，我感觉不出来，在我之内有什么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卢梭的哲学是极端乐观，他像孔孟一样相信人性本善，而是社会的生活弄得他说谎、粗暴、残虐，应该使人类恢复原有的平等，而在处处则可重建人性的自由，那么就可以恢复秩序，在世上也就要有完美和幸福。

福了。不过卢梭的这个基本观念和基督教的信仰是不能相合的，因为基督教的基础是救赎，对没有原罪，人的本性又是完美的世界，那么救赎还有什么用呢？这是第一点，如果宗教是完全建立在内心的感情上，那么启示还有什么用？这是第二点。不过，在这个充满了讥讽，而又否认一切的世代中，卢梭的作品，还有那么一点点宗教的气味，而且是在人心的深处，对天主还保存了那么一些思乡的情绪，因此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对他竟也恨之入骨，但是他的思想对基督教，仍然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不承认宗教的真正性质，他虽然和唯理主义不同，但他的宗教观仍是纯粹人本位的，他也未曾给超性留一些余地。

2.3.3 启蒙运动

两国的启蒙运动。在德国，唯理主义的思想，早已被伏尔泰传开，他认为只有一种宗教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自然宗教，18世纪反对基督教的思潮，找到“腓特烈”大帝作他们的庇护者，从1740年到1786年担任普鲁士的国王，他把“伏尔泰”和他的朋友接到他的宫廷里，予以款待，鼓励他们从事反基督教的斗争，在全德国组织了所谓的启蒙运动有些德国的新教神学家，不相信从圣经是天主的启示，只把圣经当作是一部由人撰写的书，教会也只不过是一间讲授道德的学校而已，文学家勒新公开宣传这种思想，在德国和奥地利，许多大学的教授们，也都染上了与教宗作对的思想及唯理主义的精神，最严重的是，竟连修道院的教授，也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

2.3.4 共济会

再介绍一种秘密组织，叫做“共济会”。无信仰主义就是得到共济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协助，如虎填翼，不久就传遍到整个西方世界。这个秘密会的最早起源，似乎总也没有人能弄得清楚，根据最普通的说法是这样的，共济会之名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古时代，当时指的是泥水匠们所组成的工会，人数很多，也很有影响力，国王和教宗都曾经赐给某些特权，以后他们也接纳泥水匠以外的人当他们的荣誉会员，在许多地方这些荣誉会员都个别的召开会议不和工会一齐开会，最后他们竟脱离泥水匠们的工会，组织了秘密会所，从事慈善救济、哲学、政治之类的活动，近代的共济会是在18世纪初叶起源于英国，创立人之一是从法国迁往英国的誓反教牧师的儿子，他创建了在伦敦的大会所，成为其他会所的鼻祖。共济会由英国传入欧洲大陆，18世纪后期，在欧美两洲都发展得快速而惊人。共济会怎么又转而与教会为敌了呢？

18世纪时，一股“无神主义”的思想，造成了一种“唯物”的无信仰的逆流，这种“唯理主义”的风潮逐渐的影响了教会，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改教运动。而18世纪的思想家，像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还有所谓的“百科全书派”、“共济会主义者”几乎控制了全欧洲的舆论。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已经把思想界领进了反信仰的错误途径上了。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伏尔泰、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的作者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再加上普鲁士的帝王腓特烈二世的支持，加以推波助澜，推动所谓的“启蒙运动”。因此，在德国、奥地利，许多大学的教授们，都染上了仇视教廷和教宗的思想，以及“唯理主义”的精神，连各大修道院的教师们，也受到了这股“无神主义”逆流的影响。而“无神主义”者，随后又获得了，所谓“共济会”的一个秘密组织的协助，因而使得这股逆流有如老虎添上了翅膀似的，在不久之后，就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

共济会这个秘密会的最早起源，一直都没有被人完全弄清楚过。按照一般的了解，共济会名称的由来，可以上溯到中古世纪，在当时，指的是泥水匠所组织的工会，人数庞大，也很有影响力。当时的国王和教宗，也都曾经赋予他们一些特殊的权利，以后，他们也招收泥水匠以外的人为“荣誉会员”。这些“荣誉会员”在好些个地方各别开会，到最后，这些“荣誉会员”与泥水匠彼此分离，组织了秘密会所，从事慈善救济、哲学研讨、更进一步，还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到了近代的“共济会”，是在18世纪的初叶产生于英国，创办人当中最活跃的是一个，从法国搬迁到英国的誓反教牧师的儿子，名叫戴匪贵利耶。他在伦敦成立了

大会所，我们可以称他是共济会所的鼻祖。共济会由英国传入欧洲大陆，到了 18 世纪的后半期，无论是在欧洲或是美洲大陆，都发展得快速而惊人。近代共济会秘密会所的成员，大多是贵族和士绅，也还没有与教会为敌，他们对天主，还保持着模糊的概念，把天主看成是“宇宙的大工程师”。他们创立会所的宗旨是为了友谊互助，对一切宗教，都采取容忍的态度。在法国，竟然连修会会士、主教、神父们当中也有人加入了这种秘密会，这对天主教而言，真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这些秘密会的聚会所，逐渐的被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所污染，大多数的人开始和教会对立为敌了。这种现象，在英语系的国家，像英国以及北美洲，他们的态度还算是比较温和的，而在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南美洲的国家，也已经相当普遍的与教会对立，唱着反调，而态度最尖锐的，要算是法国了。18 世纪的教宗们眼光都很明亮，很快的便都看出了这些秘密会对信仰的危机。于是在公元 1738 年时，教宗克勒孟十二世，就清楚的下令，禁止天主教各阶层加入这种秘密会。公元 1741 年，教宗本笃十四世更加重申这一道禁令。可惜，当时的人都把这道禁令当作耳边风，置若罔顾，因为这些教宗们的权威，在 18 世纪的欧美社会中，既使是在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中，已经大为低落了。

2.3.5 教宗权利低落

18 世纪的罗马教廷，事实上没有像其他的时代那样，有过不能称职的教宗，或者是在世俗的事情上过份的纠缠不清的教宗。继承伯多禄职位的教宗们各有千秋，我们追到朔十七世纪的末叶，教宗依诺森十一世时，他还能以教宗的声望与教廷的权威，迫使法王路易十四世放弃在罗马的特别治外权。但是，依诺森十一世去逝之后，接连的几位继承教宗职位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像亚历山大八世当选时，已经将近 80 岁，不到两年就去逝了，他的继承人依诺森十二世登基时，也已经是 72 岁了，他也是十七世纪的最后一位教宗。他使路易十四世废止了所谓《加利刚四项条款》；而且还颁布了《禁止使教廷声望受到损毁》的公告，因而使得偏袒亲戚们的这种不良的风气，至少在原则上是告终止了。教宗依诺森十二世去逝于 1700 年，正好是进入十八世纪的开始，正当在举行新的教宗选举时，在欧洲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欧洲的政局陷入一片复杂混乱的状况。新当选的教宗克勒孟十一世，由于他自己觉得，无法胜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教会现况，所以他迟迟不敢接受教宗职位的重责大任，最后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而事实上，他是完全无法把握当代的政治。那时候的欧洲君主们，所缔结的和平条约，也真的漠视了宗座和教会的尊严。随后的依诺森十三世，在历史上只留下稀少的痕迹。本笃十三世则热爱神学，他是一位圣善的人物，曾经在担任培瑞文图的总主教任内，有过良好的表现，但是他当选为教宗时，已经是 75 岁的高龄了，也因此，只有任由他的亲信摆布的份了。接替本笃十三世的是克勒孟十二世，他以热心著称，但是，登上伯多禄宝座时，已经是一位 78 岁的老人了，他既瞎又病，常是卧床不起，宗座似乎即将被欧洲政界给遗忘了。公元 1740 年，选出教宗本笃十四世，继承了伯多禄宗座之位。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教宗，知识相当渊博，精通教会法典，而且又好学深思，他那有关列品与教区会议的著作，一直到现代都还很受欢迎。教宗本笃十四世天性很和蔼，人也达观欢乐，也有着义大利学者，所具有的那种无伤大雅的虚荣心，他以坚强的意志力，运用他个人的声望和友善的态度，周旋于各国之间，来抑制在各国政府里，所酝酿着的那股对教廷的仇亲态度，和那站在政府的背后，不断的鼓吹着“唯理主义”的思想家们。他可真是煞费苦心，甚至还与伏尔泰有过礼貌上来往，他赢得了“唯理主义”者与非天主教的教外人士的赞扬，但是，在实质上，他所获得的却很少。好在本笃十四世他并没有在主要的事件上妥协，他的聪明才能，使得一个多世纪以来，使处于低潮的教宗声望提高了不少。随后，有克勒孟十三世、克勒孟十四世以及碧岳六世。碧岳六世一生酷爱艺术，他在 1799 年去逝时，18 世纪也接近了尾声。罗马教宗们对传教教人都很热心，常以超性的眼光来看事情，并且也努力的维持着信仰的完整，他们的圣德虽然都很高，但是在 18 世纪，也没有能够阻止教宗权威的低落。教宗们虽然是大声急呼，提醒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勿忘道德和正义的原则，不但是在人与人

之间，既使是在民族和民族之间，也应该要遵守道德和正义的原则。无可奈何的是，教宗们虽然谆谆告诫，但是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则是听者藐藐，社会各阶层对教宗的呼声，已经不再加以尊重，因此在 1772 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三国，难以隐藏侵略的野心，竟然将波兰这个国家予以瓜分时，教宗对这种破坏正义的暴行，竟然是无力阻止。

为了抗拒宗座谆谆告诫的道德和正义的原则，杨森派异端在法国，竟和法兰西主义者结成联盟，坚决的抵制教宗，一直到法国境内爆发了大革命为止，这些冲突和争斗，也大大的影响了德、奥两国。一个名叫洪太因的两国主教，在 1743 年出版了一本论文，取名为《论罗马教宗权限》。他把以前在“君士坦丁会议”所武断的、以及法兰西主义所标榜的论题，重新点燃起来，一再的声明，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宗，而是属于主教团。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再次的激起了反抗罗马宗座的情绪，甚至是在奉天主教的奥地利，皇帝若瑟二世竟然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不少僭越教会权力的笑剧，因而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若瑟主义”。下面就来谈谈，这位奥地利君主若瑟二世的一些做法。若瑟二世在 1765 年登基，死于 1790 年。他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怪人，他的心地并非不善，但是野心太强大，作风也不羁，他从小就受到伏尔泰和哲学家思想的影响，下定决心想要做一个在 18 世纪所流行“开明专制”的君王。他不顾民意，却想给人民谋福利，在宗教信仰方面，还算是热心虔诚，因此，他就以改革教会来自我期许。但是他又独断独行，并不去征询教宗的意见，这样的观点不是很矛盾吗？他一厢情愿的认为，只有国王才有在物质上或是在道德方面，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责任。在他看来，教会不过只是辅助他，完成这份责任的许多机构中的一个而已。所以他不但想在国家的事情上限制教宗的权力，他还想单独对教会的事情制定法律。因此，只要一碰到特殊的事件，他就严厉的禁止，奥地利的主教们去向罗马教宗请示。比方说，有关婚姻阻碍的豁免问题；他还严格的求主教们，没有政府的同意，不得公布教宗颁布的法令；他任意的划分主教们管辖的教区和本堂区；关闭了许多修道院；对那些专务清修的隐修院开刀，他认为他们的静观祈祷的生活，是一种无事的反省，对国家社会世道人心毫无用处；他也取缔各教区的修道院，代之以中央修道院。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他就曾经以嘲弄的口吻讥笑若瑟二世说：“我那位管理教堂的弟兄”。正因为他连教堂里的诸多细节，他都要插上一脚，予以干涉。他制订了每个教堂应该做多少台弥撒；应该唱那些圣歌；甚至教堂里的祭台上，应该点多少根蜡烛；更好的笑是，他竟然命令人死后不要用棺本，而应该改用布袋。贵为一国之君，竟然制定这样琐琐碎碎的条文和命令，真会让人禁不住的想笑。他所能表现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只属于国家的教会。

罗马教廷分裂，这也正是教宗碧岳六世所不能接受的，教宗决心亲自到维也纳，去和奥地利的皇帝若瑟二世展开争辩，向这位古怪的人物争回教会的权利。大家都劝阻教宗，但是教宗碧岳六世坚持非去不可。若瑟二世对教宗碧岳六世的造访，给予盛大的欢迎，也答应了教宗许多的事情，不过等教宗返回罗马后，一样也没照所答应去实行。对于若瑟二世的这种统治方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抗，四面响起了不满的怨声，可巧的是，他正在这个时候去逝，他的弟弟利奥保得继承了奥地利的王位，取消了他哥哥所颁布的许多琐碎又可笑的法令，但是，所谓“若瑟主义”的幽灵仍然在奥地利留存了很久。类以“若瑟主义”的观念，不但是在奥地利，而且是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里，像是西班牙、葡萄牙、义大利等，都可以见到君王反抗教宗权力的表现。他们不承认，教宗有直接向他们的属下、及各教区的主教发号施令的权力；也自称能直接任命主教。有些教宗，像本笃十四世为了爱好和平，对他们有很大的让步，君王们都得寸进尺，仍然继续对抗，尤其是当哲学家们赢得了君主的大臣们同样的看法时，公开的争斗也就开始了，他们先向耶稣会集中攻击。

2.3.6 耶稣会的会难

十八世纪的教会，面对当代的一股“无神主义”、反宗教思潮的逆流，造成了教宗权威的低落。在许多天主教国家里，都能察觉到所谓“若瑟主义”的幽灵，各国的君主也起而反

抗教宗的权力。教宗本笃十四世为了爱好和平，对这些君主们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君主们却得寸进尺，仍然继续反抗，甚至更演变成公开的争斗，他们先集中力量全力攻击耶稣会。为什么这些天主教国家的君主们，竟然会集中力量来攻击耶稣会呢？而耶稣会遭受到这么强大力量的攻击，他们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这整个儿的事件，对教会的影响又如何呢？

十八世纪时，欧洲各主要国家，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来对付攻击耶稣会呢？因为，这个在16世纪由西班牙籍的依纳爵·罗耀拉所创立的修会，两百年来，对教宗而言常常是最坚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成了各国反抗教宗权力的最大阻碍。对有意要取消教会权利的各国君主们，都必须先除掉耶稣会而后快。而十八世纪时候的耶稣会，大约1770年的前后，在欧洲，以及南北美洲、亚洲、非洲等传教区，会士们已经增加到了两万三千多人，这其中有司铎、有读书修士、有辅理修士还有半数的初学修士，大多数的会士是留居海外的传教士。他们共有800座会院、700间公教学校、还有将近300个传教站。耶稣会从创立以来，对教会有着卓越的贡献，对传教、布道、教育、宗教教义的争辩、维护教会的权益、或是对王侯贵族善尽听告解司铎的职责；时时处处忠于宗座和教廷，和不信的、反宗教的思想不断的斗争；以各种方式来维护教会的权益；攻斥异端邪说；热烈地维护着教宗的权利。这种忠于宗座的态度，也就必然的引起了与罗马教廷敌对的人，像法兰西派、杨森派、以及政府各级官员的仇恨。他们为了攻击和反对耶稣会，组成了利害相同的联合阵线，他们认为攻击耶稣会，就是打击天主教本身。1761年时伏尔泰就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一旦消灭了耶稣会，对‘耻辱’便算是站在有利的地位了！”他的意思是说，对粉碎消灭天主教，就会容易得多了。其实，外邦以为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化身，这个看法根本就是错的，因为耶稣会并没有一般人所想像的力量和影响力。天主教国王们的宫廷官吏们，利用种种的借口，把一些个人的错误，非常巧妙的全部归咎在耶稣会的身上，更有甚者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捏造许多的事情，为的只是要拚命的攻击耶稣会。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即使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各国政府首长与外交人员，都没有像在取消耶稣会的斗争中那样的忙碌过，而耶稣会也只不过是许多修会中的一个而已。

首先展开破坏耶稣会的是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是一个懦弱的人，已经变成了宰相朋巴尔的傀儡，而朋巴尔自己呢？却早已被哲学家们的学说所洗脑。朋巴尔用尽各种方法欺侮、羞辱耶稣会士，取消了耶稣会士们在宫廷内听告解讲道理的职务，寻找各种方式来污蔑耶稣会士。就像他以葡萄牙在巴西的南部，印地安人反对解散牧导村，而大动干戈的纷扰事件为借口，来诬告耶稣会士。正巧在1759年，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谁向国王的马车开了几枪，这正好给朋巴尔有机可乘，大加利用，于是他便控告说是耶稣会暗中干的，次日清晨，开始把葡萄牙全国境内的耶稣会士全部逮捕，有218人关进了幽暗的地牢，整整关了十八年之久，直至朋巴尔死后，才被释放出来；还有许多会士则被像畜牲似的，装进了船舱的底层，然后把他们载往教皇国的海岸边，把这些身上一无所有的会士们，丢弃在教皇国的海边。教廷驻里斯本的公使，向葡萄牙政府提出严正的抗议，连带的他也被驱逐出境。

法国政府又是以什么借口，消灭在法国境内的耶稣会士呢？导火线则是中美洲，安地列斯群岛中的马丁尼克岛的传教区，经济遭到破产，当地耶稣会的会计为了帮忙接济美洲各地的传教经费，于是就向大商业去投资。就在英、法交战时，开往传教区的运货船，被英国军队所俘虏，传教区的经费也因而破产，许多重要的连锁商人也连带的跟着破产，这宗案件交到最高法院去审理，而法院里的官员，不是杨森派就是法兰西派，于是法院以及相关单位，都一致认为，这真是一个报复他们所憎恨的耶稣会的大好机会，法院于是作了不实的宣判，判定设立在法国的耶稣会是非法的，就在1762年，他们要求政府加以取缔。法王路易十五世他虽然反对，不赞成这种作法，可是在1764时路易十五世，他终于在取消耶稣会的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教宗克勒孟十三世虽然曾经坚决的抗议，也终归无效。

而在西班牙的耶稣会，算是最顺利的了。耶稣会当时在西班牙以及海外殖民地上，已经

有六千个会士，国王嘉禄三世也非常的虔诚热心，教宗与国王的关系相当的友善，会士们相信，必然会受到虔诚热心的嘉禄三世的保护。很不幸的是，政府的官员们对宗座相当的不友善，决心要取消耶稣会，他们竟然在国王的面前，诬告耶稣会士们阴谋不轨。这些政府官吏们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了国王，遂使嘉禄三世竟然相信了他们的诬告呢？在历史上，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反正是嘉禄三世在 1767 年签署了一纸命令，把西班牙及其属地上的耶稣会会士，全部驱逐出境，于是在一天之内全被逮捕，遭到了像八年前，在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同样的命运，把他们全部押到船舱内，运送到教皇国领土的海岸线，然后在科西嘉岛把他们赶下船，这些会士们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一本日课经文外，就一无所有了！问及国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国王祇说是为了重大的理由，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至于为了什么理由，也只有存在国王的心里面儿，不便于说出来。教宗曾经致函给西班牙的国王说：“自从我即位九年以来，所加给我的一切打击中，最使我们感到痛心的，无疑的，就是阁下对我们这一个打击，万万想不到，您也这样的对待我们。”就在这同一年，那不勒斯国王，也就是西班牙国王的儿子，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境意，也和他的父亲一样，把国境内的耶稣会会士驱逐出境；1768 年，义大利北部的大公国巴马，也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境。

先后十年之间，把耶稣会当眼中钉的人，削去了耶稣会，在欧洲各国的重要支干，但是仍然处心积虑的，不把这个修会连根拔除，是不甘罢休的。而耶稣会，既然是教宗亲自批准又多次确定的，所以也只有教宗有权下令予以解散。于是就在 1769 年的一月，法兰西、西班牙以及拿坡里的驻教廷大使，一致照会教宗克勒孟十三世请求教宗下令解散整个耶稣会；而且以重兵派往教皇国边境，以便使他们的请求生效。这位坚强的教宗不愿向这样的威胁低头、让步，但是这种压力使他精神不支，二月就溘然长逝了！选举教宗的会议延长了三个月，各国驻教廷的公使，阴谋策动选出一位，合乎他们口味的教宗，枢机们选了一位方济会会士，取名为克勒孟十四世，他原本是一位公正而热心的人，但却又不愿意和这些国家产生冲突。强权国家不断向教宗施加压力，教宗采拖延战术，想以半推半就的措施，但是他们的要求更加迫切，而且加以恐吓。当时耶稣会尚能在日尔曼、奥地利、东欧活动。奥地利女皇玛利德兰很欣赏耶稣会，反对将耶稣会驱逐出境。1770 年，玛利德兰女皇把她的女儿玛利安东尼特公主，下嫁给法王路易十六世，为了不愿引起西方联盟的不高兴，也竟然同意，驱逐她一向所喜爱的耶稣会。这么一来，消灭耶稣会的势力更大，迫使教宗让步，教宗克勒孟十四世，在无可奈何之下，于 1773 年以《主及赎世主》的诏书，下诏声明解散耶稣会。诏书的内容中，找不出任何一句谴责耶稣会的话，教宗做出这样忍让和牺牲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如果让这个修会存在，就无法使整个教会享有真正而持久的和平。当时的耶稣会总会长利奇被监禁在圣天使堡垒，死于 1775 年。而所没收来的耶稣会全部财产，远不如人们所料想的那么多。

一位名叫雅尔风索利高烈的圣人，非常感叹的说：“可怜的教宗，他生活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中，他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是所有的君王和诸侯们都合谋起来，要求消灭耶稣会的呀！”真是可怜的教宗！实际上，他曾经抗拒各国政府的强硬压力，长达三年之久，尤其是对付西班牙大使的威逼。1773 年，他在解散的诏书上签字时，就已经心力交瘁，一年以后，他便去逝了。他临终时所念念不忘的，就是深深的以他被迫让步为憾，而且，他也看出来那种让步，并没有能够帮助教会安享和平。伏尔泰一听说耶稣会被解散，就高兴的大喊：“20 年之后，天主教会就要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历史并没有证实他的话。就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耶稣会的解散，应该是宗座道义上的失败，其结果使得在欧洲以及在亚洲、美洲的牧导工作，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教育方面，教会丧失了 800 座公教学校，确实是受到了无法弥补的打击。教宗克勒孟十四世在当时及以后，都受到责备，然而我们也很难说，是否教宗还有选择其他对策的余地。那时候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以及那不勒斯的联盟政府，决定采取走极端的

路线，教宗并不是先知，并不可能事先就知道，16年以后的1789年，法国会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更甚而连带的把这些政府一扫而尽。到以后，我们会知道耶稣会的被解散，对修会本身而言，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因为在19世纪时，耶稣会能够戴着殉道者的荣冠东山再起，而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所引发的普遍的动乱中，其他的修会，所遭遇到的苦难也都相当的深重，可是其他修会在劫后重建之时，并没有那顶耶稣会所拥有的荣冠。

圣教会，有耶稣基督亲自许下，永远不能消灭的许诺，决不会因为耶稣会的解散而成为历史上的陈迹。教会虽然遭受“唯理主义”的攻击；以及“无神主义”的气氛，虽然在上等社会中不断的生长；西欧专制君主仍然不停的欺侮教会和宗座；也经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酷劫，但是仍然具备了足够的活力传承下去。但是，那些威胁逼迫教宗的各国专制王朝，却永远的被推翻了，伏尔泰的预言，也成为了永远无法应验的狂言狂语了。再有一点要补充说明的就是，自从教宗颁布解散耶稣会的诏书后，耶稣会并没有全面的被解散，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教宗的诏书，应该由各教区的主教通告当地的耶稣会，才能在当地发生效力，但是在东欧俄罗斯的主教们，受到俄罗斯女皇凯瑟琳的命令，并没有在俄罗斯境内予以公布，因此，在俄罗斯境内，耶稣会士并未被解散，继续着他们原有的工作。教宗碧岳六世、碧岳七世都对这种情形加以认可，因此耶稣会始终没有完全解散，终于在1814年，教宗碧岳七世解除了教宗克勒孟十四世的禁令，耶稣会又再大大的复兴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天主要的，无人能阻挡。

2.4 十八世纪的教会生活

十八世纪的教宗和教廷与十八世纪的欧洲，因政治和思想的相互关系，使耶稣会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之后。下面介绍的是十八世纪时教友们在信仰生活上，面对当时的政治现况、以及思想潮流，他们到底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情形？

圣教会在十八世纪末叶，一定是趋于衰微，伏尔泰的预言似乎不久就可以应验了，而教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实际上也可以说微乎其微，或者更好说已经是不存在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教宗们仍然是信仰寄托的忠实保管人，他们对危害教会的种种错谬，仍然不断的予以揭发，而“无神论”所带来的那种无信仰的气氛，的确是急遽地增长着，不过，也看出了当时反宗教思想的渗透，必竟还有它的限度。它们所赢得，只不过是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一部份，而绝大多数民众，仍旧都能坚守他们古老的信仰，因此保存了深度的信仰生活。而宣传反宗教思想的，是那些站在历史舞台前面的流行作家，是那些风行一时的作品，所以影响所及，也只限于看那些作品，欢迎那些作品的人而已。

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改教运动后，不但没有受到当时纷纷出现的，各种誓反教的派别所宣传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即使是所谓的新思潮，也很少被浸染到，这些思想，甚至也影响不了西欧的比利时，因为鲁汶打学的影响力也很可观。即便是在法国，反宗教的思想，及它所导致的无信仰的后果，也不像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所宣传的那么严重，而且也没有波及到在城市里的工人，以及在乡间的村民。即使是在上等社会里，那些不再信仰宗教的著名“无神论”者，其中也有些虔诚的教友，他们善度着标准的教友生活，甚至还有许多保持着传统信仰的家庭。人民虽然谈论着国王路易十五世，他的糜烂生活和宫廷内轻薄气习的大有人在，但是国王的四位公主，却是十八世纪教友生活的楷模，其中一位还进了以隐居苦修著名的圣衣会。一般人民，仍然如同中世纪一样，遵行着教会所颁布的日历，度着充满宗教气氛的社会生活，守好瞻礼主日，及公共假日。许多人误以为，十八世纪是一个最轻浮、最缺乏宗教气氛的世纪，其实那只是广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十八世纪的法国，履行宗教生活的，像是去望弥撒、参加主日的日课、听道理、领受各种圣事，尤其像领圣体、办告解、守四规等等，都不比任

何时代稍有逊色。我们的圣教会，仍然肩负着“救济贫困”和“教育事业”，这两大公众服务的工作。所有有关儿童的教育工作，全由教会负责，而一切需要救济的贫病、老人及孤儿，也会交给教会的慈善机构去收容。有人曾经核算过，18世纪的法国，像医院、收容所、孤儿院、养老院等机构的数量，按照当时人口的比例数字来算，和今天的比例数字几乎不相上下，而教会的收入，绝大部份的经费，都用在这些慈善事业，以及教育事业上了。不但有钱阶级的子女，能够在修会，或是在俗神职界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就读，而且一般平民的子女，都能够享受免费的公教教育。初级教育非常兴盛，一个名叫“公教学校兄弟会”，他们也增设了好些学校。为了因应城市及乡村民众的需要，许多从事教育的新兴修会，尤其是修女会，也都陆陆续续的创立起来。这种情形，当然使得宣传无信仰的思想家大为不快，比方伏尔泰，他就曾经以埋怨的口气说过这样的话：“依我看，世上是该有处于无知的不是工人和农夫，所以该受教育的不是工人和农夫，而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您听了，觉得如何？我们的圣教会，决不支持这种狭隘不平等的看法，教会从一开始就相信，任何人，不分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和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看法是一样的。而且，教会不只是从事宗教性的教育，当然也实施一般知识性的普通教育。

十八世纪，这个宣传“无信仰”的世纪，但也是一个圣人很多的世纪。面对着讲求安逸、爱奢华及风俗浇漓的世界，却有不少的人，他们抛弃一切世俗之物、专心隐修、度着极端的神贫刻苦的生活。在各个天主教国家，尤其是在义大利，开出了许许多多圣德的花朵。下面要特别介绍三位众所共知，而又是同一类型的圣人。这三位圣人，都是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和十字架，具有特别的虔敬和热情，而且他们也都活了很高的年寿。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包尔特毛利斯地方的圣来奥纳德。他生于1676年，死于1751年，享年76岁。年青时进入圣方济会，后来成为一位很有名的大演讲家，对宣传拜苦路、明供圣体和敬礼耶稣圣心费心出力不少。第二位要介绍的是苦难会的会祖，圣十字保禄。他生于1694年，死于1775年，享年81岁。圣十字保禄，他是一位严格履行苦工、时常祈祷、并且有着突出表现的神秘经验的大圣人。26岁的时候，就因为一连串的“神见”，使他深知，这是天主召唤他创立了“苦难会”。直到81岁去逝的时候，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直是他思想、言谈和宣讲的课题。第三个要介绍的圣人，就是圣亚尔丰索，他对文学、科学都有特殊的造诣。16岁那年，就已经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像他这样一位英俊的骑士、出色的律师，若是留在世俗社会里，必然是度着辉煌人生的佼佼者，有钱、有名、有利，肯定也有权有势。家里的人绝对想不到，他竟然是创立一个严厉苦修的修会会祖。他在27岁的那年，因为他担任的一件诉讼案子，法院判定败诉，使他非常的羞恼，经过一段长久而深沉的反省之后，大彻大悟，就决心弃俗苦修。30岁时升了神父，从此以后，他开始为那坡里及附近地区的穷人服务，他眼看着这么多穷苦的人，尤其是在精神上，没有人照管，于是他就下决心要创建一种修会，专门为给平民传教和服务。亚尔丰索为修会取名为赎世主会，他誓发圣愿，绝不浪费一份一秒的光阴，而且他也英勇地、忠实的遵守了这个不浪费光阴的圣愿。他听告解无数、讲道理无数、他还大量的编写有关宗教的书籍，他真是热烈无比的。在这三件重要的职务上，耗尽了自己一生长达91年的生命。圣亚尔丰索是一位特别多产的作家，写出了两百多种的作品，有培养热心的、有讨论伦理神学的、有攻击“无神”和“唯物论”的辩论集、甚至还有诗歌乐曲。因为他也是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这些作品，在欧洲都有着不同语言的翻译本，其中一部份也被译成了中文。这些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其中有不少作品，直到现在还脍炙人口。他的作品中最具权威、最为有名的，是他的《伦理神学》。他在过于严格的“杨森主义”和过于宽松的“放纵主义”之间，划出了一道稳妥的路线，这样的路线，对消除“杨森主义”，在伦理学家和人灵导师所加的影响，要比任何的其他方法都更有效力，也正因为这本权威性的作品，圣亚尔丰索也就被教会尊奉为圣师级的人物。圣亚尔丰索长期受到剧烈病苦的折磨，一直到死，仍然不停的写作，他曾经遭遇到别人的诬陷，检举告发他不忠于教

宗，并且因为与修会发生意见上的不一致，因而使他与自己的修会暂时分离，这些在他老年时所遇到的痛苦，远远比他肉体的痛苦要来得严重，待这些危机过了以后，他也就以 91 岁高龄安然去逝了。赎世主会在会祖去逝以后，会务获得了飞跃的成长，成为圣教会内最为活跃的修会之一，会士曾经多达一万人。

十八世纪的教会，在学术活动中，首屈一指的是历史学，教会史、教父学、考古学以及礼仪学都分别成为独立的学问。在学术活动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法国，与教会历史学一样茁壮的是，教会法律的历史研究，像哈杜英、曼西等人的著作，一直都是研究大公会议的基本读物，而教宗本笃十四世本人，则是法律历史学的专家，十八世纪前半期的教会学术，受到了传记文献研究的影响，以寻找、探索和整理为重点，比较缺乏新思想的探讨。

十八世纪的最后一任教宗是碧岳六世，他的任期是 1775 年到 1799 年。在耶稣会被解散以后，政治上紧张的气氛也就立即松弛下来。在碧岳六世的时代，享有了短期的和平，不过，我们更好这样来形容，这一段时期，好像是暴风雨过后的日落时分，黑夜的暴风雨，将更为狂暴。教宗碧岳六世的时代，罗马又热闹起来，到义大利游览或朝圣的风气盛极一时，好古、慕旧的心理又再度苏醒。教宗在罗马接见信奉各种宗教的王侯和贵族，对他们都一视同仁，这是以往绝对没有的现象。教宗自己也喜好古典，他是梵蒂冈博物馆的真正创办人，还特别任命专人负责古物的监督。

1782 年时，教宗碧岳六世曾亲自前往维也纳，去劝阻皇帝若瑟二世，不该以独裁的手段干预教会的工作。教宗的这次旅行和在维也纳的逗留，以及绕道慕尼黑返回罗马的行程，在在都显示出凯旋的气象，各地的民众也群集教宗所到之处，希望能亲自目睹教宗的丰采，并且接受教宗的祝福，皇帝也不失礼，在第二年就到罗马回访教宗，人们又再一次看到天主教国家的政府，常以表面上的尊敬来敷衍教宗，而事实上他们对教会所抱持的态度，正好像没有教宗一样。教宗碧岳六世尽其所能从事特导工作。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在 1791 年谴责了所谓的《神职的公民法》；1794 年又严厉地谴责了比斯道亚的“杨森派会议”。随后局势大变，革命军占据了教皇国，1797 年，碧岳六世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缔结了《多兰迪诺和约》，这个和约使得教宗一蹶不振。

2.5 十七、十八世纪的传教事业

2.5.1 传教事业概况

为了使人了解教会在这时期的生活力，那就不可忘记传教事业在美洲、亚洲所展开的活力，这种活力自从发现新大陆后，便一直不停地突飞猛进着。十五世纪末叶的 1488 年，狄亚士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发现了到印度及东亚的新航路之后的 1492 年，哥伦布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圣教会在 16 世纪，也随着地理大发现，渡过了她传教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传教士为基督争取了如此广大的新地域和新的信徒，16 世纪的这些轰轰烈烈的传教史，下面作过详细的介绍。

16 世纪的传教士，几乎全都是清一色的修会会士，有道明会士、方济会士、圣奥斯定会、圣衣会、连当时刚新创立的耶稣会士，也加入了这令人钦佩的海外传教行列。各大修会为圣教会提供了大批的近代传教士。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传教，从墨西哥到南美洲的南端，又再传到亚洲东南太平洋上的菲律宾，不但占领了广大的土地，也建立了教会的圣统制。在这些广大的领土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当地民众皈依了圣教会，成为她的新生子女。葡萄牙人的人数比较有限，他们无法用武力，占领他们所发现的广大地域，于是在巴西、沿着非洲的海岸、在印度以及马来半岛等地，只是在重要的战略地域上，建筑了坚强的基地和贸易中心，像卧亚、麻六甲等地。澳门则是东方的最前进基地，传教士都由这些陆地出发，再航向更远

的地方，传教士的足迹一直达到印尼、中南半岛、中国以及日本。不过在传教工作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切都完美无缺，到处都有各种困难和缺点，几乎所有人性上的弱点，像疏忽、自私、唯利是图，也都表露无遗。有些传教士本身的素质也很差，另外在传教区的管理上，也出现制度上的许多问题，一直无法获得解决和改善。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间，还经常为了传教区域界限上的划分，意见不合，而引起双方剧烈的冲突和争斗。实际上，传教区的事务，都不属于教廷或当地主教管理，竟然是属于各国的国王管理，他们又常常侵犯僭越神权，两国又互争保教权，不少传教士，竟然是以自己祖国官吏的身份，和姿态在传教区活动，带着殖民主义者的优越感来管理教友，完全不像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人民的牧者。各国修会的传教士彼此之间不但无法合作，甚至还相互仇视，造成不少悲剧。许多有识之士，针对这些弊病，便提出了挽救的方法，由教宗自己担负起管理传教区的责任。几经努力和波折之后，终于在教宗额我略十五世世的任内，实现了这个计划。

公元 1622 年，在教廷正式成立了传信部，任命十三位枢机组成，负责推动并且统筹，在福音尚未传入或是遭受攻击的地区；一切传布天主教信仰有关事项，连异教和异端裂教的地区也都一齐包括在内；全权订定传教应进行的事项；委任主教或代牧；分派各修会的传教士，以防止引发磨擦；并且积极设法训练陶成本地的神职人员。六年以后，教宗吴尔班八世为了能使这些传教工作达到更理想的程度，在罗马又建立了传信部学院，栽培献身于传教的神父，这所学院可以说，就是现在宗座传信大学的前身。

十五、十六世纪的外方传教士，大多数是由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所派遣的。当时的法国，还正陷在内战及宗教战争的纷扰中，一直没有参加海外传教工作。到十七世纪的时候，局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圣教会本身已经改革振兴，于是对外方以及海外的传教事业，也普遍的引发人民的兴趣，这不再只是传教士的事情了，可以说已经引起整个天主教民族奋然兴起。从海外的传教士辗转送回来的信函和来往的情形，在各处公开的传阅、宣传和报导，使人民对所描写的，其他不同民族的奇异风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使他们明白了，传教士所经历的考验，以及英勇忍受的痛苦，甚至有不少传教士殉教致命，而多数传教士的成就和喜乐，也激发了许多民众慷慨的心肠，纷纷捐献资金帮助传教的经费，甚至还有不少农夫们志愿前往加拿大，终其一生，指导当地的印地安人农业耕耘之外，以自身的教友生活作印地安人的模范，协助传教士在异族中从事传教工作。

2.5.2 加拿大的传教事业

前面既然提到了加拿大，那么接着就报告加拿大开教的经过。加拿大虽然在 1534 年的时候，就为法国人雅格加尔弟耶所发现，树立了十字架，但是开教的工作，却一直到了 1615 年，重整方济会的会士在加拿大登陆以后，才认真的进行。由于他们人数不足，不久之后便邀请耶稣会会士前去协助。1630 年嘉布遣会会士来到北美，1640 年以后又有“苏尔比斯”修会会士加入，使得阵容更为加强起来。加拿大地广人稀，当地半游牧的印地安人，主要是靠狩猎为生，部落之间常有战斗。为了要同他们接近，传教士得放弃自己的文化水平与他们一样，度着狩猎的野蛮生活，混在他们那种烟气腾腾的陋室内，分着吃他们那种怪味的食物，随着他们进入无边的森林，或是登上他们那种用树皮做的小船，沿着河流去捉鱼打猎，尽量入境随俗。但不久之后，传教士们都看出来，除非想办法，使印地安人能够定居下来，或者是同法国的移民取得联络，否则便无法使这些游荡的印地安人皈依奉教。于是他们便教印地安人耕种，使他们学习改渡安定的农业生活，然后把印地安人聚集在圣堂及修院、学校或医院的四周，这样，以圣堂修院为中心的传教区，也就先后建立起来。现今加拿大的大城，像魁北克，蒙特利奥都是这样开始的。法属加拿大的传教工作，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从一开始，就有女修会的协助。先是乌苏拉修女会，从法国的都尔抵达魁北克，负起了教育儿童的工作。领导乌苏拉修女会的，是玛利修女，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在近代伟大的神秘学家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新世界传播福音的先驱者中，她功不可没。不久以后，就有一位名叫玛加

利大·步尔儒雅的法国女子，在加拿大创之了主母姊妹会，协助加拿大境内的传教事业，这位了不起的会祖，在 1950 年时，被教宗碧岳十二世列入真福品。传教士在传教区开始工作时相当困难，水土的不服，和生活在未开化民族中的低级生活，这为传教士而言，确实是一种不小的考验；此外，对印地安人低劣的风俗和巫师们的仇视，都得设法克服。好不容易在伍龙部落中，有些人皈依了天主教，但是他们也就成了另一个野蛮的依洛瓜人的眼中钉，两个部族于是展开了一场恶战。依撒格约格神父被仇视的部族浮掳，成为一名奴隶，受了长期的苦刑，他就在奴隶群中展开传教的工作，赢得了好几位奴隶的皈化。几年以后，他被荷兰的新教徒救出，回到法国，但是不久他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到原来做奴隶的地方，最后终于在 1646 年，与六位同伴被残杀，成为殉教圣人。随后到 1649 年，在这三年中，又有布来卜夫、拉勒芒以及其他的会士先后殉道牺牲。17 世纪中叶以后，进入加拿大的殖民人数不到四千人，印地安人也很少，但是印地安人加给殖民人士的困扰却很大。前面提到的伍龙部族，在 1639 年有一万两千人，分布在 32 个村落中，但伍龙族部落后来被依洛瓜人所消灭。

经过传教士的不断努力，依洛瓜人最后终于也接受了传教士，当然也开始有人领洗。1658 年，魁北克成为宗座代牧区。1674 年时，就被教廷升格为主教区。在 18 世纪末叶以前，魁北克是北美唯一的主教区。当十八世纪末，加拿大归英国誓反教统治时，法国的天主教移民团体，以及奉教的印地安人，团结在他们的牧者的周围，抵抗了种种的压迫，保持着信仰的完整，今天加拿大的天主教徒，大部份都是这些开路先锋的后裔。

2.5.3 北美的传教事业

下面来看看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上，天主教传教的状况。第一批信奉天主教的英国移民，是在 1634 年到达新发现的玛丽兰州，他们是由两位耶稣会的神父陪同抵达的。玛丽兰殖民地的发现者是塞西尔加尔凡，他是皈依天主教的巴尔迪摩爵士的儿子，塞西尔加尔凡让他的哥哥雷奥那，担当这支移民队伍的领队。刚开始的时候，英国所派的殖民地总督，不仅建立英国国教的教堂，也建立天主教的教堂，对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但是，以后颁布的法律，就禁止在玛丽兰建立天主教堂。耶稣会士只好在自己的会所里，设立小教堂；礼仪书籍也被禁止刊印，耶稣会士只得分发手抄本，这些手抄本还有些保留到现在。玛丽兰的天主教友，直属在伦敦的署理主教管辖。1756 年时，这位署理主教，向教廷传信部作过这样的报告：“玛丽兰有四千名教友，宾西法尼亚有两千教友，他们由十六位耶稣会士所牧导，几年以后，他估计这两个殖民地上的天主教信友，将会超过了 20 万，在其他殖民地区，还有散居的教友，神父们需要经常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不能在纽约久住。”1760 年，法国军队在蒙特利奥向英军投降的时候，加拿大的总督房德瑞依侯爵，向英国政府要求对天主教友予以宽容，作为法军投降的条件，所以在 1763 年的《和平协定》中，英国政府答应了这个要求。此后，整个儿加拿大和从路易斯安那，到密西西比河的土地，全为英国所有。因此，在 18 世纪的英属殖民上，几乎增加了十万名天主教徒。他们居住在加拿大和现在美国俄亥俄州、印地安那州、伊利诺州、密西根州以及威斯康新州。英国政府不但实践宽容天主教友的诺言，还在 1774 年的《魁北克法案》中，承认在新增加的殖民地上的天主教社团，具有法人的权利。但是在南方的一些，由西班牙人建立的小型天主教团体，仍然不免遭受财产被没收、教友被解散的厄运。在比较古老的殖民地上，坚强的新教徒中，掀起了反对魁北克法案的运动，这就是 1776 年，美洲独立战争的众多原因之一。当时加拿大与美洲的命运唇齿相关，美洲的独立运动，多少具有反对天主教的因素，从美洲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几乎完全信奉天主教的加拿大，才刚改属英国不久，如果没有像约翰吉艾以及他的同伴，在纽约所表现的反天主教的激烈行动，加拿大势必也会参加独立运动，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也就是国会和华盛顿，他们也都了解这件事。华盛顿就任总司令以后，立刻取消所谓的“教宗日”，这是一个纪念“火药爆动事件”反对天主教的节日。1776 年班吉明·富兰克林到了魁北克，希望至少能获得加拿大的中立。与班吉明·富兰克林同行的，有若望·卡洛尔神父。

若望·卡洛尔神父是一位出身于高贵的英国家庭的美洲人，后来若望·卡洛尔神父晋升为巴尔迪摩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卡洛尔神父和魁北克的主教，以及加拿大的神职人员交谈之后，知道为时已经太晚，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美洲独立战争节节胜利，1781年，华盛顿把英军总司令康利斯围困在约克镇，逼使他投降，终于在1738年，在巴黎签订和约，加拿大仍然属于英国，美国则获得从东岸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土地，而佛罗里达、南部海岸和密西西比河以外的土地仍然归属西班牙。

美国的独立运动多少具有反对天主教的因素，所以当初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天主教的教友绝不容忍。在新罕布什州，天主教徒不得出任州长、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在新泽西州和南、北卡罗来那州，天主教教友不得担任政府中任何一项职务；而在纽约的天主教教友，甚至连公民权也没有；只有宾西法尼亚、德拉瓦、玛里兰、维吉尼亚州的天主教友，从一开始，就享有法律上的平等。虽然反对天主教的思潮还没有停止，而为全美洲人民的自由、平等的“独立战争”，既然已经平息，那么，这一类反对天主教的法律是不会持久的。公元1778年，法国承认美国的独立；第二年的1779年，西班牙也跟着承认，这两个国家，是最早承认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这件事对美国的天主教教友是有利的。那时候，法国和西班牙的使节和随军司铎，都公开的举行弥撒圣祭，使美国的一些地方，还初次看到天主教庄严隆重的礼节。到1787年，由于“美国宪法”第六条的规定，从此以后，“公民权”不因宗教信仰而有所差别了。1789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教分立”的决策，它使天主教教友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此外，国会还在1791年，颁布了集会、出版以及言论的完全自由，到这时候为止，美国的一万八千名天主教教友，还是属于英国的伦敦教区的美国代牧区。1789年成立巴尔迪摩教区后，才不再隶属英国。这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就是耶稣会士若望·卡洛尔神父。

至于美国的南部，在当时的居民可以说，只有印地安人。方济会和耶稣会的神父们，由墨西哥逐渐向北发展，向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宣传福音、介绍新的文明。18世纪的末叶，方济会会士尤尼·波罗塞拉神父充满了勇敢、毅力和圣德。他不但身体弱小，而且还是一个不良于行的瘸子，他原本是一位神学教授，但他最大的心愿是，成为印地安红人的宗徒。1749年，他来到美国西南部，重新拾起了在被称为“下加利福尼亚”的加利福尼亚半岛，耶稣会士所已经放弃了传教工作，然后又进入“上加利福尼亚”，冒着超人力的困难，在那里建立了一连串的传教据点。研究美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方济会会士，是加利福尼亚的真正创建者。当1927年，美国总统下令，把尤尼·波罗塞拉神父的铜像安放在华盛顿议事厅，列入在“创建美国的国父们”的中间，这也就证明美国当局，正式承认了尤尼·波罗塞拉神父开发加利福尼亚的功勋。

美洲教会的诞生与茁壮，不但表现了传教事业的成功，而且是圣教会在地理上完全改观的开始。教会真正突破了欧洲的围墙，走向世界其他的地区，对教会内部而言，各民族之间更大的平衡正在缔造，教会也随之而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各位也许还记得，打从中古时代的初期开始，常有某一个国家，在教会内居于领导的地位，曾经承担过这项领导责任的，有日尔曼、法国、西班牙，然后又是法国，而当大西洋的另一岸，也有了天主教教友时，欧洲国家，在教会中所扮演的优先角色也就宣告终止了。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平等互换和全体竞争的风气，而现在二十世纪的南、北美洲，有着全圣教会三分之一的教友，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教会的重心已经移到了美洲。现今的教会已经与中古教会不同，不再重视地理上的中心。

2.5.4 印度的传教情形

与美洲教会兴起的时，另一批传教士在葡萄牙人的领导下，向亚洲的南方进展。然而，亚洲的环境却不同于美洲，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美洲那样培育天主教教友。亚洲的教友，在全教会的教友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今天，美洲已经向世国各地遣送传教区，而亚洲仍然有赖于外来的援助。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从16世纪以后，亚洲传教事业，对欧洲的教会历史上，曾有过极大的影响，也曾经唤起欧洲向世界传教的热忱，而使这股热忱一

直生生不息。

在 17、18 世纪，教会在亚洲南部传教的情形是如何的呢？特别要提出的是耶稣会士罗伯尔·诺比理神父在印度传教的情形。葡萄牙在印度，发现到处都有非常严格的阶级制度。印度人一出生，便隶属于一个固定的阶级，这种阶级制度被称为种姓制度。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得有任何来往，而且也无法脱离自己的阶级。葡萄牙人认为这种系统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也未加介意。由于对印度的语言认识不够，因此常用不适当的言词来号召印度人奉教，于是，“你愿意做教友吗？”这个问题，变成了“你愿意做佛郎机吗？”而“佛郎机”这一个名词，却是十字军时代，回教徒传延下来的对天主教友，一种轻视侮蔑的称呼。这种传教方式，只能在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地方，建立教友团体，至于它的效果，自然是令人怀疑的。然而在全印度，划分严格的阶级制度下，葡化的教友是遭到轻视排斥的，被看成是叛徒；至于传教士，如果他在某一阶级内，而由阶级比较低的人手里，接受了一滴水，也会被看成是严重的不洁，他也必受到原来较高阶级的轻视。当时的罗伯尔·诺比理神父到达印度南部的马都拉传教区。他懂得了应变的方式，因为他在印度所建立的传教事业，可以与利玛窦在中国所作的相比美。他认为，既然高阶级的人，也就是称为婆罗门，他们领导着舆论，自然该先争取赢得他们，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和他们同化，自己就该成为一个婆罗门。诺比理神父于是就像利玛窦穿上儒服那样，穿上了较高阶级净行者所穿的黄袍，当然也采用了他们生活的一切方式，只和婆罗门来往交际，这位从罗马来的义大利人，在马都拉很快的便出了名，他也成了一位净行者，不喝酒，对印度的语文和经典都大下功夫，作过很深的研究，后来，甚至连印度的婆罗门学者，也都来和他谈论，向他质疑问难，因此，逐渐有很多人皈依成为天主教友。诺比理神父对他们的习俗和礼仪，只要是没有敬拜偶像或是迷信的色彩，他都准许他们保留下来。诺比理神父在马都拉的工作，直到他在 1656 年去逝为止。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之下，教会也有了全面的进展，当然他也遭到不少的猜忌，有人把他的传教方式告到了罗马教廷，说他是异端，他被逼为自己辩护，结果教宗额我略十五世认为他有理，但也作了一些规定。规定在印度有两种传教士，一种专门为上层阶级，一种就为下层阶级。

自从诺比理神父去逝后，婆罗门领洗奉教的便很少了，而其他阶级的，相反的有很多人领了洗奉教。马都拉的教会，在后来又因圣若望·布理道神父，而再次大放异采。圣若望·布理道神父出身于葡萄牙的望族，是当时国王的朋友。当他 16 岁那年，便从世俗的荣华富贵中退隐，加入耶稣会，被派到印度马都拉以后，竟然成效显著，使许多部落领洗奉教，而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能使他畏缩。他曾经好几次坐监受刑、受拷打，甚至还被判死刑。当他答应离开马都拉后就被释放，会长调遣他回欧洲，讨论印度教会的问题，但是他一获得许可，便又匆匆忙忙的赶回他服务的传教区，这次回后来，不久，便被捕处死了。若望·布理道殉道的消息传回欧洲，燃起了传教士的心火，同时也使新领洗的教友更加的坚强。圣若望·布理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授洗了八千多人，很不幸的是，在印度的天主教，也受了类似在中国的礼仪之争的打击。在印度南端的锡兰岛，原本也有不少葡萄牙的神父，在那儿从事传教工作，但是，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荷兰人一度占领了锡兰岛，加尔文派的新教，把葡萄牙商人驱逐出境，同时也把天主教的传教士一并赶走，好在有几位在卧亚出生的印度神父没有遭到驱逐的命运，其中有一位名叫若瑟·瓦兹的神父，他满腔热血，一听说在锡兰所发生的悲惨事情，于是他就乔装乞丐，偷渡入境，他不但把失散的羊群又再团聚起来，而且还神奇的增加，从他偷渡入境到他 1711 年去逝为止的 25 年岁月中，从他手里领洗奉教的人数，竟然高达三万多人。下面，要介绍的是中南半岛上的传教情形。

2.5.5 越南的传教情形

亚历山大·陆德神父在越南的情形，就好像是利玛窦在中国、罗伯尔·诺比理在印度那么样的有名望。亚历山大·陆德神父，他不但被尊称为越南传教区的开山祖师，即使在越南的文化领域中，他也是一位创始人，而且他在传教区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他传播福音的

主要范围之外。陆德神父在 1591 年左右，出生于当时还属于教宗领土的亚威农，19 岁时入耶稣会，他立志要效法圣方济沙勿略，因此他曾请求派他去日本。他也和利玛窦一样先攻读数学，作为日后传教的准备。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对他后来进入越南的王宫，有很大的助益，此外他还具备其他的才能，使他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传教宗徒。除了他的圣德之外，他还有特别的精力、一颗同情人的爱心、满腔传教救灵的心火、和一副永远青春的性格。1619 年，他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经过了在卧亚，以及麻六甲的长期停泊，终于在四年后抵达了澳门。可是，他前往日本的心愿已经难以实现了，因为当时日本已经严密的封锁海关，不准任何传教士再入境。于是上司派他到安南，当时，已经有几位耶稣会士在那儿工作了几年。当时的越南，已经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北部称东京，以河内为首都，南部称安南，以越为首都。越南在当时被称为交趾支那。陆德神父被派的地方，就是南越最后的王国安南。陆德神父并不是第一位入境安南的传教士，一世纪以来，各修会都有传教士在那儿工作，不过领洗入教的人却很少。政治的不安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也因为传教工作未能持之以恒，时作时辍不能继续，而且也缺乏适当的方法。陆德神父一到，便立刻明白以前的传教士，很少有人精通当地语言，总是离不开通译者，陆德神父具有语言天才，努力学习了六个月，便能用越语听告解、讲道理。他曾进入王宫，而且还归化了一名国王的近亲，这样来，这个新成立的教友团体便有了最坚强方靠山。

陆德神父他发现，过去一个世纪，教会在越南的教务进展得很慢，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不通。传教士与民众来往，一直都需要靠“通译”，于是他以六个月的工夫，苦学越南话。在他的恒心、毅力、努力学习之后，他使用当地的越南话听告解、讲道理。教务充满了一片光明的远景，信友团体也成立了。不久之后，他的上司派他到北部王国东京去开教。因为直到那个时候，除了几个婴儿在死亡的危险中受洗之外，成年人连一个领洗的也没有。陆德神父到了以后，凭他丰富的学识，尤其是他那入境随俗的精神，使得教会获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且赢得了国王的信任。在他写回欧洲的信中这么说：“国王立即命人给我们建造了一座房屋，而且还造了一座大教堂。我每天得讲道理四次，有时候多到六次。国王的一位妹妹和 17 位近亲都领洗了，那样的容易使佛教的和尚归化，这真是使我大为吃惊。当我使他们看出来，我们的宗教多么合情合理时，他们都非常高兴。”陆德神父还说：“我们的教友，信心非常坚强，任何事情不都能使他们丧失信德。他们为了办告解、望弥撒，竟然不怕走 15 天的路程。我能够修治这个美丽的葡萄园，实在得力于传道员的惊人协助。说实在的，这个教会能有这么大的进展，除了天主之外，还得全归功于他们。我看出来，我是唯一能用越南话讲道理的神父，我选了好几位尚未结婚，而心火热情的热心教友作我的同伴，帮助我传教救人，他们在弥撒中公开发誓，终生不结婚为教会服务，并且向传福音的神父许下，要服从神父的命令和安排。现在这个修道院已经有一百多人，而他们的经费，也全由教友们来负担。”在陆德神父的领导下，这种平静的情形延长了一年半左右。不久之后，便吹起了风暴，从此以后，越南教会的历史，便在时而顺利，时而被迫害中交替进行。陆德神父四次被迫离境，但是，当这位英勇的传教士离开北越时，他便转入南越，或到澳门去暂时避难，等待机会以便重回越南。他所栽培的传教员都非常忠实，宁死也不肯背教，所以当他不在时，便由传教员来支持、鼓励教友们的信德。1645 年时，陆德神父再度被驱逐，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越南，留下了三十万的教友，他们已经多次的受到迫害和考验，其中有许多人宁死也不肯背教，很多人获得了殉道致命的荣冠。陆德神父，留给越南人的，不只是信德，他还被越南人公认为，是现在以拉丁拼音的越南国语的创始人。其实，早在陆德神父进入越南之前，早有欧洲的高人或传教士，利用拉丁字拼写越南话的发声了，陆德神父只是使它的系统更加的完备而已。他所编辑印行的教义书和越语字典，对罗马拼音的流传大有帮助，以致于使得陆德神父的大名，也连带的永垂不朽了。

陆德神父离开越南去到澳门后，更被上司选为代表，回欧洲去处理传教的事宜，他取道

印尼、印度和波斯等地，一路调查了五年之久，直到 1650 年，才回到罗马。他把在亚洲传教的经验中所拟好的计划，向教宗和枢机们陈述，以越南的卅万教友作例子来向他们证明，能有更多的人领洗奉教的，为了提供那些教友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的需要，得需三、四百位神父不可。但是，那么多的神父，又到那儿去找呢？他举出日本为例子，如果日本现在有许多本地神父的话，情形又当如何呢？因为在时局顺利的时候，没有抓紧机会培植本地神职人员，以致于到今天遭受到这么大的损失！陆德神父能从越南的教友中就地取材，但是为赋给他们神品，成为本地神职人员，非立刻派遣主教前去不可，而这些派去的主教，则必须表现出，自己与一切的政治势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才成。陆德神父深深知道，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殖民势力，过份重视他们保教的特权，为传教事业带来了好大的阻力和伤害，除非有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认可，否则亚洲便得不到传教士。现在应该由新创立的传信部，以宗座代牧的名义派遣主教，为的是证明他们实在是受命于罗马宗座，这些主教也应该专心努力培植本地神职人员。教宗和枢机们都很关心地采纳了陆德神父的意见，但却因为担心葡萄牙的反对，不得不延缓实行。陆德神父便开始，自行去寻觅赞成这种计划的神父们，以便等到教宗一批准，就可以立刻去实行。他在义大利、瑞士都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于是起身到法国，而当时，法国宗教的活力正特别的旺盛，又为到远方传教的心火所鼓舞，于是对陆德神父所提出的思想，造成了有利的气氛，何况陆德神父本人又颇具吸引力，大家都愿意看到这位著名的传教士，并且详细的听听他的言论。陆德神父便和他们取得了连络，他们当中，有热情的司铎、有希望至少以金钱致力传教的世俗教友。圣味增爵神父和法国的主教会议，在听过陆德神父的谈话，都很兴奋。司铎们自动献身，其中有的竟立刻到罗马，请求教宗准他们“离开祖国和亲戚朋友们，并且奉献他们自身和所有的一切，为的是救人的灵魂。”他们的催促战胜了一切的阻碍，教宗就从中选了三位，委派他们担任宗座的代牧。两位要派去越南，而且，他们的职权可以包括中国的南方各省；另外一位则要派往中国南京。但是很可惜，要去南京的一人，尚未走马上任就去逝了；另外要去越南的两位则遭到葡萄牙政府的反对。到了公元 1659 年，传信部给宗座代牧发出了一道训令，向他们说明应该遵守的原则：“叮嘱他们不该干予国家的政治；不要去推动人民变更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固有的礼仪；只要当地百姓和政府，不明显反对信德和善良的风俗，教会就应当给予尊重。因为一切人民都重视、爱慕他本国的传统，爱慕他自己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之上，这是合乎人性的。假如在外交国家的习俗中，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不应当立刻试着要去改正，最好逐渐的劝导取消。”

由此可见，最后的几位教宗的伟大传教通谕内，所阐明的传教原则，主要的部份，都早已抱括在这篇训令中了。前面提到的，那两位派往越南去的宗座代表，一位外叫巴禄，另外一位名叫郎伯尔穆德。他们为了使他们的传教事业继续不辍，并且为陶冶有志献身传教的在俗司铎，就在法国巴黎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这就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由来。而直到现在，在这片土地上，这个修会的传教精神和主要的规矩，就是这两位主教传授的。历年以来一直都为东亚的传教区，派遣着一批批又一批批的传教士。巴禄和郎伯尔穆德两位宗座代牧到达越南以后，便发现了陆德神父所预料到的情形，那就是惨烈的教难。所有的传教士全都被驱逐出境，教友都成了没有牧人的失教了的羊群，没有人照管，但是，教友却忠诚的固守着信仰，由隐藏在小船中的传教员指导着，这小船也成了临时的修道院。有两位年青传教员，就是在这小船中接受了培育，然后送到暹罗去领受神品后，返回越南的。后来有七位，是在郎伯尔穆德主教的手中领受了神品，这就是越南本地神职界的初果。可惜陆德神父未能亲眼目睹，他那伟大计划的实现。他的上司认为，再派他回越南已经不太适宜了。他在 65 岁的时候，接到去波斯开教的命令，1660 年死于波斯。越南和暹罗的教会，甚少享受到和平，能够公开举行敬礼的和平时期非常短，教难时期，传教士和传教员都转入地下，不论是传教士或传教员，甚至是教友，殉教者相当的多，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年，越南仍然有三十万教友。

2.5.6 非洲的传教情形

下面要介绍的是遣使会士在非洲传教的情形。有好几个世纪在北非的沿岸，有着成千成万的天主教友，在做着回教徒的奴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些教友奴隶，是一群回教海上强盗们，经年累月的在地中海一带，以海盗的抢劫行为，将他们俘掳来的。圣味增爵神父创立遣使会之后，他所派遣的第一批遣使会会士，就是奉命到这些，被俘掳而受强迫为奴隶的教友中去服务。这批遣使会会士，全都成了殉道者，像 1683 年的殉道的若望·瓦色尔，他就是被捆在一门大炮口上，被炮弹轰成了肉酱，炸得稀烂。这以后，教廷传信部把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传教工作，委托给遣使会。这对遣使会而言，真是一个可怕的考验。会祖圣味增爵派遣了第三批传教士，都因为水土不服而相继去逝。第二任会长仍然继续派遣会士，但是仍然是全都病倒，只得被迫回到法国。其他的修会，像嘉布遣会士、耶稣会士、道明会士，也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作过种种的试探，效果也都非常的有限。这个广大的非洲黑暗大陆，经过 17、18 两个世纪，几乎没有教友进入内地，谁又能料到，到了十九世纪，非洲却成了天主教传教成绩最辉煌的地区。

2.5.7 关于保教权

17、18 世纪，教会在拉丁美洲传教的情形。中、南美洲经过 15、16 世纪以来，教会已经建立了两个殖民地，传教士们跟在远征军的后头，在兵士和移民所到之地，都树立了十字架。所以十七世纪的初叶，在拉丁美洲差不多已经有一千万的教友，由许多不同的成份所组成，他们有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远征军的后裔；有的是已经皈依奉教的土著印地安人；也有的是从非洲被白人俘掳来的黑奴；再有，就是混血儿。这些地方，就好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国土的延伸，被划分为总主教区和主教区，主教们也都是由两国的国王所委派。因为 17、18 世纪，美洲的传教区，都受到保教权的限制，按照当时的宗教观念，国王负着真正宗教的使命，好像是罗马教宗在美洲的代理人一样，负起照顾当地人灵的责任。因此，两国国王保护并控制了传教的事项，主教和传教士们接受了这种控制，从欧洲起程出发时便开始生效。如果没有国王的授权，任何传教士是无法搭船前往传教区的。

关于保教圈，对西班牙人来说有另一层特殊的含义。西班牙人一致认为，西班牙能从回教徒手中重获自由，是一件具有宗教意义的事件，也是一次十字军的征战，历代的西班牙王都为王国的扩展而奋斗，甚至于有时候还因此而和教廷发生冲突，这对西班牙人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早在 15 世纪末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皇后伊沙伯拉从教宗依诺森八世的手里，获得了在征服格拉那达后，保护教会利益的权利和所有神职人员，尤其是包括主教在内的任命权，这就是保教权的由来。西班牙人终于在 1492 年征服了格拉那达，同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远达西印度群岛。新世界的发现，就好像是西班牙国土收复的一种延续。1508 年，教宗朱利二世，他批准将这项保教权扩大，以适用于新征服的土地。当时，实在没有人能够意测，新世界的幅员到底会有多大？西班牙国王，尤其是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都非常了解保教权的意义，有时它不仅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艰巨的任务。菲力二世把自己看作是教宗的辅弼，有传播信仰于新大陆的责任。17 世纪初年，教会法律学家索洛沙诺，他把国君辅助教宗的思想撰成了“神学”的理念。当保教权的行使和西班牙政府，它那冷酷无情的公务常规相系无间时，美洲新大陆所有的神职人员，上自墨西哥总主教或利玛总主教，下至圣堂管事，都由政府委派，连教廷都不能在当地设置大使与宗座代表，使传信部丝毫没有插足的余地，甚至在对外教者传福音的事上，也无权过问，而传信部向西班牙政府所作的一切抗议，都好像石沉大海。

到了 17 世纪的 1629 年时，西班牙国王颁布了一个通告，要求主教们要向政府宣誓：“在任何情况，决不反对国王的保教权。”这个通告使得主教们和罗马的关系，反而必须依据西班牙专门处理印地安事务的“皇家会议”，它所造成的另外一个流弊是，西班牙政府不必经过教宗的许可，可以擅自决定主教的人选，再从另一方面来看，无可讳言的是，西班牙国王对于保教权所抱持的态度，一向都很严谨。在保教权通行的时代，教会外在的组织和规模都

很可嘉，只要像菲力二世那样，以传教、救人灵魂为责任的君王在世一天，就会造成教会过份的依附国家行政机构，这样的结果，教会还不致于受到太大的创伤。18 世纪时，享有保教权的国家，政府本身逐渐浸染在“理性主义”无信仰的气氛，以及反对教会的思潮中，保教权的危险性，便不可估量了。教会的地位和威望，在极端的危难中深受伤害，无法有效的施展能力，去推展在传教区的教务后，才努力突破困难，从各国政府的掌握中解脱出来。在对保教权作了以上的说明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报告，中南美洲在 17、18 世纪教会的传教情形。

2.5.8 中南美的传教情形

下面把目光回到美洲，看看中美洲的情形。中美洲最早建立的教区是 1620 年的巴拿马教区，南美洲是 1521 年建立的尼加拉瓜教区，然后又在加勒比海岸线建立了若干个教区；1544 年在利玛成立总主教区；1564 年在波哥大，成立第二个总主教区，而中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北部的教区，归属波哥大总主教区。在大西洋沿岸，从巴拿马到智利的各教区，则归属于利玛总主教区。17 世纪初年的 1609 年，在秘鲁区的查格斯，成立第三个总主教区。查格斯就是现在玻利维亚国的首都苏克勒，安地列斯山脉的各教区，都属于查格斯总主教区。在犹加顿半岛上的墨西哥，原本已有 8 个教区；在 17 世纪时，墨西哥的北部又建立了三个教区；18 世纪下半期，又再建立了两个教区。16 世纪中叶以前，墨西哥各教区，全都属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教省，当 1545 年，墨西哥城的教区升格为总主教区后，就成为新西班牙的首席主教区，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

17、18 世纪整个中南美洲，除了巴西以外，皆属于西班牙西属中美洲的教会，继承了 16 世纪所立下的基础，传教士们继续以所谓牧导村的传教方式，教导当地的原住民。这种牧导村在教义、和一般常识的传授上是相当成功的。牧导村的设立，导因于从欧洲来的多民，常给已归化奉教的印地安人带来许多坏表样，传教士便试着，尽量不让新奉教的印地安教友和欧洲人接触，这种隔离政策试行了一段时间，证明效果非常良好，再加以推广。其中最为有名的牧导村，是耶稣会会士所主持的牧导村，村名叫巴拉圭。这种政策也就定名为“巴拉圭隔离政策”，巴拉圭这座村子的一部份，在现今的巴西和阿根廷的国境内。公元 1610 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同意下，巴拉圭开始有了牧导村，西班牙政府规定欧洲人不能进入。这种制度最初创立时，所遭遇到的敌人称为保力斯达，他们是来自巴西圣保禄殖民地上，大规模掳掠印地安人去当奴隶的美斯迪索人，传教士称他们是马梅路克。领导各村的传教士，终于把印地安人武装起来自我保卫。1641 年，对马梅路克给了决定性的打击，从此以后，各牧导村备享太平。耶稣会士所办的牧导村，总数大概在 30 到 32 所之间，可以收容 15 万印地安人，在两位到三位神父指导下生活。这些村庄都具有同样的规模，有一个宽广的长方形建筑和一座广场；街道都以直角相交；街道旁边就是住宅；在广场附近有圣堂、医疗诊所、养老院、学校、寡妇堂和神父的住宅，神父自然就是村民们神灵上的导师及管理員；他们的财产是共有的，每家可以有一处房舍，但是田地、牲畜、工具都是公家的财产；工作也是共同负担，由神父们指导他们工作，每天的工作，是从早上弥撒以后开始，总不超过八个小时，真正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时候还有音乐伴奏。而工作的一切成果也归公家所有，大家的需要则由公家负担，像是衣服、饮食、儿女的教育、娱乐、以及病人孤寡孤独的领养等。印地安人对传教士所教给他们的一切手艺，学习得很快，像是刺绣、制作钟表、印刷、还有像雕刻之类的艺术，他们还在神父的指导下，建造了宽广而美丽的教堂，在教堂里，经常举行盛大的礼节和弥撒，音乐和歌唱的伴奏，都是印地安人所擅长的。他们就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渡过了一个半世纪，人口增加到三十万，他们在神父的领导下，过着幸福而真正的教友生活，连教会的敌人，理性思想家伏尔泰都不禁赞叹惊奇这份特殊的成就。牧导村的成就，却引起了官吏和教会当局的嫉视，因而企图想要加以控制；唯利是图的商人，也以为耶稣会士是在那儿淘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竞争也惹出了一场恶战，摧毁了许多牧导村。反对耶稣会的仇

恨，在 18 世纪越陷越深，终于导致耶稣会被解散的命运。18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耶稣会的被驱逐，他们所办的牧导村也就崩溃了，在原始森林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牧导村的断垣残壁。在其他地区，也有由方济会会士所办的牧导村，尚能继续维持下去。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初叶的战争，分割了南美，牧导村的制度也就无影无踪了。现代历史学家与传教学家对牧导村的批判，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却没有人否认这种制度在当时所有的建树。牧导村里，思想纯正而虔诚的印地安人，他们的生活记录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人提出质问，这些牧导村是否太人工化了？为什么传教士，没有能够及时的培育本地神职人员，来代替他们自己呢？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可能会有这样的答案：与其说传教士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如说，他们仅仅是使当时的人归化信主耶稣的牧者，他们也无法预先知道，原来与他们合作的政府，会突然倒行逆施，逼使教宗解散耶稣会，把他们的工作完全摧毁呢？假如我们把殖民时代的牧导工作，当作一个整体，那么我们会说，这方面的成功很大，当然，我们也单独查看某一方面，今天的拉丁美洲，能有一亿以上的正统天主教教友，几乎占了全世界天主教友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殖民时代牧导村工作的成果啊！

2.5.9 天主教回到中国

元朝覆亡，明朝建立后，不知为何，天主教在中国竟然销声匿迹，似乎未曾存在过一样。这一消失便是将近三百年，直到公元 1582 年，才有耶稣会士重新踏上中国土地。

1557 年，明朝嘉靖三十六年的时候，葡萄牙人开始在中国澳门定居。九年之后，澳门也设立了一个耶稣会的会院，过不久，这里又有了一位主教。当初，葡萄牙人在澳门传教时，都命令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剪去长发，并照葡萄牙人方式穿衣服和生活。1578 年，耶稣会东方传教区视察员范礼安前往日本视察途中来到澳门。这位知识渊博、深具远见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在澳门住了八个月，深得当地中国人的敬重，于是决心立刻着手向中国人传扬福音。他深深以为过去传教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准备，对中国语言文化一知半解。所以，他认为：与其使中国人葡萄牙化，不如使传教士中国化。要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中国的语言和风俗。于是范礼安神父先召来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要他先学习中文。随后，又从印度召来另一位年青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充当罗明坚的助手。他们两人于一五八二年出发，进入中国内陆，设法逐步北上，前往北京。罗明坚神父於六年后，即 1588 年回欧洲，拟请求教宗派遣使节到中国，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有再回中国。因此，中国的教会事务完全落在利玛窦身上。而利玛窦则苦心孤诣，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计划，终于分五个行程步骤，于 1601 年抵达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九年，于 1610 年去世。

利玛窦一进入中国之后，首先到了肇庆，他逢人便称自己是来自印度的僧人，而且效法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行径，剃发为僧，穿袈裟。利玛窦的心在北京，所以他的种种行程活动皆以抵达北京为最终目标，其他各地只是他的跳板而已。他每到一地，便广结善缘，为自己的前途铺路。抵达肇庆后，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的社交生活相当成功，他们便趁这样的良机，把天主教的信仰初步地介绍给中国人。从肇庆又辗转来到江西的韶州，在这里，利玛窦终于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必竟不同，日本人非常尊重和尚僧侣，出家人在日本当时的社会中身份和声誉都很高，但在中国则不尽然。所以，他当初效法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作风，以僧道人士与中国社会来往接触并不理想，于是去袈裟，开始蓄发留胡，改穿丝绸长袍，带方巾，一切习惯举止都以中国士大夫为典，俨然像一位儒者。利玛窦之所以作这外表改变，因为他在中国住久了以后，发现中国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社会上真正受重视、受尊敬的人是文人学士。所以，为能受到中国人的接纳，尊重和听从，利玛窦非以儒者学士姿态出现不可。当然，利玛窦并不是冒牌或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他切切实实地下功夫，深入研究中国语文、古典文学与思想，进而与士大夫和宦官人士交往论学。他终于发现儒家思想比佛教和道教更接近天主教的教义，而向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传扬福音，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传教效果，因为中国人以读书人马首是瞻，读书人信奉的宗教必定可信。就这样，利玛窦一方面把

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文人学士，一方面又把天主教教义介绍给他们认识。他在文人朋友的协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名叫《天主实义》的书，后来发现大受欢迎，又印了数千本分发。就这样，天主教教义在中国开始传扬开来。

此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坎坷非常，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祭祖先、祭孔便是最大的关键。其次，用什么文词来表达教会的信仰，才不致使天主教的教义和中国其他的宗教教义混淆，这也是当时很困难的事情。还有，怎样培育中国的神职圣召呢？是不是要使用拉丁文呢？这都是问题。1615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后第五年，保禄五世教宗批准把圣经和教会用的礼仪书籍翻译成中文，但是礼仪中国化从未出现过。此后，西方耶稣会博学之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相继入京，甚至在朝廷供职，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与信仰的桥梁。十七世纪末年，中国已有二、三十万天主教徒，也有一百二十位西方传教士。不幸的是礼仪之争和葡萄牙保教权与罗马传信部之间的管辖权之争，令中国皇帝感到厌烦，终至惹起官方的迫害，只有在北京宫廷供职的耶稣会才学之士得以幸免。

2.5.10 韩国的传教过程

中国的保护国高丽，也就是今天的韩国。在17、18世纪的清朝时候，它也是一个封闭自守的国家，禁止外国人入境。17世纪时，传教士曾多次试着进入传教，都总是失败，铩羽而归，到最后，信德的种子是经由中国人传入的。由于高丽每年都派遣使臣到北京去进贡，高丽的使臣，因而有机会认识了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并且还从这些会士的手中，获得了有关天主教的许多中文书籍，其中，好几位学者，就是因为阅读了这些书本而认识了真理。公元1784年，高丽国到北京朝贡的使节团中，有一位团员在北京当机立断，在北京接受了圣洗圣事，他姓李，领洗后人们称他为李·伯多禄。他回到高丽以后，曾经劝化了好些人进教，不料刚诞生不久的教会便受到了迫害，其中还有好些个新教友，获得了殉教致命的荣冠。许多新教友觉得只靠书籍的帮助，对认识教义相当不方便，同时，还要求当时在北京的主教，派遣神父到高丽去传教，北京主教回信指导在高丽的教友们，如何善用已经有的书，同时，也答应派中国籍的神父。一直到18世纪末的1795年，才有一位名叫周文谟的中国神父进入高丽，周神父到达高丽，发现已经有四千多教友，经过了七年艰苦的传教后，教友人数增加到一万。1801年的教难时，周神父和三百多位教友，英勇的殉教致命了，从此以后直到1834年这30多年，高丽的教会，在没有神父的情况下继续生存，这支没有外国传教士开教，而由中国教会所产生的新枝，恐怕是天主教传教历史上仅有的，唯一的例子。

在中世纪末叶，以及近代行将开始的一段时期内，圣教会所应战胜的危机，恐怕是从公元第四世纪所产生的亚略异端以来，最严重可怕的了，尤其是因为来自教会的内部，所以才更加的严重。这种危机肇端于西方的大分裂，教友不慎染上了自由思想，以及异教古代伦理学家的风气，又因为当时道德水平的低落，甚至波及到教宗宫廷的内部。等到马丁·路得起来而反抗天主教传统的道理时，所造成的结果是，人欲横流，一发不可收拾。在社会的扰攘中，北欧大部份的民族都脱离了罗马，好在建筑在磐石上的教会是不会动摇的。教会在特力腾大公会议中，庄严而勇敢的面对全世界的挑战，作了全面的检讨，再一次的论断了教义，立定了法规，全面的展开了革新的工作。虽然说，在一切努力之后，仍然存在着一一些弊端，但是，最大多数和最严重的弊端已经绝迹。由于努力推动特力腾大公会议的议决案而复兴和刷新的教会，仍然屹立着，继续在普世为圣化人灵而工作。教会的活动，已不只限于老教友的国家，传教的精神从圣方济·沙勿略以来，一直是生气蓬勃。16世纪末年的地理大发现，给圣教会开展了新的活动园地，传教士们跟随在这些探险家的后头，有时候更冒着危险，走在探险家的前头，把福音传给新发现的民族。16、17世纪中，中美、南美和菲律宾群岛都投进了圣教会的怀抱；在亚洲方面，圣方济沙勿略的足迹，从印度、麻六甲、印尼一直传到日本；利玛窦在中国；陆德神父在越南，都先后建立了教会。教廷在1622年建立了传信部，收回了远方传教的权力，更为远方传教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量。17世纪的教会，一片欣欣向荣

的景象，对全世界都发挥了她的影响力。到了 18 世纪，新的异端邪说，像是扬森主义、寂静运动引发了无尽无休的争辩，问题已不在教义的某点某端，而是信仰基础的本身。以前藏头缩尾的不可知论、唯理主义，在 18 世纪，却大摇大摆的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影响到西方知识界。他们认为，除了人的理智，所显然能够理解的以外，他们都不再承认，把一切有关启示的宗教抛诸脑后。18 世纪末叶，教会的命运好像是大受打击，知识界中，所谓的优秀份子都似乎跟着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等人而远离了教会，教宗的声威也大打折扣。

天主教国家的君王，以保护教会为借口，实际上是利用教会，以达到他们的野心和目的，他们甚至压迫教宗，解散最忠于教宗的耶稣会。传教区的前途也不是很乐观，16、17 世纪的那股传教热火，也大为降低。西方各修会的精神显得衰退了，传教的圣名也大为减少了，在东方的中国又产生了不幸的礼仪之争。在这 18 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一切的纷争和不如意，或是停滞不前的现象，正预告着教会将面临一场更为艰难的挑战。果不其然，法国在 1789 年爆发了大革命，它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取消了贵族和高级神职界的特权，教会也因此经历了一场大风暴。令人惊奇的是，圣教会通过了这场大考验。在物质上，固然是显得贫穷寒酸了，不过却切断了，教会和政权之间的那条纠葛不清的锁链。从此以后，却使圣教会更能自由自在的，全力从事人类超性精神的职务了，专心从事宣传福音，拯救人灵的工作。教宗和整个教会的声望，反而继续不停的增高，教会在教宗领导之下，也将重新开始加强内部的整顿，和拓展耶稣基督的神国的伟大事业。